



中共党史人物傳

第二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編



国防大学 2 064 3847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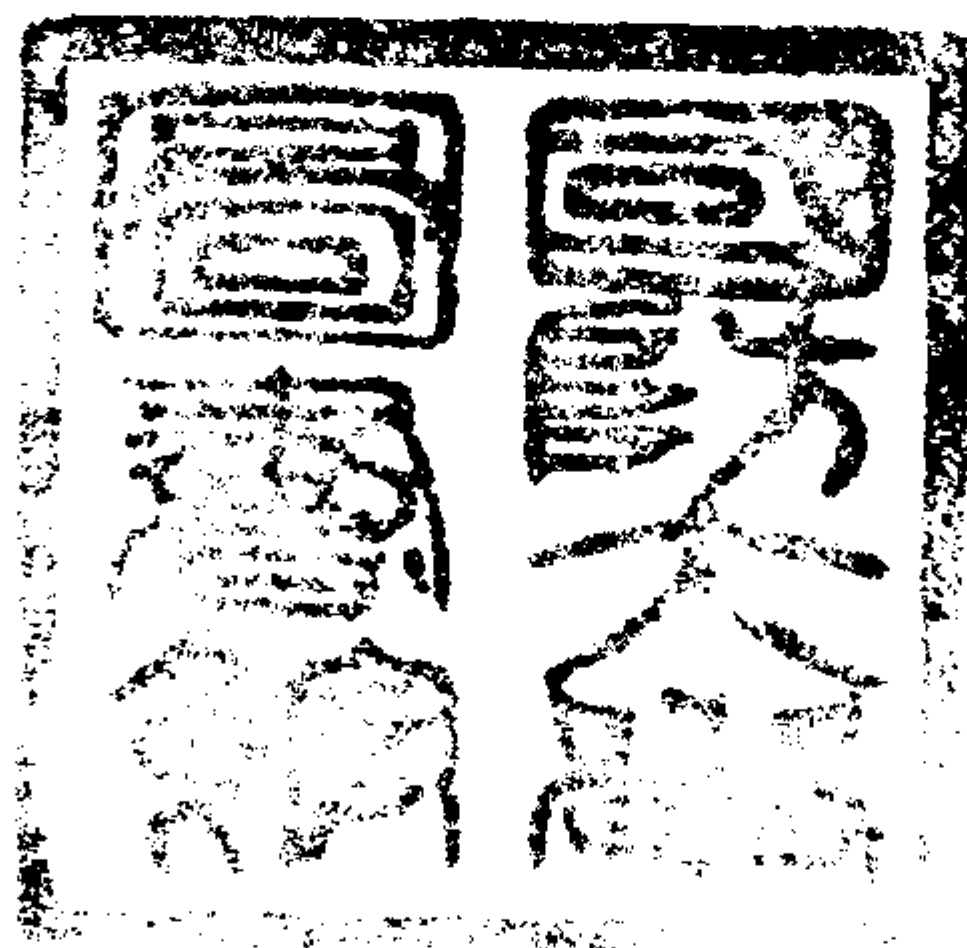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会长 何长工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二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会长 何长工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11 字数 270000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精) 5311—8510

ISBN 7-244-01620-9/K·229

定价: (精) 5.60 元

副 会 长：李 新 胡 华

副 主 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成员：胡 华 彭 明 陈志凌 杨世兰
马洪武 王德宝 王 敏 方大铭 巨彩丽
卢 权 刘富恒 李育安 杨源贵 何鹄志
张广立 陈瑞云 范寅铮 郑洪泉 南 岗
郭洛夫 曹木清 蒋伯英 翟作君

责任编辑：郭洛夫 王 敏

智勇兼优
光明磊落

怀念皮定均同志

李先念

一九八四年五月

李先念同志给皮定均同志的题词

多谋善断
英勇虎将

徐向前

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

徐向前同志给皮定均同志的题词

题词

永远怀念亲密的战友，我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人之一，红六军军长段德昌同志。

段德昌同志生平为革命事业竭尽忠诚，茹苦含辛，效劳祖国。

他虽壮烈牺牲，但他的功绩，他一生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却深深地永铭在人民的心中。

何长工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日于北京

何长工同志给段德昌同志的题词

蔡会文同志是湖南人民

参加革命的先驱者，是共

产主义好战士。

耿

飏
五月廿四

耿飏同志给蔡会文同志的题词



李 求 实



皮 定 均



赖 经 邦



孙 津 川



王 尔 琢



宛 希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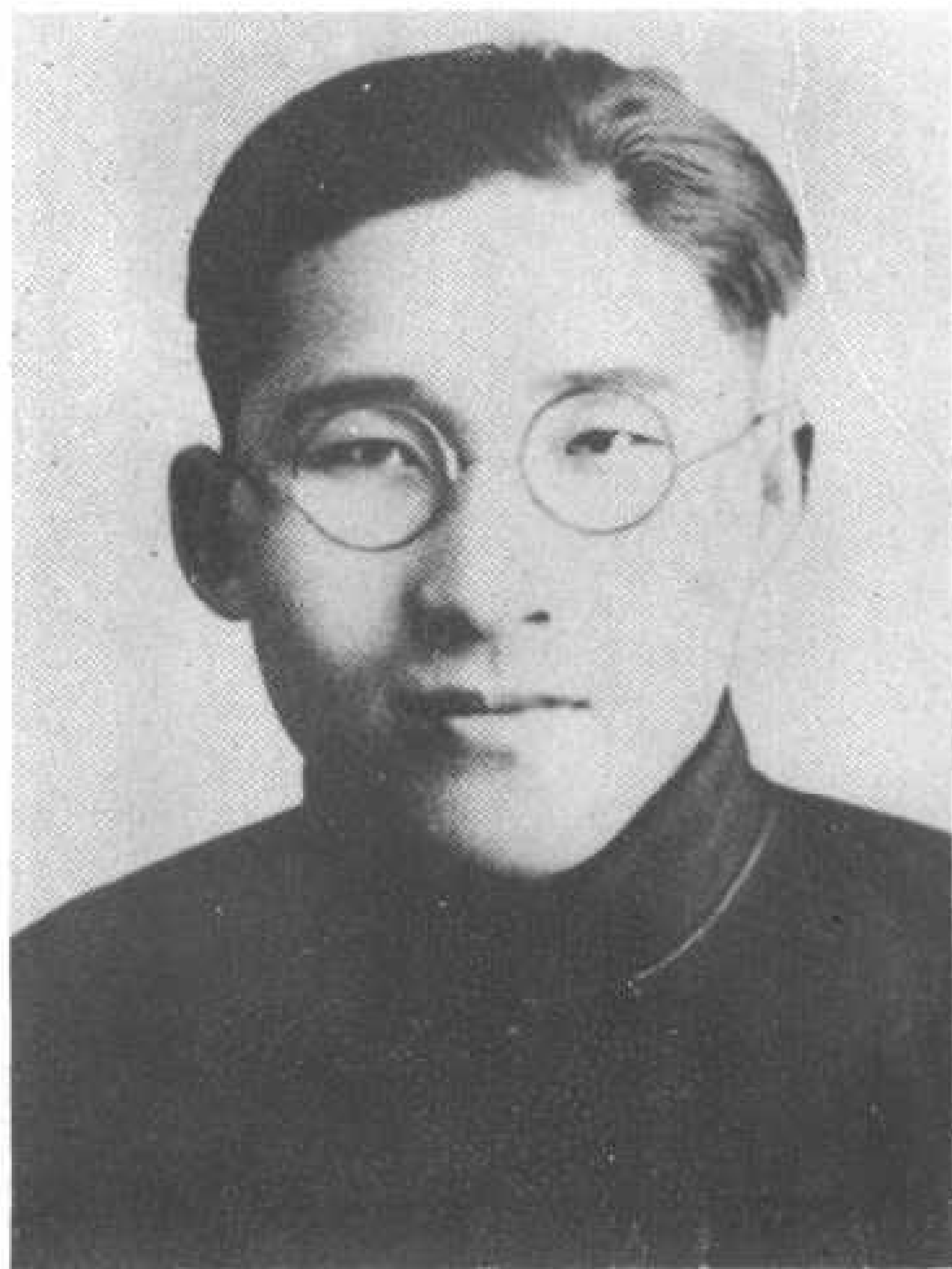
龙超清



王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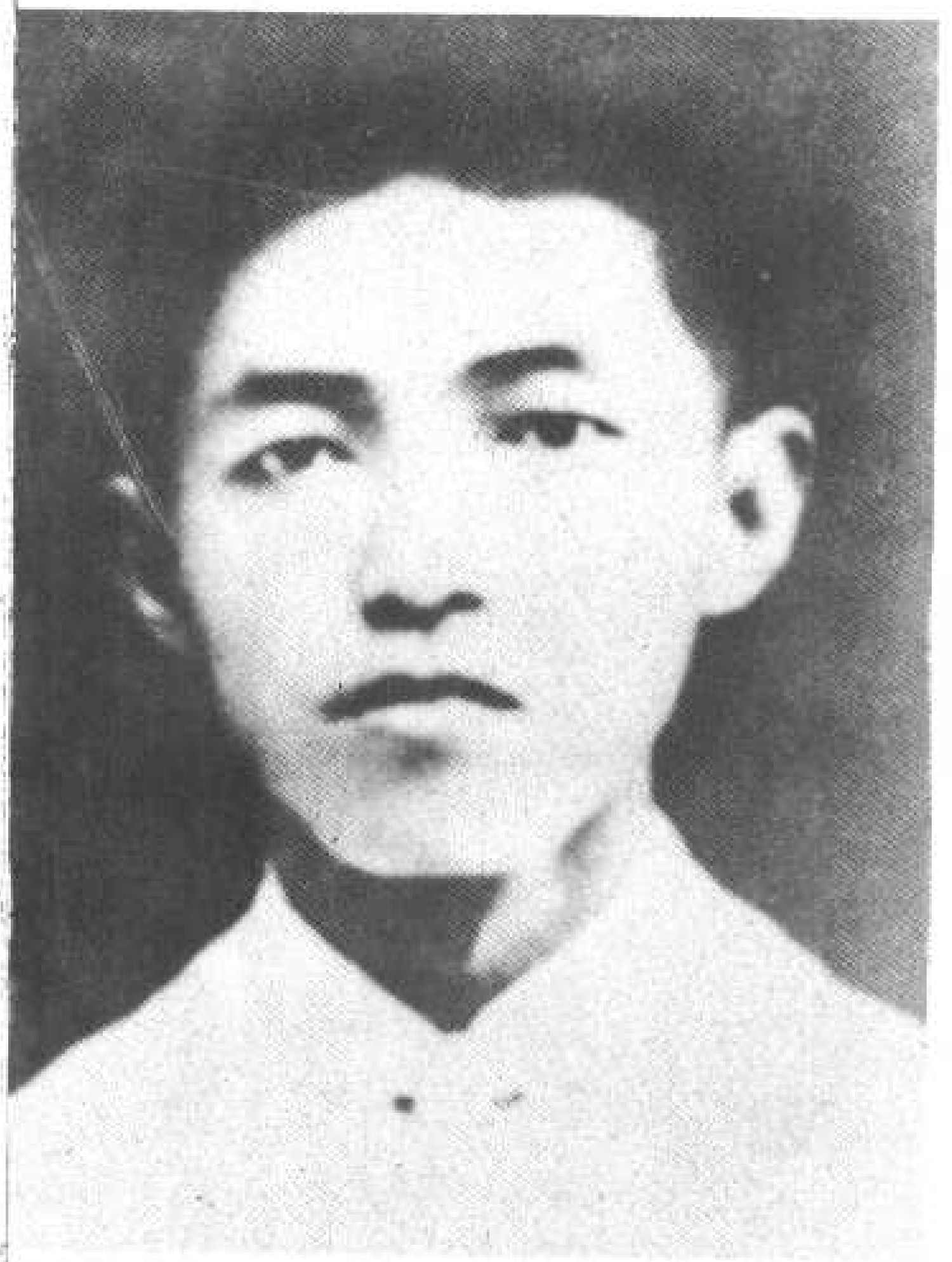
余 贵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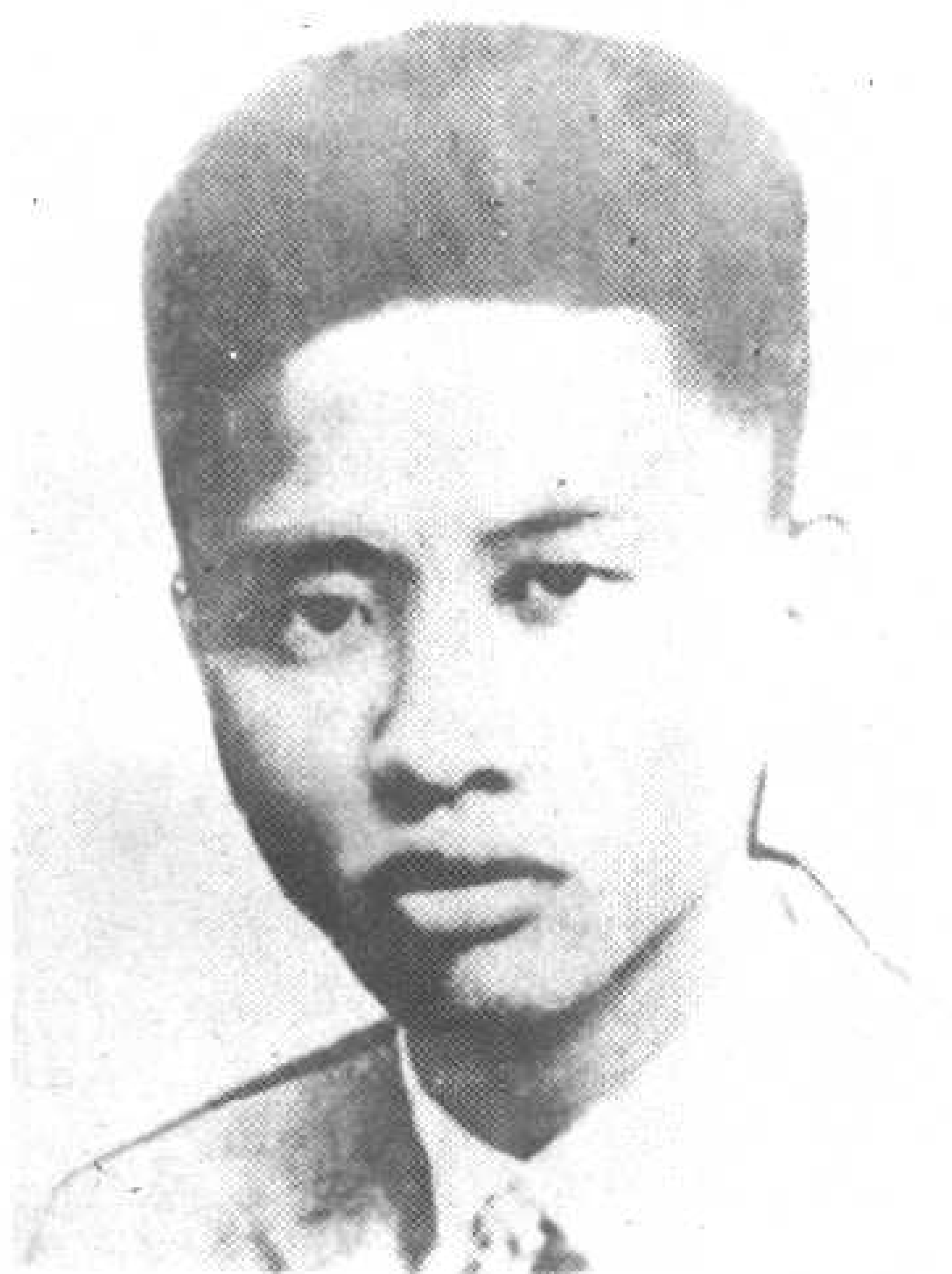
张 焱



段 德 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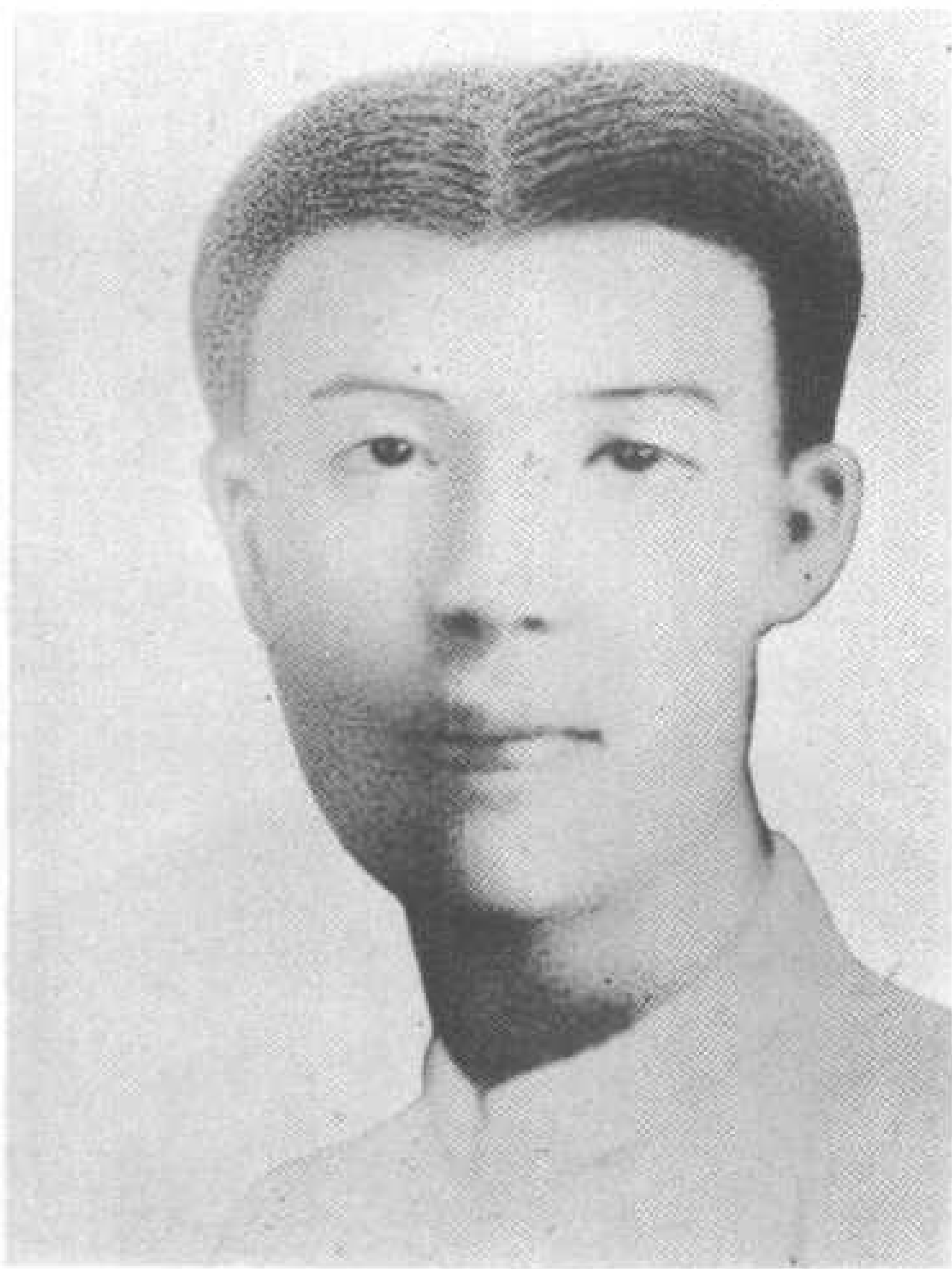
沈 泽 民



马立峰



梁柏台



蔡 会 文



贺 炳 炎

说明：本卷缺胡少海、郑义斋烈士照片

目 录

李求实	虞崇胜	李良明	田子渝	(1)
皮定均			台运行	(33)
赖经邦		汪俊生	沈庆鸿	(66)
孙津川	陶秀英	张永坤	史 雯	(77)
王尔琢		宋俊生	刘晓农	(88)
宛希先	王弟俊	桂遇秋	陆登霞	(100)
胡少海	张兆声	汉 涛	陈仙海	(113)
龙超清		刘晓农	宋俊生	(131)
王德三			徐继涛	(147)
余贲民			徐许斌	(161)
张 炽			汪涵清	(180)
段德昌		涂英伟	柯 果	(197)
沈泽民		武英林	李良明	(241)
马立峰			邱吉明	(270)
梁柏台	陈 刚	袁相标	俞水平	(281)
蔡会文		谭运湘	刘普庆	(308)
郑义斋			刘炳强	(336)
贺炳炎			方 城	(353)

李求实

虞崇胜 李良明 田子渝

(一)

李求实，原名国纬，字北平，乳名伟生，笔名伟森，求实是他参加革命后取的名字。一九〇三年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日趋潦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秉之，虽为晚清秀才，但屡试乡试不中，在求实出生不久，举家迁居武昌，以教书为生。母亲赵氏，于一九一八年去世，家务由继母主持。李求实有兄弟姐妹九人。大哥李国纲客死他乡，二哥李国纪不幸溺死，三哥李国经因婚姻失意自杀，大姐李国梅出阁不久病故，二姐李国兰因对婚姻不满和生活艰辛，服毒自尽，还有一个妹妹早丧^①。家庭经济的艰难和兄弟姐妹中的不幸，曾在李求实的心里烙下痛苦的印记。因此，他从小就懂得艰苦，爱惜衣物，以减轻母亲的劳累。他每天上学，总是将稻草裹在布鞋上，不使鞋底磨损。放学归家后，又将稻草藏好，以便明天再用。后来母亲知道此事，曾流着泪对人说：“我的几个孩子里，只有这

^①1982年12月22日访问李国楸记录。李国楸为李求实的幺妹，原武汉市三十八中教师，现退休在家。

个小儿子最懂事，最能体谅人。”^①

李求实求学勤奋，为师生所称道。他无钱买书，常于课余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武昌出售部博览群书。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即报考武昌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有人笑他“不自量力”，但揭榜时却名列前茅。他的领悟力特强，一年竟把高商三年的课程全部学完。一位曾被她请来教数学的老师看到他一学就会，十分惊叹道：“象你这样的学生，我怎能教你，你还可以当我的老师呢！”^②

这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荡涤神州大地，李求实也深受其影响。他反对学校在学生中鼓吹孔孟之道；愤怒谴责封建礼教使他的二姐李国兰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并画了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跪在地上作祈求状的画，以表示对二姐的同情。他经常鼓励幺妹李国楬应该自立，敢于做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并投入到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中去。

(二)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李求实和高商的同学们，同恽代英、林育南一起，积极行动起来，投入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参加集会游行，足迹遍阅马场、司门口、黄鹤楼等处。特别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发生后，面对湖北督军王占元的血腥镇

①参照陈修良：《回忆李求实烈士》，见《党史资料》1955年第1期；农菲：《忆李求实同志》，见《老共青团员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②1982年12月22日访问李国楬记录。

压，李求实和恽代英、林育南等进步青年，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紧密地团结各校学生，背着铺盖，夜卧街头，将湖北督军署团团围住，要求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学生，终于迫使王占元作出让步，答应释放被捕学生。随后，他们又发动武汉商界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进一步迫使王占元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后，李求实受到恽代英计划组织青年在一起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尽所能，各取所需”^①的新生活的影响，也想脱离学校，去寻求新的生活之路。他在一封给高商校长的信中，尖锐地抨击旧教育制度是“腐败透顶，贻误青年”，表示以弃学来与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他写道：“全部讲义原封退还，幸好我未沾染它的一点气味！”^②不久，在恽代英的帮助下，他离家到湖北黄陂县北乡木兰山余家大湾正谊小学教书。离家时，他给父亲写了一封近万言的长信。“信中痛诋旧社会的罪恶，罄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军阀欺压人民的事实，分析多数中国人贫困的原因，明白地提出改革旧家庭的具体意见。”^③这封信情真意切，真挚感人，以致他父亲将孩子们召集一起，反复朗读，舍不得放手；邻里、师友闻讯，也“踵门索取，争相阅诵”^④，无不为之动容。

同年秋，李求实去湖南活动。他先到常宁水口山铅矿调查，写了《水口山铅矿调查记》，发表在《湖南》第一卷第三期上。这篇调查，详细介绍了该矿的组织、历史、近况以及工人工资等情况，并“尽情而吐，无所忌讳”地提出了对该矿的改

①见《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674页。

②③④见陈修良：《回忆李求实烈士》。

进意见。

一九二〇年二月，湖南长沙学生开展没收和焚毁日货的斗争，遭到军阀张敬尧兄弟的镇压。李求实目击此事，胸中极为愤慨。他针对张氏兄弟说什么“没有对不起湖南人民的地方”的虚伪表白，撰文讥讽这种演说是当众撒谎，“尤为可笑”；并痛诋张敬尧之所谓“仁慈礼让”、“爱护学生”、“积极筹办教育”，不过是用以掩盖他搜刮民财的“手段”而已^①。

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后，李求实继续揭露其“搜刮民财，以充个人的欲望”的罪行；一面为湖南的善后提出意见。他在撰写的《湖南善后问题》一文中，认为湖南经过张敬尧的历年搜刮，“真可谓民穷财尽矣”。而医治创伤的方法，只有从开源节流，整理财政入手：如“裁减军队”；“裁并厘金关卡”，“增加出口”；“整理湖南银行，以巩固金融之基础”；“整理田赋”等。当然，他并不认为这些都是能做到的好方法，所以他在文章最后提出，要谋求湖南“今后之解放，亦在湖南人自身”^②去求解决。

这时的李求实，虽然对社会政治有着力求改革的进取精神，但多少染着改良主义的色彩，这在他写的《争自由》和《自治乎人治乎》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文章一方面深刻地指出自民国以来，国家内乱、人民受苦的根本原因，在内是“武人弄权，政客捣乱”^③；在外则是西方列强的“干

①李求实：《湖南学潮之前因后果》，载《湖南》第1卷第4号。

②求实：《湖南善后问题》，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4号，1920年7月25日。

③求实：《争自由》，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6号，1920年8月25日。

涉”，尤以“日本干涉为最”^①；另一方面提出中国要达到自治自强的途径，只有提倡言论自由，实行临时约法，推行责任政治等。不久，李求实回到武昌，参加了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利群书社除代售《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外，还出售《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等书，是长江中下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李求实因而有机会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并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〇年秋天，恽代英应章伯钧的邀请，赴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执教。李求实同吴华梓、刘茂祥三个利群书社的成员，随恽代英来到宣城师范当附读生，实际帮助恽代英工作。他和同学中的积极分子郑求坚、王子堂等，组成“求我社”、“互助社”、“觉社”、“爱智社”、“新群社”等进步小团体，作为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场所。这些团体中的青年，后来大都成为安徽党组织的最早成员。

一九二一年五月，恽代英被宣城反动势力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而下令通缉，只得离开宣师。李求实同吴华梓等六、七个青年学生，跟着恽代英在泾县南陵及黄山山区作了为时半月的农村调查，初步懂得了农村的经济情况、农民同地主的租佃关系和剥削关系，对农村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随后，李求实去湖北黄冈浚龙山浚新小学教书。浚新小学也是恽代英等创办的又读书又劳动的新生活据点和实现乡村教育的试验场地。李求实同利群书社成员唐际盛将浚新小学办得十分活跃，仅招收女生入学一事，就在黄冈乡间引起很大的震动。

社会的实践，使利群书社的多数成员逐渐认识到他们以前

①求实：《自治乎人治乎》，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1920年9月10日。

的种种作法，不过是一种空想，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阀豪绅地主的统治。他们决定仿效苏俄革命党，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组织。在恽代英等的倡议下，七月十六日到二十日，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四名青年聚集于浚新小学，讨论成立“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宗旨的“共存社”^①。李求实任总务股编印干事。“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这些进步青年的世界观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同年十月，恽代英受聘到四川泸县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李求实又跟随恽代英去那里附读，继续帮助恽代英从事革命活动，并由恽代英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共产党^②。

(三)

李求实入党后，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秋，他从四川回到武汉，参加中共武汉区委的工作，负责编辑《日日新闻》，从事武汉地区工人状况和工人斗争的报道。十月，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教育副主任委员。十二月十日，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汉冶萍工会在汉阳三码头老街举行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称颂“劳工神圣”之后，着重提出工人在同资本家、军阀、官僚作斗争中应该注意的两件事：第

①见《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②李求实入党的具体时间、地点待考。据吴华梓回忆，他是1922年由李求实介绍入团入党的，李求实是恽代英介绍入党的。由此推定，李求实入党时间当在1922年。

一，工人解放运动，“不是说把资本家、军阀、官僚推倒，工人自己起来做资本家、做军阀、做官僚，来掠夺、压迫、防阻其他人”；第二，要特别注意混迹于工人中的工贼，一旦发现，“应该不饶他，应该把他驱逐出工界，不承认他是神圣的劳工，至少应该不许他参加我们工人的解放运动。”^①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晚，李求实同陈潭秋、施洋、林育南、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武汉各工团以及新闻界、学生界的代表一百余人，从江岸乘车北上，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全体代表冲破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军警的封锁，齐集普乐园戏院会场，按时召开大会，庄严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下，举行了总同盟罢工。二月七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后，李求实根据党的指示，以记者身份来到上海，动员各界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正义斗争。二月中旬，当施洋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的消息传到上海，李求实“于万分痛悼之余”，连夜奋笔疾书，写成一篇《施洋底死》的战斗檄文。文章首先讴歌了施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英雄业绩，指出：“施洋在‘五四’运动中是中坚分子，在湘鄂自治军驱王时也曾效力军前，在一年来的湖北劳工运动中，老实说，却也很尽了一番心力。他对于为民众争自由、去蠹贼的种

^①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185页。

种运动中，真算得‘鞠躬尽瘁’！”然后，文章极力鞭挞了军阀肆意屠戮工人群众的累累罪行，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谋我们大家的幸福”！文章最后针对吴佩孚、肖耀南说什么“杀了施洋，湖北可无工潮”的叫嚣，庄严宣告：“施洋的死，乃是全国民众合力打倒军阀、建设新国家的导火线。”①

这年四月，李求实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派遣，来到安源，担任安源团地委的宣传科长。他认真调查情况，编写宣传材料，并到团员和青年中去演讲。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富有哲理，深受欢迎。譬如，他把有的工人抱有盲目骄满情绪，比做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如果乱撞乱碰，就要撞死别人，也要毁掉自己。他接着引申说，无论做什么事，盲目骄傲，有勇无谋，终于是要失败的。在安源，他还兼任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文书股长，并主编《安源月刊》，工作做得有条有理。俱乐部代理主任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报告中，谈到文书股时说：“文书股五易其人，各种文件及手续算是糟极，全无一点整理。往来公函布告杂件等底册，均无完全保存。各股的报告及表册统计等，也无一个很整齐的规划。但自李求实君任股长后，前弊已消除。”②

为了加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李求实协助刘少奇对俱乐部成立以来组织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写成了《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对俱乐部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采用“民主集中制——极严

①以上见1923年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2页。

密地组织自己的团体，才能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厮拚，才有战胜的一日。”^①九月，当安源路矿工人庆祝大罢工胜利一周年时，李求实在参与写作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中，明确地告诫工人不要骄傲，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不仅是同欧美无产阶级一样只须从资本家镣铐中解脱出来就算完事了，还须加倍努力，更非解除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殊不足以言解放。”^②在李求实主持编写的纪念传单里，更清醒地指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和资本家争斗最有效力的武器是团结起来。我们去年有了团结坚固的俱乐部——就是团结坚固的一万工友——我们才能压倒军队的气焰，战胜资本家的压迫！”“我们今天以后唯一的依傍是我们的俱乐部；我们今天以后唯一重要的责任便是拥护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应该把俱乐部当自己的生命一样拥护他！”^③

李求实在俱乐部里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工人群众的赞扬。在安源工人中广为流传的一首长篇历史叙事诗——《劳工记》^④，曾对他这样称誉道：

部里秘书李求实，
一切文件他写出。
上海报馆调得来，
罢工文件早安排。

.....

①②④见《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第46、110、130—131页。

③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罢工胜利的传单》。

求实秘书好调对，
传单宣言早准备。
派人四处发传单，
使得各界把心安。
.....

(四)

一九二三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李求实出席了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即由安源调到上海团中央工作。

次年四月，团中央局常务委员会成立，他任农工部主任。这一期间，他对国际政治关系和世界历史进行了研究，先后写了《煤油与国际政治关系》、《爱尔兰独立战史》、《俄国革命与农民》等论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李求实被派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期间，他还任团中央驻莫斯科总代表，并经常去帮助在莫斯科的中国工人同志补习文化。后来，他在回忆这次学习情况时说：“这次学习对自己教育意义很大，开始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共产主义曙光，明确了今后的道路，对今后工作有决定作用。但可惜时间太短，一切还要靠今后的继续努力。谁要认为到了莫斯科这革命圣地，就取得了真经，自认为了不起，不是狂妄，便是糊涂，毕竟会害人害己，要辜负党的培养的。”^①

^①转引自农菲：《忆李伟森同志》。

一九二五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后，李求实奉团中央之命，中断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提前回国，在上海编辑《中国青年》杂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认清当时的形势，他在《中国青年》上先后发表《特别关税会议》、《政治之最近一幕》、《十四年之回顾》等文章，对民国十四年来的形势作了深刻分析，对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奴役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作了有力的揭露。他指出：“所谓民国的十四年，只是一卷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着祸国残民的影片而已。军阀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总不惜任何牺牲——国家的主权呵，人民的生命呵，什么也值不得他们顾忌！于是帝国主义乃得利，用他们以扰乱宰割中国。……近十八年来，尤其是民国以来，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早已是中国政治舞台的后台老板，一切骚乱的根源。”^①他还针对一些青年对北洋政府的糊涂认识，着重指出：“北京政府和军阀是一伙儿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者藉以侵略中国的工具。”^②这些透彻的分析，有助于广大青年提高认识，并积极投入爱国反帝斗争。

在青年应当怎样才算爱国的问题上，李求实还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御用文人胡适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年九月，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和《答刘治熙》的信，说什么“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青年学生“跟着大家去呐喊，只能算是发发牢骚，出出

①求实：《十四年之回顾》，载《中国青年》第100期，1925年10月10日。

②求实：《政局之最近一幕》，《中国青年》第96期，1925年9月21日。

气，算不得真正的爱国”，“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个东西”，完成“救国事业的准备工夫”等等。

为了驳斥这些谬论，李求实特意写了《评胡适之的“新花样”》^①的著名论文。他指出：“真正的民众运动是有力量而且能持久的，因为它有共同的目标、严密的组织、领袖和继续不断的努力。”因此，青年们“应该努力参加民众运动——明显地指出他们——民众——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严密地组织起来，为他们寻出忠实的领袖，继续不断地加以鼓励”。他还指出，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简直是帮助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来分散民众的革命势力”。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势已经到了极危殆的地步，犹如根基已不稳固的一栋破旧房屋将要倾塌一样，不是一点零碎修葺所能挽救的，而须根本改造。中国的病，目前不可能乱投药，而只须一剂最有效的圣药来医治，这剂圣药便是组织民众起来从事革命。”因此，即使在学校里读书的青年，由于经济和环境的限制，也很难安心学习。“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有用’的东西，是真能‘到民间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并能领导民众的革命者，革命者只有在革命活动中才能铸造成功的。”

这年冬，李求实离别上海，来到河南开封，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河南区委书记。开封为中原腹地，故国古都，黄河擦城而过。每逢下乡，他总要到黄河大堤上散步。千里奔腾的黄河，激动着他热爱祖国的火热的心。他用《黄河大堤晚眺》为题，曾写下如下的诗篇：

^①载《中国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

大河经百徙，
故道尚微茫。
白苇连岗蔓，
金沙卷地黄。
壮观惟叠浪，
乡思在遐方。
笔阵凌空起，
桑乾渤海旁。

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李求实又调到上海，担任《中国青年》主编。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最激烈的时候，他即以《中国青年》为阵地，陆续发表文章，针对国家主义派的种种谬论，一一进行驳斥。

首先，他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共产党和共青团包办群众运动”，说什么“与共产党难于合作”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并不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包办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用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因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的民众的幸福”，“是为的被压迫的民众，他们没有纯粹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成功是民众的，失败亦是民众的”^①。因此，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们，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包办不包办的问题。他还指出，共产党和青年团是致力于各党派的合作的，是致力于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过去他与工人、学生、商人、士兵各界的合作都有相当成绩，并没有人怎样觉得

①求实：《我们的功罪——斥醒狮派诸领袖》，《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4月20日。

共产党是难于合作的”^①，恰恰相反，不要合作的正是国民党右派、新社会民主党和国家主义派。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他们的眼中钉；共产党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去做反革命，他们便高叫共产党难于合作了”^②！

其次，他针对国家主义派别有用心地散布“不要迷信什么领袖”，否则群众运动便“有被人利用的嫌疑”的谬论，严肃地指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有领袖，而且必须有领袖。“我们应该知道，革命运动即是一种战争，所以革命的民众应如军队一样，亦需要司令部与参谋部”^③。而共产党所以成为革命民众的领袖，是因为共产党员愿意牺牲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并且制定出正确的方略，因此，革命民众愿意奉共产党为领袖。

再次，他为了彻底撕破国家主义派自称“彻底革命者”、“青年运动领袖”的假面目，尖锐地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思想落后的‘士子’们，受不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压迫与欺凌，但又缺乏革命的勇气和决心，以致彷徨无主，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因而催眠之、利用之。结果，这些‘士子’们便都倒到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怀里，做着他们的忠臣，专一与革命的势力为难！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说广东赤化了，这些‘士子’们也应声说广东赤化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说五卅案完全是共产党人闹的乱子，这些‘士子’们也应声说‘这是正确’的……”^④。

①②求实：《五卅什话一束》，《中国青年》第126期，1926年7月10日。

③求实：《近来颇有些妄言家》，《中国青年》第126期，1926年7月10日。

④求实：《国家主义派的“实际行动”》，《中国青年》第125期，1926年7月3日。

这就将国家主义派作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应声虫的嘴脸暴露无遗。

李求实对一切反动的思想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对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却极力加以讴歌和颂扬。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写的《红色的五月》^①一文，倾注了对人民革命的真挚感情，给人以振奋和鼓舞。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节录：

在约六年前，东方的被压迫者已经遥见了一座红色之塔，他们挣扎着，奋斗着，他们投入了他们最初牺牲的肉和血，红色之塔已经在每一个东方劳动者的眼帘中显现。我们在各地都听见了“五一”示威的呼声——每一年更雄伟更激越的呼声！东方劳动者喊出了他们百十年的沉冤，他们要求得人的生活，他们要——还多呢！实在，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有钱人的大对头，他们真像一匹睡醒了的狮子一样——不呵！他并不曾睡，他以前只是被人压迫着，束缚着，现在他自己要挣扎了，同时和他同命运的狮子都要挣扎了，吼声已经震破了“主人”的耳鼓，“主人”张惶失措，“主人”要丧命在群狮的趾蹠之下了！“五一”运动——这次是庚子以来，中国被压迫民众反抗外国有钱的人压迫、求自己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的第一声！这次运动使我们“红色的五月”之塔放出了新的光焰！从新的光焰当中，我们更寻出了新的出路。

从此革命潮流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当中奔腾澎湃，

^①载《中国青年》第121期，1926年5月30日。

急转直下，遂爆发而为惊心动魄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将我们的“红色的五月”之塔培修到光芒万丈直冲云霄了！

在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春天，我们是朝日，我们也会遇着雨雪，我们也会遇着云霾，然而我们的生气是日益蓬勃的，我们的光芒是永远四射的，只要我们看过去一年中各地民众运动的兴起，我们是毫不疑虑地相信我们自己的光明之前途的！

李求实热爱青年，关心青年，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他在编辑《中国青年》时，特别注意对青年运动、青年的学习和斗争的指导。例如，青年学生应怎样认识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就理论上说，学生多半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本身并无经济基础，对于一切的政治观念，极易动摇，他们可以革命，也可以从事反革命，但是在今天这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学生自然都要趋向革命的”。“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出学生几乎是站在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上。”^①同时，他也指出青年的缺点和不足，说：青年中最大的缺点是“耽于空谈，怯于实行，好理论，恶行动”。例如谈到“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实行全民革命”，“青年应该到民间去”等问题时，雄辩滔滔，煞有其事；可是一到应该“干”的时候，便不见了他的踪影，仿佛他的责任只在“空谈”，“实行”则是另一部分人的事一样^②。他认为，这是妨

①求实：《我们的功罪——斥醒狮派诸领袖》。

②求实：《怎样才能“到民间去？”》，《中国青年》第128期，1926年7月24日。

碍青年前进的一个最突出的缺点。

怎样克服这个缺点呢？他指出，关键的问题就是能否“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他还提出许多与工农结合的具体办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革命目的、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革命的对象等。二，做好切合实际的宣传工作，办一些有益于公众的事情。如利用暑假组织讲演和演戏团体，印刷标语传单、发展党团组织，在乡村设立暑假补习学校或平民学校^①。三，参加群众性的斗争。一方面可以为被压迫民众争取到一些实际利益，进而取得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则可以检验自己指导群众运动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从而获得实际工作经验。四，注意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他指出“青年中许多活动分子在工作中的态度不适当，如喜出风头，爱摆架子，脸上挂出革命的招牌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不利于群众工作的开展，反而会使群众掩鼻而去，必须及时改正，才能接近和联系群众，真正“走到民间去”^②。

（五）

一九二六年八月初，李求实来到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担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他到达广州时，北伐军已经挺进两湖，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两广的青年运动，却给他一种“沉闷”的感觉。如私塾多于学校，学校盛行读经；父母之命，媒

①求实：《怎样利用今年的暑假》，《中国青年》第124期，1926年6月20日。

②求实：《怎样才能“到民间去？”》。

灼之言，包办着青年的婚姻；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充塞着青年的头脑，而对工农运动不参加，有时还常表示不满或愤懑。这种情况，说明青年尚“被围困在封建宗法社会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的双层铁桶中”，必须设法去“溶解那坚固的铁板，去救出那重围中的人们”^①。为此，他主持创办了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为了适应青年的需要，《少年先锋》辟有论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歌曲、通讯等许多栏目，内容以反映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为主，兼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目的在于唤起青年群众“注意自己的问题，引导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②为刊物撰稿的有恽代英、熊锐、李春蕃、元暎等人。而李求实既是作者，又是编者，差不多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李求实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当时革命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革命者应当怎样观察政治军事形势。他指出，当时形势的特点是，一方面是革命军的北伐已经直趋武汉，革命的烈火照澈了南北东西；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相勾结，美帝国主义与孙传芳相联系，新的“反动势力联合战线已经向我们开始进攻了。”^③而就革命势力方面来说，现在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北伐，只是整个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工作，大部分的民众还没有组织起来。即使就军事行动本身来说，由于原非革命的军队参加北伐，他们自身有许多弱

①求实：《“革命根据地”与落后的两广青年》，《少年先锋》第1卷12期，1927年1月。

②求实：《寄元暎》（代发刊词），《少年先锋》第1卷第1期，1926年9月1日。

③求实：《从此开始“赤化”了》，《少年先锋》第1卷第2期，1926年9月11日。

点，甚至完全失去对敌作战的力量与决心。因此，革命内部潜伏着一定程度的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认为：“加强我们的战斗力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准备给予敌人以最后的一击，这是我们目前最严重的问题”^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引导他们走向最后的决死斗争——革命那方向去。”^②

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他提出要坚决维护我国的民族尊严和主权的完整，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要及时地进行揭露和斗争。一九二六年九月间，英帝国主义故技重演，企图以“炮舰政策”来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在武汉的英国军舰直接炮击北伐军，在沙面的三艘军舰强行驶入广州省河，在长江上游的英国军舰，又制造了“万县惨案”。对此，李求实指出，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已经被逼到了墙角里，只有‘反噬’一条路可走”；另一方面又表现他们“愚蠢”，“没有认清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他说，如果说八十多年前，由于中国民众完全被压服在专制的清朝之下，英国的“炮舰政策”还有效果的话，那么今天已不同了。“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中国的民众已经觉醒了！五四以后，民众的力量逐渐加强，革命的空气开始弥漫到遍地。”他号召全国人民亲密地牵着手，共同奋斗，反抗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决“不能容许这强盗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地盘上如此猖狂！”^③

一九二六年十月，为纪念辛亥革命十五周年，李求实写了

①②求实：《从此开始“赤化”了》。

③以上见求实：《炮舰政策——英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少年先锋》第1卷第9期，1926年11月21日。

《小子之辛亥革命观》^①一文，深刻地提出革命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问题。他指出：“一种革命，必须先有一极健全的领导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真正能代表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纲，藉这政纲的宣传，取得极广大的民众作革命的基础；它具有雄厚的真正忠于革命的武力，用以扑灭敌人的势力，强制政纲在省县乡镇中切实施行。”而辛亥革命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失败。

同年十一月，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九周年时，他又写了《十月革命的礼物》^②一文，阐述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他指出：“一个能战斗的革命的政党，在这个新的时期，实在是最迫切的需要。这个党必须很勇敢地去领导无产阶级作夺取政权的斗争，很有经验地在复杂的环境中分析解释一切，而且很敏捷地与所有一切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暗礁作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党，我们就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并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他号召先进青年加入革命党，并且“切实地为党努力，完成他在这‘新时期’中的责任！”

李求实在主编《少年先锋》过程中，非常重视青年的思想工作。他针对广州学生运动领袖中一些人好高骛远、喜欢空谈革命理论，而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实际工作，以致脱离学生群众，造成学生领袖与群众隔离的情况，指出从事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必须明白：“学生运动的目的是去领导学生群众参加革命运动，而第一步工作则是号召学生群众为本身利益而奋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群众，才能使他们团结成为一种能战

①见《少年先锋》第1卷第5期，1926年10月11日。

②见《少年先锋》第1卷第7期，1926年11月1日。

斗的力量。”而“从事学生运动的人，必须自己在学生群众中间，能够了解其痛苦与要求，能够察知其优点与弱点，能够获得学生群众的熟识与信任。”^①只要这样做了，学生领袖与群众的隔离也就自然消除了。

他还针对广州各学校学生会和学联会因对时局等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出现了派别之争，影响了学生之间的团结的情况，积极地进行疏导，并指出：“学生群众所要求学联会和学生会，不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不是树的派的或非树的派的，而是能够真正站在学生群众利益上，领导他们去奋斗的。”因此，“只是为了少数人争权而不顾学生群众利益，都是应该指责的，不管这少数人是被叫作右派或左派，树的派或非树的派！”^②在他的耐心教育下，学生会和学联会中的派别之争很快冰释了，学生之间团结也加强了。

为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李求实特地写了《告失恋和迟婚的朋友们》^③一文，满腔热情地回答了青年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告诉青年，在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里，真正的婚姻恋爱自由是不存在的，如果“革命不彻底成功，社会不彻底改造，恋爱对于多数青年是没有胜利可言的”。因此，青年们的第一步便是要起来革命，首先向社会取得生活的保证，取得全部的教育权。他希望那些已婚却不满意的青年，要用“更多的力量去致力于革命事业，为未来的青年‘武装’，准备他

①以上见求实：《危机——学生领袖与群众的隔离》，《少年先锋》第1卷第9期。

②求实：《学生群众所要求的学生会与学联会》，《少年先锋》第1卷第8期，1926年11月11日。

③载《少年先锋》第1卷第8期。

们的幸福”；那些已经过了婚龄的“失恋”或“迟婚”青年，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终日幻想着什么玫瑰的梦，不要终日在那儿迟疑徘徊”；至于那些没有达到婚龄的青年，则不要轻易闯进“性”的战场，而“应该用全力去学习，……革命成功了，你们可以尽情恋爱去，你们每一个青年必定可以获得你们理想的伴侣——但决不在今天。”

李求实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文章，不仅在内容上能够把握住青年的思想脉搏，给予及时的指导，而且在形式上能够做到适合青年的特点，使青年们感到具体、生动、亲切、自然。如在《开学以后》一文中，提出学生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课程是否完全切于实际？课本和讲义的内容是否切实、新颖、合乎时代潮流？教师是否具有进步的思想，长于教授？各种革新运动、爱国运动是否可以自由进行？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学校的实验设备、文体设施是否完全？等等。在《捉狐狸精》一文中，他用人们所熟知的狐狸精善变的故事，来揭露广州学生运动中一些不断变换手法、分裂学生队伍、破坏学生运动的“狐狸精”的行径，教导革命学生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这些，都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少年先锋》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受欢迎的革命刊物之一，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朵鲜花。李求实作为这朵鲜花的培育者，对中国青年运动，特别是对两广青年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九二七年一月，李求实奉调去湖南长沙，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在长沙期间，他为了适应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需要，举办了团干训练班，着力培养从事工农运动的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工农运

动史、时事政治、共青团的任务等。他除了担任编课和讲课外，还亲手制定了湖南团组织发展的蓝图。每逢群众集会，他都主动参加。有一次，因时局紧张，纠察队员怕发生危险，不让他进会场，他笑着说：“我们团省委是领导革命的机关，不是脱离群众的队伍，更不需要保险公司为我们作人寿保险！”^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求实被调到武汉。五月，他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兼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马日事变”发生。当他得知与他共同战斗过的湖南团省委负责同志田波扬、史训川等惨遭杀害时，悲痛万分，并且说：“我们必须战胜万恶的军阀和一切吃人的野兽！誓为死难烈士报仇！”^②

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政局异常险恶的情况下，李求实坚定地提出：第一，“我们要积极地发展一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把反帝运动发展到穷乡僻壤去，彻底赶出帝国主义在下层民众中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势力”；第二，“我们要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若不倒蒋，则继续北伐只是骗骗人罢了！……我们若不先打倒蒋介石，我们将会被他消灭”；第三，“我们要发展并整顿工农的组织”；第四，我们“要武装自己”，“北伐军的胜利的重要条件是武装，革命之失败也是因为缺乏武装。”^③他的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正确的意见是很难被接受的。

①②农非：《忆李求实同志》。

③求实：《本年暑假的环境与青年的责任》，转引自陈修良：《回忆李求实烈士》。

(六)

李求实不仅是我党的政治活动家，青年运动的领袖，还是革命的文学家。大革命失败后，他随团中央机关撤往上海。大力从事革命文学和出版工作。青少年时期的李求实，就鼓吹进步的文学，运用文学这个武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十九岁那年，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新诗《小儿的怨语》。这是目前发现的他最早的诗作。这首诗通过对一对男女青年恋爱心理活动的描写，告诉青年们在恋爱过程中要真诚，要忍耐，要经得起考验。后来，他还翻译了法国、美国、英国进步作家的一些小说，鼓吹新思想。他特别推崇俄国著名作家契可夫，将契可夫的小说《范伽》^①介绍给中国人民，使读者从这部小说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进而起来斗争，推翻人剥削人的世界。

一九二六年夏，李求实编辑了我国最早的一本《革命歌集》，辑录了《国际歌》、《少年先锋歌》、《国民革命歌》、《马赛曲》、《赤潮曲》、《二七纪念歌》、《纪念五一歌》、《劳动儿童团歌》等十五首革命歌曲。所有的歌曲均用五线谱和简谱刊印，于同年十二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呈现这小册子的礼物于广大被压迫青年群众面前。这册子里面，奏着的是简单而激越的曲谱，唱着的是朴质而壮烈的歌声，通篇燃烧着的更是一片叛徒们不平的反抗的火焰。”其中《国际歌》是他一九二四年在

^①译文载 1922 年 5 月 7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学会了由陈乔年和肖三翻译的歌词，回国后再参照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修改而成的，是我国最早的《国际歌》的另一种译本。他自己还写了《前进歌》的歌词，号召中国民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作斗争，“拚此热血，洗净乾坤！前进！冲锋陷阵！不胜，不停！”

一九二八年，李求实因患肺病被迫到沪郊江湾休养。在病中，他毅然拿起战斗的笔，编写了《俄国农民与革命》一书，翻译了《十年来之俄罗斯》一书，重译了《朵思退夫斯基》一书，并且在《语丝》和《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了许多文学译作，为当时文化荒芜的中国，增添了许多激励人民革命热情的读物。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上海地区党的机关报——《上海报》^①创刊。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李求实任该报主编，参加编辑的还有谢觉哉等。当时，正值革命低潮，为了办好《上海报》，他和全体编辑部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出刊。公开的报馆被查封，就改在秘密的报馆工作；原来的报名被禁止，就改换新的报名；编辑和发行人员被逮捕，但报纸仍能照常按时送到读者手里。正如他自己所说：“本报一年来实在是在火线上与敌人肉搏，这是没有丝毫虚伪的！”^②

《上海报》创刊一周年后，李求实认真总结了办报经验，进一步提出了《上海报》的编辑方针：“一，新闻的敏捷、正确、充实；二，材料的适当分配；三，文字的简短明白。”^③

①《上海报》第1期报名为《白话日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还先后用过《天声》、《晨光》、《沪江日报》、《海上日报》等名。1930年8月，与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合并为《红旗日报》。

②③求实：《本报一年工作之回顾》，载《〈上海报〉周年纪念册》。

他还拟议建立一个以工农通讯员为主的采访网。由于他的积极努力,《上海报》的通讯员曾达到近百名,订户仅上海一地就有一千八百至二千户。工农群众称赞这张报纸“是社会的明灯,是工人的出路”,“是领导无产阶级的导师”,“是无产阶级的喉舌,中国革命的曙光。”^①在此期间,他还指导上海总工会创办《工人日报》,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苏代会”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李求实以中共文委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他特别强调左翼作家要深入工厂、农村,去倾听埋藏在人民心底的呼声,鼓励人民起来斗争。针对党内许多同志对革命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的情况,他曾对一位红军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对于文艺这个武器,我们好象秀才用枪一样不灵。我们必须学会既能用枪又能用笔,我们才配称为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武全才的革命者。”他还说:“学会使用文艺这武器,非常重要。我近一二年有很深的体会。一篇思想正确内容丰富的能鼓舞人心的小说,其作用往往在一篇普通论文之上。”他殷切希望这位同志回红军后,能更多地注重文艺战线上的活动^②。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由他编译出版的著作还有《俄国革命画史》、《动荡中的新俄农村》、《〈上海报〉周年纪念册》等。

在纪念“五卅运动”五周年的火红日子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后,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

①见《“上海报”周年纪念题词》,载《〈上海报〉周年纪念册》。

②参见马宁:《左联五烈士别记》,《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号召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积极选出代表，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六月，李求实被选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海办事处书记。他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各工厂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推荐左翼作家冯铿担任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经常同老战友恽代英、林育南、何孟雄等交换工作意见；经常向瞿秋白、周恩来等请示工作，从早到晚，不肯休息；被誉为“是个踏踏实实的人”^①。当有人看到他身体不好，劝他休息一段时间时，他总是回答说：“现在我们同敌人作生死斗争的时候，我们休息一分钟，即等于饶恕敌人一分钟，让他们多活一分钟，即等于让民众多受一分钟的罪。这对革命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②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五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上海创刊。李求实又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主管工农通讯小组，组织和编写了有关苏维埃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闻报道，讴歌党领导的红军战争和土地革命的胜利。通过办《上海报》的实践，他对搞好工农通讯工作的意义有了深刻的体会。红军战士马宁曾为《红旗日报》写过一篇关于江西苏区红军的报道，以后中断了。李求实特意在《红旗日报》上发表寻找马宁的启事。后来马宁到上海找到他，他对马宁说：“写工农通讯是很重要的革命工作。每一个作家应该深入工农群众当中，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爱憎。每一个作家要学会写工农所关心的问题，写他们爱读、读得懂的文字；但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这却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上天可摘星星，下海能捉

①马宁：《左联五烈士别记》。

②农菲：《忆李求实同志》。

大鲸，便可达到‘笔若游龙，无施不可’的地步。”他希望马宁参加工农通讯工作，不要中断新闻报道的写作。五十多年过去了，当马宁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时，仍然感慨地说：“李伟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不随便讲话，但他的话一出口，却有份量。他象个金石匠，惯于把他的讲话，凿在听者的心扉上。这就叫我敬而爱之。”又说：“李伟森长我几岁，但他讲话时，风度象个长者，口气很坚定，可也没有丝毫使人感到他是装腔作势吓人的。听了他的话叫你耳朵发热，心里痒痒。”①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借口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李求实和林育南、何孟雄、龙大道、欧阳立安、张金保等及江苏省委机关负责人旋即开会，商量办法，发表声明，揭露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内民主的行径，反对王明阴谋夺权②。他们还建立了“文化革命联合会”（简称“文革联”）的组织，与王明进行斗争。“文革联”的“纲领是李求实写的，其内容是如何发动文化战线的工作者对内反对王明集团及其错误路线，对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文革联’的负责人有李求实和谭寿林。”③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大搞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统统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后因林育南、何孟

①马宁：《左联五烈士别记》。

②1979年8月13日访问张金保记录。

③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雄、李求实等被捕，故未作出书面决议）。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并没有屈服于王明的政治压力，他们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坚持斗争。

（七）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林育南等七同志在上海三马路二二二号（现汉口路六六六号）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问题。由于叛徒出卖，不幸于午后一时四十分，被公共租界捕房探捕与国民党市警察局联合组成的行动队逮捕。李求实不知道东方旅社已经出事。第二天天刚亮，他按原先与林育南的预约，来到愚园路庆云里三十一号（现十五号）“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机关，找林育南商量工作。刚进门，李莲珍（林育南的爱人）、胡毓秀（苏准会秘书）便心情沉重地告诉他：“大哥^①昨天上午出去，现在还未回来。”他顿感诧异，急着向外走，说：“我去找找！”他不顾李莲珍、胡毓秀的劝阻，于上午九时来到东方旅社，即被继续探守在那里的便衣特务逮捕^②。两天之中，敌人在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等地还先后捕去了何孟雄、欧阳立安、龙大道、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党的重要干部和革命群众共三十六人。

①林育南时任“苏准会”秘书长，为应付环境，迷惑敌人，“苏准会”实行机关家庭化，他为一家之长，称大哥，李莲珍与胡毓秀以姑嫂相称。

②根据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1931年1月19日《审判笔录》。

李求实等先羁押于老闸捕房，十九日早上转到北浙江路的公共租界特别法庭，旋即“审讯”。开庭时，法官简略地宣告了被告的姓名、年龄、职业及“罪状”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长就要求把李求实等全部“罪犯”引渡。于是，他们被推上囚车，押送到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十一时，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便开庭分别审判。李求实等志士在敌人的法庭上坦然自若，毫无惧色。他们乘敌人暂时还没摸清情况之机，各自编出了一套假口供。李求实当时用笔名李伟森，被列为第十号被告。

下面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审判笔录》中记录的李求实的“供词”：

我十七日由鄂抵沪，预备到北新书局拿稿费，他们欠我一百多元稿费未给，现在因我女人快生产了，所以来取。十八日早上去得太早，书局没有开门，就到新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找同事同学李长寿君，跑到五马路新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没找到，又到三马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去，我一看名字不对，隔壁有人问我，就把我捉住了！我十三号收到北新书局叫我来拿稿费的信，现在没带到身上。

敌人没有从李求实等口里得到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遂于二十三日，将他们全部转移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李求实和林育南、何孟雄等把监狱当作特殊的战场，利用一切可能，互通消息，互相鼓舞，研究和敌人斗争的方法，坚持继续和敌人斗争。其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秘密建立有党的组织。他们入狱不久便由李求实和柔石设法和狱中支部取得了联

系^①。他和林育南还给党中央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他们的被捕经过及斗争情况^②。

由于叛徒的指认，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很快就知道李求实等是一批共产党“要犯”，并从缴获的会议记录中知道我们党内的一些情况。他们一面向南京邀功请赏；一面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伪装“善心好意”，妄图进行所谓“感化”工作。李求实等虽然受到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们对党没有丝毫的抱怨情绪，不给敌人任何一点可乘之隙。在又一次审讯中，李求实针对敌人挑拨离间，妄图拉拢的阴谋，愤怒地指着敌人大声说道：“禽兽！闭住你们的臭嘴！共产党人不象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废料；共产党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自己和自己的党，永远不会出卖的。”^③当敌人以死相威胁时，他付之一笑，轻蔑地说：“你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你们斩不尽，杀不绝！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你们更无法斩尽杀绝！你们要当心的，倒是你们这一小撮衣冠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最后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④

敌人立即露出了凶残的面孔，对李求实等采用酷刑，将他们的双脚铐上二十五斤重的铁镣，作为要案处理，还宣布不准保释，不准会见亲属。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正是二七大罢工八周年。这天深夜，国民党反动派诡称将李求实、林育南、何孟雄、欧阳立

①根据龙支雯 1964 年 8 月 22 日访问柴颖堂的谈话记录。

②黄理文：《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1949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

③④见农菲：《忆李求实同志》。

安、龙大道、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人押往南京。当他们被绑着双手，拖着脚镣，走过荒地，来到一座小桥旁时，等在这里的国民党法官立即慌忙宣布他们死刑。李求实等昂首挺胸，视死如归，不约而同地一齐唱起《国际歌》，并肩走向刑场。这时，行刑队射出了密集的子弹^①。李求实等二十四人英勇地倒在血泊中，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作者附记：

本文除已标明出处者外，还查阅了《大汉报》、《汉口新闻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青年》、《少年先锋》、《上海报》、《红旗日报》等报刊；访问了烈士生前的同学、战友、知情者及亲属吴华梓、张金保、罗章龙、陈修良、胡毓秀、胡治熙、郑南宣、李国樞和刘仁静、郑超麟等。**廖鑫初**同志曾参加了搜集资料的工作。

^①李求实等牺牲的具体情节，参考资料有：1931年2月12日《红旗日报》报道，题目是《二七纪念日龙华司令部秘密枪杀二十三名战士》，黄芝冈：《永远难忘的二月七日晚》，载1951年2月25日《文汇报》，郑择魁：《柔石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巴金：《他们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心里》，载1951年2月26日《解放日报》。

皮定均

台运行

皮定均十四岁参加革命，从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到川陕根据地的创建，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豫北、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从中原突围、淮海战役到抗美援朝，浴血疆场，屡建战功，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朝鲜停战后，他奉命建设东南沿海前线，作了大量工作；一九六九年，奉命调西北从事边防建设，一九七四年又调回东南沿海前线；一九七六年，在组织检查军事演习时，以身殉职。李先念最近题词：“智勇兼优，光明磊落”。对皮定均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一)

皮定均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戴家岭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孤身一人，要过饭，帮地主放过牛，从小就饱尝了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

一九二七年，皮定均家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很多贫苦农民都参加了农民协会。只有十三岁的小定均，也闹着要参加农会。乡农会主席说：“你人小，不够条件。”他说：“人小能长大，你们干啥我干啥，你准不准，我

都要参加。”农会开会他去听，农会游行他跟随。农会主席没办法，又看他是个孤儿，第二年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成了金家寨六区五乡最小的一名农协会员。由于他聪明伶俐，记性好，乡农会让他担任通信员。从此送文件、下通知，他干得十分认真^①。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立夏节，和皮定均家乡毗连的商南武装起义成功，成立了工农红军。五月中旬，皮定均家乡古碑冲、南庄畝、七邻湾武装暴动也胜利成功，建立了游击队，并于五月二十日配合红军攻打鄂豫皖边区重镇金家寨，赶走了商团，将官商汪东阁、吴立合的布匹、粮食、食盐堆放在街上，要贫苦农民来分。有些贫苦农民怕汪东阁、吴立合回来倒算，不敢上前去领。皮定均当时虽然才十五岁，俨然象一个领导人似的，挤进人群，站在一个布堆上宣传说：“农友们！这些布匹、粮食、食盐，本来就是穷人血汗换来的，汪东阁、吴立合一滴汗也没出，现在红军分给我们，是我们本分，我们不领，还要红军还给汪东阁、吴立合不成？你们不敢领，我来送给你们。”说罢，他把一匹布送给了一位老大爷。红军师长周维炯上前高兴地拍着皮定均的头说：“农友们，这位小同志说的对，这些东西不是汪东阁、吴立合的，分给你们，是你们本分，不能再还给汪东阁、吴立合！”就这样，成堆的布匹、粮食和食盐，不一会，就被分得精光^②。

皮定均家乡暴动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很快建立起来。皮定均由于工作积极，敢于斗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乡、区童子团团长。他经常带领童子团的伙伴们，跟随红

①②考红军、老赤卫队员余述焕、皮定焄1983年3月10日的回忆。

军和苏维埃干部，到处宣传反剥削压迫、反封建礼教的道理。金家寨镇中间有座火神庙，常有人烧香磕头。一天，皮定均召集六区童子团干部开会说：“我们天天宣传反封建迷信，可偏有人到火神庙烧香磕头，我们把那个泥巴堆子火神爷砸掉，你们敢不敢？”大家都说敢！但到了火神庙后，看那一丈多高的红面獠牙的“火神爷”，有的小伙伴害怕起来。皮定均说：“怎么，害怕了？”随手在地上拣块砖头朝“火神爷”头上砸去。在他的带动下，小伙伴们一阵砖头瓦块，把“火神爷”打了个“体无完肤”。最后皮定均找来一根牛绳，拴住“火神爷”颈子，和小伙伴们一阵猛拉，硬是把那个一丈多高的泥塑拉倒了，从此火神庙断了香火^①。

皮定均的积极勇敢，得到了红军和苏维埃很多领导同志的表扬。一九三〇年，他被调到英山县任县童子团团长，同年冬由团转党，并且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他跟随革命队伍南征北战，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英勇顽强，多次立功，成了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②。

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西进川陕，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时的皮定均，由于少年老成，作战勇敢，又善于学习，被提升为连指导员，同志们都亲切地喊他“小指导员”。他说：“同志们最好喊我小皮，何必要带个官名呢。喊小皮不更亲切吗？”在粉碎敌人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的战斗

①皮定煊、余述煊 1983 年 3 月 10 日的回忆。

②袁捷：《回忆英山童子团》（未刊稿），存金寨县委党史办公室。

中，皮定均领导的连队，连战皆捷，缴获敌人两个连的装备，受到师、团首长的嘉奖，接连被提升为营政治教导员、军交通队教导员、副科长。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野心家张国焘一心想夺取中央领导权。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到毛儿盖，党中央决定分为左、右路军北上，并决定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随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但张国焘认为自己山头大，人多，装备好，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大造舆论，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央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都被他们搞垮了，现在北上是在逃跑……。”到阿坝后，开大会，作报告，发文件，散传单，大肆煽动，主张南下，闹得四方面军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蒙蔽。到十月间，张国焘认为时机成熟了，居然成立了伪中央！一些随左路军行动的红一方面军同志们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极为不满，同时，对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受张国焘蛊惑而反中央、反一方面军的同志也大为不满，互相产生严重隔阂。这在当时敌军重围、环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是十分危险的。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深入到师、团、营、连、排向干部和战士宣传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这时，皮定均担任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红军大学教导师第二团团长。由于部队大量减员，干部多，很多干部被编到教导师学习，有营、连干部，也有师、团干部；二团学员全系四方面军的师、团、营、连干部。在张国焘的欺骗宣传下，这些学员之中也有少数人跟着反对中央和中央的北上方针。刘伯承觉得二团学员的觉悟，对整个四方面军的觉悟起着重要作用，四方面军同志自己起来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最有说服力

的。为此，他多次和皮定均促膝谈心，循循诱导。皮定均很快觉悟了，识破了张国焘的野心，坚决的站到党中央方面，积极向学员们宣传党中央正确方针，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二团的觉悟，很快影响到整个教导师的学员都逐步觉悟起来，有力地制止了张国焘煽动的这股反中央的逆流。后来，很多同志回忆说：教导师的稳定，对四方面军的稳定起了决定作用。这是刘伯承的贡献，也有皮定均一份功劳。

张国焘在政治上搞分裂不得人心，在军事上由于他倒行逆施，也屡遭失败，使部队减员过半，弹尽粮绝，处境极端困难。一九三六年夏，部队在甘孜时，皮定均旗帜鲜明地指出：和中央闹对立，是没有好下场的。他坚决主张北上与党中央汇合。张国焘在政治和军事都惨遭失败和广大指战员的反对下，才被迫放弃他的分裂活动，北上抗日^①。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皮定均担任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随师部一起，转战在太行抗日前线。

一九三九年，我晋冀鲁豫的太行山根据地，已成为坚持敌后抗日的坚强堡垒，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设在这里。这块根据地，头顶正太，脚踏陇海，左面控制平汉和同蒲两线，南北控制邯长公路。日寇对此昼夜不安，调动五万兵力，妄想一举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①廖海光 1983 年 2 月 7 日的回忆，另见李志民、朱绍清、廖海光、龙飞虎：《南征北战，奋斗一生》，载 1983 年 7 月 7 日《江西日报》。

日寇当时进攻太行的方针是：正面进攻，打通邯郸——长治大道，把太行分割成南北两块，然后实行所谓分区“清剿”，逐步压缩，由点、线到面的占领，把我军消灭在太行山根据地。日寇正面进攻，而蒋介石却搞所谓“曲线救国”，指使其爪牙朱怀冰、庞炳勋、孙殿英、侯如庸等部，不但不和八路军协同抗日，反而为虎作伥，暗中和日寇勾结，破坏抗日政权，杀害抗日干部，偷袭抗日武装，妄想挤进太行山占地盘，为日寇进攻提供跳板。为保卫太行根据地，保卫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的东南侧安全，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皮定均同志带领特务团，到潞城、黎城、涉县、武安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控制邯长大道，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寇和顽伪的反动气焰。刘伯承师长对皮定均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是前门拒虎，后门打狼，任务是艰巨的，只要把邯长大道牢牢控制住，虎狼再多，也难入门，主动权永远在我们手里！皮定均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勇敢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①。

日寇的进攻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每到一地，都要安一个据点，对周围的群众先是奸淫掳掠，进而吊打烧杀，造成恐怖气氛，要老百姓当他们的“良民”。皮定均带领特务团深入到抗敌前线，和各级党委取得联系，发动群众，武装自己，运用我军游击战争特有的主动性、灵活性，抓住一切可能歼敌之机，打击分散、孤立之敌，使敌人无法落脚，难以存身。

七月十二日，特务团刚来到涉县西北的岭后村，就得到消

①皮定均遗作：《活跃在邯——长大道上》（未刊稿），存金寨县委党史办；参见1982年12月5日钟发生的回忆。

息：三百多名日本兵进攻漳河西岸，由于连日大雨，漳河水暴涨，这些日军住在西岸的河南店，和东岸的主力隔开了。皮定均感到歼灭这股敌人是鼓舞士气、振奋民心、灭敌气焰的大好良机，当夜便指挥一营冒雨急行军，于次日拂晓前包围了河南店。三百多名日军还在梦里就遭全歼，给了西进敌人当头一棒。战后，皮定均用缴获的物资，武装了涉县、武安等县的很多抗日游击小组。在特务团的帮助下，涉县、武安一带全民性抗日游击战争很快地开展起来了。

日寇在河南店遭受打击以后，知道邯长大道上有八路军阻击，变得小心谨慎起来，采取了大部队行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皮定均根据敌人相对集中、相互拉大空隙的特点，采取了“破击战”，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联络，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经常有成百辆汽车瘫在公路上不能行动，遭到我军民的袭击。

交通和通讯是日寇的生命线，断了交通和通讯，日寇等于是聋子、瞎子、瘫子，寸步难行。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分散兵力，并调动大批伪军，沿公路设立据点，保护他们的生命线。皮定均又根据敌人分散的特点，组织特务团和各县抗日武装游击小组，利用山熟、路熟、人熟的有利条件，夜袭敌人据点。在邯长大道上，几乎每天夜里都能听到敌人碉堡的爆炸声。这些办法打击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很多青壮年都自动武装起来，用各种方式找日寇出气，打得敌人心惊肉跳。

日寇为了对付夜袭队，组织了一支百人左右的巡逻队，昼夜到处巡逻。皮定均针锋相对，采取“麻雀战”的战术，将特务团和各抗日游击小组分散成三至五人一组，藏在山头上或青纱帐里，瞅准机会，一阵猛打，有时敌人死伤一大片，还不知子弹

从哪里打来的。

敌人巡逻队也保不了他们的“生命线”，于是就采取更加野蛮的方式。为了不让八路军和游击队接近他们的“生命线”，竟把靠近公路百米以内的树砍光，房屋烧光，沟填平，企图把邯长大道变成为人不能蹲、鸟雀不能停的恐怖地带。敌人以为这么一来，八路军和游击队就不能接近他们，他们就可以以据点为依托，保护他们的“生命线”。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皮定均等带领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正在广泛发动群众，制造各式各样的地雷等着他们。日寇扒房炸，锯树炸，去烧庄稼，刚走到地边就响了地雷！闹得日军、汉奸寸步难行，连门也不敢出。就是缩在炮楼里、碉堡里，也免不了经常吃地雷。整个邯长大道上，日日夜夜，火光闪闪，雷声隆隆，闹得日伪军坐卧不宁。

就在特务团和各县抗日游击队打得日寇寸步难行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等一二九师首长认为向邯长大道的日军全线出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十二月十二日命令三四四旅和特务团以及各县游击队，向邯长大道日寇全面进攻。皮定均奉命带领特务团夹击邯长大道中段，前后十天，作战七十余次，打得日寇和顽军狼狈不堪，不得不全线退出邯长大道。使我太行山根据地更加巩固。战后，皮定均被提升为太行五分区司令员，领导林南地区抗日斗争。

皮定均就任太行五分区司令员不久，打响了林南战役。在太行军区统一指挥下，皮定均率领所部，一举歼灭孙殿英、庞炳勋等顽军七千多人，吓得敌人龟缩在林县城和靠县城附近的几个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我军控制了林南和辉县大部分地区。

一九四一年冬，日寇因发动太平洋战争，从太行周围地区

调走了部分兵力。为了保持其占领区域，日寇又施展其“以华治华”的惯用伎俩，将被八路军击败的豫北孙殿英、庞炳勋两个残缺不全的军，分别扩编为第五、第六方面军，由豫北向我太行山根据地进攻。我太行军区当机立断，采取了“敌进我进”的针锋相对的方针，命令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均为七分区司令员，率部挺进豫北，开辟七分区。

皮定均接受任务后，首先从加强组织建设入手，精简分区党政军机构，抽调了大批有实践经验的营连干部到豫北各县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县区政权，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很快，“老八路下山了”的消息，传遍豫北。

皮定均非常善于作群众工作。他常说：“我们八路军的胜利，主要是靠‘两座大山’，一座是太行山，她是我们夺取胜利的根据地；一座是人民群众，她是我们夺取胜利的基础，我们兵源、给养、情报都从这座‘大山’里来。”他还说：“做群众工作虽然不是打仗，但比打仗还重要，宣传群众是为了打仗，打仗也是为了群众。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单纯军事观点，终究是要失败的。”由于他重视群众工作，豫北各县抗日武装发展很快，有的县一两个月时间就发展了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各县不脱产的民兵发展到三万多人，很快打开了局面。

当时的斗争异常艰苦，除了天天打仗外，由于战争和天灾，很多群众靠吃树皮度日，我军给养也十分困难。一九四三年春节，皮定均看战士和老乡们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便决定打辉县西边的薄壁镇。这是一个很大的镇子，里面住有伪军两个营，仗着辉县城住有日军保护，在镇里作威作福。皮定均事前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掌握了可靠情报，没等辉县的日军发觉，一个晚上，就把薄壁镇打下来了。这一仗使两营伪军消灭过半，缴

获的食物足拉了四十大车。这些食物，除救济一部分贫苦群众外，供部队过了一个丰富的春节。

大王庄据点位于辉县和汲县接连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敌人很早就控制的地方。村里住有敌人一营兵力，火力配备很强，街中心有一个四丈多高的炮楼，由一连兵力把守，可监视五里远近。这个据点是敌人的耳目。严重地威胁七分区各县之间的联络。皮定均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他指挥部队分为二路。一部分控制大王庄右侧的各个村庄，卡断敌人退路，并阻击可能增援的敌人；一部分向据点猛进突袭。但战斗一打响，敌人全部龟缩在炮楼里，居高临下，以交叉火力封锁，使我军无法接近。皮定均一面组织火力佯攻，一面指挥特务连，用缴获日军的烟幕弹放烟幕。在敌人不辨东西的一刹那，我军迅速接近炮楼，一阵猛打、爆破，吓得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大王庄据点拔掉后，使龟缩在新乡、辉县、汲县的敌人失去了耳目，大大便利了我七分区抗日武装活动。

大王庄战斗后，皮定均指挥七分区军民，接连又打了几个胜仗。敌人除占据几个县城外，其余据点，几乎都被我打光了。我区、乡、村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但住在林县的敌人仍然不断出来掠掳百姓。皮定均在作了全面侦察之后，决定歼灭林县守敌，解放林县县城。当时城里住有三个团敌人，又有坚固的城防工事，硬攻是要吃亏的。皮定均设下疑兵之计，调虎离山，破城歼敌。他一面组织一些侦察人员，不断在县城周围山头上装作画地图，看地形，作工事；一方面发动群众大造八路军要攻城的舆论，并利用两面政权的人物向敌人宣传：县城已被八路军重重包围，很快就要总攻。敌人果然中计，误认被我包围，组织两个团突围。皮定均指挥部队，乘敌突围之机，一举

攻进城去，全歼留在城内的守敌一个团；突围出城的两团敌军，也被我预先埋伏的各县、区抗日武装歼灭大半。

林县城的解放，使敌人大为震惊，一见到八路军就不战而逃。皮定均抓住敌人士气低落这一弱点，指挥部队和各县抗日武装广泛出击，打击敌人。到一九四四年九月，孙殿英的第六方面军两个军，被我军消灭得只剩下两个师了；庞炳勋的第五方面军也损失惨重，不敢和我军轻易较量。整个豫北广大农村，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太行杀敌劳功大会上，皮定均部受到了邓小平的表扬^①。

一九四四年夏，日寇为压迫国民党政府投降，集结重兵，开始向正面战场的河南地区进攻。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汤恩伯等所率四十万军队一触即溃，黄河以南从郑州到潼关，从洛阳到南阳的广大豫西地区，迅速沦入敌手。中共中央为拯救豫西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打击日寇嚣张气焰，决定组织两个支队强渡黄河，开辟豫西地区。皮定均在豫北戎装未解，鞍马未下，即被任命为豫西游击支队司令，奉命组织豫西游击支队武装，向豫西疾进，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

皮定均接受任务后，在太行军区的支持下，迅速组建两个团兵力，强渡黄河，穿过陇海路，抵达登封、临汝地区，以嵩山和箕山为依托，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

当时豫西日寇的重兵放在郑州到潼关的陇海路沿线和从洛阳到南阳的几条公路线上，指挥中心设在洛阳，各县城都配有

^①皮定均在太行五、七分区领导军民抗日的情况，参见1. 聂济峰、吕梁：《豫北春秋》（未刊稿），存金寨县委党史办。2. 1982年12月5日钟发生的回忆。3. 王建政：《皮定均在林县》（未刊稿），存金寨县委党史办。

一个中队至一个大队的兵力，并有大量伪军充当鹰犬；同时，还组织大量的机动部队，来往于铁路和公路线上进行联络、“扫荡”。为了“强化治安”，日寇还在各县设立伪政权及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区、乡、村、镇，都建有自卫团之类的汉奸政权。当时的豫西，除了敌情严重外，由于连年水、旱、蝗、汤（恩伯，群众称之为一大害），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整个豫西成了暗无天日的地方。

豫西地区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由于国民党作了很多反共宣传，不少群众对八路军抗日政策不大理解，特别是看到八路军武器装备差，对能否担负起抗战任务，还不太相信。

皮定均根据这些情况，对大家说：敌情严重并不可怕，群众不了解我们甚至不相信我们，才是我们千万要注意的。他和支队党委研究，作出了三条发动群众的决定：一是加强纪律性，以八路军的模范行动，教育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相信八路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二是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使人民群众相信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三是抓住时机，狠狠打击敌人，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为了便于作群众工作，开辟根据地，皮定均提议，经支队党委研究，决定以嵩山和箕山为核心，将豫西地区十个县划为两个工作委员会，抽调得力干部担任工委书记或专员，部队也一分为二，以嵩山和箕山为依托，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全部深入到连队开展工作。

八路军作风正派，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待人和气，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各地的老百姓都说：“我们人老几辈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八路军才真正是人民的

子弟兵！”游击支队深入敌人占领区，在纵横十个县里与日伪顽军周旋。群众惊呼说：“八路军全下山了！到处都是！”有的说看到几千，有的说看到几万。群众的宣传威力是很大的，八路军的声威，很快传遍豫西。

皮定均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群众基础有了，相信我们是他们自己人了，但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有没有本事打鬼子了。”他要求全体指战员，人人出注意，个个想办法，争取狠狠打几个漂亮仗，显显八路军军威。由于敌情侦察准确，战前准备充分，游击支队连续打下了陇海线上的黑石关等几个敌人据点。在百里坪的桑楼，皮定均跨马端枪带头冲锋，以少数兵力，重创了由登封南下临汝的日军。又一次打顽军的土围子，皮定均亲自到前沿指挥，被敌人土炮击中，全身受伤七十多处，仍不下火线，指挥爆破手爆破，直到胜利。群众看到八路军作战如此勇敢，无不惊叹说：“八路军的官兵都有种，这样的军队，才是真正抗日的！”“中国有这样的军队，小日本再狂，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日寇为了从空中补给他们在豫西驻军的给养，在登封周围几个县抓了两万多民伕，修筑飞机场。民伕们整天饥饿劳累，干十多个小时的活，稍有怠慢，就横遭杀戮。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八路军打飞机场，解救民伕。皮定均觉得这是个惩治敌人和宣传群众的大好机会，便亲自布置侦察，组织火力。在农历八月十三的夜里，以奇袭的方式，打进机场，全歼了两营伪军。他把民伕集中起来，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政策。全体民伕欢呼跳跃，高呼“八路军万岁！”当场就有很多人要求参军。这一下，“八路军真抗日”的影响更大了。这次打机场，由于是“飞兵奇袭”，速战速决，日寇大队援兵尚未到来，我军已转移

到几十里以外去了。使登封日军大佐气得发疯似的嚎叫，要找皮定均算帐！皮定均诙谐地说：“他找我，我偏不去，他不找我，我偏找他，主动权在我手里。”

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皮定均十分注意组织人民地方武装力量。他除了加强工委和县民主政权的建设外，还派了大量军事干部，帮助各县建立独立团。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豫西十个县级抗日武装都建立了起来，共五千多人。人民群众有了靠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地”运动，把过去被日伪汉奸、恶霸地主利用水、旱、蝗、汤（恩伯）灾害巧取豪夺去的土地，又夺回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皮定均领导分区和各县抗日武装近万人，一面和群众一起搞生产，一面加强练兵运动，准备向各县城日伪全面进攻。到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在全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寇元气大伤，逐渐失去作战能力，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豫西人民从此开始了生活的新阶段^①。

(三)

八年抗战，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希望有个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医治创伤。

但是，和平的愿望只是人民的一方。蒋介石不但要全部吞并

^①皮定均在豫西领导人民抗日的情况，参见1.《八路军开辟豫西片断》，载武汉军区《党史资料》第24期。2. 1982年12月4日王子波的回忆。3. 皮定均：《中岳狂飙》（未刊稿），存金寨县委党史办。4. 何泉：《血染中岳》（未刊稿），存金寨县委党史办。

抗战胜利的果实，还妄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用他在抗战期间积蓄了八年的精锐，挑起内战，一举消灭共产党，建立起他一统天下的独裁、卖国政府。于是抗战硝烟刚刚平息的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

皮定均正在和豫西人民一道欢庆自己用鲜血换来的胜利的喜悦时刻，蒋介石派出的部队已经从陇海路、平汉路向豫西抗日武装包围过来，企图消灭皮定均率领的豫西抗日武装。豫西军民对蒋介石这一罪恶行径万分气愤，一致要求要严厉惩治这批强盗。这时，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内战，顾全大局，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命令皮定均率领豫西一分区武装撤离根据地，到豫南桐柏山地区和新四军五师会师。

临行之前，皮定均向豫西人民反复宣传中央的方针。豫西人民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交八路军，要皮定均带领他们狠狠打击反动派。皮定均带着五千健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到达桐柏山区，被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皮定均任旅长。

但是，一心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已经把魔爪伸向了我中原军区。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调遣了三十万兵力，拆民房，砍树木，修筑了十多万个碉堡，工事纵深达十多公里，把六万中原人民军队包围起来，并决定在我党二十五周年生日——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前夕，发起总攻，一举消灭我中原革命武装。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明察了蒋介石的这一罪恶阴谋，六月二十三日电令中原局，要准备牺牲一部分兵力，抓紧时间，迅速突围，救出大多数。

中原军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由皮定均指挥一旅担任掩护全军向西突围的任务。军区党委要求一旅要不怕牺

牲，用一切办法拖住敌人、迷惑敌人，只要三天之内敌人不能准确判明我军主力突围方向，就是胜利，掩护任务就算完成了。军区党委还传达了中央军委周恩来的指示：皮定均旅掩护突围后，三个去向，可根据情况而定：一是西追我军主力，二是打游击，三是到华中苏皖解放区去。

皮定均觉得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是党对自己的信任，他向军区党委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就是自己和全旅全部牺牲，也要拖住敌人，保证主力突围的安全。领受任务后，他和旅党委商量了一套掩护主力突围和完成掩护任务后旅本部突围的方案。这个方案完全出乎敌人意料，创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的奇迹。

一旅的作战方案，是根据敌人认为我军主力肯定要向西突围、因而集中重兵在西部设防的情况制定的。皮定均采取疑兵之计，派大量部队夜里向西、白天向东的来回转，造成我军大部队向东集结突围的气势，使敌人进攻矛头指向错误方向，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准备以自己的最大牺牲，掩护主力向西突围。敌人果真上了圈套，以为我军主力要向东突围。拚命向东进攻。但当敌人发觉上当再折转向西追击时，却遭到一旅的强有力的阻击。敌人虽然超过一旅几十倍，但被一旅咬得甩不开、走不脱，眼看我主力闯过平汉路向西疾进，却无法追击。

敌人没有能“围剿”到我军主力，又派重兵“围剿”一旅。可是皮定均和旅党委早已意料到了敌人这着棋。他们根据周恩来的三条指示，选择了一条难度最大的突围方向——向东，到苏皖解放区和华中兄弟部队会师。虽然这条路线山高水险，有超过自己十倍以上的敌人和无数道封锁线，但这条路线

和突围主力背道而驰，可以减轻敌人对主力西进的压力。为了麻痹敌人，顺利突围。皮定均和旅党委研究，又用了个疑兵之计，先向西虚幌一枪，指挥部队假装跟主力向西疾走了半天。敌人以为一旅要追主力西进，便拚命追赶。他们认为：抓不住共军主力，一旅是怎么也逃不走的。只要消灭了一旅，也好向蒋介石交差了。那知皮定均指挥的五千健儿在向西疾进的当天晚上，就以红军特有的纪律和惊人的毅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敌人空隙中的一个山林里隐蔽起来，当躲过了敌人锋芒后，又立即调头，飞兵东进，又把敌人狠狠地戏弄了一下。敌人向西追了一天，连一旅影子也没见上，派出的无数侦察人员，也找不到一旅去向。正在敌人互相争吵谁放走了一旅的时候，一旅已向东走了好几百里。

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完成了，旅本部突围的任务也完成了。但突围后到苏皖解放区和华中兄弟部队会师，还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沿途不但有大量敌人拦阻，而且要通过山高岭险的大别山和河流纵横的江淮平原，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皮定均和旅党委向全体干部、战士作了充分的动员，要大家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准备作出必要的牺牲，一定要从敌人丛林中打出去。到苏皖解放区和华中兄弟部队会师！部队又作了一次彻底的轻装，要求把所有的炊事担子、公文箱子、走肿了蹄子的骡马，全部甩掉，每个战士除了武器弹药和一点干粮外，只有一身单衣，使部队能打能拚，能跑能走，机动灵活，敏捷神速。皮定均鼓励战士们说：“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和敌人是一对十，但自古以来，兵贵神速，兵在精而不在多。我们部队的敏捷性和实战性，敌人是怎么也比不过我们的，这正是我们的长处。我们这把刀子一定能从敌人心脏里穿过去。”于是，又一个奇迹出

现了。他们时而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每昼夜以二百多里的行速和敌人赛跑，使敌人老是跟在后面；时而象捉迷藏似的，和敌人兜圈子，瞅空子，杀回马枪，狠揍敌人一下，马上又躲起来，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使敌人大量追兵望天兴叹。皮定均和副旅长方升普的家都在大别山。他们从一九三二年离家，十五年一直没回去过，这次重返大别山，多么想看望一下亲人啊！可是快到家门口了，也没有抽空回家看看。皮定均对方升普说：

“大禹治水，解救人民疾苦，三过家门不入，亲人并不怪罪他。我们打敌人，为人民夺江山，过门不入，亲人们会理解的。等胜利了，我俩一同回家住两个月，补上这一回吧。”方升普说：“这一天不会太久了，我听你的指挥。”说罢，两个人都会心地笑起来了。

敌人追击战未能得逞，又采用重兵在险关隘口和交通要道阻击。他们想：你皮定均再厉害，总不能从天上飞，总要从路上走的。所以在松子关、青枫岭、磨子潭、六合公路、淮南公路、津浦铁路，都设有重兵把守。可是一旅是摧不毁，打不烂的铁流，是久经锻炼的雄师，这些关口终究都被他们一个一个地攻下来，闯过去了。但全旅的消耗，也确实是很大的，虽然减员不太多，可每个干部、战士，由于白天黑夜行军打仗，攀荆棘，渡激流，褂子烂成了背心，裤子烂成了裤头，有的没得鞋穿，脚磨得象烂桃。突围以来，指战员没有吃过一餐正经饭菜，全靠发的一点干粮和田沟里的流水充饥。有时断了干粮，就扯把野菜生吞填肚子，一个个都累饿得骨瘦如柴。皮定均和大家一起行军，一样挨饿，还要日夜操劳指挥作战，途中患了一次疟疾，身体比别人更差。同志们心疼地说：“皮旅长瘦得象一根棍子。”皮定均笑着说：“就这样瘦才好呢，负担轻，

行动快，敌人赶不上，抓不住我们，还常常被我们这五千多根棍子打得昏头转向。”说得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敌人对一旅毫无办法，便把赌注压在最后一道封锁线——津浦路上。他们把日本鬼子遗留下来的封锁新四军的护路碉堡、壕沟等工事，都重修一遍，部署重兵，严密把守，妄想在这里把一旅卡住吃掉。对于这一着，皮定均等是早有预料和准备的。在淮南区党委派的联络员的帮助下，他很快掌握了津浦路敌人封锁线的兵力部署情况，经同旅党委商量后，向部队作了紧急动员，改变原来决定的由明光与管店之间过路的计划，连夜急行军一百二十里，向敌人封锁兵力较为薄弱的石门山猛进。但是，先头部队刚穿过铁路，就被敌人发觉。敌人在装甲火车的配合下，从明光、滁县、管店等地，分五路向一旅扑来，顿时战斗炽热起来。由于皮定均带领先头部队占领了制高点，敌人才没有讨着便宜，装甲火车在我军手榴弹和迫击炮轰击下，也退了回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一旅全部冲过了铁路，很快进入苏皖解放区。这次突围战斗，历时二十四天，行程二千多里，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交给的任务。华中军区首长高兴地说：“你们从敌人堆子里打出来了，真是大喜事，大喜事！”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惊奇地说：“你们的奇迹，我一定要告诉全世界人民！”^①

①皮定均率第一旅由中原突围到达苏皖解放区的情况，见1.皮定均：《铁流千里》，载《立夏节烽火》，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2.《皮定均胜利突围经过》，载1946年8月9日《新华日报》。3.新华社记者：《中原东路突围记》，载1946年8月12日《新华日报》。

蒋介石对我中原军区“围剿”未能得逞。又集中了五十万大军，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皮定均到苏皖解放区后，立即又投入了华中保卫战。在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渡江等战役中，都立有卓著战功。特别是孟良崮战役，由于皮定均率部出敌不意，攻占了蒋介石王牌军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贮存辎重弹药的重地坦埠，斩断了张灵甫的后卫，使张灵甫师四万多人全被压迫在孟良崮的狭小地区内，全部被歼。战役结束，皮定均在敌指挥所找出了张灵甫的尸体，诙谐地说：“这位美国培养出来的‘常胜’将军，死了还躲起来，和我们捉迷藏！”^①

(四)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纠集了十五个仆从国家的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并对我国东北地区实行狂轰乱炸，妄想以朝鲜为跳板，进而进攻中国。

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的义愤。一致要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泽东毅然决定，挥师入朝作战，与朝鲜人民并肩打击美国侵略者，保卫朝鲜，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和朝鲜军民一起，连续发动了五次强大攻势，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敌被迫转为守势。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实行阵地防御，美伪集团被迫接受“停战谈

^①江渭清1983年12月1日回忆，徐文华1983年12月6日回忆，刘德昌1983年12月9日回忆。

判”。在此期间，担任二十四军军长兼政委的皮定均，曾组织团以上干部到朝鲜前线进行战地实习，参加了多次战斗，均立有战功，并为后来挥师入朝作战，取得了经验。

一九五二年九月初，二十四军奉命集结，准备入朝。为了振奋军威，提高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皮定均对全军干部战士进行了反复动员，控诉美帝罪行，学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述，并根据自己在朝鲜实习作战的经验，深入细致地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特点及美帝和朝鲜伪军的战略战术，举行入朝作战宣誓，为全军指战员入朝作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九月中旬，皮定均奉命率全军跨过鸭绿江，经二十天徒步行军，到达指定的作战地域——朝鲜蜂腰部战略要地——元山。部队进入阵地后，皮定均立即组织全军进行紧张的勘察地形、构筑工事、制定作战方案和练兵运动；进行加强纪律性和团结友军、热爱朝鲜人民的教育；使部队很快完成了工作、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的转变。

当时，刚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要大打，以武力迅速解决朝鲜战争。他准备从东西蜂腰部卡断（朝鲜地形象只蜜蜂，中间最细部分，战略上称蜂腰），把志愿军消灭在蜂腰部以南，进而占领全朝鲜，逐步把战争引到中国的东北。皮定均和军党委在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密切协同，主动歼敌；孤胆作战，近战歼敌”的作战原则。动员全军指战员，作好坚持艰苦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要求营、连、排、班、个人，都要准备独立作战，在敌人的包围下，坚守半年，把敌人拖垮、打败。

十二月底的朝鲜北部，气温摄氏零下四十度，寒风凛冽、冰封雪冻。皮定均奉命率领全军翻山越岭，向上甘岭地区急进七天七夜，担负起东起牙沈里、西至栗木洞的约三十公里的阵地防御。行军途中，很多战士手脚冻坏了，不能行动，不能拿枪；有的不适应低温气候，干粮吃不下。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干部不注意关心、帮助这些同志克服困难，反而埋怨这些同志娇气，甚至嫌他们拖腿。担任着军政领导责任的皮定均，认为这是一种严重影响官兵关系，有损团结，有损战士革命热情的情绪，必须立即加以克服。他除了提请军党委讨论、部署外，还亲自找干部谈心，指出：“抗美援朝，是祖国人民交给每个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十分光荣的义务。面对疯狂的国际帝国主义强敌，我们没有同志间的阶级友爱，没有团结得象一个人那样的战斗集体，没有全体同志的革命热情，我们不但尽不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义务，中朝两国人民将要蒙受亡国的灾难！”教育干部要善于引导和帮助战士克服困难，爱护战士的革命热情。他还带领干部看望冻伤的战士。向他们讲解红军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历程和防寒防冻的方法，鼓励大家鼓足勇气，战胜困难，为中朝人民立功。这样全军上下，很快形成了一个官兵互帮、互爱、团结、紧张的政治局面。

二十四军的防区，处于朝鲜中线门户的五圣山、西方山，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点，当面之敌为美三师、美独立五团、伪九师、伪首都师及比利时营、希腊营、卢森堡排。敌人从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双方相距多者一两公里，少则几十公尺，都靠阵地工事对峙。

为了坚持持久作战，部队开展了广泛的“以阵地为家”和“人在阵地在”的宣传教育。为了把阵地建设成战场的“家”。

皮定均亲自带领干部战士挖坑道。他对坑道的质量要求特别严。不光是能防敌人的飞机大炮，还要能守能攻。他很少在司令部里，三十多公里的前沿阵地是他的主要活动场所。那时候，敌我大都经常派暗探到对方阵地刺探军情，打冷枪射击指挥员和抓“舌头”，因而大家都担心军长经常在前沿阵地活动的安全。皮定均却说：“我的安全是重要，但你们前沿阵地的安全更重要。工事出了漏子，坑道不坚固，我们全军的安全，整个战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一个师长向他保证：“我们一定按军党委指示的办，保证坑道修的不会出问题。”皮定均说：“你向我保证，是你师长的责任，我要亲自检查，是我军长的责任，不能互相代替，不检查就是失职。”他援引彭德怀总指挥到前沿阵地视察的指示说：“当指挥员的如果怕死，不敢在前沿阵地指挥，是绝对带不好兵的。”他的话说得如此真切有理，使军部和各级指挥员非常敬服，谁也不好再阻拦他深入前沿阵地的行动。

由于皮定均经常工作在前沿阵地，所以他对阵地上每个工事及其兵力部署、火力配备都很熟悉。在他的带动下，各师、团、营、连指挥员都坚持生活在前沿阵地，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从而使全军官兵团结一致，凝成一体，全军防区成了战无不胜的钢铁长城。

皮定均注意思想政治工作，更注意研究战略战术，抓住战机，消灭敌人。当时，美、伪军在武器装备方面，远远比我们先进，后方供给也比我们优越。他们认为我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敌方有些官兵常常在阵地前耀武扬威，甚至唱歌跳舞，并常派小股部队出击骚扰。皮定均决定狠狠打一下敌人这种嚣张气焰。他提出，“积极小打，主动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并

把这种战术通俗称为“零敲牛皮糖”。部队根据这种战术要求，广泛训练神枪手、神炮手和狙击队、突击队，充分发挥我军近战、夜战、孤胆作战的特长，打击敌人。这一战术十分有效，有的连队在一个月內，就打死敌人五百多名，三一四团神枪手张桃芳一个人就打死敌人二百多名，荣获“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敌人被打得心惊肉跳，有的出坑道放哨、值勤，先向上帝祷告；有的被打死后，躲在坑道里的敌人不敢出来收尸。我军的战士则兴奋地说，“‘零敲牛皮糖’威力很大，取消了敌人的主动权”，“关了敌人的禁闭”。

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全军各营、连都组织有突击小分队和狙击队，每队三人、五人、十人、八人不等，利用夜间摸入敌人阵地，侦察敌军动向，消灭敌军巡逻队，摸敌人岗哨。全军头五个月共出击一百五十余次，歼敌近二千人，捉了不少“舌头”，为我军提供了作战情报。

神枪手、神炮手和突击小分队的活动，打击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军士气，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表彰和推广。原来有些战士，看美国鬼子个子大，武器好，有恐美情绪。通过冷枪、冷炮射击，同敌人近战、肉搏战，连连取胜，才觉得美帝并不可怕，树立了可以打败它的坚强信心。。皮定均和军党委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积极组织部队向缓冲地区进攻，歼灭敌人，改善防御态势，占领了敌人很多前沿据点，为开展夏季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朝鲜战场形势不断地向不利于美伪军方面转化，一九五二年夏季，美伪被迫接受停战谈判。但敌人是相当狡猾的，他们想利用停战谈判的机会，发动进攻，同我争夺前沿阵地。李承晚反动当局以“遣返战俘”问题为借口，破坏谈判，更激起

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广大指战员的义愤。志愿军总部和朝鲜人民军决定发起夏季进攻战役，打击敌人破坏谈判的阴谋。皮定均根据总部指示，动员全军坚决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由于动员深入广泛，火力配备得当，进攻开始，就接连获胜，敌伪很多所谓“模范阵地”、“钢铁阵地”都被我攻克占领。这时，皮定均已接到回国命令，但他十分关注抗美援朝的战事发展，与新任军长张震协同指挥作战。直到夏季攻势取得决定性胜利，才离开朝鲜回国。夏季攻势的胜利，使我军阵地向前推进三十多平方公里，敌防区失掉了前线屏障，迫使美伪不得不在谈判桌上签字^①。

（五）

皮定均回国后，奉命到福建前线，负责东南沿海的防务。一九六九年，他被调往西北，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一九七四年又调回东南沿海前线，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二十多年间，无论是在东南海防，还是在西北边疆，他总是一心扑在国防建设上。在福州工作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了闽赣两省的山山水水，对全军区情况非常熟悉，对边防要塞，了如指掌，正像他自己常说的：指挥员要指挥打仗，就要熟悉地形，脑子里要有一张活地图。很多作战参谋，也都非常佩服他的记忆力，他常对参谋人员说：你们光知道在地图上打圈子，那是不行的，要深入

^①皮定均在抗美援朝时期的活动，见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战史》（未刊稿）。2. 1982年12月8日、1983年1月10日、11日访问唐述棣、李怀德、乐时鸣等的记录。

实地去看，才能有直接的认识，才能记得牢固。调到西北后，上任第四天，他就到边防第一线。在兰州工作四年，他走遍了西北高原，穿越腾格里沙漠，冒着大西北的风霜雨雪，风沙烈日，深入到每个前沿连队哨所。有的战略要地他曾多次巡视，对那里的工事构筑和火力配制、后方供给、生活管理等都关照的十分具体，使干部、战士非常感动。皮定均对工作不但抓得紧，而且要求严，直到解决问题为止。如当时前线战备运输任务繁重，车辆经常出问题，不是翻车砸死了自己人，就是压死撞伤了群众，严重影响了前线供给和军民关系。他抓住花庄地区一次翻车典型事件，组织有关单位上千人背被包、带干粮徒步到现场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严格管理制度。这样连续抓了几次，使汽车事故大为减少，受到总参通报表扬。

皮定均到兰州，正是林彪胡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动乱时期，很多单位对抓训练不够大胆。皮定均说：“军队就是要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就要有真本事。不训练，敌人来了，只有失败。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当了亡国奴，还有什么政治可谈！”一次，他到青海一个炮兵部队检查训练任务时，针对有些单位训练成绩不好，对团以上干部说：“你知道我们当指挥员的责任吗？抓训练是比那些唱唱样板戏、喊喊政治口号辛苦。但我们是领兵打仗的，打仗就要有牺牲。人民群众把子弟送到部队，要我们带他们打仗。如果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们训练好，他们不懂战略战术而牺牲了，人民群众能信任我们吗？还能把子弟送来当兵吗？历代名将，都知道爱兵如子。但他们爱兵就是狠抓训练，使他的士兵在战场上少牺牲，多杀敌。我们光怕战士们摸爬滚打受累喊苦，都没有一点军事素质，一上战场，就挨打。这是对战士极不负责任，也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

任。”

皮定均抓军事训练，引起了一些与他要好的同志的不安。他们要他注意，不要让人家（指林彪、四人帮）抓辫子，皮定均说：“我忠心为党为国，死而无愧，随他们怎么办！”一九七五年六月，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整顿部队纪律和作风的任务。皮定均坚决拥护，他说：“我们军队非整顿不可，军队整顿好了，党和国家就大有希望了。”他在福州军区党委会议上提议，抓整顿要首先从团以上各级主管干部抓起，他说：“这些当官的抓起来了，整顿也就好进行了。他们要是不动，整顿只能空谈一场。”在军区党委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训练计划，海陆空一起行动，先把军、师、团主要负责人分批集中到南昌步校，离职整训，每期一个月。在训练中，他亲自主持，一切按条令办事，不论职务高低，都当普通一兵，过连队战士生活。他亲自动员、讲课、作队列示范动作；亲自检查内务，从床铺整理、被子折叠、鞋袜存放、碗筷和洗漱用具的排列、衣服穿着、挂包背法、如何敬礼等等，一项不漏，细致入微。有些老同志年纪大了，长期没有训练，一时难以适应，有些怨言；个别老同志还带着小汽车、皮箱、高级营养品，准备来应付差事。但看到年已花甲的皮定均完全是普通一兵的身份，精神抖擞，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都非常感动，怨言没有了，小汽车、皮箱和营养品送回去了，表示力争当一名合格学员。

第一期训练完成了，第二期接着开始。有的叫喊工作忙，建议不要再训练了；有的请假不到。皮定均坚定地说：“这是军区党委根据军委部署作出的决定，要坚决执行。训练就是加强战备，是我们军队首要的工作。哪项工作也没有这项工作

重要，越是说忙的人，越是要来。”在他的坚持下，按时按量训练完了团以上干部。这样的严格训练，在福州部队还是第一次，对福州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许多老同志回忆说：“皮司令抓部队建设，每次都能抓在点子上。”

皮定均对司、政、后等领导机关的楷模作用十分重视，要求他们一切行动都要给下面做样子。他常说：“我们要求部队做到的，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到，这样，说话才有力量。不然，就失去了领导机关的作用。”在兰州，有一次后勤部门从南方运来一部分桔子，给皮定均送了一筐。皮定均叫通讯员把桔子搬到司令部办公室，又把后勤部门的同志找来说：“我当司令的难道吃不起桔子？你全军区都送了没有？你不能培养我们特殊化啊？”说罢，叫大家都来吃，他请客。皮定均对随身工作的秘书、医生、警卫员等，要求也十分严格。他说：你们虽然不是司令员，但是跟我一起到下面去，人家会重看你们的，也就代表我老皮的行为，代表司令部的行为，决不能盛气凌人，指手划脚，找下面办私事。他为了使随行人员都有事干，到下面去时，每人都安排有具体任务：秘书记录要当天整理出材料；医生要了解战士身体状况，调查当地有什么传染病和流行病；驾驶员、警卫员要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总之，大家都得有事做，不能闲逛。

皮定均虽然身为高级指挥员，但生活十分俭朴，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上级给他配备有专用红旗牌轿车，他极少使用，说它费油、招眼，外出总是坐吉普车。他到下面去，不准事先打招呼，不准特殊招待。有一次到宁夏，自治区军区给他安排在银川宾馆住宿，他却要睡在连队里，说那样高级房间，一晚上几十块钱，老百姓半年收入还不够，他住不起。他从来

不利用职权谋私利、走后门。有的同他要好的同志托他办有损公众利益的私事，他都以理相劝，一一谢绝。

皮定均十分重视部队生产建设，关心战士的生活。他常说：把部队生活搞好了，不仅可以减轻人民负担，还可以减轻市场压力，有利于作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福建，由于耕地少；他组织部队利用海滩兴办农场。他还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了一套加强连队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的经验，要求每个连队有“四个一”（一个好菜园、一个好猪圈、一个好水浮莲池、一个好作坊），有条件的，还要再挖一个好鱼塘；每个营要有“三机一磨”（压面机、粉碎机、缝纫机、豆腐磨）。由于他抓得紧、抓得细，福州军区各部队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上达到了以上要求，连队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

皮定均在党委内部，也是一位好“班长”。凡军政要事，他都提请党委讨论，充分听取大家意见，从不包办代替。但一形成决议，他就要求大家坚决执行。工作有成绩，他都记在党委的功劳簿上，从不突出个人；工作有失误，他勇敢承担责任，不向下推诿。他从不奉承别人，也不喜欢别人吹捧自己。对同志，特别是对领导同志的缺点、错误，他从不姑息迁就，批评起来，十分严厉。但他总是坚持以理服人，使你口服心服。你有不同意见，允许你提出反驳，如果你确实有道理，他也能改变自己的意见，并虚心检讨。一九七四年，因对一位干部处理问题，他批评一位政治部负责同志办得不力。这位同志说：“军区党委有结论，你看看再说。”他看后，证明自己批评错了，便主动向那位同志道歉说：“我批评得不准，你是对的，你不坚持，这件事要出差错的。”

皮定均十分注重营房建设和环境绿化。他常说：部队虽然

是执行作战任务的，但也要安居乐业。无论在福州还是在兰州，他都很注重营区建设，特别是植树造林，绿化营房，他到一处，抓一处。他说：栽树不光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大事，绿化伪装也是重要的战略。在福州，他向部队发出植树号召后，发现一个岛上的部队不够积极，便亲自带着树苗到岛上，在那支部队的营房门口栽了两棵树。这无声的教育，使大家很受感动。如今，这个岛上已是绿树成荫了，皮定均亲自栽植的那两棵树，已长成参天大树。他不仅关心栽树，还注意栽树的成活率，如果发现树苗枯死和遭受虫害，一定要研究清楚，并通知各单位注意防范。西北高原气温低、风沙大、雨量少、土质瘦，造林成活率很低。他到兰州后经过调查访问，发现有适应当地的树种，马上推广。现在兰州军区营房周围，树木也已蔚然成林了，还种了很多苹果树。人们看到这些成行的树木，吃起鲜甜苹果，就会怀念起当年的司令员皮定均。

皮定均对人民群众有无限深厚的感情。他常向干部和战士们讲：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是我们的父母，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战时行军打仗，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知道关心人民的疾苦，就是忘了人民军队的根本。他在兰州军区任司令员兼省委书记时，一次到张掖地区农村检查工作，发现很多人没有衣穿，有的人甚至没有裤子穿。他问为什么？一个结合进地委班子里的造反派头头说：“当地群众有这种习惯。”他狠狠批评了这个造反派头头，说：“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丑能瞒得住，穷瞒不住’。这里明明是穷，你说是习惯，所以我们就不要费力搞生产了？你们这种‘革命’太容易了。”回到机关后，他发动干部募捐搞了不少衣被鞋袜送往张掖。有人说：那地方穷，再搞也不管用。皮定均说：能解决多少是多少，比看着

不管强。

皮定均十分爱护自己的子女，但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教育他们走自己的道路，做个自食其力的公民，不要依靠父母，更不能仗着父母的权力，欺侮别人；要求他们对保姆、公务人员，都要以长辈相称。他常对孩子们说：“阿姨和公务员，都是组织上请来帮助我们的。在我们家，他们是客人，要特别尊重他们。”有一次，小三子喊公务人员的名字，没喊叔叔，皮定均听到后狠训了他一顿，批评他不懂礼貌。皮定均很注意孩子体力劳动。他规定：孩子自己能做的事，不准要保姆和公务人员做。每逢假日，他总要带孩子们到营房周围和军区大院里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他把三个男孩子都送到军垦农场劳动去了。以后，孩子们工作了，皮定均也都建议把他们分到外地，免得他们在父母身边有优越感，给组织上找麻烦。一直到他殉职之前，也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多老同志都说：“皮定均同志处处都为人楷模！”^①

皮定均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和敏锐地洞察能力。在十年动乱、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不为淫威所逼而丧风失节，也不为风向难辨而懈怠工作，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

①皮定均在福州、兰州军区工作时的情况，见1. 李志民、朱绍清、廖海先、龙飞虎：《南征北战，奋斗一生》，载1982年7月7日《江西日报》。2. 高维嵩、李叔茂、谭子先、芦延龄1983年3月15、16、17、18日的回忆。3. 宋维栻、占任雨、倪南山、许成军1983年1月22、25、27、28日的回忆。4. 张烽：《痛悼皮定均同志》，载1977年7月7日《福建日报》。

活动及其在福建的爪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对抄家、围攻、匿名信威胁，甚至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当面恫吓全然不顾，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保护了一批干部；他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从有利人民团结、有利军队稳固、有利国防建设出发，积极忘我工作，顶住了阵阵逆流。

“文革”初期，皮定均积极支持地方干部大胆放手工作，曾被诬蔑为“闽赣两省的太上皇”、“福建最大的保皇派”、“以生产压革命”。但他毫不畏惧，公开对那些“造反派”头头说：不能随便抓人、扣人、斗人。福建地处前线，是祖国的东南大门，谁要是乱来，出了漏子，可别说我翻脸不认人！一九七四年皮定均由兰州重返福州时，在江青等借“批林批孔”旗号掀起的反党乱军恶浪中，军内少数派性人物竟将福建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倪南山抓了起来。他知道后，当即气愤地责问：“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政委抓起来，谁给你们权力？”并下令马上放人。“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向“中央”告状，“中央”发了九号文件，公开点倪南山的名，说他是“反革命”。皮定均不怕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压力，同张春桥当面辩理，终于使倪南山得到“解放”。后来，在一次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齐出动，攻击“福建是全国‘右倾翻案风’最严重的地区”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并指着皮定均说：“不要认为自己打仗有办法，是什么战将，没有什么了不起。”皮定均无视“四人帮”的淫威，如实陈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福建各项整顿工作的成效，强调指出：“是非不能混淆！”会后，他对当时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说：“他们才没有什么了不起，……翻不了船。”一九

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皮定均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指示福州军区召开追悼会，还建议支持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佩戴黑纱、搞悼念活动。当他看到《福建日报》转载《人民日报》一篇题为《送瘟神》的别有用心的消息时，马上打电话责问报社：“总理刚去世，全国人民无限悲痛，你们用这个题目报道这个消息，是什么用意！”表现了皮定均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此后不久，一九七六年七月，皮定均由于长期熬夜，积劳成疾，眼睛视力极度减退。但他非常关心正在进行的海防军事演习。在刚做过眼睛手术之后，就飞往前线指挥军事演习。不幸，直升飞机失事，皮定均因公殉职，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①。他那坦荡的革命胸怀，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充沛的革命精力，无私无畏的革命品质，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忘我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①皮定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和他因公殉职的情况，见1.李志民、朱绍清、廖海光、龙飞虎：《南征北战，奋斗一生》。2.陈天仁：《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福州军区1977年8月印发。3.廖志高：《皮定均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未刊稿），存金寨县委党史办公室。4.倪南山、郝志平、叶飞、江渭清、刘功1983年1月22日、10月13日、10月25日、12月1日、10月24日的回忆。

赖 经 邦

汪俊生 沈庆鸿

赖经邦是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东固地区工农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党代表兼参谋长，对创建中央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二八年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

(一)

赖经邦，原名泽智，别号有济，小名云长，一八九九年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初五）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东固敖上古瑞仁村。祖辈都以务农为生。

赖经邦七岁入私塾，读了两年半，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十六岁到东固涧东书院读书，一九一九年夏毕业。秋天，赖经邦考取了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第七师范是吉安学生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后，吉安成立了吉州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七师范的学生每一次都走在斗争的前列。赖经邦入校后，既勤奋学好功课，又积极参加当时的爱国反帝运动，进步很快。一九二三年七月毕业，受聘到吉安县永和高等小学教书。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吉安城，共产党员

周庭藩担任吉安县长，各种革命组织也积极开展活动。赖经邦经他在七师的同学，当时担任县教育局长的梁明哲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并调县教育局任巡学员，负责吉安县纯化区（从值夏到东固一线）的学校视察工作。党组织决定让他利用巡学的有利条件，到东固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农民运动。

东固是赖经邦的家乡，位于吉安县东南部，介于吉安、吉水、永丰、太和、兴国五县之交，南北长四十里，东西宽三十里，四面崇山峻岭，山高路险，交通不便。这里的农民深受地主豪绅与反动官府的残酷压迫与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历来是揭竿农民、绿林草寇聚居出没之地。赖经邦从小生长在这里，深深懂得整个东固山就象一堆三伏天的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燎原烈火。为了东固穷苦人民的翻身解放，他愿意做一颗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冬，赖经邦巡学到东固。他白天照例到各校检查工作，同时利用机会向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晚上便找教员谈心，或到附近农村调查访问。

涧东书院青年教员刘经化和汪云从，都是赖经邦当年的同学。他们在赖经邦的教育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赖经邦又让刘经化带他到东固附近篾匠李会凤家里聊天交朋友，向李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李的阶级觉悟。不久，赖经邦就分别发展刘经化、汪云从、李会凤为中共党员。

一九二七年二月，赖经邦在涧东书院秘密成立了东固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刘经化被推选担任党小组长^②。

经过赖经邦等人的积极筹划，二月底，召开了九区农民协

^{①②}汪安国的回忆。

会成立大会，刘经化、梁必芳担任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上正式宣布：实行减租减息、禁止卖烟（指鸦片烟）开赌，禁止妇女缠足……。会后，二千多群众整队游行。不久，县农协给九区农协发了九支步枪，成立起农民自卫军。

在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里，赖经邦不忘对家中亲人进行教育。他对妻子傅伏娇说：“中国的人口中，妇女占了一半，要干革命，打土豪，妇女也要出力。我在外面领头干，你在家里也要做出好样来！”①在赖经邦的帮助下，傅伏娇积极参加农协和妇女会的活动，被选为农协代表，还带头剪去长发；他的弟弟赖泽高是农协的积极分子，并参加了农民自卫军；父母也在乡下做起宣传工作来。

当时，富田大土豪王初曦，在东固占有大量土地、山林，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东固人民早就恨之入骨。赖经邦根据东固人民的要求，组织农协撰写了《关于立即捉拿大恶霸王初曦的控告书》，列举了王初曦的十大罪状，告到县政府。县长周庭藩很快就接受了东固人民的正义要求，把王初曦抓到县狱关押起来。

抓了大土豪王初曦，大大打击了东固、富田一带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壮大了农民的声威。东固成了农会的天下。赖经邦点燃的革命星火，终于在东固的深山密林里燃烧起来。

（二）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以吉安驻

①傅伏娇的回忆（1978年5月20日）。

军第八师师长兼吉安警备司令朱世贵为首的反动分子，也向吉安的革命力量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八月六日，敌人公然杀害了吉安县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梁一清等三人，吉安革命形势随即突变。在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党员迅速离开白色恐怖的县城，转移到农村，等待时机，准备开展新的斗争。

梁一清等被杀时，赖经邦还在东固，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阻塞，他不知道吉安已发生了事变。八月十日，赖经邦从敖上动身回吉安。当他翻过九寸岭，走到离富田两里路的地方时，看见前面设有岗哨，在盘问过路行人，便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这时，天正下着雨，他就撑开雨伞遮脸走上岔路，沿着山边小道，绕过岗哨和上富田王家，来到下富田匡家村同学匡国栋家里。

匡国栋告诉赖经邦吉安近日发生的事变，并说王初曦已被释放，在富田收买一批地痞流氓，设岗放哨，扬言要捉拿赖经邦和九区农协负责人。赖经邦觉得形势危急，决定连夜返回东固。但此时王初曦正派人搜查，匡家村大小巷路都布满了岗哨。于是，匡国栋立即带赖经邦走到后院，打开侧门，穿过几家菜园地，来到匡由智家。匡由智早听说赖经邦在东固兴农会，打土豪，闹抗租抗债的事，对他十分敬佩。当听到王初曦要捉拿赖经邦，便将赖经邦带到楼上隐藏起来。

第二天，赖经邦写了一封信，交匡由智送给离富田五里的陂下村他的七师同学胡家驹和胡师超。当晚十时，胡家驹和胡师超带了一百多人，冒雨摸黑来到匡家村对面河滩上，将赖经邦接到陂下。两天后，赖经邦便绕道吉水水南、永丰上坊，回到东固敖上^①。

^①访问富田匡贤迟、曾玉莲和陂下胡登芳等的记录。

这时，东固在吉安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事变前担任县总工会秘书的曾炳春，担任县农协常委的高克念和担任县农协执委的汪安国等人，在吉安隐藏几天后，都化装潜回东固。他们向赖经邦详细介绍了吉安事变的情况。为了提防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大家决定暂时停止党组织和农协的活动，把枪枝埋藏起来。一个多月以后，赖经邦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西秋收暴动计划，决定恢复党和农协的活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赖经邦在敖上角头村段蔚林家里，主持召开了东固地区十二个共产党员参加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恢复党和农协活动、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并决定成立东龙（东固与南龙）党支部，赖经邦任党支部书记。

不久，东龙党支部在原九区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固农民协会，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汪云从、李会凤等任农协执委^①。接着，又选拔了二十三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取出埋藏的枪枝，成立了东龙游击队，赖经邦任队长。为了迅速壮大这支武装力量，赖经邦提出争取当时活动在兴国良村蜈蚣山一带的“三点会”首领段月泉率部下山。

段月泉，又名段起凤，家住永丰石陂丝茅坪，其三哥段月亮是赖经邦的姐夫。段月泉在福建参加了“三点会”，回来后在永丰潭头、兴国良村一带发展了一批“三点会”徒，结拜了十兄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发展成为邻近百里之内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农民帮会武装。

赖经邦认为在东固山开展武装斗争，段月泉等是一支可以

^①汪安国、赖泽高的回忆。

团结改造的重要力量。于是，他派段月泉的堂弟、共产党员段蔚林和段月泉的三哥段月亮，先往兴国良村一带找段月泉联系。经过段月亮和段蔚林的耐心劝说，并答应居中担保，才使这个“不服人管、只服天管”的段月泉同意和赖经邦面谈。

十月上旬，赖经邦在段蔚林陪同下，和段月泉会晤。赖经邦对段月泉说，搞“劫富济贫”是不能够真正打倒财主官府、解救贫苦百姓的，天下穷苦人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打倒地主豪绅，推翻反动政权，才有自己的出路。他还对段月泉解释了我党的宗旨和政策。经过赖经邦反复的规劝，终于说服了段月泉。十月底的一天深夜，段月泉带上他的绿林武装下了山，参加了东龙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的副队长。东龙游击队驻扎在东固、敖上、南龙之间的养军山上，抓紧进行军事训练。

在东龙党支部的领导和东龙游击队的支持下，东固农协的活动也迅速恢复，贫苦农民纷纷起来打土豪、抗租抗债。农协镇压了江口龙家湾土豪劣绅傅老鼎、傅老力两兄弟，还罚了敖上曾行积等土豪的款，打击了豪绅，伸张了正义。

十一月上旬，东龙党支部决定，以东龙游击队为骨干力量，举行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是攻打反动堡垒——富田王家，捉拿大土豪王初曦。十一月十一日（农历十月十八）晚，赖经邦率领游击队和暴动群众一百多人出击富田^①。队伍进至离富田不远的磨盘岭时，赖经邦下令分两路向王家包抄。但狡猾的王初曦已闻风逃跑，当场捉到王初曦的弟弟王良照，缴枪六条、子弹数十发，抄了王初曦的家，把没收的部分财物分给当地贫苦农民^②。

①②王初曦 1927 年 11 月向吉安县府《控告赖经邦呈文》，抄件存吉安县档案馆。

第二天，东龙游击队一路散发传单来到离吉安二十里的永和圩。打击了八个土豪，筹款上万元。十四日返回富田，又烧了王初曦的老巢。十七日，游击队袭击吉水水南圩，缴枪十六条。十八日再返富田，住十多天，向当地群众宣传工农革命的意义，号召工农起来革命，同时召集当地裁缝做军衣数百套，然后凯旋回师东固^①。

东固暴动，揭开了东固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吹响了吉安县人民向反动势力发动进攻的冲锋号，鼓舞了赣西人民的革命斗志。从此，东龙游击队威名远扬，赖经邦的名字也传颂甚广。东固附近的一些农民武装，如兴国良村民团首领梁仁杰、太和紫阳山孙道发等，相继前来联系。经过工作，都先后把他们团结收编了过来，从而壮大了东龙游击队的力量。

(三)

东固暴动的胜利，使赣西各县的反动分子大为震惊。为了镇压赖经邦领导的东固人民的革命斗争，王初曦纠集富田、新安、陂头、新圩、值夏等地的地主豪绅组织靖卫团，兴国崇贤、枫边、吉水水南、永丰潭头、沙溪和太和天符庙等地反动豪绅也先后组织了靖卫团。这些反动地方武装经常到东固地区骚扰，形成犬牙交错的斗争局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王初曦呈报反动县政府，请求派兵“清剿”东固。县政府请派了一团白军进驻富田，然后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富田、白沙、水南等地的靖卫团，共六百人左

^①王初曦 1927 年 11 月向吉安县府《控告赖经邦呈文》，

右，于十二月十二日（农历十一月十九）进犯东固，妄想一举消灭东龙游击队。王初曦亲自带了二百多人直奔敖上，企图捉拿赖经邦。这时，赖经邦正带领游击队驻扎在养军山上。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经过短暂的交火，赖经邦决定避敌锋芒，将游击队撤到永丰县一侧。王初曦在敖上抓不到赖经邦，便大肆抢劫，抄了赖经邦的家，烧了他的房子，然后匆忙撤走。

东龙游击队撤移到永丰潭头和吉水白沙一带之后，就地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抗租抗债斗争。赖经邦和段月泉帮助从东固回去的共产党员姚振和姚蕃组织了永丰潭头地区第一个农会组织——芹菜坑农民协会。随后，在潭头、罗坊相继成立了十二三个农会，还发展了七名党员，成立了归东龙党支部领导的石陂、芹菜坑、卧龙三个党小组。

十二月初，永丰藤田、石马的靖卫团开到沙溪，扬言要消灭吴江、匡新民领导的永（丰）吉（水）游击队。永吉游击队得到消息后，找到赖经邦，要求助战，合力歼敌。赖经邦带领东龙游击队和永吉游击队联合起来，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从东西南三面进攻沙溪。敌人抵档不住，纷纷向北往藤田逃窜。

十二月下旬，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赣西特委决定将东龙游击队与永吉游击队合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部分工农群众参加，组编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赖经邦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吴江任队长，段月泉任副队长；下设两个中队、一个政治宣传队，曾炳春任政治宣传队队长；共有队员近二百，枪八十多条。第七纵队在养军山召开了成立大会，东固附近七八百群众和吉水、永丰、兴国、太和等县农会也派代表前来参加，还带来不少慰问品。赖经邦和赣西特委胡代表在会上号召全体战士和各县同志紧密团结，不怕牺牲，英勇战斗，

扩大和保卫红色区域^①。会后，第七纵队指战员在与东固毗邻的各县边缘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建立农会组织，打土豪，筹粮款，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势力。

一九二八年一月，赖经邦和吴江率领第七纵队，在当地农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多次打击藤田、沙溪等地的靖卫团，有力地推动了永丰县革命运动的发展。二月，赖经邦、曾炳春带一部分队伍到和东固螺坑相邻的兴国大陇（大陇党小组也归东龙党支部领导），支援崇贤暴动。当天夜里，他们袭击了崇贤靖卫团部，击毙靖卫团长曾文绚，把东固南面这个反动武装据点拔掉了。不久，太和天符庙附近的群众来东固报信说，驻扎在天符庙的靖卫团去县城看龙灯，只留下几个新团丁看守在押的壮丁。赖经邦当夜带部队奔袭天符庙，救出被关押的壮丁，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一把火烧掉了天符庙。

第七纵队夜袭天符庙的战斗，使王初曦大为惊慌。他赶紧向九寸岭一带增派流动哨，还在靠近东固一侧的大源坑派驻三十多个靖卫团丁，对东固严加封锁，禁止人员来往和物资进出。赖经邦和段蔚林带领部队一夜之间就把大源坑这个据点打掉，缴枪十多条。从此，王初曦只得龟缩在富田，不敢轻易向东固境内进行骚扰。赖经邦还带领第七纵队攻打永丰罗坊和吉水水南的靖卫团，缴枪二三十条。几个月时间，第七纵队转战各地，威震四方。

至此，东固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东从永丰的上坊、潭头、龙岗，西达太和的中洞、桥头岗；南及兴国的崇贤；北接

^①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四团的成立经过》，载《江西党史资料》第13期。

吉水的白沙、水南，方圆近百里都成为红色区域。为了加强对红区的领导，一九二八年二月，赣西特委决定，以东龙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东龙区委，高克念任区委书记。东龙区委下设七个党支部，有党员五十多人。东固农协也改为东龙区农协，基层村农协发展到二十四四个，农协会员达一万四千多人。

（四）

东固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使附近各县的反动势力惶恐不安。他们联合起来，实行集中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封锁，在通往东固的关隘上增设岗哨，禁止向东固运送食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妄图“困死”红区人民。赖经邦在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与当地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领导东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敌人的封锁和进攻。

一九二八年春，正当王初曦极力拼凑“五市联防”^①准备对东固进行军事“围剿”时，兴国枫边的反动豪绅胡启顺也组织靖卫团，从东南面紧密配合，对东固地区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经常到东固一侧进行骚扰，杀害无辜群众，引起东固军民的无比愤慨。为了打击枫边靖卫团的嚣张气焰，保卫东固根据地的安全，赖经邦决定清除枫边这个反动据点。

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十三），赖经邦率领七纵队和东固各地赤卫队五百人左右，攻打枫边靖卫团。八时许，中队长谢利茂带所部一百多人在前面开道，赖经邦在南龙集中各地赶来

^①由值夏、陂头、新圩、新安、富田五个圩镇靖卫团拼凑而成的反动武装。

参战的赤卫队、群众随后跟上。七纵队前锋在离枫边不远的山下塘村与枫边靖卫团交火后，迅速追击靖卫团开进枫边圩，火烧万寿宫，捣毁了靖卫团的巢穴，紧接着向密石方向追击。队伍在石子背圩拱桥边遭到了敌人的伏击，被拦腰截断，谢利茂带着冲乱的队伍先向左侧山上撤走。

这时，赖经邦正在圩边桥头准备集结退下来的队伍，不料遭到敌人包围。他只身突围后，因天雨辨不清路径，一时迷失了方向。傍晚，他来到垅上村，走进一农户家刚一坐下，忽然从后门涌进四、五个团丁，经激烈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靖卫团歹徒将赖经邦捆在门前旗杆石上毒打，还用尿杓盖在他头上，将尿泼在他身上，说这样能驱散他身上的神功。赖经邦威武不屈，大声怒斥：“记住！今天你们弄死我一个赖经邦，明天会有十个、一百个人起来革命！”歹徒将赖经邦捆绑在竹担架上，解往枫边请功领赏。途中，在离枫边不远的河边小松树林里，赖经邦使尽力气，挣脱捆在身上的绳子，翻身跳下担架，拔腿就往山上跑。就在这时，一个歹徒抡起大刀朝赖经邦头顶猛砍下去。赖经邦躲闪不及，大刀砍在颈肩上，他身子一晃，倒在血泊中。凶狠的歹徒们割下赖经邦的头颅，剖开胸腹取出心肝炒了吃。枫边靖卫团还将赖经邦的头悬挂在万寿宫前“示众”三天。赖经邦为革命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二十九岁^①。

^①访问枫边胡万秀、阙祖升记录。

孙 津 川

陶秀英 张永坤 史 雯

孙津川，又名方淦，曾用名孙竟川、孙继生，祖籍安徽寿县，生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铁路工人纠察大队大队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

(一)

孙津川出身贫苦。他的父亲孙多儒终年辛勤耕作，一家人仍不得温饱，被迫带领全家从安徽寿县沿途乞讨来到南京，进洋炮局当漆匠。在贫困中，孙多儒五个儿女就有两个早夭，自己也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孙津川十一岁那年，就同八岁的弟弟晴川到南京洋炮局当了童工。出师后去上海，先后在大中华纱厂、兴发机器厂做工。因替一位被机器轧伤臂膀的工人抱打不平，他被兴发机器厂开除。严酷的现实使孙津川认识到，上海同在南京一样，穷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一九二三年春，孙津川又进英商经营的吴淞机厂做工。两

年以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孙津川结识了共产党员彭干臣^①。在彭干臣的启发教育下，孙津川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并坚决要求参加革命，跟中国共产党走。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工会派人到吴淞机厂组织铁路工会，孙津川积极参加工作，并被选为厂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党组织，为了建立沪宁、沪杭甬两铁路工会，派王警东^②到吴淞机厂进行工作。孙津川主动找王警东谈工厂情况，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由于厂长英国人毛尔维的压制，工会一时组织不起来。孙津川建议先举办工人夜校，以提高工人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孙津川的建议被采纳，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彭干臣、王警东以教员身份主持夜校工作。孙津川积极参加夜校的筹备活动。他先在吴淞赵家宅自己的住处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夜校的校址，又借了一些桌椅板凳，并动员、联络了几十名工人一起参加学习。后来夜校参加学习的工人达到二百多人，原先夜校的房子显得太小，遂迁到吴淞国民小学去上课。这里靠近永安纱厂、大中华纱厂，所以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孙津川由于在这一时期的斗争和学习中表现出色，经彭干臣、王警东介绍，铁路总工会直属党支部批准，一九二五年八月，孙津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孙津川投入革命洪流，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①彭干臣，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5年6月与王警东一起受上海总工会和铁路总工会派遣，到上海吴淞机厂开展工运工作。

②王警东，又名王凯，是我国著名工运领袖王荷波之胞弟。1925年6月，以全国铁总总干事和上总特派员的身份与彭干臣一起到吴淞机厂开展两路工运。1970年4月逝世。

党组织为了把工人组织起来，在工人夜校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召开了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成立大会，七百多名工人出席了大会，孙津川当选为协进会委员。协进会成立后，除了组织工人互助处，还领导工人开展“加薪”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工人的要求，使每个工人每月能领到五元的房饭钱，翻砂车间的临时工也改成了长工。就在这年底，吴淞机厂成立了党支部，孙津川担任支部书记。党组织的建立，使得吴淞机厂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一九二六年初，孙津川主持的党支部为了联系群众，建立了一个名叫友谊社的组织。社内设有乒乓球、胡琴等文娱用品，还有进步的报刊书籍，并经常演出有革命内容的戏剧，如《打倒军阀》等。五卅周年纪念日，吴淞机厂党组织通过友谊社举办了一次游艺会，演了一出名叫《鸣不平》的新剧，通过一个汽车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故事，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接着，又上演了直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工人罪行的剧目。每逢节日，还要举办纪念晚会，请党的领导干部到会演讲。友谊社不仅向工人进行革命教育，还领导工人罢工。吴淞机厂的工资制度极不合理，孙津川主持印刷了一些传单，号召工人起来罢工。由于工人有力的斗争，厂方不得不同意将各种工资一律增加二成半。

(二)

一九二六年十月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党交给铁路工人的任务是：十月十六日拂晓起，破坏沪宁铁路路轨，断绝行车三天，阻止南京军运列车开出，配合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前线

的总攻击，以创造上海工人起义的有利条件。十月十四日晚，孙津川主持召开了党支部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两个行动小组。会后他率领一个小组赶往镇江，执行破轨任务。

十月十五日，孙津川等到达镇江车站扬旗外的龙潭地段。太阳刚落山，他们就越过深沟开始行动。拆除路轨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拔枕木上的道钉时，用力轻，拔不出来，用力重，会发出响声，惊动敌人。小组成员十分焦急。孙津川动员大家想想办法。此时，一位同志偶然踏上铁轨，发现铁器碰轨的声响立即变得微弱。孙津川高兴地说：“有办法了！”当即安排两位同志坐在铁轨上，减弱了拔除道钉时的碰击声，使破路任务顺利完成。当晚十一时二十分，孙传芳一列满载军火、给养的列车，就在这里越出轨道掉进山沟里去了。

十月十六日拂晓，吴淞机厂厂长毛尔维接到要他急往救援军车的电报。他赶忙乘牵引救援车前往。可是，单机到达吴淞支线，也翻了车。原来，孙津川领人去龙潭破路时，为防止吴淞南滨铁路工厂的三十六吨大吊车来龙潭援救翻毁的机车，已布置几个工人把何家湾一带的铁路也破坏了。毛尔维这个平时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分子，从翻倒的车厢里爬出来，气急败坏的嚷叫：“拉救命回声！”“马上叫工人修单机！”然而，全厂工人此时正按照党支部部署，以怠工来配合破路斗争。他们答道：“路上有便衣队，晚上不能走。援救车是援救的，出了问题怎么办？”毛尔维无可奈何，只好推迟时间。这样，援救车十七日上午六时出发，下午五时到达龙潭，直到十八日下午才“援救”完毕。孙津川等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断绝行车三天”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进展。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十余天，孙

津川根据市总工会的指示，积极组织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进行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三月五日下午，由他直接领导的吴淞机厂首先开始罢工。接着，他又组织机厂罢工工人带着传单到机务段去鼓动。此时，机车司机全被军阀士兵禁闭在机车上。孙津川等通过倒煤渣的工人向司机传递消息，结果，三月八日，机务段的机车司机也都罢工了。

在吴淞机厂和沪宁线工人罢工的推动下，三月十二日，有二百余名沪杭线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十五日，沪杭线全线工人和职员罢工，沪杭线交通停顿，局面一片混乱。

三月十八日，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由罢工转入破坏铁路。当天夜里，孙津川率领工人前往沪宁线真如、镇江车站一带拆毁铁路数处。同时，沪杭线也开始行动。至此，两路运输全部瘫痪。

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三月十九日，党决定将原沪宁铁路罢工委员会改组为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委员会，孙津川当选为主任委员。这次会上，通过了给两路工人全体罢工的命令，并发表了宣言。两天后，即三月二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命令，罢工随即迅速转为武装起义。

第三次武装起义时，铁路工人组成了一个纠察大队，孙津川担任大队长。孙津川把六百名铁路工人纠察队员分成三路，他自己亲率一路，于二十一日中午一时半开到南市参加起义。他们插到警察局门岗背后，迅速解除了敌人门岗的武装，同时向天井口投掷三颗手榴弹，乘着爆炸的浓烟，闪电般地冲进了警察局的休息室，十几个警察吓得连忙跪地求饶。随后，孙津川又带领一批纠察队员赶到高昌庙，配合总工会的别动队攻打敌李宝章的上海防守司令部。此时，法商电车公司工人已经与敌

兵交火；纠察队一面让从吴淞炮台请来的两名号兵吹响冲锋号，一面在火油桶里燃放鞭炮，敌人以为正规的革命军已到，吓得魂不附体。孙津川等蜂拥而上，打得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南市的敌人武装全部解除后，孙津川指挥大家夺来机车一辆，挂了五节车厢，他和二百名纠察队员登上火车，开往闸北支援战斗。到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上海工人纠察队攻占了军阀最后的据点——北火车站，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

起义胜利后，孙津川接到上海总工会下达的复工命令，立即带领两路工人抢修铁路，至二十五日凌晨四时，已将淞沪线路修通。在短短的时间内，沪宁、沪杭铁路恢复行车，保证了北伐军军运的需要。

为了巩固和发展两路工人在这次斗争中的成果，三月二十八日，两路工人代表八十余人，在闸北总工会会所开会，成立了沪宁沪杭铁路总工会，孙津川被选为委员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下午，孙津川带领工人参加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会上，他拿出在与敌人激战中缴获的两支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手枪，控诉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四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军队封闭了两路总工会，包围恒通路梅园里一号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会所，将总工会洗劫一空，逮捕总工会委员和工作人员十九人。

对此严重事件，孙津川与两路总工会副委员长丁继曾合写了一份沪宁沪杭甬两路总工会的《郑重声明》，并在《申报》发表。同时，孙津川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淞沪司令部抗议，要求释放被捕者。凶残的敌人不仅拒绝释放被捕人员，而且扣留了孙津川。工人们义愤填膺，包围了铁路局局长办公室。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总工会委员等十九人获释。但孙津川仍被扣

留。孙津川被扣后，党的组织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吴淞机厂七百余名工人举行罢工，要厂长英国人毛尔维出面保释孙津川，并提出：“一日不放孙津川出来，一日不开工！”与此同时，四千多铁路工人签名致书铁路局长孙鹤皋，坚决表示如果再把孙津川放出来，我们全体工友就要举行罢工！”反动派怕激起更大工潮，遂被迫释放了孙津川。

孙津川获释后，于同年五月护送周恩来乘怡和轮去汉口。此后，他受党组织的委派，往返奔走于汉口、九江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革命者，秘密恢复各地铁路工会的工作。在汉口期间，“铁总”派他参加京汉、粤汉两路职工调查会，调查两路工运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出席第四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同时集合上海赴汉口工人，组成上海驻汉口工人代表团，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在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各产业工会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

(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为加强南京地区职工运动的领导，特派孙津川任中共南京市委职工运动委员。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时而化装成教书先生，时而化装成工人，深入群众，坚持斗争，积极为恢复各级工会组织而奔波，并组织党员秘密散发传单、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镇压工农的罪行。

一九二八年三月，孙津川就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首先摸清全市党员在白色恐怖中的情况，整顿和发展党的各级组

织，恢复和上级机关的联系。到一九二八年夏，全市已恢复和新建立了十九个党支部，三十八个小组。在一次全市党员代表会上，他号召大家认清前途，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大胆工作。会后不久，在市委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除掉了叛徒吴剑华等，为顺利开展工作扫清了道路。

孙津川在南京工作期间，抵制了那种认为革命形势仍在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继续组织城市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主义主张，注意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深入工人、农民、学生、士兵中开展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很快收到了效果，使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下来的群众斗争又活跃了起来。在浦口和浦镇等工人集中地区，孙津川等创办了工人夜校和俱乐部，以此为基础团结了一大批工人，并胜利地领导了津浦铁路工人为加薪、补发欠薪而发动的罢工斗争。孙津川还派工人党员胥光亮到郊区九步洲进行工作，批准建立了郊区第一个党支部。他和市委其他领导成员也先后下农村进行宣传 and 发动，并领导郊区农民开展了反对反动地主勾结“黄枪会”剥削、压迫农民的斗争。在孙津川等的领导下，南京市的学生运动和兵运，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孙津川未能出席大会，但被大会选举为中央审查委员会正式委员^①。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的一个夜晚，南京市委决定在下关黄泥塘地下党员姚佐棠家开会。当孙津川走近那间草屋时，发现有形

^① “六大”原始文件记载，中审委正式委员有三人，排列顺序是：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

迹可疑的人在走动。他意识到姚家出了问题，正想拐向另一条道，忽然从黑暗中窜出四、五个手持短枪的国民党特务。孙津川被捕了。

在狱中，孙津川见到了市委的其他一些同志，才知是叛徒告密，使中共南京市委又一次遭到破坏。敌人在逮捕孙津川等的同时，也把叛徒王汇百“逮捕”了，妄图利用这个叛徒在狱中侦察和诱降被捕的同志。但孙津川等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在狱中揭露叛徒的丑恶嘴脸和卑鄙行径，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孙津川被捕后的第二天，敌警察局的官员们就开始了审讯。敌人说：“我看你不象工人。”孙津川镇定地回答：“你不信，拿机器来，我开给你看”。敌人又问：“南京有多少共产党员？”孙津川干脆地回答：“不知道！”经过几次审讯和酷刑拷问，孙津川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不是无言的蔑视，就是义正词严的怒斥。但敌人仍不死心，不断对孙津川进行劝诱和恫吓，孙津川每次回答都是：“要杀就杀，我什么都不知道！”敌人摆上酒席企图拉拢，被孙津川毫不犹豫地掀翻在地。后来，敌人把孙津川的母亲抓来，妄图用母子之情软化他。孙津川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孙津川，不是王汇百！”搞得敌人狼狈不堪。

就在孙津川被捕的这几天里，敌警察局附近不断出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标语。警察局怕群众劫狱营救孙津川，便将他转押到敌首都卫戍司令部。

敌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极其狭小，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牢房，竟关了四十多人，牢房黑暗潮湿，地板已经腐烂，蚊子、臭虫和跳蚤很多，人们被叮咬得难以忍受。在这恶劣的环

境中，孙津川仍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昏暗的灯光下，他和难友们经常唱《国际歌》和《少先队队歌》互相鼓舞革命斗志，并同难友们一起同监狱当局开展了多次斗争。他非常关心同室的难友，母亲探监时带来的辣椒、牛肉丝和其它一些食品，孙津川总是与大家分享。同室难友中有一位叫 窦昌熙^① 的因身体不好，经常呕血。孙津川给他喂水、喂饭，精心照顾。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赢得了难友们的爱戴和尊敬。

孙津川被捕后，党组织曾设法营救，但因案情严重，未能成功。他的许多朋友也计划营救他。他得知后，连忙带去口信，坚决反对这样做，担心这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他那种为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使难友们为之垂泪，也更加鼓舞了同志们的斗争意志。

面对死亡，孙津川毫不畏惧。一次，母亲来看望他，给他带来了几只梨。孙津川把梨咬开，自己吃了一半，用手指甲在另外半个梨子里刻了一个五角星，然后递给了母亲，暗示母子要分离了，但自己的意志是坚定的，要革命到底。敌卫戍司令部对面一家小吃店当伙计的许忠林，当时只有十三、四岁，敌人允许他可以给狱中犯人送饭。通过多次接触，这个小伙计对孙津川非常敬佩，主动要求为津川办点什么事。孙津川借机托他给母亲带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死我一个不要紧，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及成千成万的革命英雄在那里继续战斗着，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劝说母亲不要为他的牺牲而过于悲哀。

^①窦昌熙，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现任江苏农学院图书馆顾问。

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清晨，一队持枪士兵闯进牢房。看守所所长高叫：“孙津川，出来！”孙津川镇静如常，步履从容，和难友们握手告别，昂然走出牢房。狱卒要绑他，他说：“不用绑，我决不会跑的！”在去刑场的路上，孙津川愤怒地高呼：“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还有一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共产党万岁”！敌人惊恐万分，赶忙堵上了他的嘴巴。刑车来到雨花台，随着罪恶的枪声，孙津川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和调查访问过的单位与个人：

1. 1927年3月至4月上海《申报》。
2. 1927年6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
3. 1927年10月7日南京《民生报》。
4. 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藏有关资料。
5. 访问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上海第八棉纺厂（原大中华纱厂）厂史编写组、戚墅堰机车厂（原吴淞机厂）厂史编写办公室的记录以及上述三个单位提供的资料。
6. 访问徐行之（徐梅坤）、黄一民、窦昌熙、李淑英、何正泉、章养吾、周长福以及孙津川的亲属孙以华、孙以致的记录。

王 尔 琢

宋俊生 刘晓农

王尔琢，一九二四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担任过北伐军东路先遣军党代表，后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井冈山斗争时期，任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于一九二八年八月英勇牺牲。

走革命救国的道路

王尔琢字蕴璞，一九〇一年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一个小康人家，家有十三亩水田和几亩山地。

王尔琢十三岁起在村里读私塾，一九一四年进入官桥国民小学，三年后入石门县县立高级小学，一九二〇年七月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

王尔琢在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期间，不仅自己的成绩优良，还关心其他同学的功课，希望别人与他一样，发愤读书，学好工业知识，将来办工厂为国出力。由于他乐于助人，被同学们选为校学友会的组织干事。

一九二二年春，湖南省劳工联合会的负责人黄爱、庞人铨等被军阀杀害，党领导长沙人民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斗争，并派人到甲种工业学校发动学生举行抗议活

动。王尔琢与学友会的其他负责同志一道，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抗议军阀的暴行。

在实际斗争中，王尔琢目睹了劳苦工农的贫困和统治阶级的腐朽，对原先抱下的“实业救国”的信念发生了怀疑。这时候，他接触了一些进步书刊，通过认真阅读，从中领悟到许多革命道理，懂得要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实行革命，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为了唤起更多的同学的觉醒，他与校学友会负责人商量，以学友会名义在校内开设了一个出售进步书刊的书店。

一九二四年暑假期间，王尔琢在家乡得知广州黄埔军校招收学生的消息。他喜出望外，立即筹足路费，邀合几个同村好友，告别家人，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王尔琢被录取后，在校勤奋学习，刻苦操练，各个科目的成绩名列前茅，颇得校方器重，担任了学生队的分队长^①。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他极为赏识，时常找他谈话，对他进行鼓励。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的反动武装——商团举行暴乱，妄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调集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平叛。王尔琢指挥学生分队，配合其他力量，平息了这次叛乱。年底，王尔琢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二月，占据在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准备进攻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广州革命政府实行东征，东征的主力乃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王尔琢随军出征。六月间，王尔琢率领的一个队的学生军又随主力回师广州，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

^①访问李奇中记录（1978年12月）。

刘震寰的反革命叛乱。

广东根据地得到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改组军队，制定了北伐的军事计划。一九二六年夏，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经过扩充，改编为北伐军东路先遣军。党决定从黄埔军校中抽调一批优秀党员到该军去开展工作，王尔琢被委为这个军的党代表，带领四十多名党员到了东路先遣军。该师师长李明扬是个同情共产党的无党派人士，王尔琢与他的关系很融洽。为要把这支老牌的赣军改造成真正的国民革命军，王尔琢同其他党员一道，通过李明扬团结进步力量，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东路先遣军中开展得较为顺利，派去的党员均安置在各团、营、连担任党代表。王尔琢提出了部队的革命宗旨，颁布了革命纪律，并经常向部队讲述北伐战争的重要意义、目的，讲述官兵们的责任，强调部队各级党代表要身先士卒，带头执行各项纪律和规定。

出师北伐后，东路先遣军在王尔琢、李明扬等人的带领下，不到半年就进军至浙江桐庐一带，在攻城战役中，师长李明扬在前线负伤，由王尔琢代理职务。由于王尔琢善于指挥，部署得当，全军将士英勇顽强，经过数日激战，攻克桐庐县城，为北伐军进军浙江开辟了通道。

“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密令李明扬逮捕该部所有的共产党人。李明扬将密令拿给王尔琢看。王尔琢当机立断，布置师内所有的党员迅速离开东路先遣军。四月底，他也离队前往上海，找到周恩来汇报了情况。五月下旬，周恩来与王尔琢同赴武汉。抵武汉后，他立即写信给那些已脱离东路先遣军的党员同志，要他们尽快来武汉集中。俟这些同志抵达武汉之后，他又通过党的组织，将他们安排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或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九二七年七月，王尔琢接受党的派遣，赴九江马廋岭，担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

艰 苦 转 战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二十五师奉命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王尔琢所在的二十五师归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守大埔的三河坝，与敌黄绍竑部恶战三昼夜，受挫后撤出战斗，沿闽粤边境南行。军至饶平，得知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遂会合潮汕突围出来的少数队伍，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边境。

这支由几方面汇集、建制紊乱的部队，自饶平出发以来，沿途受到反动军队、地主武装的追堵袭扰。加之终日行军打仗，给养得不到补充，部队有时几天吃不上饭，晚上露宿在外。时值深秋，官兵们还穿着破烂的夏装，尤其是伤病员缺医少药。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部队的思想较为混乱，逃跑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保存住这支起义部队，王尔琢不仅协助朱德指挥打仗，而且常向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每次行军，他都和战士们走在一起，或搀扶伤病员，或帮助战士们背包、扛枪，一边走一边给战士们讲述革命道理，有时还唱起京戏或家乡小调，活跃气氛，鼓舞士气。一到宿营地，他又主动找一些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这段时间，王尔琢终日繁忙，一连几个月都顾不上理发，胡子也长得老长。有一回，何长工对他开玩笑说：看你满脸胡须，简直象马克思了。王尔琢笑着答道：革命不成功，不剃头不刮胡子！这虽然

是谈笑之言，却表现了他坚强的革命决心^①。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粤桂战争爆发，敌军忙于混战，起义部队得以在大余、崇义一带休整。这时，所有的部队整编成一个纵队，由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整编后部队分散在崇义的上堡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打土豪分财物，消灭土匪势力。后来，中共广东省委要求朱德率部南下参加广州起义。部队抵达离韶关三十里的犁铺头，得知起义已经失利，遂就地驻扎下来。为了保存实力谋求发展，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经过反复商议，决定利用和敌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旧关系，使部队暂时挂上十六军一四〇团的番号，取得了范部的部分给养。这时候，朱德决定对纵队进行一次系统的整训，由王尔琢具体负责。王尔琢先将所有的连排长集中起来，组成教导队，集训了一段时间，然后要这些干部带着编印的教材回到连队开展训练。在训练当中，王尔琢每天都到现场进行指导，并给战士们做示范动作，在地上摸爬滚打。

不久，蒋介石发觉驻守在犁铺头的队伍是南昌起义的余部，便严令范石生就地予以消灭。朱德、陈毅、王尔琢得到消息，立即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去向。王尔琢建议迅速撤向广东仁化方向，再相机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乳源县北部与湖南宜章县边境。朱德采纳这一善策，率部疾进仁化，一举攻破该县县城，击败县团防局。随后，中共宜章县委派胡少海前来联系，请求攻打宜章县城。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朱德、王尔琢带领伪装成国民党军的起义部队，开进宜章县城。宜章县长不知是假，还在县咨议

^①何长工《伟大的会师》，载《星火燎原》第1集。

局为之举行接风宴会。酒过数巡，王尔琢指挥一个排按照预定计划，逮捕了反动官吏及地主豪绅二十多人。接着，王尔琢率队包围养正书院，解除了县团防局的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犯人^①。第二天，部队召集民众大会，开仓救贫，全纵队正式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王尔琢仍任师参谋长^②。

起义军占领宜章，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不久，王尔琢根据朱德的部署，指挥部队在宜章农军配合下，在岩泉、坪石歼敌许克祥师一千余人，接着又挥师北上，攻占湘南的重镇郴州。随后，部队又分路行动，先后打下了耒阳、资兴、永兴等县，发动农民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使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湘南。

三月，蒋介石调集湘粤重兵从南北两路夹攻湘南。这时，部队接到中央指示：“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并具体指示“将军队移往江西农运发达区域。”^③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又鉴于南昌起义以来的教训，认识到敌强我弱，不宜硬拚；再加上早在去年十二月上旬在赣南时就得知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已经派毛泽覃前往湘赣边界联系，因此决定撤出湘南，与湘南各县的农军一起向井冈山转移。

①②《朱德同志在湘南暴动中的革命活动》，载《郴州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

③转引自肖克：《回忆湘南暴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卓越的红军将领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进至井冈山的中心区域宁冈，在砦市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合。五月四日，在砦市召开了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王尔琢担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

湘赣边界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此时正是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期，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最少时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达十八个团。因此，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乃是根据地军民的首要任务。王尔琢是四军的领导人之一，不仅协助毛泽东、朱德制定适合于红军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每次大的战斗中，都亲临火线直接指挥。

五月中旬，赣敌第二十七师两个团从拿山向根据地进犯。王尔琢协助朱德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向遂川方向出击。军至黄坳，走在前头的二十九团与敌先头营相遇，将敌人打垮。王尔琢估计后面定有大股敌军，立即把二十八团换成前卫，直奔五斗江，在敌人必经的地方设下埋伏。翌日清晨，两个团的敌人果然前来，王尔琢率队英勇出击，首先歼敌第八十一团，旋即冒着倾盆大雨乘胜追击，击溃敌第七十九团，占领永新县城。

红军一败赣敌之后，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带四个团从吉安进犯永新。王尔琢率部主动撤出永新，后又根据军委的命令，绕袭湖南茶陵。杨如轩乘红军主力远在茶陵高垅一带，派

两个团向宁冈进犯，派一个团向永新湴田方向警戒。这时，正在高垅的王尔琢得知敌人进攻宁冈的前锋已抵达龙沅口，当机立断，率领部队向东杀回马枪，一天急行军一百三十里，赶到敌人西进的必经之地草市坳埋伏起来。向西警戒的一团敌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出现在这里，大摇大摆地踏入了红军的伏击圈。王尔琢指挥部队组成密集火力网，将敌军包围在草市坳的大桥头，激战一个多小时，全歼敌人，当场击毙敌团长。战斗结束后，王尔琢又率兵猛进，直扑永新县城。红军攻进城门时，杨如轩正在他的司令部听留声机，闻得枪声大作，才仓惶逃命，被流弹击伤。战后，有的红军战士编了快板演唱，讥讽杨如轩慌乱奔逃的狼狈相，赞颂王尔琢率领二十八团神速行进，飞兵天降永新城。也有的人称二十八团为“飞兵团”，王尔琢是“飞兵团长”^①。

王尔琢每次指挥作战，即使在险恶的战斗环境下，也临危不惧，沉着镇定地进行指挥。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赣敌调集五个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团，分两路从永新向宁冈进攻，由第九师师长杨池生担任前敌总指挥。王尔琢根据军委会议的布置，带领二十八团独挡一面，在老七溪岭迎击敌人。当部队跑步赶到百步墩时，敌人的两个团已经抢先占据了地形险要的制高点^②。王尔琢乘敌尚未完全做好工事掩体之机，下令向敌发起进攻。但连续冲锋三次均不能奏效，部队的伤亡也比较大。与此同时，朱德指挥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一个营，在新七溪岭一带，也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双方正处于对峙状态，

①何长工：《回忆王尔琢》，抄件存宁冈县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②访问白口大队龙作田、尹冬发、朱四发记录（1972年6月）。

战局非常危急。这时，二十八团一营长林彪提出强攻不成，伤亡又大，不如撤出战斗退往莲花方向^①。王尔琢坚决反对这样做，再次指明这次战斗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一定要打垮敌人。他与各营的干部经过研究后，从第三营中挑选了一百多名党员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组成敢死队，由他亲自带领，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再次向敌人发起冲锋。敢死队员一边利用树木山石隐蔽前进，一边用花机关枪射击，前面的倒下，后面的紧接着冲上。经过一场激烈的血战，红军终于攻下百步墩。老七溪岭首战告捷后，王尔琢又果断地指挥部队，一鼓作气赶往新七溪岭，从敌人背后发起突袭。敌人在红军前后夹攻之下狼狈败退。这一仗，红军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一千余支，取得了威震湘赣两省的空前大捷。

王尔琢善于治军。他带兵的一贯作风是严肃和慈爱相结合。部队中的每项事情，大至军事部署、战斗计划，小至生活安排及战士之间的口角是非，他都事事关心，件件过问，从不马虎草率。他不恃才自矜，能够团结同志，听取别人意见，对于别人的缺点错误，也能直接了当地指出，善意诚恳地进行帮助。鉴于王尔琢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和对革命的忠心耿耿，一九二八年五月成立红四军军委和边界特委时，他均被选为委员^②。

英 勇 献 身

红军在连续获得三次大捷后，为了巩固和扩大红色区

①访问何长工记录（1973年4月）。

②《湘赣边界特委之变迁》，载《江西省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8期。

域，王尔琢率领二十八团前往安福边境，开展群众工作。

六月下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带着省委指示信来到边界，要红军离开井冈山，“立即向湘南发展”；并称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要边界特委、军委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①。为此，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城内召开联席会进行讨论。毛泽东、朱德等人在会上陈述红四军不能轻易离开宁冈、冒进湘南的理由，与杜修经发生激烈的争论。从安福连夜赶回永新参加会议的王尔琢，也反对冒进湘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几次与杜修经据理力争。最后，会议决定对于省委的指示不予执行，并向湖南省委作了文字汇报^②。

正在这时，湘赣敌军计划再度联合进攻永新。朱德、王尔琢根据军委决定，率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湘东，扰袭敌人。红军首先攻克茶陵，后又进占酃县。可是，正当部队准备回师宁冈之际，由宜章农军编成的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因思家心切，欲取道郴县折返湘南。杜修经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附和了二十九团这些官兵的错误情绪。朱德为阻止该团孤军冒进湘南，曾在酃县沔渡圩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王尔琢在会上首先发言，严厉批评杜修经无视联席会议决定、一意孤行的错误。杜修经对此极为恼火，指着王尔琢声色俱厉地质问：“究竟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王尔琢回答说：“我要对革命负责！”^③会议经过讨论再次作出决定：执行联席会的

①《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抄件存井冈山革命纪念馆。

②《湘赣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

③肖克：《从红四军成立到离开井冈山前后的几个战役》，抄件存宁冈县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决议，立即回师宁冈。散会以后，王尔琢集合两团部队讲话，号召全体战士服从军委领导，不要违背军委的战略部署。然而，杜修经与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①并没有执行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致使二十九团在翌日凌晨悄悄开往湘南。

朱德和王尔琢得知此讯，觉得该团单独深入湘南，处境将十分危险，遂决定率二十八团前去追赶。二十九团一路急行，七月二十三日抵郴州，在攻城战斗中先胜后败，幸亏二十八团及时赶到，才免于全团覆灭。但在撤出战斗时，部分官兵不听指挥，私自散去，“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②。王尔琢遂与朱德商量，将该团剩余人员编入二十八团，然后率队从资兴、桂东回师井冈山。八月中旬，在桂东与从湘赣边界赶来接应的毛泽东带领的三十一团三营会合。在分路向井冈山进发途中，二十八团行至江西崇义县新义圩时，二营营长袁崇全串通营党代表杜生柏，胁迫该营及一个机枪连、迫击炮连叛逃。第二天，有三个连的干部识破了袁崇全的阴谋，率队设法摆脱了袁逆，但第五连和迫击炮连仍被袁逆带走了。

王尔琢闻报，马上与朱德研究，自告奋勇率队去追赶。追到思顺圩时，侦知袁崇全等正在圩内歇脚。王尔琢观察好地形，指挥部队包围了村子。袁崇全在一栋大屋里听到村外的喊话声，知道红军大队已到，便蒙骗战士们说敌军来了，下令赶快从圩后突围。来到后街，有的战士听清是王尔琢团长的声音，又惊又喜，纷纷跑了过去。王尔琢向他们问明情况，了解到叛徒仍然胁迫几十个战士在圩内，便不顾众人的劝阻和迎面不断射来的子弹，带警卫排直向圩上的那栋大屋扑去。他一面

①龚楚后来成为叛徒。

②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冲，一面放开喉咙高喊：“不要打了，我是王尔琢，是接大家回去的！”^①

快到叛徒藏身的地方时，王尔琢布置战士们四面散开包抄上去。他贴着一堵墙观察了一会，正欲起身向前冲，突然一颗子弹把他击倒。几个战士连忙将他扶起，发现他的胸口流出了殷红的鲜血。不多久，王尔琢睁开眼皮，以微弱的声音嘱咐战士们快去抓住叛徒，言毕牺牲。

被叛徒袁崇全拉走的五个连全部归队，王尔琢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围在王尔琢遗体四周，泣不成声。朱德闻讯赶来，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在王尔琢身旁肃立默哀了很久。最后，他布置战士们把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思顺圩外的虎形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红四军军部在宁冈砬市举行追悼王尔琢大会。战士们临时搭了座小台子，中间挂着大横匾，匾上用棉花精心缀成“赤潮澎湃”四个大字，两旁挂着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的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②！

追悼会由陈毅主持，朱德致悼词。悼词号召全军将士学习烈士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继承烈士的遗愿，为夺取革命胜利奋勇战斗。

^①《八月失败》，《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二，江西人民出版社版第24页。

^②访问苏兰春记录（1969年8月），宁冈纪念馆馆藏资料。

宛希先

王弟俊 桂遇秋 陆登霞

(一)

宛希先，一九〇六年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宛家大屋。父亲宛桃生，是布店的店员，为人忠厚；母亲熊氏，早年病故。

宛希先六岁至十六岁时，在本地私塾读书；十七岁至十九岁时，在县立八角亭高等小学读书。他在共产党员、家兄宛希俨和黄梅进步知识青年、共产党员李子芬、邓雅声等人合办的书报流通处借阅《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当时，他对学校少数教师无心教学，精神颓废，抽鸦片等不良作风，很不满意。有一次，学校出墙报，他画了一个老学究，端着鸦片烟枪，在那里打哈欠的漫画，加以讽刺。他在《睡乡记》的作文中，赞颂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在《试述毕业后进修的方针》的毕业作文中，他又阐述了读书不能为光宗耀祖，而要把学得的实际知识，用于改造社会，造福劳苦大众的观点，受到批卷老师的称赞。

在家兄宛希俨的教育、培养下，宛希先于一九三四年在八角亭小学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进到长江流域后，他随宛希俨到武汉

投身革命，不久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在五连任班长。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宛希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愤慨万分。这年七月底，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果断地抵制了张发奎要警卫团去九江的阴谋，坚定地执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指示警卫团参加南昌起义的命令^①。八月二日，宛希先随团离开江城武汉，乘轮东下。他们在黄石港听说南昌已举行了起义。到广济田镇附近时，得知敌军已在九江布防。卢德铭在船上召开了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在阳新黄颡口上岸，赶到南昌去。宛希先随部队翻越了幕阜山，来到奉新县城，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向东南方向挺进；敌军在南昌、樟树一带布了防。此时，警卫团已来不及追上起义部队，便回师西行，旋在湘、鄂、赣毗连地区修水县渣津休整，卢德铭到武汉找党请示今后行动方向。警卫团在修水对外用江西省防军名义，以利从国民党当局解决部队给养和麻痹敌人。江西军阀朱培德派徐景祥到修水谈判，妄图把部队骗到涂家埠整编，一举吃掉。警卫团将计就计，派宛希先为谈判代表。他假称部队行军疲劳，不能过早到涂家埠，并提出一个朱培德难以接受的受编不受调的难题，拖延时间，等候卢德铭请示归来。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

^①参见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有关资料，访问肖克、何长工记录。

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赶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党中央指示卢德铭，率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把参加起义的革命士兵和工农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宛希先所在的警卫团和平江、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编为第一团。宛希先为一团一营党代表。

九月九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宛希先根据卢德铭的指示，率第一营从修水出发，进攻湖南的平江。九月十日，攻下朱溪厂，随即越过平江、修水边界，胜利地占领了平江龙门厂，与师长余洒度仓促收编的夏斗寅残部组成的第四团汇合。九月十三日，宛希先率部到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第四团突然叛变，倒戈袭击我一团二营。经过两小时激战，宛希先的第一营撤出战斗。宛希先奉命随卢德铭率师部和三营撤向平、浏边界。

九月十九日晚，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宛希先见到了毛泽东，并出席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了形势，认为在起义部队受挫折，敌强我弱，敌人在中心城市长沙坚固设防的情况下，应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余洒度的“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宛希先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了余洒度的错误主张。

九月二十四日，南下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萍乡芦溪遭到敌人的包围。宛希先在毛泽东、卢德铭的指挥下，率部和敌人展开激战。部队突围时，卢德铭不幸壮烈牺牲。

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认真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行军打仗的经验教训，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次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枫树坪土坎上，向全体官兵宣布前委关于三湾改编的决定，并宣布“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的原则。宛希先带领部队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举起武器，高呼“跟着毛委员打天下，坚决革命到底”等口号，支持前委的正确决定，拥护三湾改编。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原想回家的战士，纷纷表示不再离队，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三湾改编后，宛希先继续任一团一营党代表。在三湾期间，宛希先还在“泰和”店，帮助该湾建立了党支部^①。

十月四日，宛希先参加了毛泽东在宁冈古城文昌宫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宁冈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坚持武装斗争，实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会后，宛希先认真地向部队作了传达，对部队鼓舞很大，大家一致表示：言付于行，表里一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三)

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的进军，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湖南当局急忙派遣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带领两个团从茶陵出发，分西北两路，进犯酃县水口，妄图一口吞掉工农革命军。

^①邱恒聪编著：《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载《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进军途中，毛泽东分析了敌情，决定派两个连，由一营党代表、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率领，绕安仁，经界首，攻打茶陵，直捣敌人巢穴，把罗定进犯酃县水口的兵力牵回去，以打破敌人“进剿”计划；工农革命军主力则按原计划，继续向井冈山进军。

根据上述部署，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宛希先率领的两连工农革命军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罗定西路军侧面穿插过去，在茶陵乱葬山打垮了敌人一个营，当天在离城三十里的一个村庄宿营。宛希先深入班、排了解情况，接着召开大会，作关于攻打茶陵的战斗动员。他豪情满怀地说：同志们！这次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任务，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集款子；向群众作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要使人民知道，工农革命军还依然存在，还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到处都在打击敌人。

第二天，队伍到了茶陵县城郊。宛希先从两个连中各抽一个排，组成突击队，由他亲自带领攻城。突击队向东岳庙发起强攻，首先击毙了庙门前的哨兵，部队随后冲进城内。在宛希先的指挥下，突击队的两个排冲进衙门，活捉了反动县长和书记官；一个排冲进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农运干部和群众。

占领茶陵后，宛希先根据群众要求，在东门河边沙洲上枪毙了罪恶累累的反动县长和书记官。罗定闻讯，惊恐万状，带着两团白军，匆忙地赶回茶陵。

部队胜利完成了攻打茶陵、牵引敌人的任务后，当天，就在宛希先率领下，回师宁冈。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为了扩大根据地，建立工农兵政权，毛泽东决定派团长陈浩和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率团部和一营（一、二、三连）加上特务连，二打茶陵。一九二七年十一

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宁冈县大垅给出征茶陵的战士进行战斗动员。他分析了井冈山周围革命形势，阐述攻打茶陵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指示部队打下茶陵后要注重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工农红色政权，用军事发展扩大边界割据。

部队在陈浩、宛希先带领下，十一月十六日，在坑口打垮了地主的挨户团；十八日拂晓，到达茶陵城郊。宛希先选择了部分精干战士，化装成菜农，在城郊农民的掩护下，分别从东门和文星门经铁牛渡口进入城内。这时，守城挨户团正在睡梦之中。我军乘其不备，里应外合，迅速发起猛攻。战斗打响后，宛希先率领主力飞快地越过浮桥，冲进东门，直捣县衙，活捉了新上任的反动县长，再次攻占了茶陵县城。

攻克茶陵之后，陈浩和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背着宛希先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人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全部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旧官吏仍然出出进进，土豪劣绅仍然趾高气扬，人民群众仍然没有说话的权利，而陈浩一伙则整天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打骂士兵，敲诈工农。宛希先和新任总工会主席谭震林等对陈浩所作所为，进行了抵制和批判，严厉指出他们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另搞一套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但陈浩等拒不接受^①。

鉴于上述情况，宛希先派人用鸡毛信，将陈浩的所作所为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宛希先，严肃地指出：陈浩等搞的“人民委员会”是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旧政府，必须立即取消，尽快组织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

^①何长工：《井冈山的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另见茶陵县革命历史陈列馆陈列资料。

府^①。宛希先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立即贯彻执行。十一月下旬，在茶陵县洣江书院的操场上，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主席。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宛希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工农革命军名义，赠给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五枝长枪，成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

(四)

湘、桂军阀混战结束后，湘敌第八军吴尚部派其主力独立团，连同地主武装近二十个连的兵力，进攻茶陵。宛希先一方面及时地向毛泽东汇报敌情，一方面组织指战员沉着应战。这时正在桂东游击的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奉毛泽东指示，在张子清的率领下，昼夜兼程赶到茶陵参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宛希先、张子清等主张撤出茶陵回师井冈山。而恶性不改的陈浩，却企图乘机叛变投敌，把工农革命军拉向湘敌方鼎英那里去。他下令撤掉茶陵东门的浮桥，断绝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之路；并乘黑夜战乱，不辨方向之机，强令部队向湘南方向撤退。宛希先、张子清察觉情况异常，质问陈浩，并指出其撤掉浮桥的行为，等于毁灭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武装，明确表示拒绝到湘南，要求撤回井冈山。

这时，我侦察员从邮递员身上缴获了陈浩、徐庶、韩昌剑叛变投靠方鼎英的信件。宛希先获悉后，又经过深入调查，终

^①参见茶陵县革命历史陈列馆陈列资料。

于掌握了陈浩与方鼎英之间勾结的情况。方鼎英时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驻兵桂东，伺机进犯井冈山。陈浩等在投降信中要求方鼎英派部队接应，以便里应外合，把工农革命军拉向湘南吃掉。这就是陈浩等撤掉浮桥、向湘南撤退的阴谋所在。在多数战士不明真象的情况下，宛希先和张子清为了不使这支人民武装遭受损失，只好随军向南撤退，待机再采取行动。

十二月二十七日，部队南撤到茶陵县的湖口时，宛希先、张子清向陈浩提出，坚决要返回井冈山，拒绝把部队开向湘南。陈浩等凶相毕露，继续强令部队南行。宛希先当众指出：“开往湘南，就是叛变革命！”陈浩拍着腰间手枪，威胁宛希先说：“不跟老子走，老子不客气！”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带着毛泽覃等八、九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顶着呼啸的寒风，向茶陵疾行，在湖口赶上了队伍。毛泽东听取了宛希先的汇报后，当场宣布撤销陈浩把部队开往湘南的命令，当晚上在湖口召开营长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揭发批判陈浩等三人叛变投敌的罪行。陈浩等无理狡辩。宛希先义正词严地揭发了陈浩一伙一系列罪恶行径，并公布了陈浩等与方鼎英暗中勾结的来往密信。毛泽东根据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令逮捕陈浩、徐庶、韩昌剑三人，然后把部队带回井冈山。

十二月底，在宁冈砦市河滩上，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及群众大会。宛希先、何长工主持了大会^①，代表前委，总结了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并宣布前委关于处决陈浩、徐庶、韩昌剑的决定。到会的工农兵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讲了话。他在总结茶陵战斗的经验时，

^①谭家述《给酃县革命斗争史陈列馆的信》（1968年6月26日）。

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五）

宛希先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在开辟和保卫井冈山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地率领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

一九二八年三月，湘南特委派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的错误决定，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强行命令秋收起义部队开往湘南，攻打城市。毛泽东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向湘南进军途中，部队仍然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开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工作。三月十二日，宛希先奉命率部从宁冈出发，于十三日到酃县沔渡下关，歼灭了“挨户团”，打开了土豪劣绅的仓库，挑出两百多担谷子，分给贫苦农民；十四日，攻克酃县县城。十五日，宛希先在酃县洙泉书院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军队，并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果实。接着，他带领部队在城郊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果实等活动。

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宛希先积极参与了“永新困敌”战斗。永新地处罗霄山脉东麓、井冈山根据地的北侧，东连吉安，北通安福，西接宁冈、茶陵。敌人要想进犯井冈山，首先就要占领永新。七月中旬，湘敌吴尚第八军侵入宁冈，再进永新，企图寻找我军决战。赣敌第三军王钧、金汉鼎部五个团从吉安出发，经天河也向永新逼进。第六军胡文斗部亦从北路进

犯。毛泽东带领红三十一团返回永新。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召开了营、连和地方干部联席会议，将部队组成南、北、中三路行动委员会，并根据敌情、地形、红军兵力、地方武装和群众等条件进行部署，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

宛希先任北路行委会书记，三营营长伍中豪为指挥，率第一、七、八连和永新西北区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在永新北乡迎击安福来犯之敌。北路敌人第六军胡文斗部的六个团，在我根据地军民英勇打击下，行动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费了三、四天工夫，才从安福到达金田。从永新外逃的土豪劣绅和土匪恶霸麇集金田，组织反动武装挨户团，准备跟随白军返回永新反攻倒算。胡文斗以金田为大本营，在地方反动武装的带领下，先后进占了洋门、马田、樟木桥地区。宛希先和北路行委其他领导同志组织广大军民进行袭扰，并令西北特区濂田办事处的赤卫队夜袭樟木桥，消灭了三十多个敌人。四、五天 after，敌人进占社口、合东、固塘等地，疯狂向群众反攻倒算，逼迫群众退田还屋，吊打、搜捕革命群众和红军家属，强令守望队为其站岗放哨。白军所到之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为了打击敌人，牵制敌人的行动，宛希先、伍中豪等组织红军和赤卫队指战员，分头接近守望队的岗哨，向他们进行政治宣传和政策教育，瓦解他们斗志，使敌失去守望的作用。与此同时，宛希先又令象形办事处赤卫队夜袭石塘，歼灭了石塘的挨户团。

数日后，敌人又向象形推进，先后占领了黄门、花溪、高市地区。象形和黄门的挨户团反动气焰非常嚣张，疯狂杀害革命干部，毒打革命群众。宛希先召开行委委员会议，决心打击象形、黄门两个挨户团的嚣张气焰，除掉旷志斌和马奎士这两

个地头蛇。八月上旬一天晚上，根据事前侦察的敌情，宛希先和伍中豪分别率领红军、赤卫队和暴动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黄门，一举歼灭了黄门挨户团，处决了旷志斌。不久，又获悉黄门挨户团马奎士带领二十多名守望队，驻在一个祠堂里。宛希先命令赤卫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这个祠堂，歼灭了守望队，用梭标刺死了马奎士。象形、黄门的挨户团和旷志斌、马奎士这两个地头蛇被消灭后，敌人十分震惊。紧接着，宛希先和永新县委的负责同志，又指挥红军和县赤卫大队袭击了花溪，打死敌人十多名，缴枪三十多支。八月中旬，宛希先指挥红军和赤卫队夜袭高市，给敌军胡文斗部狠狠打击，使其进退维谷，士气低落，完全处于困境。这样，宛希先光荣地完成了北路困敌二十天的任务，为红军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战机。

(六)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八月失败错误行动前，有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赞扬了宛希先坚持革命原则，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除了要同湘、赣两省敌人进行反“围剿”斗争外，还要同“左”的和右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每次斗争中，宛希先总是站在持正确意见的毛泽东一边，往往为了捍卫革命利益而力持异议。一九二八年一月间，在遂川县城五华高等小学召开的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万安、遂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武装起

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依托农村，积聚革命力量，逐步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主张。宛希先表示坚决拥护。四月二十八日，在宁冈县龙江书院文星阁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及到会的其他领导人，研究并作出了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重大决策。宛希先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这一决策，并在这次会议上，被推定为红四军十师党代表^①。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宛希先力持异议，批判了右倾悲观论调。他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六月三十日，在永新县城召开的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上，宛希先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关于不宜去湘南的正确主张，反对杜修经、杨开明极力把红军拉往湘南的错误意见，并对湖南省委撤去毛泽东特委书记的错误决定，表示异议。他在会上详细列举了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的许多革命功绩，明确指出党、军队和井冈山根据地，不能离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特委为了培养党团骨干，在井冈山茨坪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宛希先主持了这次训练。训练班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各乡送来的党、团员骨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宛希先从训练内容到生活安排等方面都搞得很好。训练班学习时间虽然只有两个来月，可是学员都感到学懂了许多革命道理，掌握了不少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宛希先继续当选为特委委员，并先后担任过茶陵县委书记

^①《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信》，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和主持过湘赣边特委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带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宛希先留在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不久，湘敌进犯，并占领了山上五井。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撤离五井，冲出包围后，召开永新、茶陵、宁冈三县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临时特委，以刘真、宛希先、朱昌谐三同志为常委，朱为书记，指挥一切，负责整理收容工作^①。

三月，陈正人由遂川来永新，与朱昌谐、宛希先等会合，并于十二月召集正式特委（当时邓乾元任特委书记）常委会议。十四日，又在永新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上，除了讨论关于边界工作政策及其他重要问题外，还决定以朱昌谐、何长工、宛希先、刘真、陈正人五同志为特委常委^②。会后，宛希先深入茶陵等县巡视工作，健全扩大党的组织，积极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加强对群众日常政治、经济的斗争的领导。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农历正月二十六），湘赣特委未经调查研究，将宛希先打为“AB团分子。”宛希先因而被错杀。毛泽东不知道宛希先被害，他还给边界特委写信，要调宛希先到红四军工作。但此时宛希先已埋骨于永新三湾地区大湾村的山上了。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提出要给宛希先平反，并对何长工说：“长工啊！希先要平反”^③。

宛希先投身革命后，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出生入死，累立战功，为党为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革命精神，正如高山流水，永存于宇宙之间！

①②《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冯奇男、方金波1979年8月21日访问何长工的记录。

胡 少 海

张兆声 汉 涛 陈仙海

胡少海是湘南起义的指挥员之一，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中，战功卓著。曾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红四军第二和第四纵队司令员、闽西红二十军和二十一军军长等职。一九三〇年八月在福建漳平县之永福战斗中壮烈牺牲。

(一)

胡少海原名振弼，乳名弼臣，学名占鳌，字绍海，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三十）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岱下村。兄妹十人，他排行第五。

胡少海的父亲胡声镛，字泮藻，初为肩挑小贩，后来经营致富，每年租谷收入达四、五万斤，成为宜章县有名的富豪。胡少海在岱下村度过童年，并在村中私塾“高书房”读完小学。一九一五年秋，他随在湖北省财政厅任一等科员的大哥振文来到武汉，就读于汉口中学。这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各地军阀纷纷拥兵称雄，各霸一方，湖南的大小军阀和民团更是相互抢占地盘，连年火并，给人民增添了苦难，也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胡声镛

联合宜章上层地主和其他社会“名流”组织团练，由胡少海的二哥胡振国充任县团总。在父兄的影响下，胡少海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跟着练武，不久便学会了使用长短枪，还懂得了一些军事知识。

一九一六年，宜章闹灾荒。胡少海的父兄不顾穷人死活，继续征收捐税。他们还利用振文兼县参议长的权势，包揽诉讼，任意欺压百姓。当时宜章有人写对联讽刺这腐败的社会：“猪公、狗公、猫儿公，公也不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在，都是伯公谋利益；赌局、嫖局、洋烟局，局又分局，局内者甘、局外者苦，何日了解得太平^①。”

父兄的作为，给开始思索人生和社会问题的胡少海极大的精神刺激。他逐渐厌恶这个肮脏的家庭，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

一九一八年，胡少海同迳口王瑞月^②结了婚。不久，他的父、叔为清明祭祖时的账目发生纠纷，在岱下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父亲无法在岱下安居，携家辗转迁往岩泉的郭家村定居。在这种情况下，胡少海被迫弃学离家，同四哥振忠、六弟振藩一道，投奔嘉禾民军李竹陶的团防大队谋生。不久，这支民军被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参军兼湘粤边界安抚使李国柱^③收编。在征讨湘南北洋军阀所部和当地土匪的战斗中，胡少海屡

①摘自《宜章革命史》，原文无标点。

②王瑞月，宜章迳口人，生于1898年12月，1927年因肺病去世。生有蝶英、慈英二女。

③李国柱（1878——1949），湖南嘉禾人，同盟会会员。1911年在湘南策应武昌起义，曾任孙中山总统府幕僚、湖南省参议员等职。

立战功，很受李国柱的赏识，升任连长。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李国柱所部被编为中央直辖独立旅，调防岭南，胡少海升任该旅独立营营长。一九二五年底，独立旅参加南路讨伐军阀邓本殷的战役后，胡少海被李国柱选送入“攻鄂军演武堂”作短期的学习^①，结业后仍回独立旅。该旅后来被编入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胡少海仍任营长，不久参加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攻克武汉。翌年四月六日，武汉国民政府将第六军编入第一集团军，程潜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程潜接受蒋介石命令，开始“清党”反共。目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胡少海义愤填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毅然动员一部分湘南籍士兵离开了部队，回到湘粤边的乐昌，在“粤南会馆”秘密串联，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在梅花、莽山洞一带拉起了队伍。

大革命失败后，宜章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宜章县委书记李文香、县委委员颜秉仁、吴泗来、戴崇德先后被捕牺牲，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极端艰难的形势里，中共宜章县委在高静山、杨子达、毛科文等领导下，秘密转移到湘粤边的莽山洞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宜章县委很重视胡少海拉起的队伍，并派高静山同胡少海取得了联系。经过工作，胡少海进一步看清了形势，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所领导的队伍经过整编，成为活跃在白色恐怖中的一支红色武装力量，由于胡少海革命意志坚决，不畏艰难，特别是在革命处

^①王成英 1982 年 5 月给龙岩市革命纪念馆的回信。

于低潮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一九二八年一月，经高静山介绍，胡少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胡少海入党后，受中共宜章县委的派遣，去湘粤边境迎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队伍。一月中旬的一天，他和朱德、陈毅在莽山洞会了面，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和宜章县委的建议，朱德决定胡少海以国民党第十六军一四〇团团副的身份，赴宜章探听敌情，准备相机夺取宜章。

宜章城里没有驻扎国民党的正规军。反动当局风闻朱、陈部队进逼县境，共产党游击队又在乡间频繁活动，终日惶恐不安。胡少海戎装佩剑。“荣归”故里，使反动县长杨孝斌等欣喜若狂，将他迎至县衙下榻，并再三请求他率领本部人马进驻宜章，以“稳定”宜章局势。胡少海虚于应付，满口答应县长请求。在掌握了城内敌情之后，便以回团部带兵来宜为名，离开了县城。朱德、陈毅听取了胡少海的汇报，当即决定将计就计，智取宜章。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中午时分，胡少海带着由朱德部队改扮的两连“国民党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开进了宜章城。紧接着，朱德、陈毅率领化了装的起义军大部队共一千多人入城，司令部驻宜章女子职业学校。

当县政府官员和豪绅地主代表们从胡少海手中接过“十六军一四〇团团团长王楷^①”的名片时，个个受宠若惊。当晚，杨孝

^①王楷一说王阶，是当时朱德的化名。

斌在县咨议局摆设盛宴，为“王楷”、胡少海等人“洗尘”，共商“防匪事宜”。待酒至半酣，起义军按预定计划迅速解决了挨户团，同时包围了宴会厅。此时，朱德威严地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宜章解放了^①！敌人目瞪口呆，束手就擒。起义军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砸开地主的粮仓，将粮食分发给劳苦大众。

第二天，在宜章县城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起义军应群众的要求，枪毙了县长杨孝斌、挨户团副团长刘秉均及土豪肖星若等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当天，起义军正式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参加暴动的宜章农民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胡少海任团长。

智取宜章县城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急令许克祥率二十四师共五个团的兵力，由广东韶关向宜章扑来。

一月二十五日，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占领了宜章重镇岩泉，敌教导团和补充团亦陆续占领了栗源、武阳和坪石，形成了对宜章的包围。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早已料到敌人的进攻意图，先敌于二十一日主动撤出宜章城，隐蔽集结在城南八十里的笆篱、山门、圣公坛一带，以逸待劳，伺机打击敌人。

二十六日，许克祥将师指挥部移设坪石，并于次日进占宜章，遂一面急电蒋介石请功，一面寻找革命军主力决战。

胡少海按朱德的布置，带领第三团分散活动。他们沿途用鸟枪、土铳袭击敌人，同时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壮声势，

^①栗裕：《激流归大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33页。

弄得进犯之敌坐立不安。三十日拂晓，三团部分主力奉命和地方武装配合，从马岭、罗家经狮子岩袭击许克祥在岩泉、坪石的主力 and 师部。在长冈岭激战中，胡少海沉着指挥，紧咬敌人不放，击溃敌两个团，缴获大批步枪、机枪，还有二百余担子弹。与此同时，分驻在宜章城、岩泉墟等地的许克祥主力，在朱德、陈毅率领的革命军打击下，溃不成军。许克祥腹背受敌，仅带几个马弁狼狈而逃。革命军歼敌一千多，缴获步枪一千余支，迫击炮、山炮三十多门和其它大批军用物资，并趁胜收复了宜章城。

二月初，在宜章县城隆重召开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扩编为独立第三师，胡少海任师长，陈东日任副师长。

二月下旬，李宗仁和唐生智混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由宜章出发，转战郴州、耒阳、永兴、资兴、桂东等县；第三师留守宜章，保卫红色政权，并进行土地革命。

这时，逃到临武县的宜章大地主程绍川、李绍文和挨户团团总邝镜明，乘革命军主力北上之机，勾结临武反动头子李锦山、曹维凡进犯宜章。

三月二日，敌人突袭黄沙堡大黄家。该村来不及撤退的革命群众三百多人，在共产党员黄祯刚、黄祐朝带领下，退守村中的一个大炮楼——水楼内。他们用土铳、梭镖和石块顽强抵抗，坚持了三天三夜，情况十分危急。第三天夜晚，黄祯刚、黄祐朝等三人冒死突围，在宜章城内找到了胡少海。面对这紧急情况，胡少海经过冷静分析，决定以部分赤卫队员在大黄家四周放空炮迷惑敌人，并亲自带领连长肖克和一部分革命军战士，连夜前往

救援。受困群众见援军赶到，立即大开楼门，冲杀出来。一时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敌人腹背受击，死伤无数，慌忙溃逃。受困群众终于安全转移。

接着，李锦山、曹维凡又集中两千多兵力，分三路向栗源进攻。胡少海率领第三师和部分赤卫队员在观音寺一带迎战。战斗开始不久，第三团负责人谭新不幸牺牲，师负责人之一陈藩头部负重伤。胡少海立即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在河边山地隐蔽待机。李锦山、曹维凡见革命军没有动静，以为已经退去，遂率部大摇大摆冲过河来。胡少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全体战士争先出击。敌背水作战，失其地利，死伤甚多，余部纷纷向临武方向溃逃。胡少海身先士卒，率部紧紧追击。就在这时，他得知六弟振藩在敌军中充任连长，更是气愤填膺，边追边骂他的六弟是危害人民的强盗。

三月底，李宗仁、唐生智的混战结束。蒋介石即调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协剿”湘南。四月初，范石生和许克祥部越过粤湘边界驱兵宜章，根据湘南特委指示，第三师和一部分群众由宜章撤往郴州方向，同陈毅带领的部分革命军汇合，向井冈山转移。

敌人发现革命军东移，立即以一个师兵力追截。胡少海率少数部队在摺岭阻击，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

摺岭是宜章通往郴州公路的天然屏障，革命军在这里和敌人展开了激战，从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黄昏时，革命军弹药将尽，敌人又发起冲锋。胡少海跃上阵地，命令战士上好刺刀、拿起梭镖。准备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在此危急关头，陈毅派出的工农革命军邓允庭的第七师赶到。在援军配合下，胡少海率部一举突围，趁夜色朦胧迅速撤退。

四月二十三日，胡少海、肖克等随陈毅率部来到酃县沔渡村，同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汇合。二十八日，朱德、陈毅率领革命军第一师和胡少海、邓允庭率领的革命军三、七师等部，相继到达宁冈砦市，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胡少海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

(三)

红四军的胜利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震动了敌人。一九二八年五月底，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三个师共十个团的兵力，委杨如轩为前敌总指挥，对井冈山进行第一次“联合会剿”。

六月初，赣军杨池生、杨如轩两部五个团，由吉安直趋永新；湘军吴尚的第八军五个团，由茶陵向宁冈推进。这时，红军已主动撤离永新城，在冈宁新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二十八团夺取老七溪岭，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扼守新七溪岭；同时，派出小股部队监视和阻击茶陵、遂川方向之敌，拟先将赣敌歼灭在新、老七溪岭之间^①。

胡少海接受任务后，立即率领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前往新七溪岭，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

六月二十二日，杨池生部一个团由龙源口向新七溪岭发动进攻。胡少海率部扼守制高点，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

^①《井冈山斗争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第2版第69页。

攻。激战中，杨池生发现如不突破二十九团防线，就有被歼的危险。遂集中火力猛攻制高点，并以密集队形轮番冲锋。这时，老七溪岭方向枪声未响，胡少海判断二十八团尚未赶到，如果不把敌人拖住，整个战斗计划就会落空。他命令加强制高点火力，并告诉战士们节省弹药，用手榴弹和石块还击敌人。中午时分，敌人发起更大冲锋，制高点眼看要被蜂涌而上的敌人突破。在这紧急关头，朱德手提花机关枪，带领军部部分直属队赶到，以密集的火力又将敌军压了下去。此时，从老七溪岭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二十八团三营首先突破了杨如轩部防线，夺取了老七溪岭制高点。胡少海见时机已到，率领二十九团由新七溪岭居高临下冲向敌阵；二十八团则由老七溪岭出击，并直抄龙源口。红军两面夹攻，杨池生部支持不住，纷纷溃逃，在龙源口被歼。二十四日，红军乘胜追击，打垮杨如轩部另两个团并攻占永新城。湘军吴尚部闻讯慌忙撤退。此役缴枪一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湘赣敌军的第一次“联合会剿”。龙源口大捷，使红军装备得到改善，二十九团全部换上了步枪。胡少海在实践中逐步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从朱德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作战经验，逐渐成长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

在井冈山人民支援下，红四军初步巩固了根据地，造成了罗霄山脉中段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但“左”倾盲动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七月中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乘毛泽东在永新开会时，不顾原永新联席会议^①的决议，强令二十八、二十九

^①192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了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不打湘南、继续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两个主力团开往湘南。七月二十四，在攻打郴州要塞苏仙桥时，胡少海亲自指挥二十九团以密集火力压制敌人，使二十八团切断守敌的退路，并将其大部歼灭，缴获大批辎重，解放了郴州。但是由于麻痹，当晚范石生联合许克祥部组织反攻，我军被包围。胡少海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和二十八团失去了联系，终因敌众我寡，二十九团被打散。胡少海仅带几十名战士突出重围，后来才同二十八团相遇。八月十八日，胡少海随二十八团进占桂东城。毛泽东闻讯即率三十一团第三营由永新九陂赶来汇合，准备撤回井冈山。八月二十三日午，湘军阎仲儒师两个团袭击桂东。在毛泽东指挥下，胡少海率二十八团一部到城东南三台山阻击敌人。天黑后，部队向寨前方向转移时，胡少海不幸大腿中弹，负了重伤。

毛泽东、朱德等十分关心胡少海的伤情。经精心护理，八月底部队回到井冈山后，他伤势日见好转。“八月失败”的教训，使胡少海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亦痛悔自己指挥不力，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部队整编时，他被调到二十八团任第一营营长。

十一月九日，赣敌周浑元旅向井冈山进犯。胡少海腿伤尚未痊愈，就坚决要求参战，从茅坪率部迎敌。这时，周浑元旅之二十七团一部退守新七溪岭山口，妄图依山固守，阻止红军进军永新。胡少海留下一营大部兵力作正面佯攻，自己忍着伤痛率领一百余名战士，翻高山，绕小道，登上新七溪岭山口，出其不意从敌背后包抄。红军两面夹攻，迅速打垮了敌人，击毙敌营长一人，生俘副营长二人，缴枪一百六十余支^①；并乘

^① 《井冈山斗争史稿》第103页。

胜于十日攻克了永新县。

经两个多月的战斗，井冈山周围失地大半收复，“边界割据”的局面又重新发展和巩固起来。

一九二八年秋，红军掀起了运粮上山运动。胡少海腿伤初愈，身体尚弱，然而他同士兵一样，起早摸黑挑担运粮。宁冈到井冈山往返一百多里，一路上他乐呵呵地同战士们说说笑笑，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定革命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四)

一九二八年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宁冈白露村主持召开了边界党的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冲破敌军的包围，在外线打击敌人，以粉碎敌人的“会剿”，扩大工农武装割据。一月十四日，胡少海率部在小行州集中，随同毛泽东、朱德下山，向赣南进军。二十五日，红四军冲破了敌军重重包围，突然攻占赣南重镇大余。二十八日，赣军李文彬旅由遂川方向扑来，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与红军接触。为摆脱强敌追踪，朱德命令二十八团担任掩护任务。二十八团依据城东北高地与敌激战，伤亡甚众，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协同阻击的军部独立营营长张渭中弹牺牲。此时，主力尚未安全转移，团长林彪却带领一部先行退却，掩护任务实际上落在胡少海身上。为了争取时间，他沉着指挥一营战士，时而在阵地上猛开一阵火，时而率领战士来个反冲锋，打得机动灵活，使李文彬部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保证了红四军主力的安全转移。任务完成后，胡少海率第一营于傍晚

时分从城东向梅岭关方向疾进，很快甩开跟踪的敌人，赶上了大部队。

二月八日，红四军攻克闽赣边重镇瑞金。部队尚未来得及休整，尾追的赣军刘士毅的独立第七旅就追了上来。为了打掉这条尾巴，红军撤出瑞金，在距城六十公里的大柏地布下了口袋阵。朱德命令胡少海担任诱敌任务。胡少海率二十八团第一营，很快牵住敌人鼻子，左躲右闪，边打边退。刘士毅部以为红军怯战，便孤军深入猛追上来，全部进入了红军的包围圈。霎时间，红四军主力如神兵天降，打得刘士毅旅懵头转向，很快溃退。此役生俘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官兵八百余名，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和其它许多战利品。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

二月中旬，红四军再度甩开赣敌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残部的跟踪，经宁都、安福到达吉安之东固，再转而向闽西进军。

这时，驻守长汀之福建省防军混成第二旅旅长郭凤鸣闻讯红军逼进闽西，慌忙派部堵截，同时派兵加强长岭寨的防守。

长岭寨，又名胜华山，是长汀城南的重要屏障，也是进出长汀的必经之路。三月十四日凌晨，胡少海受命率二十八团一部在长田与三十一团分手，由当地党组织派人带路，取道白叶竹子岭，向长岭寨右侧高地进军，准备夺取制高点。

上午八时，三十一团在长岭寨左侧高地胜华亭附近与郭凤鸣所部之卢新铭团相遇，被敌火力压在半山腰。郭部之增援部队听见枪声，立即由山下向卢部靠拢，在此紧急关头，胡少海率二十八团一部突然出现在卢部右翼，以密集的火力打得卢部一败涂地。三十一团乘此机会，迅速占领长岭寨左侧高地。红军居高临下，火力集中，逼使增援的敌人寸步难行，郭凤鸣部遂节节败

退。红军战士愈战愈勇，将郭凤鸣击毙于长岭寨脚下，并一举攻克了长汀城，歼灭郭凤鸣部二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

三月中旬，红四军在长汀正式将团改为纵队，胡少海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五月二十三日和六月三日，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取得二战龙岩的胜利。为了诱使陈国辉之福建省防军混成第一旅主力撤回龙岩进而歼灭之，红四军转攻上杭白砂，歼灭卢新铭一个团后，即开至新泉进行整训，为三打龙岩作军事准备。

六月十七日，红四军获悉陈国辉主力已撤回龙岩，遂于十九日凌晨奔向龙岩。胡少海率二纵队沿龙门公路向龙岩挺进。在二纵队攻破西门、直捣县政府和陈国辉旅部时，敌人仍利用街道、民房负隅顽抗，妄图垂死挣扎。胡少海下令用刺刀、山锄打通墙壁，逐店逐屋追击敌人，最后将敌军困逼在几个大院里。敌军还击无力，溃逃无路，只得举手投降。经半天激战，攻克了龙岩城。此役歼灭陈国辉旅五个营计二千余人，仅旅长陈国辉带几个卫兵化装逃走。

七月中旬，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红四军前委根据闽西特委的要求，派胡少海，谭震林、邓毅刚、邓僮、高静山、游端轩等，协助组建闽西地方红军^①。九月，以龙岩、永定、上杭暴动武装力量为基础，组成了红四军第四纵队，胡少海调任四纵队司令。这是由闽西子弟组成的第一支正规红军。九月底，毛泽东由永定到上杭，胡少海奉命到兰家渡、庐丰迎接，并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十月初，毛泽东在上杭临江楼会见胡少海、张鼎丞、卢肇西等人，

^①邓子恢、张鼎丞：《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

赞扬四纵队在攻打上杭城时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精神，勉励他们为进一步带好四纵队使之成为红军的劲旅而努力。

四纵队在胡少海等领导下，坚决执行红军的各项训令，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一次，一个中队外出募捐，私分了打土豪没收来的财产。胡少海知道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布处决了那个主谋私分财物的中队长，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纪律。

一九三〇年春，红四军进军江西，四纵队在宁都颁布了以纵队司令官胡少海、政治委员张鼎丞和政治部主任卢肇西署名的六言布告：

照得本军宗旨，实行民权革命。

打倒帝国主义，没收洋人资本。

打倒地主豪绅，消灭封建势力。

工人增加工钱，农民分配土地。

士兵生活改良，欢迎白军投顺。

推翻国民政府，工农独裁专政。

打倒新旧军阀，肃清反动市镇。

打倒包办婚姻，男女一律平等。

废除苛捐杂税，商业从此日振。

所率纪律森严，买卖极为公平。

商民各安营业，谣言切莫轻信。

学校禁止滋扰，邮电深为保护。

特此恺切布告，其各一体知认①。

① 《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公历1930年）。

(五)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胡少海在福建上杭古田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为会议写的决议案，给胡少海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使他认识到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纠正。胡少海平时带兵极严，强调士兵服从官长是唯一天职，忽略了对士兵的说服教育。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他的旧行伍思想虽有所转变，但在许多地方仍然暴露出残余的军阀作风。如操练时，战士稍不注意或听错口令，他就厉声指责，甚至罚跪禁闭；平时他以井冈山人自居，流露出自满情绪^①。在张鼎丞、卢肇西的帮助下，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找一些被他批评错了的士兵谈心，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大大增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蒋介石调动了闽粤赣三省军队，委任金汉鼎为指挥，对闽西红色区域进行第二次“会剿”。

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一、三、四纵队离开古田。挥戈赣南，开展新的斗争。四纵队官兵经古田会议后的短暂休整，面貌焕然一新，在胡少海、张鼎丞率领下，连克宁都、信丰。二月二十四日，四纵队又配合兄弟部队在水南和施家边，一举歼灭敌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战斗中，四纵队装备不断得到改善，人员扩大到八百人。此后，他们配合一、二纵队，由赣州城外南进，经半个月突击，连克南康、大余、南

^①龙岩县革命纪念馆 1980 年 9 月 25 日访问傅柏翠记录。

雄、信丰诸城，打开了粤赣边界的新局面。

五月上旬，四纵队抵达寻邬的上四甲。当地反动武装靖卫团前来骚扰。胡少海派一个大队围追，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未果。当晚，四纵队一战士因负伤掉队，被“红枪会”^①抓去，连刺十三刀，血流如注昏死过去。他醒来时，敌人已走掉，便忍痛爬回驻地，向战友诉说遭遇。敌人的残忍暴虐，激起全纵队指战员的无比愤怒，纷纷请求出战。

朱德听了胡少海汇报后，特地拨给四纵队四挺手提花机关枪。胡少海亲自率领八支队三十三大队为敢死队，并以赖连璋的七支队十一大队为后备队，出师围剿。靖卫团和“红枪会”的反动武装妄图凭借山高林密，和红军周旋，在匪首带领下向红军冲击。胡少海挥动二十响，指挥部队猛烈射击，那些自诩为“刀枪不入”的土匪们纷纷应声倒地。胡少海风趣地说，还是我们的子弹硬^②。在红军指战员的狠狠打击下，反动土匪一片慌乱，仓惶溃逃，敢死队一举攻破敌人赖以盘踞的七村一寨。

一九三〇年五月底，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各县新编的赤卫团集中在龙岩，编为红二十军，胡少海被任命为军长（当时他还在四纵队任职）。六月初，红四军前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共闽西特委的建议，由寻邬出发，南入武夷山。胡少海率四纵队迅速击溃钟绍奎、蓝玉田的反动民团，占领了闽西的武平县城。

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迎接红军，在四纵队路过的地

① “红枪会”系由靖卫团死硬分子组成，见龙岩县革命纪念馆1980年10月访问赖连璋记录。

② 龙岩县革命纪念馆1980年10月访问赖连璋记录。

方，到处张贴“欢迎四纵队回老家”、“欢迎百战百胜的四纵队”^①等标语。胡少海看了，心潮起伏，眼睛不觉湿润了。半年来，四纵队这支主要由闽西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经过战火锤炼，思想觉悟和战斗力已大大提高。他从战士们身上学到很多优秀的品质和宝贵的经验，深深敬佩着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闽西人民和他们的子弟兵。六月初，他由武平出发赶回龙岩，就任红二十军军长之职。

六月中旬，经闽西苏维埃政府建议和红四军前委决定，四纵队留守闽西，与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合编成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与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十二军第三师，胡少海调任二十一军军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陈正任政治部主任。

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派王海萍来闽西传达和布置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行动计划。他强调二十一军应集中向广东推进，并以广州为中心，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当时，闽西苏区内尚有不少土匪和民团未肃清，如果二十一军远征东江，必然造成苏区防务空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邓子恢、张鼎丞建议下，胡少海首先执行肃清苏区内的民团、土匪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他先后率领二十一军，在龙岩的梅村、溪口、白砂、雁石、岩山和漳平的中甲、永福等边远山区，肃清了刘烈波等反动武装和土匪，巩固了苏区政权。

七月，永福地主从安溪搬来闽南著匪詹方珍部攻占永福，并骚扰龙车进而威胁龙岩。为了粉碎敌人的侵扰，保卫闽西土地革命果实，闽西苏维埃政府命令二十一军攻打永福，消灭詹

^①龙岩县革命纪念馆1980年10月访问赖连璋记录。

方珍部，重建永福革命政权。

七月中旬，胡少海率领二十一军及龙车、内山十八乡的地方武装共四千人，兵分两路猛烈夹攻詹方珍部。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战斗，拔除了敌人在永福周围的据点，将残敌赶进永福墟。月底，詹方珍部顶不住红军的攻势，丢弃永福墟，退守溪边大炮楼和天主教堂内。这座炮楼墙厚楼高，一面临溪、三面是开阔地，同天主教堂遥遥相对，形成交叉火力，易守难攻。

成立不久的二十一军，好的武器全部调去支援主力，部队又缺少攻坚作战经验，炮楼一时难以攻破。战士们怒火满腔，准备不惜代价进行强攻。八月五日，胡少海指挥战士们先从后山攻下天主教堂，使溪边炮楼孤立无援。当天傍晚，胡少海伏在教堂楼梯边用望远镜察看地形，拟定新的作战方案。不料一阵枪弹由炮楼袭来，胡少海腹部中弹，倒在血泊中。部队撤出战斗，战士们抬着胡少海返回龙岩。因他伤势过重，流血太多，途中在龙车村牺牲。战友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将他安葬在龙车通往龙岩小道旁的山头上。

龙超清

刘晓农 宋俊生

龙超清，又名龙济明，一九二五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区域宁冈县委书记、赣西南西路行委书记，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一九三一年底牺牲。

(一)

龙超清一九〇五年生于江西省宁冈县白石塘南村。父亲龙钦海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江西省议会议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龙超清家庭生活虽然颇为优裕，但他却没有纨绔子弟的恶习，自小就常同村里的穷孩子们在一起玩。一九二一年秋，龙超清在家乡读完小学，来到南昌，在他父亲担任名誉校长的省立第二中学读书。

龙超清嫂嫂肖国钰的姐姐肖国华，是江西省妇女界著名的共产党人^①。肖国华发现龙超清关心时政，思想进步，便主动接近他，与他谈心，还送他一些进步书刊，如《中国青年》、

^①吉水县民政局王佐、陈晓放访问肖国钰记录（1979年3月18日）。

《向导》、《先驱》、《革命之华》等。龙超清很喜欢阅读这些书刊，读完了又向肖国华借，并就一些自己很关心的问题向她请教。肖国华借此机会，向龙超清宣传革命思想。有一次，龙超清在谈论中，表露出对青年前途忧虑的心情。肖国华说：“当今青年是大有出路的，这种出路就在于斗争，在于把个人的命运同劳苦大众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在肖国华的引导和帮助下，龙超清的思想开始向革命方面转变。他痛恨军阀政府腐败，关心民众疾苦。一九二四年冬，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军阀贩卖鸦片和驱逐北洋军阀江西督军蔡成勋的斗争。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中共江西省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举行群众集会，悼念孙中山先生。龙超清在一次悼念会上登台演说，宣扬孙中山的功绩和他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

龙钦海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著名人士。他不满意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对革命深表同情，与著名共产党人方志敏、袁玉冰、曾天宇等人来往密切，曾帮助中共江西支部在南昌筹办了党的秘密活动基地明星社和黎明中学，并多次保释了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员。他对龙超清投身于革命的行动早有察觉，但并不干涉。这些，对龙超清走上革命道路，是有一定影响的。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龙超清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五卅”惨案发生后，党领导广大民众开展了反帝运动。龙超清跟随党员们坚定地站在运动的前列，终日奔走于学校、工厂、商店，组织群众起来参加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在一次公祭遇难烈士的大会上，龙超清的演说格外激昂，听者泪下。他还参加抵制仇货的斗争，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募

捐款项。

声援“五卅”惨案运动结束后，肖国华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吸收龙超清入党。党内有位负责同志不同意马上吸收，认为龙超清虽然表现得比较活跃，但出身于名门，年纪又轻，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

又经过党组织几个月的培养和考察，龙超清终于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经肖国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龙超清虽然还在校学习，却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工作。他担任过南昌共青团地委经济斗争委员会领导人之一，领导广大工人、店员，开展反对资本家、厂商不择手段地剥削工人的经济斗争。他经常前往工厂、店铺，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联络进步力量，建立党和团的组织，发展党团员，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初那位对他入党持慎重态度的党内负责同志对肖国华说：“你真有眼力！龙超清是个很有能力的好同志！”^①

(二)

北伐战争开始后，江西省党组织派遣了一批党员回到原籍，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以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九二六年暑假，龙超清奉命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偕同共产党员、宁冈籍的同学刘辉霄、谢希安、刘克犹等，回到宁冈^②。

当时，宁冈县还被北洋军阀统治着。龙超清等以温习功课

①吉水县民政局王佐、陈晓放访问肖国钰记录（1979年3月18日）。

②《烈士名册》，南昌市人民政府资料科编（1956年5月22日）。

为名，来到龙江书院，以此为阵地，在学生、教师中秘密进行活动，联络进步力量。首先，龙超清在龙江书院的文星阁，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冈县支部，由他担任书记。接着，党支部在学生中公开成立了进步团体新民社，向社员们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他们上街发表演说，欢迎北伐革命。龙超清还经常带领部分师生到乡下进行宣传。几个月以后，党在学生中的工作取得了相当进展，在农村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龙超清等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宁冈县党支部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掌握武器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当分析到全县各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一位党员谈到了茅坪马刀队的处境和马刀队参谋长袁文才为人处世等情况。龙超清听了大受启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鼓动县政府对马刀队进行“招安”，然后，再逐步将马刀队争取过来，变为党能够领导的武装力量。党支部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一主张基本是可行的，决定由龙超清、刘辉霄负责此事。

袁文才是茅坪人，在永新县读过中学。因不堪忍受当地豪绅恶霸的欺凌，与官府富绅结下了深仇，愤然投奔绿林。由于他精明能干，多谋善断，又有文化，不久便成为马刀队的头领之一。他们的队伍有六十多人，三十多支枪，军阀政府曾多次派兵“进剿”，均因马刀队的兵士善走山路熟悉地形并有群众基础，使官军屡吃败仗。

龙超清和刘辉霄等利用自己名门望族的身份，去游说宁冈县长沈清源，向他献出了招安的“计策”。沈听后犹豫不决，担心马刀队招抚后难以控制。龙超清等反复劝说，左一个“以宁冈人利益为重”，右一个“替政府着想”，并表示愿意替县政府做袁文才的工作，终于使沈清源同意了他们的主张。

接着龙超清等又来到茅坪的半冈山，说服袁文才接受招安。在绿林里混了多年的袁文才，深恐受骗，断然拒绝接受招安。龙超清不厌其烦的阐明道理，着重陈述了马刀队欲求其生存和发展，只有利用这一时机的利害关系。袁文才被龙超清等说动了心，提出容他同部下商议一下，要龙超清过两天再来。尔后两天，袁文才把自己准备接受招安的想法告诉了马刀队的成员，个别头领却死不同意。当龙超清和刘辉霄按照约定的时间二次上山时，发现袁文才还没有下最后决心。他们便继续劝说，晓以利害，终于帮助袁文才定下了决心。随后，袁文才率领马刀队的主力下山，被改编为县政府的保卫团。

马刀队接受改编后，党支部趁势加紧了对袁文才的争取工作。龙超清等人经常到保卫团的驻地去，向袁文才讲述全国以及江西的革命形势，使他感到只有随着潮流前进才有出路。一九二六年九月初，北洋军阀为加强对北伐军的防御，将各地的驻军抽调回省城。龙超清在党支部会议上分析了全县的形势，提出目前正是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的好时机。党支部完全同意龙超清的建议。会后，龙超清与几位党的负责人找袁文才谈了很久，帮助他下定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心，并积极进行准备。接着，龙超清布置党员们到农村暗中组织农民配合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龙超清与党支部的同志们带领上千群众与袁文才的保卫团同时行动，捣毁了县政府，缴获了豪绅武装“清乡局”的枪枝，逮捕了沈清源及一批反动官吏。翌日，党支部在县城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民众大会，成立了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由土客籍人员组成的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当选为主席。毛泽东在谈到井冈山根据地土客籍团结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

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①

县人民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龙超清签字印发了大张的公告，号召全县工农商学兵迅速行动起来，开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他布置党支部的成员和人民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下到各区、乡去进行实际领导。县城所在地的新城，土豪劣绅较多；在农村，不少村庄多是一姓，封建色彩和宗教势力比较严重，要把各阶层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困难很多。龙超清主动到县城郊区工作。他和同志们白天召开群众会议，晚上挨家挨户作宣传，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先把农会建立了起来，接着又建立了工会、妇女委员会、学生联合会和商会，还办了一个妇女工读学校。经过县人民委员会和党支部的努力，宁冈各地都建起了各种民众组织，广大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龙超清又指示人民委员会在耒市和新城举办了两期农民运动训练班。他还多次与袁文才商议，把保卫团改为县农民自卫军，使这支昔日的绿林队伍，成了一支党基本上可以指挥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江西省国民政府派林笑佛来宁冈出任县长。他到新城后，装模作样地拜会了龙超清等人，表面上大谈什么“国共合作”，暗中却四处活动，联络土豪劣绅，试图重新拼凑反动武装。龙超清认为，不除掉这块绊脚石，宁冈的革命不能深入发展。他与袁文才等一起研究了铲除林笑佛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袁文才率自卫军战士，在一天深夜将县公署团团包围，收缴了警卫队的枪枝，并击毙了林笑佛。后来，江西省政府又派出张廷芳、易敌无等右派分子来宁冈任县长。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但没过多久，都被龙超清等人领导宁冈人民赶跑了^①。

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江西省委指示将宁冈党支部改为县委，龙超清任县委书记。

(三)

一九二七年，湖南“马日事变”后不到半个月，宁冈逃到吉安土豪劣绅带着一营敌军卷土重来，捣毁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并通缉龙超清等人。在白色恐怖下，有人逃避斗争，有人叛变，龙超清及刘辉霄等则继续坚持斗争，随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退入茅坪山区。有的同志劝龙超清离开宁冈，到南昌暂时躲避。他的父亲也曾来信，要他潜出家乡到外地读书，等形势好转时再回来。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不相信，革命会长久冷落下去，重整旗鼓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待革命形势重新发展。”^②

这时，有些地方党的组织竟命令农民协会将武器上缴给反动当局，明令取消农会。龙超清立场坚定，不向反动派交枪。他带着几个同志潜到新城、古城等地方，告诉各乡农协会的负责人，要顶住敌人的压力，无论如何不能宣布散掉农会，农会的梭镖、大刀一件也不能交出去。龙超清还把县委仅有的四支手枪，分配给最可靠的同志使用。

在这革命低潮时期，龙超清和周围的几位党员，常常是白天睡觉，一到黄昏就出去活动，贴标语，召开群众会议，对危

^①《宁冈县志》（1937年）。

^②宁冈县民政局罗发昌、罗英模访问肖国钰记录（1979年7月31日）。

害革命的土豪劣绅发出警告。他还在柏路、大陇几个地方办了农民夜校，给农民上课，坚持秘密活动。

驻守在宁冈的一营敌军不停地“追剿”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龙超清经常给袁文才出主意，并鼓舞他们的斗争决心，帮助农民自卫军把六十多条枪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这年七月中旬，永新县的土豪劣绅勾结反动武装，将县委、县农协负责人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及五十多名党员抓起来关进监狱，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刘珍设法从狱中带出密信，请求宁冈县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进行营救。龙超清接信后，与袁文才共同制定了营救计划，派人联络遂川县王佐的农民自卫军和安福县王兴亚的农民自卫军参加攻城。七月二十六日，龙超清、袁文才率领自卫军和上百名群众，没等王兴亚部队到来，便会同王佐部队攻打永新县城，经过半天的激战，攻破城池，救出了受难的同志。第三天，两支农军又会同王兴亚的队伍，打退了由吉安前来反攻的一营敌军。由于永新暂时不利于共产党人的活动，刘珍、贺敏学、贺子珍等遂与龙超清、袁文才的部队一起，回到宁冈的茅坪。

在茅坪这段时间，龙超清多次派人前往吉安，与上级党进行联系。一九二七年九月底的一天深夜，住在茅坪梅树山的龙超清，突然被袁文才派来的两个自卫军战士叫醒。他们带来了袁文才的口信，要龙超清立即去茅坪，说有急事商量。龙超清打着松明火把赶到茅坪，袁文才把一封信递给他。那信的意思是，工农革命军要来宁冈一带落脚，请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和袁文才的代表前去接头，落款是“毛泽东于永新三湾”。龙超清看完信后，惊喜交加。他认为，如果真是毛泽东的队伍来了，湘赣边界的革命烈火一定能够重新燃烧起来。龙超清与袁文才

商量，并要他派人与自己一同前往。天刚麻麻亮，龙超清偕同袁文才的司书陈慕平、党员龙国恩一起离开茅坪，于当天上午赶到三湾，在三湾协盛和杂货店，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就通过衡阳湘南区委的两个同志，了解到大小五井山区一带的地理、政治情况。秋收暴动前夕，他又从王兴亚那里进一步得知了宁冈、永新党组织和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情形。这次，毛泽东见宁冈地方党与地方武装的代表都来了，非常高兴。他与龙超清、陈慕平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晚上，毛泽东与龙超清又单独谈了很久。

龙超清三人返回宁冈的那天，毛泽东见他们没有带枪，要部队送了三支马枪给他们。

回到茅坪，龙超清转达了毛泽东对袁文才的问候，并向袁文才介绍了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告诉他毛泽东很快就率领这支工农武装来井冈山一带建立根据地，希望自卫军作好欢迎的准备。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由三湾来到古城。龙超清等在头一天就给部队安排好了食宿。三日晚上，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党的前委扩大会议。这是秋收起义部队进入湘赣边界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讨论部队到何地建立根据地的重大问题。龙超清是出席会议的唯一的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他完全赞成前委关于在湘赣边界开展武装割据的主张，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并介绍了罗霄山脉中段区域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以茅坪为后方，在湘赣边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

古城会议后，龙超清连夜赶到茅坪，安排毛泽东与袁文才

的会见。十月六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见面。袁文才表示十分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十月七日，工农革命军由古城来茅坪，龙超清、袁文才组织自卫军和群众敲锣打鼓，杀猪放铳，热烈欢迎。尔后，又帮助部队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医院等后勤机关。龙超清带着一些党员为工农革命军四处筹集粮食，几天功夫，就组织群众将上万斤粮食，送到茅坪。龙超清还布置人把各地方隐匿在家的党员叫到茅坪开会，并请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在会上也讲了话，号召每个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①。

（四）

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制定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方针：以宁冈为中心区域，逐步向四外发展。因此，抓好宁冈的各项工作，对于整个根据地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龙超清根据前委的指示，首先集中力量，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龙超清自告奋勇，负责白石、柏路一带的工作。有人问他：“到自己的家乡去打土豪，你不怕吗？”龙超清回答说：“要怕就不革命了。”他回到塘南，村里的几家土豪办了酒席为他接风，他严正地拒绝了，并对这些人说：“只有主动地把剥削来的财富交出来，才是识时务者。”他动员自己的家里，“交出一百多担谷子，五六大缸茶油。家里的一本借据租约也烧掉了。”^①接

①《宁冈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1978年）未刊，宁冈县纪念馆编。

②访问肖国钰的记录（1982年）。

着，他与村里的党员龙国恩等人，在周围村庄组织群众清算土豪。有些人不敢要打土豪时分的浮财，龙超清带人送上门，耐心地做宣传工作。清算全县屈指可数的富绅龙瑶斋家那一天，龙超清从新城把毛泽东请来，给上千农民讲了话。以后，他又来到柏路，组织农民到长富桥的大土豪杨唐臣家开仓分谷，杀猪分肉，焚烧债契。龙超清不仅自己扎扎实实地搞好一个地方的工作，还很注意全局工作的进展，经常到其它地方去检查、督促。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一月这段时间内，全县打土豪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前委的表扬。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乘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之际，派一营敌军进驻宁冈新城，配合地主武装靖卫团到处进行骚扰。龙超清一面率领群众武装袭扰敌人，一面派人到遂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二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回师宁冈，龙超清等人发动的一千多群众积极参战，一举攻下新城。接着，在砦市宣布成立宁冈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恢复县委，龙超清仍为县委书记。

新城大捷之后，宁冈的工作进入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龙超清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带领全县的党员、群众积极地投入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的伟大斗争中去。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①如何配合红军打败敌人的频繁的军事“进剿”，是地方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县委重新成立后，龙超清所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全县普遍建立区、乡政权及各级民众组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织。在他和县委其他同志的具体领导下，约半个月的时间，全县四个区三十九个乡都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县委、县工农兵政府通过这些组织，领导广大群众从各方面积极地配合红军打仗，对保卫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宁冈的土地革命是湘赣边界开展得最早、分田最彻底的地方。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起，县委、县工农兵政府就领导全县人民兴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到四月底，已经把所有的土地分配完毕。在分田的日子里，龙超清挨区挨乡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找干部商量解决。有一次，他来到第二区的坳头乡，发现长溪村的分田运动冷冷清清。经过调查，了解到该村的一个族老、土豪，倚仗其子在县靖卫团担任头目的势力，暗中恐吓群众，散布谣言。龙超清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这个土豪，把他送到区里关押起来，又将乡政府的几个干部集中到长溪，帮助该村丈量土地、造册登记，很快地把田分了下去。一九二八年，宁冈的农业获得了历年来少见的好收成，广大农民按二成的比例交纳土地税，保证了红军的军粮供应。

龙超清还指示县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举办了几期党团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他自己还亲自到训练班为学员讲课。为了保证党的纯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一九二八年十月下旬，县委根据边界特委的指示，在全县进行一次“清党”，对所有党员重新审查登记。古城区石口乡党支部有三个党员在“八月失败”的时候意志消沉，躲到外地，逃避斗争；有两个经不住敌人的利诱威胁，暗中反水投敌。龙超清和县团委书记肖子南来到石口，重新整顿了这个党支部，清除了坏人，教育了大多数党员。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的大部分后勤机关，均设在宁冈。宁冈的党和群众一起军事化，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上级布置的每项任务都能完成，到处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县委书记龙超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在他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将近一年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每个地方，大人小孩无不知晓他的名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成绩卓著，所以，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特委委员。

(五)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前往赣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前委决定，建立了宁冈中心县委，以原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为中心县委书记，统一领导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这时，“龙超清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西北特区书记”^①，率领县赤卫队和特区的地方武装，会同永新等县赤卫大队，守卫九陇山军事根据地。

龙超清带领着地方武装到了九陇山后，组织群众，从砦市、古城一带挑运粮食上山；在各个隘口险处修筑工事掩体，日夜熬制土硝、赶制梭镖。湘赣敌人在猛攻井冈山的同时，还派了四个团的兵力向九陇山地区进攻。龙超清率领武装守卫在七里船和蔡家田一带，阻击从茶陵坑口向九陇山推进的敌人。他将部队分为三道防线，每道防线都在阵地前布满竹钉、滚石及鹿砦等等，终于利用山险打败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

^①宁冈尹华珍、罗发昌访问何长工记录（1979）年。

一九二九年一月下旬，继大小五井军事根据地失守后，九陇山也被敌人从蔡家田攻破，龙超清带领部队隐入深山老林坚持斗争。为集合在井冈山被打散的同志，他派出五、六个联络员，到古城、东上等地去接应，很快将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和特委的陈正人、刘珍等接到了九陇山区。宛希先在山上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龙超清被选为特委委员、候补常委。临时特委分配他重新负责宁冈西北特区的工作；并打通砦市与九陇山之间的联系。

敌军占领湘赣边界后，各县的反动地方武装死灰复燃。宁冈县挨户团经过扩充，由团总肖庚光带领驻扎在砦市，封锁通往九陇山的大小要道。为要消灭这股敌人，龙超清几次派人去侦察敌情。三月六日，小雨夹雪下个不停。龙超清领着赤卫队二百多人，冒着雨雪从石口向砦市进发。为要避开敌人沿途的岗哨，他们沿河滩在水里行走，拂晓赶到砦市，一举消灭了挨户团，打开仓库，将很多粮食、弹药运往九陇^①。

是年秋，特委调龙超清去莲花担任县委宣传部长。三个月后又被调回宁冈，担任县委领导工作^②。

一九三〇年二月上旬，赣西苏区的局势大为好转。三月中旬，按照前委的指示，赣西、赣南、湘赣边界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曾山、龙超清等十七人为特委委员。特委下设六个行动委员会。原来的湘赣边界特委改为西路行委，下辖永新、宁冈、莲花、遂川、茶陵、酃县和吉安。龙超清开始任团的西路行委书记，六个月以后，担任了党的西路行委书

①刘晓农、归惠芳访问谢合彬记录（1972年）。

②宁冈纪念馆访问徐克刚记录（1976年10月1日）。

记^①。

龙超清担任行委书记后，为了开创革命斗争的新局面，着重抓了彻底平分土地和加强各地党、政建设这两方面的工作。边界各县曾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两度分田。由于敌人的不断进犯和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加之经验不足，土地分配不够彻底，有的好歹不匀，留了不少公田；有的分了田没有烧毁田契；还有的按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分田。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龙超清布置各地普遍地、广泛地进行一次分田运动。这次分田的方法与过去相比有许多不同，行委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如好坏搭匀，不准留公田，农具、耕牛同时分配，该分清苗的分清苗等。这样做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彻底平分土地的要求。

接着，龙超清领导行委，在各县开展党组织的整顿和苏维埃的改选。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和乡政权由于惧怕敌人进攻，平常工作缩手缩脚，敌人一来便消声匿迹。龙超清和行委指示各县，对这样的地方实行严格审查，坚决更换负责人，对不敢大胆挺身出来工作的党员、干部，经教育仍然无效则予以清除。同时，在各地纠正党内包办苏维埃工作的现象。龙超清很重视行委对各地工作的巡视。他指示，除留个别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人下到农村去，巡视检查，了解掌握情况。他自己也很少在行委机关办公，多数时间在下面指导工作。

这两项中心工作有力地带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至一九三〇年九月间，西路行委所辖各县的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农业生产、党政建设都有了新的起色，为建立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

^①李文林：《赣西南特委干部履历情况表》。

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月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西路行委带领一万多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摧毁了敌人在赣西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形成了纵横千里、人口达四百余万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龙超清面对大好的革命形势，精神极为振奋。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更加努力为党工作的时候，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赣西党内进行肃反，清查AB团，龙超清最早受到“审查”，被诬告为AB团首要分子，关押了起来。一九三一年底，龙超清在江西广昌县不幸惨遭杀害。

全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认定龙超清为革命烈士。宁冈县与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都陈列了龙超清烈士的事迹。

附 本传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如下一些材料：

1. 《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革命历史丛书之一），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革命历史丛书之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回忆井冈山的斗争》（革命历史丛书之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盛祖绳整理：《井冈山革命斗争大事记》
5. 《烈士材料》（50），存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6. 李少恒：《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始末》（未刊稿）。
7. 汪为公：《关于王佐同志的资料》（未刊稿）。

王 德 三

徐 继 涛

王德三，中共早期优秀党员，陕西党团组织创建人之一，历任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书记、省委书记。一九三〇年底英勇就义于昆明。

王德三，名懋廷，字正麟，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生于云南省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大家庭。祖父王臻，字美西，晚清的贡生；父亲王之濫和两个伯叔都是清末的贡生；母亲是位“聪明勤苦而好强的人”^①。

王德三有弟兄三人。哥哥名濡廷（即王复生），中共早期党员，一九二〇年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云南最早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一九三六年八月牺牲于东北齐齐哈尔。弟弟王馨廷，一九二二年考入北大附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病逝于陕北绥德。

王德三幼年时期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十二岁进入大理高等小学，十六岁考入大理中学。在中学，他努力攻读先秦诸子和明清诸家文章，古汉语水平有很大提高，他爱好数学，每次

^①王德三：《母亲墓志》，《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6辑。

数学考试的成绩总是优等。

一九一八年，王德三转入昆明成德中学。到省城后，他仍“只是专心读书，不交朋友，不作什么活动”^①，但这时他已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

一九一九年，王德三到北京报考大学。因考期已过，“补习一年，非常专心，连同乡都很少来往。”^②一九二一年考入北大预科。

进入北大预科后，王德三开始也只“专心想学数学物理”^③，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认为科学落后是中国贫穷衰弱的根本原因，决心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取得成就，为中国人民造福。他曾与几个同学组织相对论研究会，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有较深的认识。后来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与推动下，他逐渐认识到“科学救国”的道理是走不通的，于是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当时第三国际有些书刊是以法文印行的，王德三在会内承担法文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还多次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到北京丰台铁路工人区和门头沟煤矿等地的访问调查，回来后写成报告或通讯，为研究会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具体翔实材料。他自己也在实践中受到教育，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些活动中，他“先后结识了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著名党的活动家，并由邓中夏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④

①②③王德三：《狱中遗书》，《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3辑。

④汪玉凯：《关于邓中夏给王懋廷的一封信》，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此处共产主义青年团应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王德三入党的具体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

在北大上学期间，王德三与哥哥王复生是互相“换着教书，来供给读书”^①的，曾先后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和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教。一九二三年夏，王德三在北大刚读完两年预科，就接替哥哥王复生到了陕西，先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一九二四年夏，应李子洲（中共早期党员，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校长）之邀，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在教学中，王德三自己编选国文课教材。在他写的讲授提纲中，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他还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并通过各种活动，在学校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列主义。

一九二四年秋至一九二五年六月，李子洲与王德三等在师生中（包括绥德籍在榆林中学上学的学生）吸收霍世杰、乔国桢、白明善等四十多人作为团员，在绥德建立了团的特别支部，王德三任特支书记^②。王德三曾组织团员学习讨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演变集》、《劳农俄国之研究》，以及十月革命的历史。通过讨论，他们认为，俄国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那么，陕西与西北革命也同样应到民间去。确定了这一方针后，他们还进一步研究了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到工厂去组织工人，到军队中去组织士兵与中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的具体办法。

在团组织以及李子洲、王德三的带领下，陕北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兴起。在农村发起组织“脚户自保会”，团结广大脚户

①王德三：《母亲墓志》。

②王懋廷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2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与军阀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不久又成立了农民协会。

在如何开展工运的问题上，当时在团组织内部曾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陕西省没有一个机器工业的工厂，工人都是从事木石泥水的手工业工人，且分散各地，很难组织工人开展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陕西城市苦力人数很多，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是充分的。王德三把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邓中夏，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一九二四年秋冬，邓中夏从上海给王德三写来回信，明确指出：“应按照当地情况，有什么工人就组织什么工会，为了要把一切劳苦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组织起来革命，不是为了非要产业工人不可，……各种手工业工人，即是西北的主要工人，西北二三百个县，每县又有数十数百数千工人，组织起来，也就是很大的革命力量。”^①邓中夏不仅给王德三复信，而且还陆续寄来了党中央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文件、刊物等。在邓中夏的指导下，王德三等人积极开展工作。不久，绥德成立了工会。先是一九二五年“建筑绥德师范礼堂的工人们首先组织了工会，接着绥德城又按行业成立了木匠、铁匠、石匠、砖瓦业、泥水业、担水业等各种工会。……次年冬天，正式成立了陕北工会联合会”^②。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绥德后，王德三、李子洲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各阶层人民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五卅”惨案后，绥德各界人民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王德三带领绥德师范学校的学生到街头

①汪玉凯：《关于邓中夏给王懋廷的一封信》。

②高长久：《回忆陕北职工运动片断》，《人文杂志》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专刊。

募捐，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抵制日货，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王德三离开陕北回到北京^①，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

为了进一步团结云南旅外青年，组织他们参加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推动云南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秋，由王德三等人发起，在原云南青年团的基础上，组织了云南革新社，创办《革新》周刊^②。后来为了团结更多的云南青年，将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出版《铁花》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革命理论。王德三曾以“齐人”、“正零”的笔名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在一九二五年《革新》第一期（创刊号）上，王德三以“正零”的笔名发表了《剿匪与国民自卫》、《半月来的民族运动》、《告云南青年》等三篇文章。在《告云南青年》一文中，王德三号召云南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改造社会，要他们把“改造社会的责任放在肩上”，指出他们的“出路只有革命”，“革命如不实现，一切事业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在《半月来的民族运动》一文中，王德三通过一九二五年九月段祺瑞政府仰帝国主义的鼻息，对爱国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的事实，告诉人民“军阀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帝国主义的势力赖军阀而强大，而军阀也依赖帝国主义的

①关于王德三离陕的时间，有说是一九二六年夏。笔者认为是一九二五年夏。根据是王德三亲属保存的绥德师范学生欢送王德三的合影上明文写道：“民国十四年七月五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送别王懋廷先生摄影”的字样。

②《云南青年团启事》，《革新》第1期（1925年10月1日）。

帮助，而得长久掠夺人民。人民欲求出路，必先打倒帝国主义，而尤以先打倒帝国主义之爪牙以实现国民革命。”在《铁花》第六期上，王德三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国民革命之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及军阀”。他同时指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因为“工农是最受压迫的阶级，同时也是最革命的阶级”。其次是小商人，因为他们“生活极感痛苦，也是站在革命这边的。”对于知识分子，王德三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他们不能独立成一阶级，他们的革命性，是由认识而来，他可以站在革命的前线，也可以站在反动的方面。不过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成分，尤其是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工农自身的知识缺乏，不容易发生革命的意识，第一步必须要有智识分子的启发与组织。”^①工农力量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才能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适逢北大成立二十七周年。王德三在《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的文章。他通过北大历史的回顾，说明北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说北大“不但孕育了数千同学作改造社会的中坚分子，她並在改造的途程中（从）政治上思想上处处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特别难得的是，王德三当时已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划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是“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之必然结果，是中国民众外交第一次的胜利。她唤起了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热情，並向军阀官僚表示民众的制裁。”同时指出了“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自‘五四’后，

^① 《铁花》杂志第6期（1926年6月21日）。

同学受了世界革命潮流的鼓荡，均有到民间去的呼声。”^①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为了积极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王德三动员北京及武汉、南京等地的新滇社成员前往广州参加北伐战争。这年夏天，王德三也到了当时全国革命中心的广州。

到广州后，王德三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和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课程。为讲课的需要，他编写了《帝国主义大纲》的讲义，内容共分三部分：1.帝国主义之内容；2.帝国主义之历史的发展；3.帝国主义之崩溃^②。

一九二六年八月至九月，《黄埔日刊》上曾先后刊登了王德三的《纪念廖先生多数化精神》、《帝国主义讨论题目》、

《国际青年与本校》等文章，以及他起草的宣传科八月份《工作报告》和九月份《工作计划》，均署“科长王懋廷编制”。

当时驻广州的滇军朱培德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为了做好滇籍旅外青年学生的工作，为云南地方培训革命干部，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广州大沙头第三军留守处举办政治训练班，由王德三兼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于一九二六年冬开学，一九二七年一月结业，学员共三十多人。中共广东区委对这个训练班很重视，曾派周恩来、恽代英等为训练班讲授军运和青运方面的课程。学员结业后，一部分到了北伐前线，被分配在第三军做政治工作；一部分回到云南，成为云南党的骨干力量。

在北伐胜利进军形势的鼓舞下，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①王德建：《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1925年12月17日）。

②王懋廷：《帝国主义大纲》，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人民革命斗争不断高涨。为了加强对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大沙头训练班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①派王德三回云南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王德三等回到昆明。“在他们到达昆明的两三天后，云南地下党组织就在省教育会内秘密召开了地下党领导机关的会议”。“那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云南地下党组织在原来特委组织的基础上扩大为中共云南地下党省临时委员会。委员会书记由王德三同志担任，赵祚传任组织，张子昌任宣传，李鑫任农运，孙荣贵任工运，吴澄任妇运，毕昌杰任青年。”^②

省临工委成立后，首先开办了几次党团员训练班，以加强党内的理论学习，提高党团员的政治觉悟。王德三曾亲自到训练班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在省临委和王德三的领导下，云南人民相继筹备建立了各种革命群众性组织。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昆明各界妇女第一次举行了庆祝活动，会后游行示威，成立了云南妇女解放协会。三月中旬，云南部分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四月十日，在昆明省教育会召开了农协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同时，印刷、纺织、猪鬃、邮政、铁路等行业工人也分别成立了工会。五月一日，成立了昆明市总工会。此外，各大中学也分别成立了学生会，並

^①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领导广东、广西、云南和南洋地区的工作，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52页。

^②杨静珊：《赵祚传烈士革命事迹的片断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14辑

召开了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党组织还派出共产党员到云南地方军阀的几个师去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现），开展军运工作。

正当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迅猛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由于当时云南新军阀内部（龙云与胡若愚等）正忙于争权夺利，还未顾及到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镇压。王德三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布置公开暴露的同志及时向农村转移。

接着，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消息和党中央“八七”会议发表的《告全体党员书》先后传到云南。王德三及时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並作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的部署。

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初，王德三离开昆明到开远、蒙自、文山等地检查、指导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蒙自的小东山、查里皮和文山的小塘子、马关的八寨，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组织起来后，对反动派进行了斗争。一九二八年初，王德三到蒙自小东山指导农民运动。他在各村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揭露罪恶的封建制度，号召广大农民用革命的办法，打倒地主恶霸，彻底推翻封建势力。他还特别号召广大妇女也要积极参加农会，与男同志一起来干革命。

一九二八年初，云南军阀龙云在与胡若愚、张汝骥的争斗中取得了胜利，胡、张退向川黔边境。龙云的统治得到初步巩固后，开始在云南实行“清共”，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对共产党人实行大逮捕。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云南。这年三月，共产党员陈祖武、赵琴仙和罗采被杀害于昆明。

王德三对英勇牺牲的同志表示了深切的悼念。翌年三月三十日，在陈祖武、赵琴仙等殉难一周年的时候，他曾赋诗吊唁：

恨，那壮烈的日子，
我未能置身于战场，
把这沸腾的热血，
和你们共流齐放！

今天是你们牺牲的周年忌日，
我这颤动着的心弦，
奏着吾党哀悼的曲子，
敬悼我们的少年英雄！

去年的今天，
你们舍了生命，
开着一朵红花，
你们为了劳苦群众的幸福，
将赤血遍洒！
你们死后遭了虐待，
生前受尽拷打。

.....

不久呀，
镰刀斧头的红旗，
将飘扬在你们的冢头；

英特奈雄那尔的歌声，

荡漾于你们的四周，

……

我们静默于你们英魂之前，

向我至爱的同志们诚挚的宣誓：

拚着这傲逆的头颅，

粉碎那束缚着人们的锁链。①

一九二八年夏，王德三绕道越南经上海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六大是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王德三是有表决权的八十四名正式代表之一。在六大期间，王德三（当时的用名是王茂廷）是大会宣传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成员。在六月二十四日讨论瞿秋白的政治报告的大会上，王德三作了发言。在七月一日讨论李立三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时，王德三与项英、蔡和森等二十九人联名提议，以“六大”的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强调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指出“目前中心工作应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反帝与城市、乡村群众运动的斗争。”经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提议给国内发出指示电，并决定把二十九人提议交政治委员会作为研究材料②。

① 《王德三同志悼陈祖武、赵琴仙两同志的诗》，《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3辑。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一九二八年秋，王德三返回云南，及时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传达“六大”精神，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员会，他被选为省委书记。同时成立了滇中、滇西、滇南等地的区委和一些县委。

根据“六大”精神，云南省委决定深入农村，在群众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开展武装斗争。王德三曾亲自深入到马关、文山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武装起义。为了启发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他编写了《苗夷三字经》，用通俗的语言向兄弟民族宣传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苗夷三字经》首先对兄弟民族的苦难生活作了通俗的描述：“面面饭，麻布衣，茅草房，无油无盐脸色黄，滚草窝，无被盖”，“苗亲夷亲个个苦，上租当佃无田土。夷亲田地哪里去了，这盘账，怎么算，苗亲夷亲想一转”。接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与官府田主作斗争：“齐心合力争天下，事业大，人数多，团结斗争怕什么？官场田主是汉人，汉人还有工农兵，工农兵，不分夷汉一条心，一条心，土地革命世界新”。最后强调了组织起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意义：“一个联一个，大家联合起来好做事；麻线织布缝衣裳，草凑起来盖成房”，“工农兵士一齐起，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才中用，推翻军阀消灭田主，成立工农兵政府；工农兵，代表会，夷汉平等一齐扯”，“中国主人工农兵，天下从此得太平，夷汉从此扯得平。”^①

在汉族地区，王德三也特别注意对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观

^①王德三：《苗夷三字经》（抄件），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点的教育。一九二九年他在陆良的一次讲话中说：“一切政策皆为要站在阶级上”，“政党利益，个人道德皆要站在阶级上”，“不要注意一时的片面现象，要注意阶级的现象”^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工作，在省委和王德三的领导下，云南各地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如一九二八年十月在文山的阿加衣，一九二九年在马关的八寨、文山的小塘子，一九三〇年七月在陆良的旧州、三岔河等地爆发的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夺取了敌人的枪枝，镇压了当地的地主豪绅，取代了这些地方的乡村政权。这些起义虽然由于敌众我寡而最后遭到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五月，王德三到达中越接壤的麻栗坡地区指导工作。在麻栗坡，他与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商订并亲自草拟了“工作计划”。在计划中，王德三根据麻栗坡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工作策略和任务，明确指出：“麻栗坡是安南交界各边地的政治中心”，工作策略应是“领导农民反对官僚豪绅剥削，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在农民运动中启发夷亲的民族觉悟，团结夷亲”。对工作方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目前即在干部中也不提党的问题”，“在可能时可形成一公开的反帝组织，自由同盟组织，这些组织尽可能吸收农民群众加入，不要限于学生”，“还要组织一个核心作用的秘密组织去领导，这一组织暂用任何名称，将来转变为党组织。”^②

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王德三经常阅读军事书籍，认真钻研战略战术。他曾打算去找活动于滇桂边的广西百色地区的

① 《王德三在陆良讲话节录》，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② 《麻栗坡工作计划》（记录稿），现存云南省博物馆。

红七军，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未联系上。

一九三〇年秋开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连续进行了三次反革命“围剿”。在全国范围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猖狂进攻。云南军阀也加紧了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很多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在狱中，大多数同志都很坚强，但也有极少数人背叛革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共宣传；有的还被敌人收买，充当特务，破坏党的组织。王德三针对这些人的动摇、背叛行为，写了《歧途的羔羊》一文进行抨击^①。

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九日，王德三在昆明附近的安宁长坡被捕，关押在昆明省政府所在地的五华山看守所内。敌人对王德三进行了种种威胁利诱，他坚强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耿耿忠心。他在狱中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古人说：‘人各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王德三在昆明英勇就义。

①杨东明：《五十周年祭》，《云南文史资料》第14辑。

②王德三：《狱中遗书》，《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3辑。

余 贲 民

徐 许 斌

余贲民，字金榜，号世英，湖南省平江县城关人，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五日生。父亲余载福是个木匠，母亲江宝珍在家耕织，生活比较殷实^①。

(一)

余贲民幼年读了三年私塾，一九〇九年考入湖南新军四十九标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四十九标连长^②。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的战役中负伤，不久，退伍回乡，迁居到平江县城北门外迎瑞洞（现平江县东源乡迎瑞村），种田养蚕。一九一六年，其父托人把他介绍到启明女子师范学校种菜，并逐渐接触教学工作。一九一八年，在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余贲民主张在启明女师反对旧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教学，得到了进步校董凌容众先生的赏识，应聘为启明女师园艺部主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余贲民在县城与李六如、陈弗章

①访问余贲民之子余略生谈话记录。

②李六如：《余贲民传略》，原件存中央组织部档案室。

等人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救国十人团”、国货维持会、雪耻会，曾被选为平江雪耻会会长^①。一九一九年六月，余贲民等组织县城工人、学生、市民共二千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号召抵制日货。余贲民手拿广播筒，走在队伍最前列，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中国劳工万岁”等口号。当天晚上，他和李六如、陈荪章、彭见清在启明女师开会，决定组织仇货检查组，分成几个小队到四乡检查仇货。余贲民在会上提出了几条检查办法：一，从明天起，各队分头出发检查，所有日货一律进行登记，贴上检查证；二，各商店已购进的日货，一律减价一半，在一星期内售完，到期没售完的，交商会统售；三，已经在汉口、长沙等地定购了日货的，一律退回，不准入境，违者没收。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余贲民的意见，并推举他负责组织四个检查组。第二天，余贲民把检查组组织起来，并亲自带领一个组在县城进行检查登记。

一九二一年冬，余贲民同陈荪章一起，以公法团的合法名义，创办了平江县工会、县农会。一九二二年春，余贲民被推选为县农会会长，陈荪章被选为县工会会长，并在城乡创办了十几所平民夜校，组织农民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在长沙教书的共产党员李六如，不断给他们寄来革命书籍和刊物。余贲民先后阅读了《向导》以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小册子，还学习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①李六如《余贲民传略》。

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认为平江地区已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遂通过李六如、函约陈萑章、余贲民二人到长沙，具体研究在平江建党问题。他们俩到达长沙后，被安排在湘区委员会办的短训班学习。一天下午，李六如告诉陈萑章、余贲民，毛泽东要找他们二人谈话。晚饭后，他俩随同李六如来到小吴门外清水塘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见面后，毛泽东询问了平江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向他们俩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和他们多次深谈之后，就亲自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示他们回到平江建立党的组织^①。

陈萑章、余贲民从长沙回到平江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扩大了工会、农会组织，秘密宣传党的纲领、方针，先后发展了余本健（缝工）、刘肱臣（木工）、徐礼君（小学教员）、陈景潜（夜校教员）、李则鸣（医师）等十多人入党^②。一九二三年春，建立了平江县第一个党小组，以后又成立了中共平江特别支部，陈萑章任支部书记，余贲民、陈景潜为支部成员^③。同时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平江支部。

一九二四年，余贲民又发展了罗纳川、余再励、徐应胡等十几个党员，并于四月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北新区委员会。至一九二五年，平江东南西北四乡都有了党员，建立了党的支部。

平江东南乡的北福洞、芦洞、灶门洞、辜家洞等地盛产楠竹，

①平江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委员会编：《平江革命斗争史》（1962年9月），原件存平江县档案馆。

②《平江革命斗争史》。

③《陈景潜自传》，原件存北京建国门派出所。

群众有用嫩竹做纸的习惯，当时有一千多个纸槽、五千多名造纸工人。一天，北福洞纸工吴方泉上山运竹藤^①，由于体衰力竭，山道崎岖，加以监工催促赶路，一个趑趄滚下一丈多高的石崖，跌断了脊骨。工人们把他救起来，找人医治，要求资本家李荣堂支付医药费。但是工人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他们怒不可遏，一把火烧掉了造纸棚。

正在北福洞开展工作的余贲民，决定通过这一事件，提高工人觉悟，发动造纸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当天晚上，他召集纸工中的共产党员罗纳川、黎幕方、余再励、杨玉庭等开会，提议立即组织纸业工人总罢工。他们连夜起草了罢工宣言，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享受福利，允许成立工会等条件。

在余贲民的领导下，五千多纸业工人一齐停止了生产。但是，李荣堂等十几个资本家，拒绝接受工人要求，竟停发工资，企图迫使工人复工。罢工时间一长，工人们的困难越来越大，许多工人家里断了粮食。为了能使罢工坚持下去，余贲民带领一些人下山，发动农会支援工人的斗争。不到三天，农会给罢工工人送来二百多担粮食和几百斤食盐。纸工们有了农民兄弟的支援，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吴方泉由于伤势过重，又无钱治疗，在罢工的第十天死去了。这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慨。余贲民等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斗争。他们组织三千多纸业工人开进县城，包围了县公署；并把吴方泉的尸体抬到县长刘永栋的公堂上，要求县长出面交涉。余贲民同时在县城发动各行各业举行游行示威，声援纸业

①竹藤——做纸的原料。

工人的罢工斗争。县长刘永栋新上任不久，看到平江群众斗争坚决，只好责令李荣堂等答应纸工要求，每天增加工资五枚银毫，妥善安葬吴方泉，抚恤其家属。县公署还被迫批准成立了纸业联合会。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商与平江奸商相勾结，偷运一批亚细亚煤油到县城西门大码头，准备卸货。余贲民获讯，一方面通知各学校和工人中的党、团支部，组织党、团员和群众前往阻运；一方面通知平江县商会，不得擅自起运这批煤油。很快，一千多群众涌向西门，把大码头团团围住，不准卸货。商会会长钟坦然和奸商黄栋材，勾结驻扎在县城的军阀李柱中，率领一百多士兵，冲到大码头，驱赶群众，肆意殴打学生，有二十余名男女学生被撞入河中，不少群众受伤。随后，奸商强行起运煤油上岸。二十八日晨，余贲民、吴创国等领导群众在文圣庙集会，准备前往县议会请愿。李柱中部下某营长又率部冲击会场，将群众驱散。二十九日，余贲民等再次发动各团体举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李柱中等摧残爱国运动的罪行。李柱中慑于民众威力，被迫到各学校、团体道歉，并申明以后决干涉民众抵制仇货。县杂税局长亦暗中向四方活动，要求和平解决^①。

十二月二十三日，余贲民等获悉，钟坦然又从湘阴新市福记公司运来无商标英油二百三十箱。他们立即召开县城党团支部的主要干部紧急会议，商讨处置办法。二十三日午后二时，福记公司装运英油的竹筏，驶抵距城三里许的落星滩。余贲民带领百余名党团员高举耙头、梭标、钩刀，冲上竹筏将煤油桶

^① 《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平江油潮”始末的报告》（1925年）。

戳穿或掀至河中^①。事后，钟坦然、黄栋材等竟贿赂县长，捕去几个学生、工人。余贲民、吴创国又组织县城学生、工人罢课、罢工，抗议这种横暴行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严惩奸商钟坦然、黄栋材。县长慑于群众威力，释放了被捕的工人、学生。一千多名愤怒的群众，把钟坦然、黄栋材二人抓住，进行游街示众。平江煤油案斗争获得了彻底胜利。长沙为此向全国各地发出了快邮代电，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一九二六年元月，余贲民被中共湖南区委派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通过学习和锻炼，他的思想觉悟和工作经验都有较大的提高。同年七月上旬，余贲民根据平江地委的通知，从农讲所回到平江，领导农民武装斗争，迎接北伐大军。

八月，余贲民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平江县团防局局长^②。上任后，他安排了一批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在团防局里担任班、排长。这时，北伐军打到长沙，吴佩孚的部队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向湘北节节败退。余贲民将民团队伍撤离县城，到农村发动农民，筹钱筹粮，组织冲锋队、暗探队、向导队、运输队、疑兵队、宣传慰问队，积极支援北伐军。八月中旬，叶挺独立团进抵平江，在白石岭同敌遭遇。敌军依山顽抗，北伐军几次冲锋受阻，伤亡不少。余贲民指挥民团从敌军背后袭击，使敌前后受击，顷刻溃退，北伐军遂大胜^③。

十九日，北伐军进攻三面环水的平江县城。守敌将浮桥拆除，并劫走全部渡船，妄图负隅顽抗。余贲民带领几十个民

①1926年1月26日长沙《大公报》。

②《平江革命斗争史》。

③1926年8月29日《湖南民报》。

团队员，在当天深夜泅渡汨罗江，潜入城里，分路炸毁了敌军火药库和粮仓，并从北门向敌军背后攻击，他亲率一支小队，直捣敌军司令部。在此同时，北伐军乘势猛攻，迅速占领县城。敌军将领陆澐带了几个卫兵企图逃窜。余贲民发觉后，紧紧追击，陆澐无路可走，举枪自杀^①。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曾经指出：“此次胜利夺取平江，其力量全是农民。”对平江农民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平江敌军溃退，乱不成军，余贲民率领团防局乘势缴得散兵二百余支枪，充实了团防武装力量。随后，余贲民即支持、协助农民协会，进行二五减租、退押、平粜，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和开展禁烟禁赌等斗争。

一九二七年三月，余贲民在县城培元学校开办了政治讲习所。讲习所设三个大队，共有学员九十六名，余贲民任所长并亲自讲授政治、军事课，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②。

(二)

“马日事变”后，平江代理县长曹修礼，纠集了一伙从外地潜回平江的土豪劣绅，组织“拥蒋捧喝团”，并策划成立所谓“救党委员会”。他命令驻在南江桥的县团防队开回县城，妄图迫使余贲民交出这支武装。余贲民拒绝了他的命令，从而保存了这支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③。

五月底，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通知附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讨伐许克祥。中共平江县委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了五千名农

^①1926年8月27日长沙《大公报》。

^{②③}《平江县农民运动大事记》，存平江县委党史办。

军战士，任命余贲民为总指挥。余贲民组织力量，日夜赶制梭镖、大刀、红旗、袖标，筹集了三百多担粮食，并组织了运输队、慰劳队和担架队。准备工作就绪后，五千名农军在县城月池塘举行誓师大会，余贲民亲自作了动员，宣布了行军纪律。后因没有接到进攻命令，故未能参加围攻长沙的战斗^①。

六月以后，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湖南省长何键派其亲信刘作柱任平江县长，并在平江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对平江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根据当时的严重情况，中共平江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团防局、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共一千二百余人，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担任大队长，开往离县城一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②。刘作柱悬赏通缉余贲民。七月初的一天，“清乡”队闯入余贲民家里搜捕。乡农会已有防备，事先已通知余贲民的父亲和妻子家人转移，惟独他九岁的儿子漠仪，因在山上割牛草，被“清乡”队认出，落入敌手。

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余贲民的女儿余细咏赶到幕阜山，向父亲报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义勇队队员们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要求下山，拚死抢救余漠仪。余贲民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耐心地向队员们解释，指出不能轻举妄动，以小失大。后来，县城地下党组织通过县商会会长凌容众的关系，把余漠仪保释出来了。

七月下旬，党中央从武汉派来联络员，指示将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与浏阳工农自卫军合编为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开往南昌参加起义。与此同时，平浏清乡司令部派李南山、向玉霞驰往修水，威逼余贲民投降，并以杀

① 《平江县农民运动大事记》。

② 《平江革命斗争史》。

害他的老母、幼子和义勇队的家属相威胁^①。为了保存党的武装，余贲民把个人生死和家庭安危置之度外，毅然率领部队与浏阳农民自卫军汇合，前往南昌参加起义^②。当他率领部队赶至涂家埠车站时，贺龙部队已经开走，铁路交通又为张发奎部所阻^③，只得率部折回平江。途经修水，他们遇到由共产党员卢德铭指挥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于是，两支队伍合编，进驻修水县城。不久，卢德铭前往中央请示工作，部队由余洒度（后叛变）和余贲民率领。他们在修水县城休整了十多天，设立招兵站，扩充了部队。

八月下旬，根据江西省委指示，警卫团和平、浏义勇队的负责人在修水山口镇召开会议，决定将警卫团和平、浏义勇队与修水、铜鼓两地的革命武装合并，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④。第一师下辖两团，原警卫团编为第一团，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第三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分别补进这两个团，并从警卫团抽调了一营补入第三团。这样，部队形式上属江西省防军，以便安全地在修、铜驻扎，得到给养和训练，而实际上仍是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他们在铜、修一面训练，一面帮助当地农民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的靖卫团。

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决定由毛泽东去平、浏领导农军，举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先在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组建工农

①《凌容众日记》，原件存湖南省图书馆。

②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存湘潭地委党史办。

③李六如：《余贲民传略》。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原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会议还作出了举行秋收暴动的决议，确定了秋收暴动的具体军事部署。

九月九日，第一师师部及第一团在余洒度、余贲民的率领下，从修水出发，向平江长寿街进军。九月十一日经朱溪厂越过平、修边界，占领龙门厂。另外，由钟文璋指挥的第一团两个营和夏斗寅部改编的邱国轩之第四团进攻平江。

九月十二日，第四团和第一团两个营抵达离长寿街十五华里的金坪之后，邱国轩暗与敌第八军勾结，在饶鱼潭河岸从后面袭击起义部队。钟文璋三面受敌，仓促应战，指挥部队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时师部还在距金坪三十里的龙门厂，无法接应，一团因此损失不小^①。

事变发生后，余贲民立即赶赴前线，在长寿街大道以南的一个山庄收容被打散的部队。部队集中之后，卢德铭、余贲民本来打算重整旗鼓，再取长寿街。后来侦知敌人已插到我后方，遂当机立断，决定退向修水，并派人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变化，命令一团迅速向三团靠拢。卢德铭、余贲民按前委命令，率部队迅速赶到文家市与兄弟部队会合。

文家市会师后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陈浩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全国革命的形势，决定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沿湘赣边界南下，打土豪，分田地，找个歇脚的地方。次日上午，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的率领

^①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下，向井冈山进军。

为了甩脱敌人的追击和堵截，部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二十四日傍晚，工农革命军抵江西芦溪。第二天早晨，部队继续前进，约行十里许，突然遭到敌人伏击。卢德铭立刻指挥队伍回击，并且亲自率领一个连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人。不料敌人一部已抢占了附近一个山头，居高临下，向我阵地射击。阻击的战士伤亡很大。余贲民听到枪声，带领一个连赶来支援，向敌人侧面发动攻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战斗间隙，余贲民奔上山头，要求卢德铭撤离危险的阵地。卢德铭不依，两人争执起来。最后，卢德铭以总指挥名义命令余贲民赶快下山。余贲民无奈，把一连兵力留给卢德铭，自己下山追赶撤退的部队^①。后来，敌人又连续发起冲锋，卢德铭指挥队伍英勇抵抗。终因敌强我弱，战斗失败，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

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余贲民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把战士们分成若干小组，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收割、挑水、打柴、舂米、推磨。群众给部队送粮送草，给伤员熬汤治病，军民亲如一家。

部队自起义以来，跋山涉水，战斗频繁，加之生活艰苦，疾病流行，严峻的斗争环境考验着每一个人。余贲民始终保持着坚定、乐观的革命情绪，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教育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关心每一个战士的疾苦。在从莲花开往三湾途中，余贲民得知一团有个战士疟疾发作，没有跟上部队。他骑马往回走了二十多里，把掉队的战士找到扶上马背，自己牵马步行，赶上了部队。

^①访问钟胜科等谈话记录。

起义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在打了几次败仗之后，思想更加混乱，少数投机革命的旧军官，看不清革命的前途，散布悲观论调；有的战士思想动摇，以致开了小差。为了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在三湾村一家小杂货店里召开了前委会议。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陈浩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政治形势和部队状况，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命陈浩为团长，余贲民为副团长^①。

十月三日，改编后的部队从三湾到达宁冈县古城。余贲民在文昌宫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二十七日，余贲民跟随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千里，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井冈山^②。

(三)

部队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对余贲民说，我们有了个落脚的地方，但能不能在这里站稳，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军事问题，二是经济问题，现在想请你负责经济后勤工作。余贲民感到这项工作关系重大，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③。

节令已是“霜降”过后，井冈山下了一场小雪。战士们大部分没有棉衣，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薄毯子。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冬装问题，部队决定在宁冈桃寮张家祠成立一个红军被服厂，

①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③访问骆奇勋等人谈话记录。

由余贲民任厂长。他从赤卫队里挑了十多个做过裁缝的队员，找人买来两台缝纫机，利用部队缴获来的一些棉花、布匹，做了一批棉衣、棉裤和被褥。留守处负责人杨立三见余贲民患了风湿性膝痛病，身体很虚弱，便给余贲民送去了一件棉衣和一床棉被。但余贲民坚持先满足战士们的需要，硬是把棉衣、棉被退回去了。

为了解决布匹问题，余贲民领着被服厂几个干部到遂川县城，与县委商量解决办法。城里有个大布匹店，老板是城郊的一个大地主，还在红军到来之前，早把布匹藏了起来。余贲民了解到这个情况，便派人把那个地主叫来，限他三天内交出五百丈布。第三天，地主雇人如数把布送来。余贲民仔细一看，发现这批布质地不同，还都是长短不一的零头布。他分析其中一定有“鬼”，遂派人暗中察访。果然不出所料，这五百丈零头布是那个地主向城内的小商、小贩摊派的，他自己却一尺也没有拿出来。次日，余贲民派被服厂的一位干部，提着现金，装扮成九江一个布匹商，到那个地主家里去谈“生意”，从而搞清了布匹的下落。于是，他带领十几个人没收了那个地主的全部布匹，又解决了一部分战士的冬装。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选举余贲民为特委委员。五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巷边村成立，余贲民任财政部长^①，不久又调任红军后方医院院长^②。

由于敌人对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实行严密的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②李六如：《余贲民传略》。

经济封锁，红军的粮食、食盐、医药严重缺乏。余贲民担任红军后方医院院长之后，竭尽全力为解决红军医药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奔忙。他打听到附近山村里一位老药农有止血消炎、退肿生肌的秘方，便决定亲自去拜访。他冒着风雨，翻山越岭找到了这位老药农，老药农答应下山给红军治伤。余贲民告别老药农时，见他衣着破烂，床上盖的是麻袋片，就脱下自己的棉衣、棉裤送给了他。几天后，老药农来到医院，用他的秘方治好了几个伤员的伤口。余贲民非常感激，派通讯员把自己的棉被又给老药农送去，还给他送了些粮食、食盐等生活用品。

老药农第二次来医院为伤病员治病之后，余贲民亲自送他回去。路上，他向老药农提出想学习治伤秘方的要求。按照当时民间的规矩，祖传的秘方是不能外传的。因此，老药农摇摇头，没有答应。

不久，余贲民病倒了。老药农闻讯，特意赶来给他治病。当老药农看到余贲民盖的是薄薄的、补丁叠补丁的破毯子和稻草袋，穿的是到处都露棉絮的破棉袄时，他似乎明白了一切：这些红军战士原来是自己受着冻，却把棉衣、棉被送给我；自己挨着饿，却省下粮食、食盐给我用的啊！“红军这样一片真心为穷人，咱穷人也要一片真心帮红军。”想到这里，老药农毅然冲破了旧的传统观念，把治伤的秘方献给了红军。余贲民非常高兴，急忙派人喊来几个医生，跟老药农一起采药配药，又治好了许多红军战士的伤口。后来，他们还按照这个配方，制成一批成药，部队行军打仗时，卫生员随身携带，随时可以使用^①。

^①访问皮哲夫等人谈话记录。

(四)

一九三〇年七月，余贲民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奉命从井冈山回到平江开展武装斗争，在长寿街见到了湘鄂赣边区负责人李宗白、袁国平、杨幼麟、赖汝樵、胡筠等人^①。为了给日益壮大的边区红军部队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特委决定创办湘鄂赣红军军政学校，由余贲民担任校长，校址设在平江长寿街河南桥的万寿宫。学校没有课桌、黑板，余贲民带领学员上山砍树，自己动手做；没有课本，余贲民派人弄来一架油印机，亲自试制了一种腊纸——人们取为“贲民腊纸”^②——同教员一道编写、油印教材。他还用自己亲身体会给学员讲课，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在余贲民的领导下，红军军政学校办得很好，为湘鄂赣边区的红军输送了一批批优秀军政指挥员。

一九三一年九月，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工农兵政府在长寿街成立，余贲民调省苏维埃工农兵政府任内务部长。他奔走于修水、万载、崇阳、浏阳、铜鼓、平江等地，巡视指导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后勤工作，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边区红色政权和红军部队。一天，余贲民来到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检查财经工作。县苏一位同志向他汇报，说有一位财务主任帐目不清，贪污了十多块钱，现被县苏保卫局关押，并要判处极刑。余贲民听后，马上和那位负责同志一起复查帐目，最后查

①访问骆奇勋谈话记录。

②访问贝允亮谈话记录。

清是那位主任少记了收入帐，不属贪污公款，遂同县苏研究，取消了对他的惩处。那位主任深受感动，表示以后要吸取教训，认真负责地做好财务工作。

一九三二年二月，余贲民调湘鄂赣省委任军事部长。这时，省委领导下的红十六军已发展到七千多人。平江、浏阳、宜春、阳新等地边区政府都成立了红军独立团。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分别从平江、浏阳迁移至江西万载县小源^①。余贲民非常重视发展各县地方游击队，经常到各县指导游击队的整训工作，研究游击战战术问题。

平江县独立团成立后，发展很快，增添了大批新的干部和战士。余贲民和独立团负责人一起，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在训练中，他发现独立团一个姓钱的营长行迹可疑，排挤打击营政委赵顺清，并擅自安排亲信任连、排长。余贲民通过调查，截获了这个营长与敌人暗中联络的亲笔信，便立即下令将其逮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姓钱的不得不供出自己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叛变革命，以后又假装越狱，混入我军充当内奸的罪行。根据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余贲民和独立团负责人决定，将姓钱的暂时关押，报请上级处理，并从部队中清洗了他所安插的一些亲信^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余贲民到小源参加省委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后期，省委接到紧急情报，敌人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正朝小源逼进。省委马上决定，驻小源的一切机关和区乡干部及当地群众，均向浏阳方向转移^③。

①《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访问吴亚云等谈话记录。

③访问骆奇勋谈话记录。

这天清晨，当转移的干部群众二千余人撤离小源四十多里时，前卫连发现一股地主武装二百余人占据石鼓山，截住了部队去路。余贲民闻讯赶到前卫连，要连长全力攻下石鼓山，为省委机关和干部、群众转移打开通道。他到前沿观察了地形，命令连长带一个排绕到石鼓山南侧，攀越一处陡壁接近敌人，自己带领两个排担任佯攻，从正东的大路上向山上开火。正当余贲民带领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时，前卫连长带领的一个排攀上悬崖，爬到山顶，向敌人猛力冲夺。余贲民趁敌军混乱，指挥部队与前卫连长的队伍汇合，杀退敌军，控制了山头，掩护大队安全地通过了石鼓山^①。

又行二十余里，一个营的敌人将我撤退机关拦腰截断，医院、兵工厂被阻在后边。这时，敌人的追击部队已经迫近，情况万分危急。走在队伍前面的余贲民，急率一个连的战士，猛回头冲进敌阵，打开一条通路，救出了医院和兵工厂的人员。突然，一颗子弹从树林里飞来，穿透了余贲民的肩胛。几个战士奔过来，要背着他撤退。他命令战士不要管他，继续阻击敌人。余贲民从地上爬起来，提着手枪再次冲向敌人，由于流血过多，没走出几步，就昏倒在地。战士们在余贲民的鼓舞下，发起猛烈的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

一个多月后，敌人撤出了江西省万载县，省委机关又迁回小源。余贲民在小源的红军医院里治疗，伤口有所好转，已经能够下地行动了。正当他准备重返工作岗位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下午，负责肃反工作的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昊，带

^①访问鲁桂华谈话记录。

着两个武装人员闯进医院，气势汹汹地宣布余贲民是“反革命嫌疑分子”，说有人供认他加入了“AB团”；还要他“证实”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翼、师政委李幼军、师长高泳生等也加入了“AB团”^①。余贲民同刘学昊进行了激烈争辩，坚决否认这种对他自己和他的战友们的毫无根据地指控，用事实驳斥了刘学昊的诬陷。刘学昊根本不听余贲民的申辩，蛮横地命令两个武装人员把他监禁在病房里，不准他与任何人接触，连医生也不得随便进去，逼迫他“反省检查”。

半个月后，由于复发的伤口得不到治疗，余贲民的病情开始恶化。一天深夜，一位医生趁两名监押人员熟睡之机，悄悄地来到余贲民的病床前，要给他打针、喂药。然而，余贲民婉言谢绝了。他要医生把药品留给其他同志使用。医生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交给余贲民。他拆开一看，是湘鄂赣省委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涂正坤写来的。信中说，余贲民的问题已查清，党组织仍然相信他是一个好同志；加入“AB团”的问题，是一个坏人诬告的，想利用我们的肃反来达到他们瓦解省委、瓦解红军的目的。信中还说，刘学昊是混进红军的内奸，前几天带着省委和部队的重要文件骑马携枪投向了敌人^②。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当省委准备解除对余贲民的监禁时，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九日傍晚，因抢救无效，牺牲在江西万载县小源红军医院里，终年四十五岁。

余贲民牺牲后，党和人民一直怀念着他。据张令彬、张平凯、赖毅等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在中南海，曾

① 《湘鄂赣苏区史稿》。

② 《连云壮歌》，湖南少儿出版社1980年版。

多次提到余贲民的名字，赞扬他忠诚、肯干，对革命有功劳，是我党的一位好同志。何长工在回忆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历史时写道：“余贲民同志很能干，吃苦耐劳，踏踏实实地办事情，他的奋斗精神是很宝贵的。”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王首道在长沙接待笔者访问时还特意嘱咐道：“余贲民在湘鄂赣是个有影响的人，应该给他写个传。”

张 炽

汪 涵 清

(一)

张炽，号子昌，乳名炳南，笔名昌明，化名章阿昌、张其昌，一八九八年六月四日（旧历四月十六）出生于云南省路南縣堡子村。

张炽的家庭是一个劳动家庭。依靠全家的劳动和父亲担任公职领取的微薄薪金，维持全家生活。作为这个家庭长子的张炽，从幼年起参加放牛、牧马、割草、砍柴等劳动，培养了自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张炽的父亲张家彦是清朝晚期路南有数的廩生之一，博览诗文，为人公正，早年在家设学馆办学，后担任过公职，晚年则在村子里开办中药铺行医，兼顾农业生产。他虽然信奉孔孟之道，但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巨变的影响之下，思想並不冥顽，尚能接受新思想，适应社会的新潮流。

张家彦颇为重视对子女的启蒙教育。子女还在 幼 年 的 时 候，他即教他们读书识字，向他们讲解待人处事的道理。一九〇五年，年方七岁的张炽在父亲的指导下，以三年的时间学习了《三字幼仪》、《三字经》、《史学提要》、《声律启蒙》、《孝经》、《四书》等书籍。一九〇八年，乡里举办了初等小

学校。这所小学校学生学的是新教科书，並设有体操、图画、歌咏等课程。张炽渴望进这所当时称之为学习新学的学校。他终于如愿似偿，在父亲的支持和护送下到校读书。

初小毕业后，张炽升入县城的县立高等小学校继续读书。对于在县立高等小学校的学習情况，张炽一九二二年六月所作《我的家庭状况》一文中曾经回忆说：“到了十三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又送我到城里高小校唸书，可是在里面浮沉一年多，校不负我，我自负校：初而请假偷闲，继而不假偷闲，终而一个月不上半点堂，每日只是随着几个同学洗澡，钓鱼，闲游……过我们当时以为最快活的生活。最后被我的父亲晓得了，痛骂痛打了几顿，复迁我到私高小校，同我的表弟杨立业、立身、立贤等唸书。”^① 张家彦的家教确实非常严格。不仅严禁子女吸烟、饮酒和赌博，即使小节微礼，子女稍有违反，也要被厉声呵责。然而，张炽转学私立高等小学校，却成了他一生思想转折的开端。

那时，这所小学校的教师李权之除旧学有根底外，兼受过新学的洗礼，思想比较进步。他特别器重张炽这个天资颖慧、朴实上进的学生，以介绍阅读中外名人为救国救民奋斗的书籍，进行个别谈话等方式，对张炽进行多方劝戒开导，並在教学中带领学生进行参观学习，灌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张炽在私立高等小学校读书的几年，正是路南人民在辛亥革命后推翻清朝地方政府、支持护国讨袁不断开展革命斗争的时期。李权之老师的谆谆教诲，中外名人为救国救民奋斗的事迹，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都给予张炽很大的影响。从此，他努力读书，奋发向

^①原件由烈士家属保存。

上，立志将来投入救国救民的行列。

一九一九年二月，张炽从路南到昆明升学。三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今昆明第一中学前身）十三班。由于他成绩优异，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入学后即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执委。

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北京学生曾拍来电报，呼吁昆明学生奋起进行一致的斗争。消息传来，省立一中许多关心国事的同学纷纷奔走相告，酝酿起而响应。首先振臂而起的，就是张炽及杨兰春（青田）、段融生、张四维等七八个同学^①。他们铅印了一份《缘起》的传单，散发到本校各班和昆明地区其它各学校，征求本校和各校广大同学对这次北京爱国运动的意见，並号召大家组织和行动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省立一中和昆明私立成德中学、省立法政学校、省立工业学校、省立农业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昆明县立师范学校等七个中等学校学生，都一致表示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经各校代表相商，决定组织昆明学生爱国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召开国民大会和举行示威游行。六月四日，以昆明中等学校学生为基础，昆明学生爱国会和各界群众团体在金碧公园（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址），联合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国民大会。会上，各界代表登台讲演，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竞相表示要坚决地和全国人民一道，把除奸、废约、反日的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继而，昆明各界群众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

^①据杨一波：《二十年代的回忆及一九三〇年回滇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78页。

日货运动。张炽积极参加了所有这些斗争。这些斗争促进了他的政治觉醒和思想解放。

象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昆明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省立一中，张炽怀着喜悦的心情，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到了由省外传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革命刊物和一些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张炽那时认为：作为一种新思潮，应该进行实验，应该在具体的地方和具体的问题上加以推行^①。在这样一种想法的指导下，他继续投入了新的斗争。

当时，省立一中校长丁杰对学生在五四运动后日益发展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甚为恐惧，竟然横加阻挠，甚而以各种高压手段对学生实行迫害。丁杰的专横残暴，引起全校学生的极大愤慨和反抗。为此，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张炽亲自主编校学生自治会刊物《驱丁声》小报，揭露丁的罪恶，並代表学生自治会领导全校同学掀起了一个“驱丁”运动。同进步学生为敌的学校当局竟与反动政府相勾结，逮捕了张炽和十四班同学解瑄。消息传出，群情愤激。学生自治会立即发动全校五百多同学，到省教育厅和张、解两人被关押的地方——昆明县公署进行请愿示威。在广大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有恐于学潮的继续扩大，才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张炽和解瑄，无计可施的丁杰，也只好“辞职引退”。“驱丁”斗争取得了胜利^②。“驱丁”斗争的胜利是对反动地方政府及其走卒的一个打击，对昆明学生革命

①张炽：《诸君志愿如何请各陈述之》（1924年），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杨一波：《张炽烈士生平事略》（1981年1月），《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斗争的继续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张炽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所表现的英勇行为，深受全校乃至全市学生的敬佩。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张炽还同其他路南同学一起，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到路南农村大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工作，开展社会运动^①。堡子村地方劣绅张彦成、张渭成（均系张炽的同族兄长）鲸吞公款，鱼肉人民，到处横行霸道，群众无不切齿痛恨。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张炽为贫苦农民鸣不平，曾经对此进行过许多社会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他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假期中，组织路南旅省学生回乡清算团，到堡子等村子和县城群众聚会的一些场所张贴传单，进行公开演讲，宣布他们的罪状，发动群众跟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被一些亲友视为“大逆不道”，却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赞扬。人们看到一贯作恶的劣绅被揭露、被斗争，无不拍手称快。

从参加五四运动到投入回乡的社会运动，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使张炽认识到：要救中国非革命不可！非打倒帝国主义、摧毁封建势力不可^②！

（二）

五四运动以后，云南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个出省游学（即

①张炽：《我的家庭状况》（1922年6月），原件由烈士家属保存。

②张炽：《诸君志愿如何请各陈述之》（1924年）和张炽1925年旧历4月2日给张子昭的信，两原件均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升学)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为了进一步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革命的正确道路,一九二三年春刚刚毕业于省立一中的张炽,毅然决定与同学结伴北上投考大学。经过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变卖部分家产,并请亲友资助,张炽依依惜别慈祥的双亲、恩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子女,与杨立贤(一波)、徐景湖于同年五月起程,乘滇越铁路火车取道越南,转搭轮船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在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算学系熊庆来教授等云南籍人士的帮助下,他们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补习中学主要课程。

一九二四年七月,张炽继续北上,到北京投考大学。在确定报考什么大学时,张炽考虑到:国内军阀之所以横行,国外帝国主义连续不断地侵略中国之所以得逞,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黑暗腐败;要根本改造中国,必须研究政治,“以为将来根本改造之预备”^①。为此,他于同年九月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由于这个有利条件,张炽得以更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他在学校的学习中,极为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密切注意国内外一切政治形势的发展,並以大部分时间积极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如参加云南旅京学会,参与组织由北京十八所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北京青年学会,加入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和平民教育研究会,在这些组织中进行各种活动。同时,他还到本校平民学校任教,走向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道路。

^①张炽:《诸君志愿如何请各陈述之》(1924年)。

这样，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不断的革命实践活动，张炽愈益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由一个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经中学时同学、早期云南籍共产党员刘绍猷（平楷）、姚宗贤的介绍，他于一九二四年（一说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炽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为把云南旅京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参加了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云南革新社的领导工作；参加了党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参加了一九二五年六月北京工人、学生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募捐、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同年十一月底反对关税会议、反对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以推翻段祺瑞政权、组织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站在当时革命示威运动和捣毁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巢穴斗争的前列^①。此外，他还在北京《京报》、《革新》、《云南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介绍国内外形势、评论国内政治经济的文章，宣传革命，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在党内，他担任中共民国大学支部和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学校和北京地区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在党的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三万多青年学生和各界革命群众，为抗议日、英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要段祺瑞政府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最后通牒，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组织了两千人的请愿团举行示威游行，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张炽发动

^①杨一波：《张炽烈士生平事略》（1964年8月12日），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並帶領民國大學同學和雲南旅京學生參加了這一鬥爭，在大會和示威遊行中擔任指揮、聯絡、散發傳單等工作。當請願隊伍到達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廣場時，布滿廣場四周的反動軍警，突然開排槍向請願群眾射擊。頓時，陳尸累累，廣場洒滿鮮血。這就是北洋軍閥反動政府製造的空前大屠殺——“三一八”慘案。“三一八”慘案中請願群眾被打死四十七人，被打傷二百餘人。張燦本人腹部受傷，被送進醫院治療。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的北京《京報》、《晨報》等報刊曾經報道了包括張燦在內的革命者英勇受傷的情況。在三一八事件中，張燦再次表現了自己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堅強意志和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

(三)

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大連一直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進而鯨吞全中國的一個基地。在這裡，長期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和殘酷剝削的勞動人民，曾經連續不斷地進行過反日愛國鬥爭。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黨非常重視大連的工人運動和組織建設。大連是黨在東北的重要活動地區之一。一九二五年六月，中共北方區委派張燦到大連視察工作。張燦到大連後，曾在革命組織和工人群眾中進行過許多調查研究。他返回北京，向北方區委作了詳細匯報。由於他的工作，使黨進一步掌握了大連地區的基本情況。鑑於大連黨組織成立的時間不長，成員多系新同志，工作上還存在黨的領導力量薄弱、黨組織不健全、黨員缺乏教育訓練等一系列問題。中共北方區委復於一九二六年

五月委派受伤刚愈的张炽为特派员，前往大连^①，整顿和加强大连的党组织，进一步团结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张炽第二次到达大连后，运用党的工作经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大力整顿党、团各级组织，进行了各方面的艰苦工作。五月三十日，张炽领导和主持了全市党、团员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了党、团工作，改选了党、团组织的领导成员，建立了党、团地委，设立了党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以及团的相应组织，健全了党、团的各级执行机关^②。会后，张炽留在大连，任中共大连地委宣传部长。在此期间，他亲自写文章，给各级党组织以具体指导，并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努力培养干部。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更好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在他的领导下，筹备开办了小书铺，以经营通俗书籍和文教用品为掩护，传递、散发党的刊物及宣传品。

张炽进行的这些工作，振奋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情绪，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大连地区党的工作，获得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很高评价。当年大连地委给北方区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自张特派员来连以后，帮助我们改组了各级机关，整顿了内部的组织，加强了同志的工作，纠正了我们不少错误，而且每次地委会，甚至支部会议都有张特派员参加指导，直接把

① 《廉德视察记》（1926年5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中共大连地方五月份报告》（1926年6月8日），《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汇编》第115—117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张君的经验间接把区兄（指北方区委——引者）的经验，一古脑儿交给我们，使我们有所遵循，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①

张炽在大连工作期间，正是闻名全国的日商满洲福岛纺织株式会社（简称福岛纺织厂，今大连纺织厂前身）一千多工人举行“四二七”大罢工之时。福岛纺织厂是日本资本家在大连进行经济掠夺、吸吮中国人民血脂血膏的一个重要场所。这个厂广大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工资待遇却极其低微，还经常遭到日本工头的污辱以至杀害，工人们早就忍无可忍。这次，以日本资本家乘兑换货币之机大涨工人饭费为导火线，全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大罢工不久，日本资本家即勾结日本警视厅采取了招收新工人、逮捕罢工领导人等手段，对罢工进行残暴的镇压。在罢工最困难的时候，张炽深入福岛纺织厂，同大连地委其他负责人、中华工学会领导人和罢工总指挥等一起分析形势，研究措施，并为解决罢工工人生活困难、援救被捕罢工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他还参与制定开展反招工斗争、筹款、扩大宣传、争取各界人士支援等斗争策略，挫败了日本资本家玩弄的种种阴谋。结果，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下，经过长达一百天的斗争，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不准打骂工人、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等六项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②。由张炽参加领导的这次福岛纺织厂工人的罢工，对南满工人的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① 《中共大连地方五月份报告》（1926年6月8日）。

② 参见《满洲省委烈士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福岛纺织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日本警视厅的注意。由于特务跟踪监视，张炽继续在大连工作已有困难。一九二六年八月，党调他回北京。

(四)

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张炽由党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在广州，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原滇军）政治部工作，并参加了党为云南党组织培养干部而以该军政治部名义举办的政治训练班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云南“二六”政变后，根据云南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张炽随党中央派返云南、以加强云南工作的王德三（懋廷）等人，于同年春天回到昆明。

张炽对父母妻儿有着极深的感情。他的夫人胡素冰是一位农村妇女。在他出外求学和参加革命的长时间里，胡素冰在操持繁重家务的同时，一直省吃俭用，以从事农业劳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给予他很多的资助。他们始终保持着崇高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回到家乡后，理应立即前往探望分别多年的亲人。但是，党和革命的需要，使他一踏上故土，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紧张的革命斗争。

王德三和张炽回到云南后，在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以王德三为书记，张炽是临时省工委的领导成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主编《日光》周刊^①。与此同时，他还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左

^②杨大经 1983 年 7 月 18 日的回忆。

派)负责工作人员、省立一中教员等身份,奔走呼号,日以继夜地开展过许多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即,五月十一日,云南地方反动当局同蒋介石反动派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张炽因在昆明地区进行过不少公开活动,已被地方反动当局通缉,遂由党调离云南。

张炽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终于到达武汉。这时,第一次大革命已经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低潮。

党中央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屠杀政策,挽救革命,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根据党的指示,张炽参加了这次名震中外的武装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工作。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他随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沿途,由于天气炎热、物质供应十分困难以及起义部队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阻击等原因,伤亡人数日益增加,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难免产生思想波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炽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处处关心和照顾同行的同志,对他们讲解革命道理,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说:“我从云南出来真不容易,跟马帮、打火把走了几天几夜,特别是爬那些大山更是辛苦。爬山是不能歇的,越歇愈没劲。革命好比爬山,爬一步,高一截,如果爬到半山折回去,那就再也爬不到山顶了”^①。他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是很大的鼓励。十月初,

^①杨辉远:《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前前后后》(1982年5月26日)。

起义部队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被强大敌人围攻，起义遭到失败。张炽和其他同志一起化装潜入香港，曾经几个星期过着乞丐式的生活，并且又染上疾病，处于十分困苦的境地。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一再经历了革命挫折的张炽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决不放弃！消极！我相信，十分相信，我的前途仍旧是很光明的！失败与小挫是我的事业成就的母亲！只要我们肯努力奋斗，我相信，十分相信，是终有一日会偿了我们的夙愿的。”^①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张炽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到达上海。随后被分配到党中央秘书处工作^②。

为了使党组织和党员能够逐步适应秘密活动的环境，党中央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开办了中央训练班。同年五月，张炽奉调参加第二期中央训练班学习，并担负训练班的有关负责工作^③。七月，学习结业，他被调返党中央机关担任巡视员，来往于南京、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南昌、武汉等地；同时参加上海法南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张炽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开展工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党和革命事业东奔西驰。在完成党赋予的上述各项使命过程中，为便于掩护，他既做过报刊编辑和中学教师，也当过码头工人、百货公司店员和酒店茶房，历尽了种种艰辛。

①张炽 1928 年 4 月 29 日给胡素冰的信，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张纪恩 1983 年 9 月 9 日的回忆。

③李华 1964 年 6 月 17 日给中共旅大市委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的信，原件存中共大连市委地方党史编辑室。

(五)

一九三〇年七月，张炽奉党的指示率领“CP宣传队”，参加上海鲁班路广场一次工人集会。在对工人进行宣传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旋被押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他以工人身份出现，自称水电工人。由于被捕时遭特务毒打，胸部受伤，入狱后又得不到调治，伤口溃烂流血，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仍以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与同案被捕战友一道，同敌人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凶残的敌人曾施用各种手段，妄想要他承认“进行共党活动”的“严重罪行”，但他始终坚不吐实。敌人遂以“同情共党赤色分子罪”，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宣判后，张炽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江苏第二模范监狱，后又被转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张炽把牢房作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另一个战场。他以“努力琢磨坚志气，禁中切莫妄蹉跎”^①自励，坚定地认为：“天快亮了，黑暗的日子就会过去，光明的前途就会到来”^②，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坚信不移。为了准备将来出狱后更好地为党工作，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他在狱中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在他从“过”字监调到“仁”字监后，与监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通过在洗衣濯（即洗衣房）做苦役能同各狱房接触的机会，同陈泽等一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领导了狱中一系列的斗

①张炽 1932 年 5 月 1 日给杨适轩的信，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杨一波：《张炽烈士生平事略》。

争。首先，他把坚定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狱中秘密党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①。对较积极的骨干分子，作为赤色互济会成员联系，而对表现一般的同志，则作为可靠群众进行联系，从而把狱中的难友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亲自主办手抄小报《生活》，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报道苏区红军反“围剿”战争胜利、一二八淞沪抗战等消息，鼓舞难友们的斗志。他还组织难友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政治，讲解中国革命问题，教大家唱《国际歌》和以《苏武牧羊》为曲调、用党的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填词的革命歌曲；经常鼓励难友“千万不可向敌人屈辱”。……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和鼓动工作^②。当时的中央军人监狱，牢房既阴暗潮湿，又狭小破烂。牢内空气污浊，令人窒息。犯人吃的是掺有砂子、稗子、糠秕的饭和无盐无油、霉烂发臭的菜。难友们遭受着难忍的折磨，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为此，张炽发动全监罢饭，要求监狱当局改善非人的生活条件，延长放风时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张炽在狱中组织冲击队，计划相机进行越狱暴动，以便直接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

张炽对敌人和叛徒非常仇恨，对同志和难友则关心备至，处处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难友生病，他总是无微不至地进行照顾，并做看守兵的工作，设法买药，帮助治病；难友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为难友排忧解难；难友思想上产生什

①李华 1977 年 11 月 29 日给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信，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②参见李华 1964 年 6 月 17 日给中共旅大市委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的信。

么认识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进行耐心教育。因此，大家都对他非常尊敬和爱戴。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在监狱中杀害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恽代英。消息传开，难友们无不义愤填膺。张炽领导全监难友提出强烈抗议，并带头高呼：“代英同志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卖国贼！”在他的带动下，全监响应。一时间，呼声震天，吓得反动派不知所措^①。

张炽坚定不移地领导监狱难友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使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反动当局大为惊慌和震动。敌人派遣特务打入监内进行无孔不入的监视和反革命的策反活动。一九三二年的冬天，由于联络交通失事和叛徒的出卖，敌人把张炽、陈开、杨泽等人押到南京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进行“重审”，准备对他们下毒手。但是，张炽不畏强暴，仍然丝毫没有停止战斗。离开军人监狱前，他以铿锵的语言给难友们留下了“坚持斗争，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遗言^②。到敌首都宪兵司令部后，敌人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又对他进行了多方诱说劝降，妄图获得他在狱中领导斗争的有关组织情况和狱外的联系线索。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

敌人在一切鬼蜮伎俩都遭到可耻失败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地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判处张炽死刑。就义前，张炽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恶，不断高呼“打倒南京反动政府”、

①②谢云巢：《有关章阿昌同志的情况》（1951年12月17日），原件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张炽殉难的噩耗传开，全监难友以至同情革命的看守都为之肃然起敬，默默地低下了头。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杨一波、杨青田、张纪恩、冯素陶、陈坦、李戈伦、李华、黄洛峰、苏刚达、詹云青、黄玠然、谢云集、安娥、杨静姍、黄丽生、浦光宗、杨大经、张运、张雪华、张雪芬、杨辉远、杨春洲、罗虎堂、金玠、胡文锦等的回忆录或访问记录。

段 德 昌

涂英伟 柯 果

段德昌是洪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是湘鄂西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过洪湖游击队队长，鄂西游击总队队长，红军师长、军长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是我党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错误“肃反”中不幸牺牲。

(一)

段德昌，字裕厚，号魂，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九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场。父亲段心铨，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家乡小学教书，并当过旧省农会办事员和常德行署法院承审官。母亲早丧。

段德昌七岁在本村念私塾，后转读小学。一九二二年夏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同年秋，考入长沙雅各中学。这时，他与南县、华容一带在长沙求学的刘革非、何鸣一、彭定、朱登瀛、欧阳悟等革命青年过从甚密，曾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阅读《新青年》、《劳动者》等革命刊物，互相勉励，立志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

一九二三年，段心铨因病去世，家境日益窘困，段德昌乃辍学回乡。一九二四年，他与留法勤工俭学的归国共产党员何长工（何璜）去华容南山创办新华中学，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曾与盘踞在华容教育界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①。一九二五年，他在南县县城第一小学任英文教员。五卅惨案爆发后，南县的一些进步师生成立了南县雪耻会，段德昌任纠察队长^②，带领群众积极开展查禁日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由于他经常拿着一根五六尺长的铁杆到县城码头等处检查日货，有人就讥讽说：“当教员不拿教鞭拿铁杆，在街上转来转去，不雅观，有失体统。”段德昌严肃地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者枪杀工人顾正红，你看文明不文明？奸商想方设法贩卖日货，甘当亡国奴，难道就雅观？”他不怕别人的嘲讽，不顾困难险阻，始终站在爱国反帝斗争的前头。

一九二五年六月，段德昌在南县由陈琳、冯希濂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由曾习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同年夏，段德昌由南县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这时的黄埔军校里，以国民党右派分子为核心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的斗争十分尖锐。段德昌是“青军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党的领导下，无情揭露“孙文主义学会”头目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因而，为右派所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到半年，段德昌被蒋介石开除了学籍。后经周恩来介绍，他进入以李富春为班主任

①何长工：《关于段德昌的回忆》（1983年4月于长沙）。

②曾习孔、刘叔云：《回忆段德昌》（1978年5月于南县）。

③曾习孔：《关于段德昌的回忆》（1977年）。

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一九二六年六月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党代表^①。

北伐战争开始后，段德昌于一九二六年夏随六军进入湖南。不久又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工作^②。他积极地在士兵和基层军官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配合着革命战争的进行。尤其在攻占醴陵、平江以及汀泗桥等战役中，他带领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战场上进行宣传鼓动，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同年秋，段德昌调任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围攻武昌的战役。十月，武昌攻克后，第八军第一师划归第三十五军指挥，番号仍为第一师，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主编^③。围攻武昌前后，他结识了先在第八军第一师、后又一同划入第三十五军第一师任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的彭德怀，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彭德怀回忆道：围攻武昌时，段德昌“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④。

攻克武昌数日后，三十五军第一师奉军长何键令，由武汉经孝感西进，抵当阳时获得情报，吴佩孚的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师长周磐遂下令要彭德怀率部赶往玉泉山截击逃敌。

①涂国钦：《忆段德昌》（1955年）。

②一说段德昌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③李靖：《关于段德昌的回忆》（1977年）。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另见刘淑云：《回忆段德昌》（1977年）。

段德昌向周磐提出要随第一团参加这次战斗。周磐同意后，他便同彭德怀一起，带领部队自当阳出发。可是，当他们赶到玉泉山时，吴佩孚的残部已于前一天通过该地北窜。这天晚上，段德昌与彭德怀就宿在玉泉山上的关帝庙里，二人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通过交谈，使段德昌对彭德怀更加了解，使彭德怀受到很深教益。彭德怀对这次交谈终生不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他在《自述》中写道：

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段问我：

“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

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钊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那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①。

同过去几次一样，彭德怀把段德昌这一次的谈话，向他在部队中秘密建立起来的救贫会会员传达了。他后来说：“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②。”

部队在玉泉山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奉命开拔，随第一师进入宜昌，时间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下旬。在这里，段德昌同彭德怀等一起，迎来了一九二七年。元旦那天，彭德怀召集救贫会会员开会，按照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的章程和口号。不久，一营还以夜校形式办起了训练班，“段德昌来讲课的次数最多”^③。

在党的政治影响和段德昌的直接帮助、教育下，彭德怀和他领导的第一营“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④。彭德怀曾几次找段德昌，要求参加共产党。段德昌对彭德怀深为了解，非常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但由于当时正是国

①②③④《彭德怀自述》第43—47页。

共和作时期,为了避免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党组织决定暂不在这支军队里发展党员,彭德怀的入党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这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了何键的三十五军第一师。秋季,他受党中央派遣,赴沙市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在一次战斗中被烧伤,遂秘密潜回家乡湖南南县养伤。

不久,摆脱了何键和三十五军控制的第一师,南渡长江,进驻湘北的南(县)、华(容)、安(乡)地区,改番号为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归鲁涤平直接指挥;彭德怀升任第一团团长,率团部和第一营驻南县县城。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定地维护工农利益,先在城陵矶打击四川军阀杨森,声援叶挺部队作战;后又稳住周磐使第一师摆脱了正在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的控制,进驻南、华、安的政治表现极为赞佩,遂向中共南华安特委提出,要介绍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华安特委派代表同彭德怀谈话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十月的一天,特委代表张匡找到彭德怀,告诉他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①彭德怀十分激动,表示感谢党对他的信任,并打听段德昌的下落。当他得知段德昌就在南县养伤时,既高兴,又不安,当即建议将段德昌搬到李灿家里,以便他派团部的军医去为其治疗。

^①转引自《彭德怀自述》第63页。另据彭德怀回忆,1927年农历腊月底,南华安特委通知他省委已批准他为中共党员,并于次年正月月底或二月初在南县第一团团部举行了入党仪式。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段德昌在李灿家里接待了来看望他的彭德怀。二人互致问候，互诉别离情况之后，段德昌阐述对当局的想法，说：“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破产了，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今后会干得更好。他热情赞扬了彭德怀在白色恐怖中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并对特委通过彭德怀入党表示祝贺。他说：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你能坚持革命立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你很久的愿望达到了——特委通过你加入共产党。已经报告省委，省委是会批准的。段德昌要彭德怀注意保密，说：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工作条件较好的第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①。这次会面，又使彭德怀受益很深。他后来回忆道：“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②。彭德怀告辞时，段德昌又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勉励他认真学习。

十一月，段德昌伤已痊愈。党派他去湖北公安，担任县委书记。公安县是大革命时期农民农运迅猛发展的区域，党在那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段德昌决定要把那里的武装斗争烈火

①以上参见《彭德怀自述》第63—64页和黄克诚：《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载1979年1月2日《解放军报》。

②《彭德怀自述》第46页。

点燃起来。为此，离开南县前，他想请彭德怀提供一些枪枝和经费。彭德怀通过第一团的地下党员，满足了他的要求。

一切准备就绪，段德昌带领南县一批共产党员，化装成绅士、小商贩、江湖术士等各种身份，混过敌人一层层岗哨，抵达公安县曾家嘴，同在这一带活动的戴补天、邹资生等会合，并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制定了公安暴动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段德昌在一天夜晚，率领一百多名暴动队员，袭击了弥陀寺的团防局，缴获敌人七十多支枪。一九二八年二月的一天拂晓，段德昌和戴补天、喻文彬等，带领游击队员潜入公安县城，乘团防局士兵正在徒手进行早操之时，冲入操场，夺走摆在操场一角的枪枝，并乘势占领了公安县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将没收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段德昌宣布成立公安县游击大队，自己兼游击大队长，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①。不久，杨森的五十三军来公安进行“清剿”。段德昌率领游击队撤出县城，转往孟家溪一带同敌人周旋，继而转入洪湖腹地。

(二)

段德昌率领公安游击大队进入洪湖腹地以后，即同活动在洪湖附近的彭国才、刘革非所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洪湖游击队。洪湖游击队以段德昌为队长，彭国才为副队长，在洪湖的一个荒岛上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不久，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遭敌破坏，张计储等领导

^①刘淑云：《忆段德昌》（1977年）。

人大部被捕牺牲。周逸群组织起鄂西临时特委，将特委机关迁往宜昌，并向党中央汇报了鄂西和鄂中的斗争情况。七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到宜昌，正式组成了鄂西特委，以周逸群为书记，段德昌等为委员^①。此后，段德昌除继续领导洪湖游击队整训外，还和周逸群等一起，按照鄂西特委制定的新的工作方针，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和地方主义观念，恢复整顿党和群众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使党和游击队不断壮大，到当年秋季，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已扩展到二十三个县。

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正式成立，段德昌任大队长。他率领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相继袭击杨林尾、凯口、峰口、府场等地的敌军。仅峰口一仗，就歼敌八百余名，缴获了许多枪枝。在此基础上，他们以洪湖边上的瞿家湾、柳集为中心，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二月，段德昌参加了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结合总结鄂西革命斗争的经验，作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组织，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和防止“和平发展”思想等决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确定以江陵、石首、监利三县为发展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会上，段德昌当选为特委委员。会后，段德昌、彭国才率领洪湖游击大队，利用监沔交界地区河港交错，苇林茂密的自然条件，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消灭了号称“铁军”的分盐团防局，攻克新老嘴、岳口等地，并与在石首、华容东山一带活动的段玉

^①姜之铮、张广立：《周逸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

林领导的游击队一起，建立了江、石、监三县的红色政权。

一九二九年三月，段德昌代表鄂西特委在沔阳谢家湾附近的天主堂召开了沔阳县的党员大会，把遭敌严重破坏的沔阳县党组织恢复起来，并重建中共沔阳县委^①。

此后，段德昌率领部队向驻扎在峰口、府场一带的以张泽厚为首的保安团进攻。张泽厚是个狡猾的家伙，外号“混世魔王”。段德昌和沔阳县委研究，决定采取“端窝智歼”的方法。他们派出一部分游击队员攻下张泽厚的家乡沙口镇，活捉其父并批斗游街后斩首示众，再把其大管家打一顿大棍，然后开释。大管家逃到张泽厚那里诉说，张泽厚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带着五百多保安团直扑沙口镇，撞进了段德昌的伏击圈，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张泽厚只身逃跑。智歼保安团后，游击队力量大增，洪湖各地也都建立了守备队。守备队每大队有船十二只，下属四个小队，每小队有船三只，每船三人，配备一门土炮、一支土枪^②，活动于各个水口，配合游击队作战，保卫苏区的安全。

五月，段德昌和彭国才率领第二中队和监利赤卫队攻打监利要镇毛家口。驻扎该地的敌军谭道源师两个连，几乎全部被歼，我军缴获枪枝百余^③。接着，段德昌等又乘胜攻占了峰口和仙桃。峰口之役是一次成功的夜袭战。敌军十八军一个营在镇周围挖有较深的水壕，并布满了铁丝网和梅花桩等障碍物。敌人自恃工事坚固，只在入镇要道口设有哨兵。段德昌令三百多游击队员，每人带马刀一把，于半夜用梯子和杉木板作工具爬过水

①②湖北省党史调查团：《洪湖革命史资料》（1958、1959年）。

③《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现状》，1930年5月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壕，砍开铁丝网，穿过梅花桩，摸进敌营，发动攻击。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猝不及防，大部束手就擒，少数顽抗者作了刀下鬼。是役重创敌军，缴枪两百多支，获得了大量布匹和其它物资，游击队声威大震^①。

这期间，段德昌等还带领游击队员积极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在监利、沔阳的下东湾、凯口、柳家集、瞿家湾一带，江陵的白露湖畔、沙岗及其周围，石首北部的冯家潭、小河口以及华容的东山等地，都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红色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②。此时，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游击大队和段玉林领导的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紧密配合，互相呼应，开展荆江地区和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和团防队的“清乡”，使革命根据地有了发展。

一九二九年七月，鄂西特委命令监沔游击大队和江石华游击大队合组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后接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为便于部队发展和补充所需的骨干，特委还从部队和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等县选调了一批基层干部，成立教导队，由总队直接指挥。

段德昌和周逸群等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建设。他们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学习朱德、毛泽东建设红军的经验，首先健全部队党的组织，设立总队政治部和中队以上的各级党代表，在中队以下的分队建立党、团支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其

① 《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现状》。

② 《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第30页。

次，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强调士兵工作是军队内部的主要工作，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士兵群众的基础上，每一士兵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使他们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自动地参加工作、娱乐和生活管理，以发扬内部民主。各游击队中队以上都设立巡查队，负责维持纪律，每队三人，由士兵轮流担任，有权纠察违犯纪律的官兵。游击总队还建立了作战奖评制度，普遍推广“批评会”的方法，每次战斗后召开参战人员会议，发扬民主，进行奖评，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段德昌亲自编写了一首《红军纪律歌》，以教育指战员遵纪爱民，歌词是：

大马刀，
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在后头。

大马刀，
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处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差半毫分。

段德昌根据他在洪湖地区一年多的斗争实践，总结了游击战争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套作战方法，这就是：“敌人来‘清剿’时我们就‘飞’，‘飞’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打，迫使敌人回去，我们再‘飞’回来，相机伏击、截击，消灭敌人。”后来，又把这些方法概括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这对于发展洪湖和湘鄂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九二九年九月，敌五十师谭道源部和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大于游击队十余倍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清剿”。段德昌命令活动在洪湖一带的第一大队避开强敌，转往华容一带活动。一大队路经监利二区时，应当地党的负责同志的要求，攻下了尺八口。由于胜利后产生了轻敌思想，大队领导人无视段德昌的意见，改变了总队部的原定计划，又带队转回洪湖，结果在小沙口与强大敌军遭遇，伤亡甚重，大队长王尚武和几个中队的党代表牺牲，大队党代表王鹤亦受伤^①。

^① 《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

在此情况下，游击总队决定段德昌率一、三两个大队坚持洪湖地区的斗争，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坚持华容、石首、江陵地区的斗争。一、三大队在洪湖党和群众武装协同下，按照段德昌提出的“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作战原则，避开强敌，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用奇袭和近战歼灭敌人。十月，他们在聂家岭击溃敌军一个团，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十一月，趁蒋、冯战争紧张，部分敌军调出鄂西的时机，段德昌率部向洪湖以西地区展开攻击，先后攻克三官殿、杨树峰、谢仁口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游击队，收复和发展了根据地。与此同时，周逸群、段玉林、朱祖光等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十二月，洪湖根据地占有江、石、监、沔的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段德昌参加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历时九天，深入讨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军事工作问题”、“苏维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鄂西党组织问题”、“农民运动”、“职工运动”、“经济问题”和“兵变问题”等十二个决议草案，产生了以周逸群为首的新的鄂西特委，段德昌继续当选为特委委员。

会后，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担任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十个中队，人员共约五千，枪一千几百支。

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鄂西特委决定红一师于十二月底

^① 《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第32页。

前在江陵集中，与活动于长阳一带的由贺龙率领的红四军相互呼应。此时，二纵队攻取了江陵重镇郝穴，又迅速向普济观和沙岗发展，形势极为有利。但湖北省委此时过高估计红一师的力量，命令红一师第一纵队集结于洪湖，第二纵队亦东返洪湖，与一纵队会师，再东进汉川，夺取武汉。当时，二纵队由于种种原因未向洪湖开拔，因此，两个纵队的会师计划未能如期实现。接着，到达洪湖根据地的柳克明（直荀），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写信命令第一纵队立即往江陵与二纵队会师。于是，段德昌率领第一纵队从洪湖西进，沿途在城垸和沱子口等地打了两仗，重创两地的敌军；第二纵队亦从石首出发，在江陵熊家河收编了敌常练队一分队，又进攻普济观、沙岗，缴枪五十余支。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两个纵队在监利的汪家桥会师^①。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因病未到职，不久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军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下辖两个纵队，段德昌兼任第一纵队司令，王鹤任政委，段玉林任第二纵队司令，周容光任政委^②；全军约六七千人。

红六军成立后，主力移至新观寺，召开了纪念“二七”罢工的万人大会，誓师出征。次日，段德昌和段玉林等率领一、二纵队向敌势力较弱的潜江西南地区进击，先后攻克龙湾司、老新口、张金河、熊口等集镇，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并规定各当铺凡二十元以下的当物一律无偿还原主，二十元以上的当物，允许原主以原价赎回，不计利

①《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

②许光达：《红六军成立前后》，《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息，受到沿途群众的称赞。

二月十四日，部队集中于老新口。十五日拂晓，段德昌和段玉林指挥一、二纵队，进攻监利三大集镇之一的新沟嘴；十七日又占领了渔洋镇，歼敌新编第五师一个连。这时，段德昌得悉潜江县城敌人力量较弱，只有反动武装三百多人枪，于是决定进攻该城。二十七日，他派一部红军埋伏于潜江县城北面，以备堵截逃窜岳口的敌军；将主力分成两路，一路担任正面主攻，一路进攻县城的西南角。这天拂晓，两路红军同时发起攻击，守敌不支，迅即溃败，除部分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三月八日，段德昌等指挥红军分三路向郝穴发起冲锋，经过激战占领该镇，歼敌独立十四旅两个营。十二日上午，段德昌率主力一部攻取观音寺，逼近沙市郊区，并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宣传和发动群众。四月，段德昌和段玉林指挥部队跨江南下，连克藕池、石首和调弦口等城镇，军威大震。这时，鄂西地区的江陵、石首、华容、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相继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赤卫队发展到近二十万人，游击区扩展到十七个县的广大农村。同月，在石首调弦口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从此，以洪湖为中心的鄂西地区有了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开始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五月二日，段德昌指挥部队又分四路进攻峰口，消灭敌军八百多人。接着，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仙桃，歼敌徐源泉的正规军一部和保卫团，缴获大批步枪和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攻下仙桃后，段德昌命令红军主力隐蔽设伏，一部佯装撤离他去，以调动、引诱敌人。第四天拂晓，敌徐源泉部两个团

果然出动，拟渡北襄河追击红军。正当敌军渡河之际，埋伏在岸边的红军战士以暴风骤雨般的炮火向敌群猛烈射击。毫无戒备之敌，被打得晕头转向，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被打死或淹死在河里^①。

战后不久，段德昌去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党中央决定扩大红军并组建红二军团；指示红六军移师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迎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进入洪湖，以便两军会师进攻武汉。段德昌返回根据地后，于六月即指挥红六军南渡长江，在江南群众和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华容，歼灭了何键派驻华容的敌军^②；接着连克石首、南县二城，歼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七月一日，红六军攻克公安县城，四日进入公安的陡湖堤，和贺龙率领的来自湘鄂边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召开两军前委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二、六两军合编成红二军团，军团总指挥为贺龙，政委为周逸群，参谋长为孙德清，政治部主任为柳克明。红二军团辖二、六两个军，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勉之；六军军长邝继勋（到任月余即调往红四方面军），政委兼副军长段德昌^③。六军下辖十六、十七两个师，由王一鸣和许光达分任师长，王鹤和李剑如分任师政委。

红二军团进入洪湖根据地后，军团前委决定消灭为害最烈的反革命地主武装“白极会”（又称“反共军”），打开敌人重兵盘踞的监利县城。按照前委的部署，八月十三日，段德昌率

①湖北省党史调查团：《洪湖革命史资料》（1958年）。

②华容县人民委员会：《华容革命简历》（1955年）。

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革命斗争》，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领红六军在河口歼灭“白极会”几千人，捕杀了反动首领，缴获大批马匹、枪枝、弹药，完全瓦解了这一反动武装，并乘胜攻克了沔阳、天门、应城、京山、皂市、安陆等城镇，开辟了襄北根据地。

监利城内驻有敌新三师李云龙旅的两个正规团和一个保安团；城东的朱河镇还有一个正规团，共三千多人。敌人在城东西北三面筑有密集的纵深壕堑，布置了多重铁丝网，南面则是水深流急、波涛翻滚的长江，因此李云龙自恃监利城固若金汤，声言不怕红军进攻。

段德昌和贺龙、周逸群等调查了监利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前委便决定由段德昌率领红六军担任主攻，红二军担任攻城的第二梯队，并阻击朱河来援之敌。段德昌接受任务后，命令彭国才带领一批侦察人员，化装进入城内，与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党员杨嘉瑞作为内应；同时派刘革非组织监利、华容两县的游击队、赤色教导军等前来助战。准备就绪后，段德昌命令一部兵力先在城西佯攻，李云龙闻得枪声仓皇将城内守军主力调往城西，并下令城内炮火向四面八方可疑的目标轰击。段德昌见时机已到，命令全军炮兵集中轰击城墙和敌炮阵地，并将预先准备好的三百头角下扎有尖刀的“火牛”驱入敌群，很快冲乱了敌人的阵脚，红军战士跟在“火牛”后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此时，长江两岸华容县和监利县的几万名游击队、赤色教导军、赤卫军、暴动队和农协会员、少先队员已经赶到，监利城外枪炮轰鸣，喊声震天。李云龙摸不清到底有多少红军攻城，吓得六神无主，正在督饬守城敌军拚死顽抗之际，彭国才带领侦察队员和我地下党员杨嘉瑞掌握的两连兵士，在敌军营房和司令部内放起了大火。城内守敌立时大乱，纷纷抱头鼠窜，各自逃命，红军遂乘胜攻克监

利县城。此役全歼敌新三师教导团、保安团和从朱河来援的一个正规团共三千余人，缴获步枪、短枪三千几百支，重机枪十二挺，迫击炮八门，布匹九船及一个金库^①，是红二军团成立后的一个大胜仗。

监利攻克后，军团主力迅速扫除了龙湾、熊口等敌军据点，解放了潜江县城，并乘胜攻占天门重镇岳口。红六军十七师亦先后攻下新沟嘴、府场、杨林尾等地，消灭了大批敌军。

红二军团的主力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已经达到三万五千多人^②。荆江两岸、襄河两岸的苏区连成了一片，监利，沔阳、石首、华容、江陵、潜江、公安七个县城均已为红军占领，苏区范围西至沙市近郊，北至天门、汉川，东至洪湖、岳阳，南至南县、安乡，纵横数百里。洪湖根据地处于极盛时期^③。

(三)

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红二军团按照湖北省的指示，进攻沙市未克；接着又执行省行动委员会的命令向武汉进逼，使部队连连受挫。九月十二日，党中央派邓中夏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担任湘鄂西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九月二十日，红二军团前委扩大会议在洪湖苏区中心周老嘴召

①毛友爱：《东山星火》。湖北省党史调查团：《洪湖革命史资料》。

②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③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洪湖地区革命斗争情况简介》。

开，传达和讨论中央指示，决定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一、三军~~团~~攻长沙。二十二日，部队攻占监利，获悉红一、三军团已撤出对长沙的包围，向湘东转移。于是，二十四日，在监利县城召开原前委和原特委联席会议，接着召开湘鄂西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及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周逸群调离红军，任特委代理书记和联县政府主席，段德昌改任红六军军长^①，柳克明调任红六军政委。

在此期间，段德昌与贺龙、周逸群等同中央代表邓中夏是存在着分歧的。邓中夏要红二军团攻打长沙，段德昌与贺龙、周逸群等则力劝他慎重考虑。邓中夏虽曾对要红二军团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作法有过怀疑，但仍坚决执行了立三中央的“左”倾冒险方针，直到一、三军团退出长沙的消息传来，九月二十八日又收到中央停止待命的指示，他才同意将部队开回峰口休整。可是，几天之后，邓中夏又决定要二军团向长江边前进，准备渡江南下。按照这一决定，十月中旬，段德昌带领红六军、贺龙率领红二军，分别由监利、石首渡江南征。

红二、六军渡江后，连占南县、华容二城，接着乘胜攻占了公安县城和藕池、官塘等镇，使江南苏区连成一片。新区未及巩固，邓中夏命令继续南攻津市、澧县等地。打下津市后，红军主力直逼澧县城下。澧县驻有敌人的重兵，且有坚固城防，红军云集城外，强攻三天三夜，指战员们虽奋勇冲杀，前

^①邓中夏给长江局并中央的报告（1930年10月6日），存湖南省档案馆。

仆后继，伤亡很大，但仍不得克^①。而何键派出的李觉部两个师和其他几个师的增援敌军逼近，前委才放弃对澧县城的围攻，并撤出津市。接着，段德昌指挥红六军奉命转进，攻占了石门，临澧等地。

这时，蒋、冯、阎大战结束，敌军从四面八方云集江南，准备围攻红军的各个根据地。进驻常德一线的湘敌李觉率领的两个师，企图“围剿”我湘鄂西红军。根据以上情况，贺龙、段德昌将红二军团撤至河口。在前委会议上，段德昌提出将部队撤回洪湖，以恢复和巩固洪湖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围剿”。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但邓中夏以前委书记和军团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仍坚持要攻打津市、澧州（澧县城），并夺取常德。

当红二军团又一次进攻津市、澧县县城的时候，敌李觉两个师来援，其他敌军也大批向津、澧一带汇集，准备与我决战；红二军团只好撤退，红二军退至公安县城，红六军退至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

这期间，湘鄂西特委周逸群、刘革非等，鉴于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我洪湖根据地周围集结，准备进行“围剿”的严重形势，曾多次写信给红二军团，要求部队返回洪湖，保卫根据地。段德昌和贺龙极力支持特委意见。但邓中夏却以洪湖地区河流港叉纵横交错，“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等为由，主张放弃洪湖根据地而向山区发展，甚至错误地提出“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的口号。贺龙、段德昌严正表示不能并提“中央”二字，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4月）。

不能把湘鄂西苏区与中央苏区并列起来^①。段德昌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陈述不能放弃洪湖根据地的理由，并特别针对中央代表提出的打无条件的阵地战的错误做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指出，当何键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步步逼近我军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把比敌人弱小好几倍的红军分散在一条一百多里长的战线上。他说，把二、六两军的战线拉得过长，全面出击，是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红军处于在北面受鄂军，在南面受湘军的两面夹击之中。可是，中央代表不仅不听取段德昌的正确意见，反而免去了他的红六军军长职务，调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任命从苏联留学回来、并无实战经验的汤慕禹接任红六军军长^②。段德昌对贺龙说：“胡子，这不是撤我的职吗？红军在这样危险的关头，我怎么能忍心离开呢！？”他又对政委周容光说：“二、六两军战线拉得过长，这是战略上的致命错误。敌人南北一夹击，我军腹背受敌，只有等着挨打！”^③此时此刻，段德昌关心的，仍然是红军部队的存亡。

果然，十二月十七日，敌以优势兵力向杨林市发起猛攻。当时，我二军尚在公安；六军仓促应战，由于防线过长，兵力分散，无法击退从沙市南来的敌湖北省保安师；而湘军李觉所部又从津市方面向北攻来。十八日，经过一天激战，三万多人的红军被打得只剩下一万多人，由贺龙带领向西突围到刘家场，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开到鹤峰的走马坪进行休

①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斗争》。

②刘淑云：《回忆段德昌》（1977年8月）。谷志标的回忆（1977年11月16日于成都文庙前街）。

③刘淑云：《回忆段德昌》（1977年8月）。

整^①。翌年三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并于四月离开鹤峰北上，占巴东，渡长江，连克兴山、秭归、远安、荆门；五月间又突破敌十余个团的围攻，进入房县，开辟鄂西北根据地^②。

在贺龙带领红二军团主力突围西进的同时，段德昌把在战斗中失散的战士集中拢来，组成了一个营，又打回洪湖。他通过石首县委书记屈阳春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取得联系，同周逸群一道，把在杨林市战斗中被冲散、先后又回到洪湖苏区的红军集中起来，其中有“六军四十八、五十一两团之各一部及二军之十二团，合计枪一千左右”^③，整编为红军独立团，由段德昌负责指挥。一九三〇年冬，湘鄂西特委将段德昌率领的独立团，加上洪湖地区卢冬生、王炳南的两支游击队，合并编成新六军，段德昌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这支部队成为洪湖苏区反“围剿”的主力军。

自红二军团退出洪湖根据地后，敌人先后占领了监利、沔阳、潜江、华容等县，实行血腥屠杀，并继续进行“围剿”，使根据地受到极大摧残。湘鄂西特委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根据地，除成立和加强新六军外，还将各县赤色警卫队和赤色教导军等群众武装合编为江左（江北）和江右（江南）两个指挥部，分别由董朗和林仲丹负责，归周逸群和段德昌统一指挥。段德昌与周逸群、段玉林等，运用机动灵活的战

①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毛友爱等十二老红军：《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4月）。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61页。《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③《湘鄂西特委来信（一）》（1931年3月7日）。

略战术，领导苏区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先后攻克沔阳、华容两城，并进逼仙桃、南县^①。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段德昌率领红军战士佯攻华容高基庙，诱敌来援。待敌人援军赶到高基庙时，段德昌带着部队已经奔向鲢鱼须，突袭敌十一师的一个营，全歼敌军，缴获一批武器弹药^②。随后，段德昌率领部队北渡长江，一路打回洪湖，到监利朱河时，子弹已经打光。部队继续前进，在陶家渡与国民党保安团一千多人相遇。两军狭路相逢，转移和回避已经来不及了。段德昌当机立断，领着这支近于赤手空拳的部队和几千群众，埋伏在大路两旁的田地里。待敌人进入包围圈时，段德昌一声令下，指战员一齐冲入敌阵进行肉搏。敌人措手不及，纷纷逃窜和投降。段德昌把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七百多支新枪和两挺重机枪以及大批弹药，装备了自己的部队^③。

不久，段德昌率领新六军在黎家铺与川军一个团进行激战。战斗中，我机枪手牺牲，敌人蜂涌而上。段德昌接过机枪向敌群扫射，打得枪管都发红了。敌人依仗人多，仍不断猛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名叫李文举的战士跑到前面来，抢过军长的机枪，将枪托在身上，站着对敌人进行暴风骤雨般的猛烈扫射，终于把猖狂的敌人压了下去。段德昌指挥部队乘胜反攻，击溃了敌人。战后，在总结评功会上，段德昌在全军战士面前表扬了李文举，并提升李文举为营长^④。这时，段德昌获知敌人进攻特委及苏维埃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石首，并且已经突破了石首北区的冯家潭子、小河口一线。他立即率

①《湘鄂西特委来信（一）》（1931年3月7日）。

②刘淑云：《回忆段德昌》（1977年）。

①②毛友爱等：《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

领新六军急赴石首，歼灭了进犯之敌，收复了石首北区。一九三一年二月，新六军南下再攻川军，第三次收复了华容县城^①。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湘鄂西特委在调弦口召开会议，决定段德昌率主力渡江，乘敌人集中兵力于江南之机，反击监、沔之敌，恢复江北苏区。段德昌执行会议决定，率领新六军先后攻克了湘鄂西省级机关驻地瞿家湾、柳家集及府场等地，两次攻克峰口，击溃敌新三旅一个团，接着又歼灭敌人一个营；四次攻克朱河，歼灭敌人新二旅的第二团。至三月底，洪湖根据地大部分都已恢复，基本上扭转了困难局面。

四月初，经过短期整训的新六军，乘敌军大部分调往他处参加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段德昌的率领下，攻克了监利的车湾，于四月五日又一次迅速地占领峰口。部队休整了十来天，沿江陵方向发展，四月十八日在老新口一带歼敌新三旅第二团两个营，旋又在新沟嘴歼敌一个营，诱使敌新三旅余下的第一、第三两个团反扑，在监利余家埠设下埋伏将其全部歼灭，只剩下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往武汉。这次行动历时一周，歼敌近一个旅，缴获长短枪二千余支，机枪多挺，迫击炮数门。段德昌又率部队乘胜收复了龙湾、熊口等地。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被迫结束了对洪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当时武汉的国民党报纸也惊叹：“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力，一再败北……神州自此无宁日矣”^①。

①《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刘淑云：《回忆段德昌》（1977年）。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红军：《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

一九三一年五月，蒋桂军阀混战开始。徐源泉部相继撤离鄂西，岳维峻部兵变，敌人对苏区的“围剿”开始放松。段德昌率领由新六军改编成的红九师，又乘机向江陵之敌发动进攻，赢得胜利。这期间，周逸群在返回江北途中遭敌伏击，英勇牺牲。六月初，我军在三官殿、沙岗，以及普齐观、郝穴、汪家桥等地连获大胜，歼灭敌军两千几百人，缴枪一千几百支。至此，洪湖根据地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了。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段德昌领导的红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拥有两个主力战斗团（二十五团和二十六团）、五千多人枪的铁军①。

（四）

一九三一年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又派夏曦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苏区，于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军委分会，夏曦任分局书记及军委分会主席。六月中旬，夏曦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和省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团。

夏曦到洪湖后，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否定湘鄂西党和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成绩。他指责湘鄂西特委执行了所谓“富农路线”，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要把湘鄂西党、红军和苏维埃的工作转变到所谓“国际路线”上来，并执行中央的错误指示，取消了红二军团，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

治委员)，将新六军缩编为红九师（段德昌任师长，陈培荫任政委。他还认为湘鄂西党组织是不纯的，要自下而上地在“党内发动一改造党的运动”，“彻底改造党、红军和苏维埃”；“改组派在苏区颇活跃”，要加紧“肃反”等等。但由于当时反“围剿”斗争紧张，加上大水灾后带来的许多工作急待进行，他的这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一时还无法全面贯彻执行，因而仍能取得上述三至六月间的一连串胜利。

一九三一年秋，敌人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红三军主力七、八师远在鄂西北的均县、房县苏区，保卫洪湖苏区的重任主要落在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肩上。敌我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国民党反动派又借长江、汉水、东荆河涨大水的时机决堤灌水，妄图水淹苏区，并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并解决因水灾造成的部队给养上的困难，八月二日，湘鄂西军委分会决定段德昌等率九师北上，开辟天门、潜江苏区，并跨过襄河向北发展，迎接红三军七、八师南返洪湖。夏曦亲自找段德昌等谈话，交代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分会又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指出：“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的扩大苏区的原则下，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因此决定以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发展。二十六团的具体任务是：一，最主要的任务首先须以极大决心给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围剿’我们之一方。二，发展天门、潜江游击战争……并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一片。三，尽可能的占领天门，巩固这一线。四，保证……随时可以回到苏区。五，保持与后方之一定的交通线，以便输送和取得政治消息与指示”。关于迎接红三军的问题，分局和

军委分会的决议则改为：“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然而，这些正式决议形成之后，段德昌早已带队出征了。

段德昌根据夏曦口头通知的军委分会的决定，将二十五团留在苏区，并建议省委抽调部队干部帮助群众抗灾抢险，解决苏区物资供应等问题；再三教育留守后方的指战员，要关心群众，多为群众着想，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生产自救。他还和二十五团团长段玉林一起，巡视了他与战士们在炎炎烈日之下修筑起来的“红军大堤”。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与万涛一起，率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挺进。八月十三日，他们歼灭了同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又乘机攻克沙洋，全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所属的第二团，共二千余人，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击毙敌旅长徐德佐。沙洋战斗后，段德昌以缴获的武器装备新组建了红九师的二十七团。这时，留在苏区守卫的二十五团，为了掩护主力行动，从江南桃花山战场赶来参战，一天之内连克直洛河、莲花寺，进逼潜江县城。八月十五日，二十五团又在杨家场歼敌新三旅一个营，潜江守敌弃城向北逃遁。十八日，红九师三个团占领潜江县城。二十四日，敌新三旅残部汇合敌三十四师一部向我反扑，被段德昌诱敌深入于潜江城下伏击，一部被歼，余下的纷纷溃逃^②。

九师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使监、沔、江、汉（川）苏区得以巩固并联成一片，潜江的红色政权也得到恢复，并占领了天门的一部分地区。然而，江南苏区则

^①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4月）。

由于夏曦不断抽空地方武装，限制地方武装的发展，在敌人大军“围剿”之下，华容根据地失陷，朱祖光领导的江南游击大队经过激战之后也退入到江北洪湖，江南苏区因而沦于敌人手中。

攻克潜江之后，段德昌即率领九师沿襄河北上，迎接红三军返回洪湖。这时，红三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又得悉九师沿襄河前来接应，便将各级政治机关人员及教导团留在鄂西北坚持斗争，主力于九月中旬自青锋镇出发向九师靠拢，在保康附近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后，经南漳、荆门向洪湖转移。段德昌率领的红九师得知以上情况，乃复渡襄河，九月二十八日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七、八两师共三个团在荆门刘猴集胜利会师。会师后，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分局的指示，以万涛接替邓中夏为红三军政治委员，并决定部队仍按原计划打回洪湖。随后，贺龙带七师、八师三个团攻岳口，段德昌带红九师三个团攻张金港。十月五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一举全歼张金港之敌，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十月八日，七、八、九师胜利返回洪湖，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形势不断好转。

两个多月来，段德昌率领部队不断打击敌人，胜利地完成了发展襄北苏区，迎接红三军返回洪湖两大任务。但夏曦不顾段德昌在战斗中立下的卓著功绩，按照军委分会在红九师出发以后作出的决议，无理指责段德昌“违抗分局命令”，是“反国际路线”；并认为九师去襄北接七、八师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是“冒险轻进”的“立三主义残余”等等；还把明明是夏曦自己导致江南苏区沦陷的责任，推到段德昌和万涛身上；又说贺龙回洪湖是不要鄂西北的后方，是不要群众的立三主义。据此，夏曦撤销了万涛红三军政委的职务，由他本

人兼任，并错误地给段德昌以行政警告处分^①。接着，又以临时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红三军编为五个大团，由他为首的军委分会直接指挥，“实际上剥夺了贺龙对红三军的领导权”^②。

段德昌对此十分愤慨。他曾当面责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你可以调动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共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红九师回去吗？你谈话在前，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以后发生的问题又怎能怪我们？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又怎么开展游击战争？”^③问得夏曦无言以对。

夏曦在军事、政治、组织、干部路线、党和根据地的建设等方面推行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不得人心的。贺龙、万涛、段德昌和党内军内的一大批党员、干部都挺身而出，与夏曦的错误进行斗争。在湘鄂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夏曦曾受到同志们的尖锐批评，对他“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是不适宜的”，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低”^④。为了解决湘鄂西党和红军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先后派出宋盘

①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等：《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革命斗争》。

②*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第81页。
参见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许光达、王震、王尚荣：《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二第287页。

③转引自贺龙：《回忆红方二面军》。

④《湘鄂西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议代表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中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1931年12月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铭和尉士钧前往中央请示^①。

这时，敌人加紧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向我苏区发起新的进攻。敌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进占张金港、潜江等地；荆江方面的川军郭勋等部也积极配合进犯苏区，给我根据地带来很大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红三军决定首先打击川军，然后对付湘北之敌。十一月上旬，段德昌率领红军一部在荆门厚港石灰桥歼灭了川军郭勋部两个营五百余人，缴枪四百多支，击退了川军的进攻。随后，贺龙率领红军一部折入襄北地区，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攻下天门皂市，歼灭敌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的副官长兼特务团长曹振武的一个整团及武汉保安团的两个营，击毙其副团长以下官兵八百多，缴获敌手提式机关枪三十余挺，花机关枪五十余挺，步枪四百多支，从而稳定了根据地的形势^②。

不久，宋盘铭自中央回来，带来中央指示，肯定了红九师接应红三军的业绩，也肯定了红三军南下的路线，不同意夏曦取消军部和师部的决定，并指示把红三军整编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十二月，红三军军、师两级领导机关恢复，段德昌仍任九师师长^③。

但是，王明“左”倾错误控制下的党中央在总的方面仍是支持夏曦的，说夏曦自从到湘鄂西分局以来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执行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政治路线，并错误地说，在苏区

①谷志标的回忆（1977年11月16日）。

②张明才：《碧水苍山》，解放军文艺社1980年版第101—107页。《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

③参见《许光达》，《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阶级斗争更加紧张的情况下，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国际和中央；要湘鄂西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予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中央指示还说，由于全国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全国阶级斗争的新发展，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再强调要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向武汉进军”、与“鄂豫皖打成一片”等等。这样，湘鄂西党和红军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助长了夏曦的“左”倾错误，并为他推行的宗派斗争和打击报复打开了大门^①。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同时几次给湘鄂西党组织发出了类似内容的指示，从而使得夏曦在湘鄂西地区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更有所依据。在这样的形势下，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会前，党内军内已出现了尖锐的思想对立。夏曦在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等各方面推行“左”的一套，受到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许多领导人的抵制，贺龙、段德昌、万涛等多数同志，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纠正夏曦的错误。而以夏曦为首的一些人，则想通过这次会议彻底排除上述障碍，以全面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大会开始以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会的大部分代表批评了夏曦的错误，特别是段德昌、万涛、彭之玉、潘家

^①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

宸、彭国才、段玉林、庄东晓等的发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段德昌还和许多代表一起签名，反对夏曦的报告，贺龙也不同意夏曦的报告。段德昌在会上严肃地指出，由于夏曦的错误，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夏曦对代表们的批评虽然反感，但他看到以段德昌、万涛为代表的意见已经在会上占了绝对优势，便在表面上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省委派到中央去请示的尉士钧和中央派出的代表关向应一起到了周老嘴。于是，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①。关向应按照中央指示的观点，把段德昌、万涛等对于夏曦错误的批评和抵制，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随后，大会压制正确意见，通过了夏曦所作的政治结论和他起草的政治决议案，把同夏曦的错误进行过斗争的同志说成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怀疑党的正确领导的反党分子”，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公开指责和攻击为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的段德昌、万涛和贺龙等同志，“完全接受党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及其他一系列错误决议的观点，提出以最大努力与鄂豫皖根据地打成一片和会师武汉的方针，并确定以进攻的战略，粉碎敌人的进攻，从而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红军得到全面贯彻”^②，使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大好革命形势，从此便一步步地恶化起来。

①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②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1983年12月版第116页。

(五)

段德昌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后虽然受到了夏曦等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处分，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任劳任怨地继续率领部队英勇战斗在最前线。

一九三二年一月，红三军乘敌人主力集结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对付鄂豫皖红军之机，向襄河以北之敌发起攻势作战。十九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冒雨由泗港北渡襄河，二十日袭占皂市，二十一日分别包围了龙王集、陈家河之敌第十军特务团。敌以四十八师工兵营由应城西援，被我大部歼灭于龙王集附近。龙王集之敌两个营向田店突围，也被我大部歼灭于途中，陈家河之敌一个营，在我政治争取下投降。为了诱使敌人大军前来，以便在运动中歼击，段德昌命令红军一部佯攻应城。攻城红军用云梯爬城，用坑道爆破炸城，吓得应城守敌连连告急，敌武汉绥靖公署何成濬遂派他的王牌军第四师第十二混成旅部率两个团自孝感驰援。二十五日，段德昌将红九师两个团和地方武装汉川独立团埋伏在龙王集到应城的公路两侧。当援敌全部进入包围圈以后，段德昌把红旗一竖，满山遍野的红军好似神兵天降，以各种轻重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大部队被四面困住无法展开，重武器也来不及卸载，登时乱作一团，纷纷倒毙在红军的枪下。这时，红九师的八百多名英勇骑兵又从应城方向杀来，步骑配合，把敌人彻底打垮，活捉敌旅长张联华。以上各次战斗，共歼敌四千人，缴获步枪三千多支，轻

重机枪一百余挺，大小迫击炮二十余门，军装一万套^①。

龙王集大捷后不久，一九三二年二月底，我又探明敌第十军徐源泉部四十八师之一四四旅由皂市出发南下，妄图打通天门至岳口之间的公路线，并切断我襄北苏区和洪湖苏区的联系。三月五日，敌一四四旅在旅长韩昌俊带领下南犯，因暴雨被阻于文家墩休息待命。这天，在贺龙统一指挥下，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已运动至距文家墩八里的花台，并于深夜冒着滂沱大雨，秘密逼近文家墩，向敌发起突然猛攻。蒙头昏睡的敌人仓促应战，一开始就被分割成许多小块，还击无力，突围无门，纷纷倒在红军的火网和刺刀之下。第二天早晨，皂市的敌人来援，又被红七师和红九师的预伏部队击溃。这一仗，红三军全歼敌精锐之师一四四旅，活捉旅长韩昌俊，打伤敌四十八师师长张振汉，并逼退进占泗港、张载港之敌，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

不久，敌第十军军长兼鄂中区司令官徐源泉调整部署，以三个师另两个旅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大举进攻洪湖苏区，企图阻止红三军东进。面对强敌，夏曦不顾主客观条件，要红三军继续采取“进攻战略”，把游击战、运动战“转变到大规模的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在他的命令下，红三军强攻京山未克，又接连在瓦庙集、张家场与敌人打阵地战。这些战斗虽都杀伤了敌人，但也使自己遭到

①参见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樊哲祥、杨嘉瑞：《到处是红旗》，《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306页—311页；《许光达》，《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第278页；《贺龙》，《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

了很大伤亡。

六月初，敌乘我后方空虚，进犯我根据地中心区域，敌二十一军的五个团从北面占领了浩子口和潜江一线；范绍增的第四师从沙市扑到老新口、龙湾、张金河一带；二十一军独立师的四个团则从南面占领了陈陀子口和余家埠；几路敌军，直逼湘鄂西省委及中央分局所在地周老嘴。我湘鄂西警卫师在谷港石灰桥阻敌范绍增师不支败退，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只剩下由熊同寿率领的省军委警卫团，再加上钱瑛率领的潜江县游击队，形势万分紧急。夏曦惊慌失措，火急通知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师救援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

段德昌接到通知，立即决定全师回返。他把八百名骑兵和部队所有能利用的马匹都集中起来作前锋，由他亲自率领，日夜兼程，以一天一晚跑二百多里路的速度，抢在敌范绍增之前赶到新沟嘴；跳下战马，又组织骑兵赶修工事，直到工事修好，三个团的步兵也都赶到，他才下令休息、开饭。几天来，段德昌与战士们一起奔驰，眼角已经挂满血丝。如今，战士们都休息了，他仍然精神抖擞地到每个连队检查工事筑构和障碍物的设置，询问和检查战前准备的情况，听取侦察人员和老乡的汇报。由于连续频繁作战，部队弹药极缺，他命令各战斗部队向当地赤卫队和群众借梭镖和大刀，准备在子弹打光时同敌人肉搏。

第二天天刚亮，范绍增的第四师开始向新沟嘴进犯。走在最前面的是“袍哥”帮会的所谓“神兵”，每人身穿红褂子，手里拿着马刀；接着就是前卫的一个团，趾高气扬地向我九师阵地冲来。红九师指战员遵照段德昌“无令不放枪，坚守不后退”的命令，隐蔽在工事里观察着敌人的动向。敌人进到距我

阵地五十米时，仍不见我军动静，以为前面没有红军，就放心大胆地冲了过来。此时，段德昌一声令下，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猛扫。敌人受不了红军突如其来的猛烈火力，除击毙的以外，全部伏在地上，伺机逃跑。段德昌又发出信号，预伏在东荆河堤右面的骑兵营从右翼河滩上飞驰出击，吓得敌军心惊胆战掉头就跑。段德昌命令两个营穷追溃敌，一直追了二十多里，狂奔的敌人又被我迂回包抄的骑兵截断退路，敌前卫一个团全部被歼，缴步枪七百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毙俘敌一千多人。范绍增领着剩余的敌军慌忙龟缩到老新口的工事里，不敢出来。当天晚上，段德昌命令全师每个战士带一支枪、一把马刀和一支梭镖，乘夜摸到老新口敌军阵地，在敌人中心穿插分割，猛攻猛打。经过短时间的拚刺，全歼范绍增师部及一个旅，总计歼敌五千多人，缴枪四千多支。范绍增带着剩下的三十几个残兵向张金河逃窜，路上又被自襄北南返的红七师先头部队痛击，残部被歼，范本人负伤，丢下他心爱的坐骑“龙驹马”，在漆黑的夜晚骑着水牛逃脱。后来，段德昌把缴获的这匹“龙驹马”送给贺龙了^①。

新沟嘴大战刚结束，贺龙带着红七师赶回周老嘴。在湘鄂西省委和政府组织庆祝新沟嘴大捷的庆功大会上，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呀！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给了范哈儿（范绍增的外号）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呀！连范哈儿的魂都吓

^①周长庚：《新沟嘴之仗》，《星火燎原》选编之二第312—316页。
张树芝：《河堤上的闪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关于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

掉了，这是红军的伟大胜利。湘鄂西省的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大敌逼近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呀！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会后，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慰问红九师指战员，反映了洪湖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深情^①。

夏曦无视他执行王明的“进攻战略”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的危机，反而把龙王集和文家墩等地取得的胜利，当作他“执行国际路线”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因此，新沟嘴战后，他又命令红三军进逼应城、皂市，并围困京山，使红军和根据地的形势步步被动。加上从五月起，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来信指示在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中开展的“肃反”运动，诬害了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使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②。

蒋介石为了“消灭”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还在五月间就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纠集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担任“围剿”洪湖根据地的是左路军，共十余万人，以国民党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兼任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

七月中旬，徐源泉开始执行以“逐步清剿”为方针的“左路军第一期剿匪计划”，企图首先围歼襄河北岸我军，尔后转入南岸作战，将我主力消灭或压迫于长江、襄河之间。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不顾敌情的新变化，仍然执行中央六月五日发出的“在襄北发展”，“造成鄂中一片根据地，与鄂豫皖根据地

^①彭松林：《关于段德昌的回忆》（1977年12月）。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117页。刘晴波、雷子：《夏曦》，《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第236页。

打成一片”的指示，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奉命再次围攻京山的红三军在敌人的重兵压迫下撤围，在襄北找不到歼敌机会，又南渡襄河返回熊口、莲花寺一带，使襄河以北的红色区域为敌控制。

八月十八日，徐源泉以“肃清南岸，铲除匪巢”为目的，开始执行“第二期进剿计划”，以三个师另三个旅、一个团为左翼军，由岳口渡襄河，进攻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两个师为左翼军总预备队，留襄北“清剿”；以第二十一军为右翼军，在东荆河两岸担任堵截；并以湘军第十九师置华容、海军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南渡^①。二十日，敌左翼军已经渡过襄河，控制了白庙以西的整个东荆河北岸地区；配合“进剿”的鄂军一部分也已侵入汉川、汉阳及其西南地区，湘鄂西根据地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空前严重的形势，段德昌和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认为，在内线击破敌人的进攻已不可能，坚决主张集中十个团的主力转到外线去，威胁敌人兵力空虚的武汉，迫使敌军后撤；然后在敌人撤退时，于运动中捕捉并创造有利战机，寻歼敌军的有生力量，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挽救洪湖根据地。但是，这些意见都被中央分局拒绝了。夏曦等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坚持“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决定平分兵力为两路：一路为红七师、警卫师和地方武装，由夏曦指挥，在现地构筑碉堡，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一路为红八师、红九师的五个团，由贺龙、关向应（时任红三军政治委员）、

^①参见《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118页。

段德昌等指挥，深入敌后，向襄北出击，以牵制敌人。“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方法，加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我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最后一线希望。”^①结果，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八、九师刚过襄水，敌人就象潮水一样冲进了洪湖腹地，留在根据地的部队遭到空前惨败，整个洪湖苏区被敌军蹂躏，后方机关遭敌破坏，红军伤病员二三千人落入敌手，所有医院、兵工厂全被焚毁，夏曦带着剩余下的部队于九月上旬转入江陵的张金河地区。十月，敌几路兵马进攻张金河，夏曦又率部向西北突围，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

然而，就是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仍然没有放松所谓的“肃反”，而且越来越扩大化。自五月以来，先后错杀了大批忠诚的党、团员，干部和战士^②，其中重要的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万涛、段玉林、周小康、陈培荫、刘鸣先、刘革非、戴补天、王鹤、柳克明（柳直荀）、傅光夏、李良跃、彭国才、刘岳云、潘家宸（潘克鲁）、张昆弟、胡慎己、许旭、蔡玉昆、李剑如、周容光、喻文彬、谭秋吟、韩奉山等。他们都是跟随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一起创建洪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党的精华。这些卓越领导人的相继被害，也是湘鄂西根据地反围攻失败的重要原因。

红三军主力第八、九两师渡过襄河以前，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在贺龙领导下，段德昌以惊人的胆识和谋略，命令所部隐伏在敌人眼皮底下，并决定从敌人大军的间隙中穿插过去，以避

①许光达、王震、王尚荣：《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二第290页。

②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毛友爱等十二位老红军，《关于洪湖根据地的回忆录》（1977年4月）。

开强敌。他极其精细地根据侦察的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北上襄北，打入敌后的其它路线虽然都被堵死，然而尚有一条出路，这就是：从西面的浩子口穿插出去，直抵荆门，然后走钟祥、荆山，转向大洪山一带。浩子口地势险要，西面有一个湖叫长湖，在浩子口和长湖之间有一条幽静曲折的小路。段德昌等认为，必须机智地通过这条路，才能化险为夷。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雨夜，红军踏着这条小路出发了。骑兵的两千匹马，四蹄全用棉花和稻草缠得结结实实，走起来听不到声响；战士们在行军中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打电筒。就这样“偃旗息鼓”，悄悄急进，终于穿过敌人重兵驻防几十里的心脏地带，脱离了险境。接着，又以一昼夜行程一百八十里的速度，从沈家集和当阳之间直插荆门，奔向钟祥、随县之间的大洪山区，创造了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事后敌人知道红军此举，也震惊不已。

(六)

红三军从洪湖苏区突围到大洪山区后，红七师余部和夏曦也突围到随县一带往返游击。与主力会合后，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在枣阳王店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决定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转往湘鄂边。由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以来夜以继日的行军作战，体力、弹药消耗甚大，部队党组织极不健全；尤其是“肃反”中错杀了许多军政干部，部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因此不得不避开襄河两岸的敌军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和川东，向湘鄂边转移。

十一月初，红三军自随县北部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南，向

西移动。因沿途不断与敌军作战，部队伤亡很大，八师师长覃苏等光荣牺牲。十一月下旬，部队在陕西东南武关等地打退敌人的追击，经旬阳、安康，翻大巴山，进入川东，然后沿川鄂边南下，越巫山，渡长江，攻克巴东，于十二月下旬到达湘鄂边。

在这次七千里行程的大转移中，由于红七师和红八师损失太大，战斗的重担往往压在九师肩上。有时敌人从前面打来，段德昌就率领红九师冲向前去消灭敌人；有时敌人从后面追来，他又领着红九师转至全军后尾，打退敌人；对保证全军的安全行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卢冬生率领的红军独立师在鹤峰走马坪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后，中央分局在走马坪召开会议，研究今后行动方针，决定把部队改编成七、九两师和教导团，段德昌任九师师长，宋盘铭任政委。接着，红三军军部及中央分局进驻建始县的官口店，后转至巴东县的金果坪地区。三月二十四日，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开会，检查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没有检查自己对丢失洪湖根据地所应负的责任，反而错误地认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由于杀“改组派”杀得不彻底，今后要在党内、军内、政府内，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肃反”。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解散湘鄂西的共产党，取消红军中的全部党组织，开展所谓的对湘鄂西苏维埃的“罪恶”的群众性的控诉运动^①。段德昌在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夏曦的错误。他认为洪湖根据地的失陷，主

^① 《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昆明军区政治部：《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大事记》（1958年）。

要是夏曦所搞的错误的“肃反”和他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的。因此，他坚决反对夏曦继续搞“肃反”，坚决反对取消湘鄂西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错误的开展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罪恶”的控诉运动。他愤怒地说：“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①贺龙、宋盘铭、王炳南等也坚决支持段德昌的意见，否定夏曦提出的取消党的错误主张。段德昌鉴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当前的处境又极其困难，提出了打回洪湖去，利用洪湖地区群众基础甚好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建议。他曾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四十条短枪，批准我打回洪湖。三年之内，如果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头割下来见军部。”^②

但是，夏曦却坚持自己的错误，在继续进行不断扩大化的“肃反”的同时，又主持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他还指责段德昌“打回洪湖”的建议，是“分裂红军”，“要带九师跑”^③。段德昌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曾抄写于谦的《石灰吟》贴在石洞里，以抒发其革命意志和情怀。

一九三三年初夏的一天，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在川、湘、鄂边界完成了歼灭敌军、保证军部安全的任务后转回巴东金果坪，竟遭夏曦逮捕。

①转引自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长征前的贺龙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彭松林：《回忆段德昌》（1977年12月）。

③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段德昌被捕以后，全军都焦急不安的关注着他的安全，贺龙等坚决反对杀害段德昌。可是夏曦却说：“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①。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段德昌被错当成“改组派”遭杀害，时年二十九岁。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曾对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同志们听后都非常难过，非常感动。一九五二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鹤峰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段德昌烈士镌刻了碑文，认为段德昌烈士“生平为革命事业竭尽忠诚，茹苦含辛，效劳祖国。他虽身死，但革命精神却深深的印在每个人民的心中”。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给予段德昌烈士以崇高的评价。不少老前辈都撰文盛赞段德昌烈士“一生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②。

①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②何长工的关于段德昌烈士的题词（1981年1月20日）。

沈泽民

武英林 李良明

(一)

沈泽民，学名德济，笔名成则人、风、罗美、李清扬，浙江桐乡县人，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农历五月二十七）出生在这个县的乌镇。祖父沈砚耕，教过私塾；父亲沈永锡（字伯藩），是个秀才，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临终遗言，期望儿子雁冰（学名德鸿）、泽民能成为振兴实业的理工人才，“不要误解自由、平等”，“要以天下为己任”^①。母亲陈爱珠，也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通晓文史，经常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讲康、梁、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故事，教他们背诵“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陈爱珠曾积极赞助过上海党（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全力支持泽民兄弟从事革命工作。

沈泽民五岁时，母亲和哥哥就教他读《字课图识》、《中国历史》、《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书籍。良好的家庭教育，养成了他勤奋好学的习惯。十二岁时，他便考进省立三

^①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51页。

中。据茅盾回忆：“在中学阶段，沈泽民的数学、物理、化学，在全校算是最好的。”^①

一九一六年夏，沈泽民从第三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是为专门培养土木工程技术人才于一九一五年春创建的。在他入学前，母亲特地把她在上海买的《西洋通史》、《西史纪要》、《东洋史要》和《清史讲义》送给他。并对他说：“你将来要做工程师的，但也不能不懂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②

沈泽民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异常勤奋。他既精心攻读专业课程，又十分刻苦学习英语，使自己这两方面的知识提高很快。一九一八年，他与哥哥雁冰合译了美国赛尔·彭特著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设谭》，在《学生杂志》上连载。同年暑假，他又用半个月的时间，译完了另一部科学小说——《理工学生在校记》。在这同时，沈泽民对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也潜心研读，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促使他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

(二)

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以后，沈泽民立即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他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发表演说，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革命刊

^{①②}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20、121页。

物和团体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沈泽民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负责分会出版的《少年世界》月刊中“工厂调查类”的编辑工作，并由他和张闻天担负整个刊物的校勘。经过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沈泽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是国家破败和人民贫困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越来越感觉实业救国之路在中国行不通。一九二〇年春，他给哥哥沈雁冰写信，说自己“思想变动很大”，觉得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课“枯燥乏味，听不进去了，想中途辍学”^①。五月末，他从南京回到上海，决定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寻求革命真理。

一九二〇年七月，在母亲的支持下，沈泽民与同学张闻天东渡日本，到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在掌握了日文之后，他开始学习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同时又积极翻译英文版的进步小说，撰写通俗的科学短文，寄上海《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刊用。在东京，他还结识了田汉等人。他们在一起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情况，学习和讨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共产国际的文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仿效苏俄，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于是，沈泽民等决定回国参加实际斗争。

(三)

一九二一年一月，沈泽民与张闻天同时由日回国抵达上海。四月，经沈雁冰介绍，沈泽民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

^①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73页。

组；又经恽代英介绍去安徽芜湖中学任化学教师。在芜湖，他与高语罕等进步教师组织芜湖学社，并编辑出版《芜湖半月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使芜湖成为当时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基地之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至四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沈泽民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会员中的思想分化日趋明显。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共产主义者坚持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思想行动一致的进步的政治团体。但这一主张却遭到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会议以后，这些不同意见继续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展开讨论，沈泽民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他主张学会必须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特别强调个人与团体的关系问题，认为“少年中国学会自身若有明确的主义，对于一切社会问题都有一定的见解，那么团体就可以指挥个人”^①。当时，他还翻译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一书，由我党设在上海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二一年底，沈泽民回上海，参与了由陈独秀、李达主持的筹建平民女校的工作，并担任英文教员。他注意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对高级班除教读课本外，还注意引导翻译；对初级班则只教单词和简单会话。据当时的学生回忆说：

“他教授方法既生动又联系实际，还经常把我们带出课堂走入社会，到公园、野外去，看着实际的东西边教边学。同学们容易懂，学得快，记得牢”^①。在此期间，他还经常和师生深入到工人区调查研究，为青年工人办夜学，教工人识字，并给他

^① 《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① 钱希均：《我所知道的平民女校》，载《红旗飘飘》第23集。

们讲革命道理。一九二二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他和张秋人组织学生到南京路一带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参加实际斗争。

这年五月，沈泽民去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从这以后到一九二三年团的“二大”期间，由他和施存统、俞秀松、张太雷主持团中央的日常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党调沈泽民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负责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他和谢远定（东南大学农科学生）等组成南京党小组^①，本着先建团后建党的精神，在学生、教师、工人、军人中发展团员三十余人。这时，他和谢远定、张秋人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发动学生开展爱国活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禁止米粮运往日本。为了团结各方面力量，沈泽民主张在街头宣传时，口号不要提的过高，行动上政治色彩不要太浓，要反复讲“大厦将倾，岂有完卵”的道理；讲“二十一条”是投降卖国的条约；但在学生中宣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用各种形式向学生介绍进步报刊和十月革命的情况。

一九二三年一月，沈泽民应浙江白马湖春晖学校丰子恺校长的邀请，访问了这所学校。他热情赞扬春晖学校师生与四周农民相结合的良好校风，并说：“春晖在这里仿佛是一个知识

^①1923年9月17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包括沪、江、浙、皖）执委第13次会议决定，沈泽民与谢远定组成南京党小组。10月11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第17次会议决定，南京、浦口编为两个党小组，直属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领导，南京为第6党小组。

的蓄水塔，和白马湖四周的农民一面交通感情，一面传达他们有用的知识……再扩而广之，全上虞、全宁波、绍兴、杭州的人民都犹如一家，这不是人群幸福之标志了么！这大事业，定可以从你们春晖学校起首了”^①。

这一时期，沈泽民对无产阶级的文艺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九二二年，他便开始注重对苏联文学的研究，和留心俄事的朋友们，常讨论在共产主义底下艺术如何发展的问题。为此，他翻译了《新俄艺术的趋势》，并在附言中说：“正如世上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一样，将来会有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即将来必有与资产阶级艺术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艺术。”

“现在正处于无产阶级统治下的俄国艺术，至少也可视为确是无产阶级艺术先驱罢！”他坚信，经过革命的发展与实践，无产阶级艺术的基本内容，“当然将来更有详细答案的”^②。他还在《新青年》、《中国青年》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无产阶级的文学观。他说，我们需要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丰收和炸弹这一类名词，并非如象《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和泪”。“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又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革命文学来。诗人若是一个单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我们无论怎样谈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总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自参

① 《泽民在春晖学校的演讲》，载1923年2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② 《新俄艺术的趋势》，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8期，1922年8月。

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不曾和满身泥巴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文学。”为此，他期望缺乏实际感的文学工作者，“不要空望徘徊，起来，为了民众的缘故，为了文艺的缘故，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①

我国无产阶级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使文艺界的旧势力惊恐万状。一九二一年，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出版《学衡杂志》，竭力反对文学进化，反对白话代替文言，反对言文合一，一味主张摹仿古人。到一九二四年，他们的活动达到高峰。“‘学衡派’反对新文学，提倡复古，是当时的时代思潮中的一股逆流。”^②面对这股逆流，沈泽民与鲁迅，沈雁冰等一起参加战斗，给学衡派以坚决打击。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了《文言白话之争根本问题及其美丑》一文，指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情感的工具，所以必须包括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二是容易普及，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三是最适宜表现出现代的思想 and 感情的。就这三点来看，文字就有用日常用语的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③沈雁冰回忆说，沈泽民的这篇文章，“简明而深刻地阐明了白话文代替文言，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④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党调沈泽民到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一九二四年初，他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这时，国共两党实

①泽民《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载《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

②④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第218、221页。

③见1923年2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现了第一次合作。沈泽民和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到各地发表演说，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讲孙中山的革命功勋和革命主张，介绍苏联的情况等。他还通过《觉悟》副刊，动员工人、学生、妇女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他结合青年思想实际，鼓励青年学生“投身于劳动界”，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实现“渐渐社会主义化，渐渐革命化”，“用血来染红将来世界的旗帜。”^①他号召工人阶级要与“全世界劳动群众、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为一”，共同反对帝国主义^②。

《觉悟》每周出一期《妇女评论》，刊登沈泽民和陈独秀、沈雁冰、向警予等人撰写的文章，主张把我国妇女运动同十月革命、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结合起来。沈泽民还经常在《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妇女运动的历史作用。他在《近来妇女运动的现势》一文中指出：“社会革命运动和妇女运动是分不开的两种现象”，“在殖民地国家里，民族运动是社会解放斗争的前驱”，“民族运动是跨到社会解放运动所必须的一步”，强调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发动妇女起来斗争^③。

这年夏天，沈泽民和张琴秋在上海康德里十四号结婚。张琴秋是沈雁冰夫人孔德沚的小学同学，一九二三年张琴秋在南

①沈泽民：《中国青年女子底烦闷》，载1925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沈泽民：《八小时运动》，载1925年5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③见《妇女杂志》第9卷第12期。

京美术学校读书时结识了沈泽民。从此。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紧紧相连在一起。婚后，张琴秋从事女工运动，日夜在女工中奔忙，十分辛苦和疲倦，但她十分乐观。她常说：“疲倦，疲倦，可是我也乐意，这样我的心才安。”她曾同朋友陈学昭谈自己在女工中生活的感受：“她们（指女工）的苦，是如我们的一天没有黄包车钱的着急的苦所能梦想得到么？！在这些时候，我开始满足，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吝惜我微小的力量了，我应当的是牺牲。”“在那里（指在工人中）见到了世界的全体，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精神。”^①

沈泽民非常关心自己的妻子，他常勉励张琴秋说：“我们要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学习革命烈士的牺牲精神，警惕自己身体里藏着专制思想时代的遗毒，不然我们时时刻刻有灰心颓废的可能。”^②

（四）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

为了推动五卅运动深入发展，六月三日，党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沈泽民、郑超麟、何公超（何味辛）等参加编辑工作。这是一张专事刊载党中央对五卅运动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报道工人阶级英勇斗争事迹，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勾结破坏五卅运动的罪行的报纸。沈泽民具

①以上见陈学昭：《天涯归客》第17页和《海天寸心》第67、69页。

②1982年6月10日访问郑超麟记录。

体负责翻译外文(英、日)报刊资料,从中了解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据以编辑新闻,写出评论或社论。《热血日报》每期发表的评论,绝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不久,《热血日报》遭军阀政府封闭,沈泽民被调到党中央创办的通讯社,继续从事翻译,定期向中央汇报国内外动态。在五卅运动期间,他写了《畏垒(即陈布雷)的排外主义》一文,批判了陈布雷的错误观点,着重指出:“工人做了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学生是先锋军”,“根本的是全中国的民众”;而大资产阶级“公然取媚于帝国主义……,背弃了全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质问道:“除了每个工人、学生、小商人(他们的人数千万倍于卖国的高等华人)的利益,我们还能说什么全民族的利益么?”^①与此同时,沈泽民还同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分子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结成的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他说:“国家主义在英美日是资产阶级的工具,那么这一主义在将近亡国的中国,是帝国列强的工具”。^②他明确指出:“五卅的目标根本是全中国民众的利益,所以是一个民族运动,而不仅是某个阶级的单独运动。”五卅运动“都是直接从中国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上出发的,他们所包涵的意义是全中国的荣盛,决非只为其阶级利益的。”^③至于那些所谓的“赤化谣言都是从卖国的高等华人里放出来的,目的是要民众不要响应,任凭他们去出卖全民族的利益。”^④

一九二五年七月,少年中国学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国家主义派蓄意要把少年中国学会改变为国家主义的团体。出席这

①②③④风:《畏垒的排外主义》,载1925年6月27日《热血日报》。

次会议的共产主义者恽代英、沈泽民，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十八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议上，国家主义派分子就装模作样地提出所谓“本会对于外患与内乱交逼之中国应争取何种方针案”，并由左舜生说明旨趣，声称“绝对主张国家主义”。恽代英、沈泽民当即予以驳斥，辩论达两小时，并宣布放弃对会议宣言的表决权，以示抵制。至此，少年中国学会分裂已成局定。在这场斗争的风浪中，沈泽民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此外，他还积极参加中国济难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从事对被捕同志和烈士家属的营救和救济。他经常到杨树浦和沪西工人区，进行调查访问活动，鼓励工人阶级继续战斗。他常说，五卅运动结束了，但工人的革命精神是高涨的，革命的运动没有停止。

(五)

一九二六年春，沈泽民担任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的翻译，随同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代表大会。会后，他留在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其时，该校讲课都用英文，沈泽民与张闻天、吴黎平（吴亮平）等同编在翻译班，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一九二七年，他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

由于不懂得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失败后的实践缺乏深刻的了解，沈泽民这时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曾对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及主要任务作了片面的理解，被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认为是中国党内理

论“较强的同志”^①。但他与王明有区别，据吴亮平回忆：

“泽民和张闻天都反对王明的宗派活动”，“有谆谆长者之称”。他还说：“泽民和闻天与人为善，对己能不断地修正错误，坚持真理，都是正派的好共产党员，和王明有本质的区别”^②。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沈泽民担任大会翻译工作。会后，他和张闻天考取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研究生，学习约两年。由于过度劳累，加之当时生活条件差，不久，他患了肺病，但仍坚持学习。他还经常阅读鲁迅的《彷徨》及国内出版的小说，认为这样能了解到一些群众内心生活的脉搏。当他从友人处借到茅盾以描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为背景的第一部小说《幻灭》时，就象得到一件珍宝一样，一口气读完，并高兴地给哥哥写信说：

“‘幻灭’的呼声，是愤慨的呼声，从烦闷苦索中找出解放的路。”他在信中还说，带有深刻时代烙印的作品，才是经世不衰的，希望哥哥“择取现在中国民众生活最深处的情绪，而将其耳朵贴在地上，静听那大地最深处的呼吸”，写出更多好作品^③。

一九三〇年十月，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化名李清扬，取道法国，乘邮船回国。他在船上梦见红军，心情振奋，竟高

①参阅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84页。

②1981年7月10日访问吴亮平记录。

③罗美：《关于“幻灭”》，（茅盾收到的一封信），载《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7月合订本。

呼起口号来，幸同船人都在酣睡，才没出事。抵沪后，下榻新世界旅馆，因化名恰和国民党一个师长同名，为避免是非，立即转移，几经曲折，终于在一家工厂门外巧遇杨之华，才把国际十月来信面交瞿秋白^①。按照共产国际的委托。他协助瞿秋白，于十一月十九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时，他还写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②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有它正确的方面，如指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是混淆了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胜利已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已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所以他提议在革命政权开始建立的时候，就立刻开始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经过中间阶段。”同时指出了李立三在革命动力问题和组织问题等方面的错误；进一步分析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这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冒险拼命的情绪反映到党的政治领导中来，不愿意做艰难困苦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工作，希望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由于冒险的行动获得暴动的胜利，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

尽管如此，但沈泽民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反映的新的“左”倾错误是很明显的。例如，他没有看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已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纠正和停止了执行

①参见茅盾：《回忆录》（12），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②两篇文章均载《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1期。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相反，他在文章中却认为三中全会以后，各地依然“继续以前的”李立三错误，“就是中央自身的策略指导也不能开始真正的转变”。尤其是他认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不是“左”，而是“用‘左’倾的辞句掩盖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在以反右倾为主要任务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仍然是反右倾斗争的主要内容”。这说明，他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取得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沈泽民也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六)

沈泽民任中央宣传部长三个月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离沪前，他和张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辞行，认为这次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心里十分高兴。后来沈雁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①他们兄弟两人一起分析国内革命形势，交谈了一个上午。当谈到国民党新军阀利用混战发财时，沈泽民愤慨地将孔祥熙、蒋介石等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勾结，形象地比喻为一个输送管系统，将崩溃中的中国劳动群众的膏血，输送到外国财政资本的银行里去，这样也就造成了

^①茅盾回忆录〔十二〕，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民族资本家的破产，成了帝国主义、封建和买办勾结的特征。后来，沈泽民将这次谈话内容进行整理，写成了《第三时期的经济》和《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两文，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一期上，揭示了蒋介石卖国反共政策的阶级基础。

沈泽民夫妇起程时，瞿秋白、杨之华前往亲切话别。瞿秋白对沈泽民说：“发展苏维埃运动是很艰巨光荣的。”“要扩大鄂豫皖苏区，就是从土地革命中壮大红军。”瞿秋白将一块怀表送给他并深情地“祝愿红军不断壮大，不断取得胜利！”^①沈泽民回答瞿秋白说：“你讲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的精神很好。愿我们今后在苏区会面，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②

毋庸讳言，沈泽民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打着“改造党的各级领导”的旗号下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同他一起被派去的还有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三月中旬，张国焘、陈昌浩在顾顺章的护送下，从沪搭船经汉口前往黄安（现湖北省红安县），进入鄂豫皖苏区。沈泽民和张琴秋则于四月初坐火车到蚌埠后，改乘轮船去正阳关，四月中旬到达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

金家寨是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驻地，沈泽民初到特委时，工作还比较谨慎，常找特委、县委和区干部及红十二师指战员谈话，开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认为，苏区干部“政治上都很好，诚恳虚心”。并赞扬“红军十二师作战英勇，纪律严明”。^③当他了解到红十二师还帮助地方建立武装近三千人

①②杨之华1958年9月在武汉检查女工工作时的谈话。

③沈泽民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3日）

时，很重视这一成就，极力推广这一经验，并抓了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县区游击队的工作，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和扩大红军主力。当时正值春荒，他立即和皖西北特委研究办法，采取措施，让红十二师在产粮的霍区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粮食十万担，救济群众；同时发动生产自救。他很重视农业生产，强调“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红军作战”^①。他根据商城有药材、金寨有竹木扫帚和纸、苏家埠一带有茶等土产，以及国民党每年在这些地区的税收在三十万元以上等情况，强调提出：“要发展土特产，才能发展苏区。为了军需民食，要成立我们的税收机构，建立苏维埃商务工作。”^②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张国焘经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新集、商城，进入金家寨，与沈泽民相会。张国焘下车伊始，便攻击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叫嚷必须按照四中全会的路线，实行“转变”和“改造”。

根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的指示，张国焘于五月十一日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共青团鄂豫皖分局书记，沈泽民任分局委员^③。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又召开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以“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思想指导下，全盘否定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这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七人组成中央分局常委^④。会后，张国焘加紧“改造红军”、“改造各地方党、苏

①②③沈泽民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3日）。]

④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张国焘的结论。

维埃和群众团体”，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统治。

这时，沈泽民原来就存在的“左”的思想发展起来，接受了张国焘的错误观点，也主张开展“党内斗争”，一切从改造领导机构这个根本做起。

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鄂豫皖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他手中无真理，只有凭借职权，对反对他的广大党员干部扣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右倾”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借故于十月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开展罪恶的“肃反”。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中的许多重要干部如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四军十二师政委姜镜堂、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四军十二师参谋长兼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红七十五师政委戴克敏、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红四军十师师长兼政委陈奇等，先后被张国焘诬为“反革命”或“阶级异己分子”而遭杀害，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次“肃反”没有召开分局会议讨论，是张国焘亲自到白雀园主持进行的，沈泽民没有参加。

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完成对苏区各级领导机构的改组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召开了鄂豫皖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省委，沈泽民任省委书记。他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犯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但他不是王明、张国焘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仍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于巩固与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进行保卫苏区

的斗争，“是有功勋的”^①。

一九三一年八月，红四军在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的指挥下，攻克英山，继而抵制了张国焘要红军通过近四百里白区进攻安庆的冒险计划，决定向圻水、黄梅、广济进军，连克圻、黄、广等县城。把鄂东北和皖西北联成一片，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斗争。沈泽民在支援红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圻、黄、广战役中，他提出了“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庆祝红四军大捷”等宣传口号。战役结束后，他主持召开了欢迎和慰劳红四军大会，并根据分局再扩建红军一个师的决定，动员根据地青年参军。接着，红四军于十一月在七里坪扩建为红四方面军，成为保卫发展鄂豫皖苏区的坚强主力^②。随后，红四方面军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取得了黄安战役、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取得了杜付店战役、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八日取得了苏家埠战役的胜利，共歼灭敌人三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使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红军主力扩大到四万五千余人，地方武装约在二十万人以上，根据地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多万。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沈泽民在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吉鸿昌将军出国考察归来，于八月率原二十二路军旧部一个旅投奔红军。在赴苏区途中，被蒋军尾追阻击，到羊山角附近，遭敌重重包围，

^①中央组织部档案室沈泽民档案。

^②据郑位三回忆革命斗争史谈话记录（1974年6月25日）。

部队无法突围。这时，吉鸿昌身着便衣，带少数亲随进入苏区。沈泽民在红安附近的长冲会见了吉鸿昌，同他畅谈了一天一夜，讲“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国内形势，讲中国革命的前途，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欢迎他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召开了有六、七人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使吉鸿昌深受感动。当他离开苏区时，沈泽民代表省委送给他三千元作路费，并指派徐海东护送一程。这些作法得到省委和边区多数领导人的赞同，认为“这都是好的”^①。

沈泽民在负责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期间，很注意“尊重有经验的同志，见了面就问情况，对每个干部的情况都仔细地问，提拔了大批的地方干部。”^②他和郑位三、郭述申等领导了苏区的土地改革，强调要把分配土地和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发展苏维埃等工作联系起来。他把赤卫队、共青团、童子团、贫农团、妇女会一齐动员起来，开展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宣传活动，动员党团员带领群众参加红军，提出“快快武装起来，壮大红军，保卫苏区，扩大苏区”的宣传口号，并抓住红军的祝捷和节日纪念等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扩红”^③。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了解决劳动力的缺乏，沈泽民同省委的领导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以村为单位组织不同形式的互助，红军家属与鳏寡孤独残废者的田，由

①据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沈泽民烈士档案整理，并参考了徐文伯的文章：《吉鸿昌将军到鄂豫皖苏区的情况》，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

②中央组织部档案室沈泽民档案。

③见《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的决议》（1931年10月6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村苏维埃组织代耕；在春耕秋收农忙季节，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投入生产；特别是在接近白区地带帮助农民抢种抢收。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在战争环境的困难情况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粮食获得了丰收，人民也渡过了饥荒的难关^①。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重新纠集六十三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张国焘惊慌失措，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对于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沈泽民是坚决反对的。据郭述申回忆，在鄂豫皖苏区，“敢批评张国焘，真给张顶嘴的还是泽民”，^②这时，他不仅支持省委其他同志反对张国焘逃跑的正确意见，还给张国焘写了一封长信，要张国焘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围剿”和武装保卫苏区的问题。信写好后，请省委同志传阅，经郑位三、成仿吾、郭述申、张琴秋等签名后，送交张国焘。张国焘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复信表示同意开会，一面又说开会没有时间，拖了一个多月。对此，沈泽民十分气愤。十月初，他同省委同志来到中央分局驻地，对张国焘说：“革命不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事，这是全党的大事，要开会决定才行”。并说：我们不能丢掉苏区几百万人民不管，党和先烈开创的苏区，不能不战而扔下。他还质问张国焘：“丢掉苏区要逃到哪里去？”进而坚定地表示：“要保卫苏区，要开会，我非到会不可。”^③

①《鄂豫皖中央分局报告》（1931年10月），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1981年7月18日访问郭述申记录。

③据郑位三回忆革命斗争史谈话记录（1974年6月25日）。

十月十四日，中央分局在红安以西河口地区的黄柴畈召开会议。沈泽民等坚决反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的主张，重申了保卫苏区的决心。而张国焘却在会上竭力散布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说什么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说什么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根据地内继续进行战斗是没有希望了，他不敢把西逃的打算公开端出来，只说红军主力需要跳到包围圈外保存力量，在周围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为欺骗大家，张国焘还装模作样地发誓，决不开鄂豫皖根据地。最后，会议根据敌我形势，决定红军主力转移到京汉路以西外线作战，以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重返苏区。留下沈泽民、徐海东等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这时，沈泽民的肺病复发，有时吐血，同志们劝他随主力到外线去，他却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①

黄柴畈会议后，鄂豫皖分局和四方面军总部即率主力越京汉路向西转移。如果按照徐向前等同志的意图，把外线作战当作挽救反“围剿”斗争免遭失败的手段，全面布置，指挥得当，内线外线紧密配合，敌人的“围剿”是可以打破的。然而，这时的张国焘，已经失去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下去的信心，没有对外线和内线作战以及相互配合等问题作出任何部署，便轻率地丢掉了鄂豫皖根据地，把四部电台全都带走了，没有给根据地留一部电台。对于这样的重大行动，张国焘连对师一级的干部也没讲，更没有报告中央，也不通知已不随部队行动的鄂豫皖省委和沈泽民，也没有给内线留下必要的主力红军。对此，

^①据郑位三回忆革命斗争史谈话记录（1974年6月25日）。

沈泽民坚定地说：“我们决不相信这是根据中央指示来做的，我们看来这种行动是违背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局有关文件中所指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①

(七)

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以后，二十万敌军大举进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清乡”。蒋介石采用“民尽匪尽”、“山过火”、“人过刀”的法西斯手段，限十二月十五日前彻底消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根据地，形势极为严重。沈泽民同省委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党员和游击队，为保卫大别山苏区进行艰苦的战斗。在沈泽民、郑位三、徐海东、郭述申、吴焕先、成仿吾等领导下，苏区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即使是吃树皮、草根，也不屈服。苏区到处贴满了“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的标语口号；罗山、黄安、河口、商城、六安等县还成立了县游击师或独立师，充分反映了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针对这一新的形势，沈泽民曾经著文指出：“蒋介石屠杀人民，使苏区的人民恨得要吃掉蒋介石”，“走投无路的是蒋介石，红军游击队是打不败的”。这是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紧急关头，“蒋介石执行与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决一死战的卖国政策，引起了广大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新怒潮，蒋介石一定会走投无路

^①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成仿吾、戴继英、高敬亭、沈泽民、郑位三：《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的”。①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战争，红军消灭了敌人近千名，缴获枪枝近两千支，武装了游击队和群众。

十一月二十九日，省委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鉴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未归，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加强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根据地。

十二月，省委得悉红四方面军已到陕西省南部，同时，为了应付敌人新的“清剿”，于三十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谴责了张国焘的“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明确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决定红二十五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②。后因战果不大，于翌年三月初又决定集中行动，将全军七千余人集结于新集以南野鸡楼一带，待机歼敌。三月四日，敌三十五师一个旅进占边区根据地郭家河。沈泽民召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首长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等开会，分析敌我情况，决定集中兵力，全歼敌人。六日，天未破晓，徐海东率主力团攻入郭家河，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毙、俘敌军二千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取得了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给根据地军民以极大鼓舞。群众高兴地说：“红军主力又回来了”。沈泽民心里也充满了喜悦，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彰了红二十五军，说“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积极作战，牵制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的行动，又保卫了大别山的红旗。”③四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又取得了潘家河、扬泗寨两次

①沈泽民：《蒋介石走投无路》（支部党员教材）1933年3月25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鄂豫皖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沈泽民1933年3月21日给中央的报告，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战斗的胜利，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得到好转，蒋介石的“清剿”遭到失败。

这一时期，鄂豫皖省委和沈泽民也受到了临时中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的影响。早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由沈泽民主持的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就根据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要求，提出把“夺取中心城市”作为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之一。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省委不能冷静地分析形势，反而根据原来“左”的指导思想，在《鄂东北通讯》发表的捷报中，号召根据地群众“趁热打铁的起来”，“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三月下旬，鄂豫皖省苏维埃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再次号召：“一定要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等中心城市。”

不久，省委又收到王明路线统治的博古为首的中央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发来的《反四次“围剿”中的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的指令。这个指令提出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要求“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并强调“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在现在”。根据这一指令，省委在四月十四日发布的《通告第一〇六号》中，把“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一切城市”，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并于五月初，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

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并不同意省委攻打七里坪的计划。他们认为从整个形势看仍是敌强我弱，且我军给养困难，因此不能打。但省委却一味强调党

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坚持要打。七里坪战役五月二日开始。十天以后，战斗没有取得进展，而红军却告断粮，起初靠根据地人民忍饥送些稀饭，以后只得用野菜树叶充饥。在这种情况下，吴焕先、徐海东等建议撤出战斗，但遭省委拒绝。五月二十四日，省委还发出《通告第一〇七号》，继续坚持要打七里坪，甚至要求“准备更大的力量加倍迅速夺回一切其它中心城镇”。直到六月中旬，由于红军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饥饿而死和战斗伤亡日增，部队减员严重，所剩五千余人，体质日渐衰弱，而敌人援军不断增加。至此，沈泽民才认识到省委的错误。他对徐海东说：“现在看来你没有错，是我们省委错了，要是早采纳你的意见就好了。”^①

六月十三日夜，全军撤出阵地，但这时的省委并没有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转变过来。

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省委事先对这次“围剿”缺乏警觉，直到六月底，才知敌情有变化。恰在这时，派往中央请示工作的同志返回。省委于七月一日、二日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第二次扩大会议，口头传达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给鄂豫皖苏区党委的信》，并通过了《通告第一〇八号》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临时中央的指示信要求鄂豫皖省委恢复和巩固以红安、麻城为中心的鄂东北根据地，将根据地完全打成一片，强调要进行所谓“正式战”，“集中武装力量来为防御苏区作猛烈的斗争”。于是，省委提出苏区全体

^①傅家选：《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简介的补充意见》，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期。

群众动员起来，在红二十五军主力的领导下，“大举向敌人反攻”，“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其结果，又造成了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和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失利，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全军只剩下约三千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到十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遭受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身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沈泽民，自然应承担主要责任。

(八)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严酷的斗争现实，使省委和沈泽民深深感到，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斗争方针。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全面总结过去五个月的斗争经验，吸取教训，制定出今后斗争的新策略和方针。由于敌人的进攻，会议仓促结束，但省委还是将斗争方针的转变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会上，沈泽民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处于（黄）陂孝（感）以北广大地区和罗山地区外线作战的三个团，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实行游击战争，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经验。鄂东北道委也介绍了红安县河口区、仙居区发展便衣队的情况。这使省委和沈泽民打开了眼界，认识到将红军组成小型便衣队到外线活动，是打破敌人“围剿”，扩大红军，发动群众，保卫苏区最适宜的办法。沈泽民说：“红军转到外线活动，路子皆是大有希望”，“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组

织”。^①

在极端艰苦的岁月里，红二十五军严格维护群众纪律。特别是徐海东以身作则，和战士一起吃南瓜、葫芦，千方百计不增加人民群众负担的爱军爱民品德，深深感动了沈泽民。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不久，沈泽民找到徐海东，噙着泪花，激动地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红二十五军被困难是压不倒的”。随后，他从怀里取出瞿秋白送给他的那块钢表，深情地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济困难，把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给了苏联人民。苏联的同志为了瞿秋白工作的方便，回赠了这块钢表。一九三一年我离沪来皖时，瞿秋白把这块表送我作纪念。”他接着说：“海东同志，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祝红军胜利！革命成功！”^②徐海东热泪盈眶，无限感慨，从战友的手里接过表，深沉而又坚毅地说：“红军会胜利的！一定会胜利！”^③

根据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和会后的多次研究，由沈泽民执笔，于十一月十日写成了给党中央的报告。报告沉痛地检讨了省委过去在斗争方针上的错误：“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四次‘包剿’前之大苏区，……至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报告深刻地说：“生死存亡只在一个问题上来判断，即是对群众的关系，如转变到真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亦包不住我们”，表示今后要

①沈泽民给党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10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徐海东生平自述》，载《人物》1981年第3期。

③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至于今后的斗争方针，报告写到：“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联合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去活动，夺取物资；杀反动，骚扰敌人，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的运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①

其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辗转天台山一带，艰苦奋战，缺粮少菜，无以为炊。沈泽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以葛藤、树叶、草根为食。他的肺病日渐恶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给中央的报告就是在吐血的情况下写成的，是他用药水写在一件白色短裤衩上，由成仿吾穿着前去向党中央汇报的。此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吐血不止，并又染上了疟疾。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前来看望他，他知道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握着战友们的手，坚定地说：“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②这便是他的最后遗言。

十一月二十日，沈泽民因吐血不止，在红安县天台山芦花冲与世长辞。他忘我奋斗，尽忠守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为了纪念沈泽民的革命业绩，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中华

①《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1933年11月10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据郑位三回忆革命斗争史谈话记录（1974年4月13日）。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创建了苏维埃大学，正式给这所大学命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由瞿秋白任校长，毛泽东、林伯渠为管理委员会委员。当时率红二十五军转战商城东南豹子岩的徐海东，获悉沈泽民病逝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掏出沈泽民送给他的那块怀表，流着眼泪边看边说：

“沈书记可是一个好人哪！”^①全国解放以后，原鄂豫皖苏区领导人傅钟、郭述申、成仿吾、徐以新、倪志亮、张苏民、袁先福、郑位三、张琴秋、曾传六等同志，曾在口头上或文字上向党中央反映说：“沈泽民是好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在鄂豫皖丝毫没有个人企图，反对张国焘不正派的作风。但泽民思想方法有毛病，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②。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红安人民举行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于红安县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

作者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郭述申、成仿吾、吴亮平、王盛荣、郑超麟、陈学昭等，查阅过《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少年中国》、《中国青年》、《热血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布尔塞维克》等报刊，在中央组织部和湖北省档案馆查阅了沈泽民烈士有关档案资料 and 文件。杨之华一九五八年来武汉检查女工工作时，接待过武英林的访问。

①转引自张麟：《徐海东将军传》。

②见中央组织部档案室沈泽民档案。

马立峰

邱吉明

马立峰是闽东党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闽东临时特委委员、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二月英勇牺牲。

马立峰，原名马泽祥，号一山，参加革命后，曾化名马烈风，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溪柄马厝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的父亲马四弟和母亲黄氏，在贫病交迫中相继离开人世。他和两个妹妹被朴实善良的伯父马三弟收留抚养。童年的劫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他从小爱编山歌，喜欢画画。伯父见他聪明伶俐，便克勤克俭送他进了村塾。十三岁时，他上了城关湖山小学。在这所商会创办的纨绔子弟群集的学校里，他以敦厚的品行和良好的学业，赢得了师长们的赞赏。高小毕业后，他肩挑行李，翻山越岭，到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霞浦作元学校（又叫汉英学校）念初中。在这里，学校对中国学生实行免费教育，但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信奉基督。他看透了帝国主义欺骗和奴化中国人民的这一罪恶手段，带头反对信仰宗教。一年之后，他在忿懑情绪和反抗思想的支配下，愤然走出了这个伪装慈善的校门。

一九二六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在省内外读书的福安籍学生，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利用假期返籍的机会，带

回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和《新青年》、《向导》、《语丝》等进步书刊，在青年中传阅。在彷徨和苦闷中的马立峰，开始接触到这些在旧书斋和洋学堂里看不到的新书刊，从中受到革命的熏染和启发。

一九二七年初，福安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筹备会。二月，北伐军的一支队伍路经闽东，带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消息。马立峰为之欢欣鼓舞，並立即投身到进步青年的斗争行列，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参加各种集会，经受革命风浪的洗礼。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福安的反动势力也打起了“拥蒋护党”的旗号，大肆镇压革命力量。马立峰和许多左派青年被迫离开闽东，前往省会福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春，马立峰和陈铁民、郭文焕等福安青年，先后在福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这年夏天，他们三人接受组织派遣回到福安，在城关明伦堂创办了暑期平民识字学校，传播革命道理，並且深入到城关、阳头两地，在贫苦群众中秘密发展了一批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同年八月，马立峰考进了福州理工学校公路专修班。这时，他同革命互济会中的共产党人开始交往，更加直接地受到马列主义的教育。他在福州投入了人力车工人的罢工行列，参加了“双十节”捣毁国民党闽侯县党部的斗争，经常冒着风险在南台或南街等中心市区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党的领导下，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改变了以往沉默寡言的性格。同学们钦佩地说他“静如处子，动如兔子”。一九二九年二月，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马立峰，

在福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是年暑假，马立峰接受组织的委托，回福安开展工作。他同省内外返籍学生一起，组织了五十多个社会青年，在城关的紫阳小学再次举办暑期补习班。八月间，中共福安县委成立，陈铁民任书记，马立峰当选为县委委员。随后，以马立峰为临时主席，主持召开了全县党代会，决定在城镇继续进行反帝斗争，在农村要加快建立贫农团，开展抗租、抗捐、抗债的“三抗”斗争。会后，马立峰又奔赴福安南区发动群众，并在柏柱洋的山下村，建立起了闽东第一个贫农团组织^②。

同年秋，马立峰在福州理工学校毕业后，留校任职，具体工作是在教导室协助绘图，刻写讲义。遵照中共福州市委的指示，他以这个职业为掩护，成立了校内地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③。一九三〇年一月间，国民党警察突然对福州理工学校进行搜查，从马立峰床铺底下搜到了红色传单和革命刊物。为此，学校当局将他强行解雇。此后，他回到福安，担任中共福安南区区委书记，并由组织安排，以宅里小学校长的身份，在南区发动和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

这年夏秋之间，中共福安县委曾先后组织过三次农民暴动，都因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而归于失败。十月间，县委召开县、区委及党支部、贫农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决定通过武装暴动，保卫秋收斗争，并确定以驻扎在溪柄的福

①《张志坚介绍闽东党斗争历史概况》（1957年5月）；《闽东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1961年5月），未刊稿。

②《柏柱洋土地革命时期若干问题调查补充报告》（1961年7月8日），未刊稿。

③任铁锋 1983年9月6日的回忆。

建警察第十二大队三营王贵生部的一个连作为攻打对象。马立峰接受了组织领导这次暴动的任务。他首先派人进行瓦解敌警察连的工作，争取了该部教练程心初及其十几名部属。随后，他与詹如柏、张志坚等县委领导人共同制定了战斗方案，决定率领贫农团员分三路向溪柄包抄，在暴动当天夜里十二点由程心初发出行动信号，然后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可是，由于敌情发生变化，程心初提前一个钟头打响信号，而三支暴动队伍尚在半路，无法与城内接应。此时，匪首刘宗彝一面命警察队反击，一面调动地方反动大刀会截击，暴动队伍腹背受敌。经过一场血战，队伍才得以突围。随后，警察队倾巢出动，四处搜捕马立峰等县委领导人。为了避免损失，经县委安排，马立峰离开福安，前往福鼎，在秦屿屯头村的麟江小学暂住。

一九三一年初，马立峰辗转抵达福州，就当时福安的斗争形势向中共福州市委作了汇报。二月二日，市委专门开会研究了福安工作，同时对县委进行了改组，确定由马立峰担任县委书记，并将县委机关移设在经济集中而群众基础较好的福安南区^①。不久，中共福州市委又派遣农村巡视员邓子恢去福安，协助开展农民运动。

邓子恢到福安，正是豆青麦黄的时节，庄稼长势很好。但马厝一带的穷苦农民早在春节前后就向地主粮商卖了青苗，他们看到即将收获的麦子全都拿去还债还不够，普遍蕴藏着一股愁苦怨恨的情绪。邓子恢和马立峰决定，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开展抗麦债斗争，并商定以贫雇农为核心，先组织农会小组，然后发展成秘密农会，形成一股斗争的中坚力量。在

^① 《福州中心市委林祖清给省委的信——福安县委的改组及对目前政治情况的分析》（1931年2月4日）。

邓子恢和马立峰的领导下，马厝农民以拖为抗，终于取得了抗麦债斗争的胜利。

马厝农民抗麦债斗争胜利以后，马立峰、邓子恢等又领导了溪柄农民反对地主、粮商囤积居奇、抬高粮价的斗争。他们以农会的名义，要求地主和粮行老板冻结粮价、不得倒贩粮食，办“平糶”；同时发动农民向地主、粮商赊借粮食。溪柄街上的手工业工人和附近各乡的贫苦农民群情激昂、并肩战斗，迫使地主和粮行老板答应农会提出的要求，并把粮食借给了农民。

马厝和溪柄农民斗争的胜利，鼓舞了福安南区各乡的农民群众，环象、北山、长洋、里村、井头岩等乡先后恢复和成立了农会，马厝、溪柄等乡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适应农民运动的发展，成立了中共溪柄区委^①。六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马立峰任书记^②。八月，马立峰在坂中的步兜里主持召开县委会议，总结前段抗债、抗粮斗争的经验，讨论研究了开展秋收斗争和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会后，秘密农会、农民小组、贫农团等组织，在全县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起来。

农民运动的浪潮，使反动派感到震惊。一九三二年初，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和警察队相继进犯福安南区、西区等革命中心地带，并四处张贴布告，缉捕马立峰等福安党的领导人。马立峰被迫前往福州，局部地区的农民运动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给厦门、福州两中心市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了党对于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①《福安农民运动的开端——邓子恢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0日），见《闽东党史资料》第66号。

②任铁锋1983年9月6日的回忆。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並作出决议，强调福安党组织要马上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①。会后，马立峰陪同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到福安^②。他们首先把几十个因受敌人摧残而不能回家的同志召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精悍的武装队伍。一个月后，陶铸离开闽东。马立峰便同詹如柏一起，率领这支小部队出没在福安西区、北区和上南区的山村乡镇，专门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发动群众抗租抗债，减租减息，迅速扩大了影响，并开辟了一些红色区域。

九月十二日，马立峰主持召开中心县委会议，作出了正式成立工农游击队、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武装保卫秋收抗租斗争的决议。九月十四日，在马立峰等领导下，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由詹如柏任队长，马立峰任政治委员。当天晚上，马立峰等率领第一支队夜袭兰田村民团，一举占领民团团部，缴获了一批枪枝。初战获胜，游击队员士气大振，于九月二十七日又消灭了福安县南端的溪尾民团，击毙了民团头目杨圣斋，缴获了七支步枪。紧接着，他们攻打北区的堂溪民团，收缴了敌人的武器，打开豪绅的粮仓、盐库，分发给当地农民。随后，马立峰等带领第一支队挥戈北上，转战寿宁山区。不久，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相继派遣叶飞、赖金彪等来到闽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领导。

① 《市委扩大会议决议——讨论中央给两市委的指示信》（1932年5月15日）。

② 《陶铸同志谈闽东初期革命的斗争情况》（1959年8月22日），见《闽东党史资料》第74号。

是年冬天，敌人调集了海军陆战队，对闽东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福安县长叶长清勾结海军团长蔡铎、民团团总林丛秋和豪绅头目陈王基，联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四处出兵搜捕闽东党的领导人。一九三三年初，马立峰在去北区出席党的会议的途中，被敌海军陆战队逮捕^①。敌人将马立峰连夜解送县城，然后押送福州，关进了国民党福建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反动派绞尽脑汁，对这位闽东群众领袖进行了三十多次刑讯，但始终没有从他身上捞到半点东西^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闽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可是，反动的看守所长借口马立峰于一九三二年冬率领游击队在寿宁放火烧了他的老家，诬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刑事犯，不在释放之列，继续加以监禁。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得知这一情况，领导刚出狱的同志们连续两次向福建政府最高法院提出抗议。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和斗争，马立峰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日获释。

马立峰出狱后，根据中心市委的指示，日夜兼程赶回闽东，在福安召集各县委执委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了“闽变”的经过情况，传达了市委关于抓住闽东敌人力量空虚的有利时机，努力扩大游击区等指示精神。会议认为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党组织应利用这一时机，领导全面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马立峰和詹如柏、叶飞、曾志等，率领游击队和赤卫队数千人，一举占领了闽东水陆交通要道及

①陈挺：《回忆闽东红军斗争历史》（1982年5月）。

②范式人1983年3月在北京接见寿宁县党史办同志时的谈话。

其经济中心赛岐。嗣后，安德、福霞、霞鼎、安福、福寿等五个边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下辖三十个区、三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接着，中心县委在后楼叶山召开二百多名干部参加的大会，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马立峰当选为筹备处主任。二月十七日，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闽东党、政、军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决定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府，继续发展红军，全面实行土地革命。会后，开始在柏柱洋进行分田试点。马立峰在斗面村召开了上南区各村苏维埃主席、土地委员、贫农团代表等一百多人参加的会议，对分田政策和具体问题作了说明，并召集大家学习分田大纲，具体布置了分田工作。此后，一个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便在柏柱洋展开了。

柏柱洋的分田历时一个月，取得了重要经验。四月底，闽东党政军的负责同志齐集柏柱洋，同各地来的三千多名代表和群众一起，庆祝柏柱洋的分田运动获得胜利。随后，马立峰从上南区抽调了一批有分田经验的骨干，前往福霞、霞鼎等县，推广了柏柱洋的经验，掀起了闽东土地革命的高潮。

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马立峰任常委。接着，在闽东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从此，他致力于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改革社会习俗等工作。同年秋，由于农民收割的粮食无人购买，经济上面临着许多困难。马立峰要求各级政府和一切革命团体，不得擅自向群众摊派粮食，而要严格按照政府统一规定的价格，用钱向群众购买。在经济建设方面，他除了要求政府大力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搞好家庭副业外，还按照党的政策，主张保护商业自由，强调政府不应干涉群众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从而加强了苏区内外的商品流通，改善了群众的经济生

活。他特别重视妇女工作，编写了《十月怀胎苦》、《反对旧礼教》等歌谣，启发苏区妇女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八月，他抱病主持成立了闽东第一个妇女工作团，使解放了的苏区妇女，在各项政治活动特别是慰劳红军方面，作出了贡献。

在马立峰和闽东特委的领导下，各地的分田运动风起云涌。在纵横十个县，方圆七百里，有一千四百多个村庄和几十万人口的苏维埃区域内，封建契据被烧毁，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为保卫胜利果实，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到今年六月，闽东红军增编了两个团。十月初，与寻淮洲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留在闽东的部分战士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从而扩大了宁（德）、罗（源）方面的新苏区，掀起了古（田）、屏（南）两县的革命浪潮，成为秋收斗争中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闽东苏区和红军的迅速扩大，土地革命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震惊。于是，敌人以十二绥靖区司令王敬久为总指挥，调集了三万多正规部队，配合福建、浙江两省的十几个保安团，勾结地方民团和大刀会，分兵三路对闽东苏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

十月下旬，敌人攻陷了柏柱洋，马立峰率领闽东党政机关迅速北移官洋村。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他和詹如柏、叶飞等以无比坚定的信念，一面发动群众投入反“围剿”斗争，一面指挥闽东独立师主力为保卫苏区同敌人展开浴血奋战。但是，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过大，独立师在柏柱、赛岐、溪柄等地的战斗中，均告失利。十二月底，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在洋面山上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充分研究，决定红军独立师避敌锋芒，向外线转

移^①。随后不久，在闽东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决定由叶飞和赖金彪率领独立师一、二团迅速撤出苏区打游击；马立峰留下指挥红三团牵制敌人，掩护撤退，然后转入东区的大山里，依靠当地群众与敌周旋。

独立师主力转移之后，闽东大部分苏区都被敌人占领，剩下的苏区也被切割成安福、宁周屏、福寿、霞鼎、福鼎等几个小块。马立峰率领红三团，转战在东区海拔千米以上、方圆二百余里的崇山峻岭之间，继续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根据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马立峰指示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并要求随时和他保持联络。他严肃地告诫指战员们说：“逃跑就是投降。今日苏区是处在黑夜与黎明交替的一瞬，谁不坚定，谁就是革命的逃兵，革命的罪人。”^②

但是，在那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可耻的败类。二月三日，正是农历除夕，已经叛变投敌的红三团团长游聚康，伙同陈石元在碣窑村召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以开会为名，突然收缴了全连的枪械，向敌团部邀功。次日，敌团长马鸿兴进一步唆使游聚康说：“若能抓到活的马立峰偿银一千元，打死马立峰偿银五百元。”并当场递交了文据。二月六日，游聚康秘密派遣叛徒陈石元、游阿乐等四人以汇报军情为名，前往下坪、社坪等地寻找马立峰。

当时，马立峰鉴于斗争局势的复杂严重，在大坝里村过了农历除夕，大年初一就带着警卫员转移到石二村；二月六日，又转移到地处偏僻、只有单座房屋的下坪凤落洋（又名凤洋

① 《叶飞同志在福安地委扩大会议上关于闽东党斗争历史的报告》（1957年3月20日）。

② 纯青：《缅怀马立峰烈士》，载《福安文史资料》第1辑。

坝)住了下来。

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初五)^①上午,马立峰刚刚派人护送二十多名留在东区的红军伤病员往松沃(即今松罗)转移^②,叛徒陈石元、游阿乐等四人便接踵找上门来。正当马立峰一边拆看游聚康的来信,一边听取陈石元的“汇报”时,游阿乐突然拔枪向马立峰射击,子弹从马立峰身边掠过。

枪弹没有击中马立峰,却使马立峰明白了一切。他拍案而起,怒斥一声:“叛徒!”并顺手撂倒了身边的陈石元,迅速撤到大厅。当他刚到厅下廊沿,躲在外面的凶手陈奕弟又拨动了枪机……。闽东人民的忠实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立峰当即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陶铸同志谈闽东初期革命的斗争情况》(1959年8月22日)。
2. 《福安农民运动的开端——邓子恢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0日)。
3. 《叶飞同志在福安地委扩大会议上关于闽东党斗争历史的报告》(1957年3月20日)。
4. 《范式人同志在福安地委扩大会议上关于闽东党斗争历史的报告》(1957年3月20日)。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二团团史初稿》(1961年3月)。
6. 柘荣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烈士芳名垂千古——纪念马立峰同志遇难四十七周年》(1982年2月)。
7. 陈挺:《回忆闽东红军斗争历史》(1982年5月)。

①马立峰遇害时间,见1935年2月26日《福建民报》消息。

②吴玉春1981年7月7日回忆。

梁 柏 台

陈 刚 袁相标 俞水平

梁柏台，又名越庐、月庐，字苏生，号梯云。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重要领导干部，中华苏维埃法制建设的开拓者，一九三五年在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

(一)

一八九九年九月十四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十），梁柏台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查林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梁开钱，初通文墨，聪明干练，为人慷慨，勇于任事，受乡里称赞。母亲胡玉兰，心地善良，温顺朴实，对梁柏台温和敦厚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名小芬，二姐名菊芬。梁家原属殷实农户，由于梁开钱不善理财，至柏台出生时已十分贫困，只得租种银制岭庵田，以维持一家温饱。

梁柏台秉性聪慧，深得父母钟爱。一九〇九年，柏台十岁时，父母希望他日后有出头之日，不顾家庭困境，勉力筹资送他进本村裘荣兴私塾受业。辛亥革命后，本村办起双溪学堂，柏台又以优待生免费入该学堂读书。一九一三年，双溪学堂停办，复转入龙山学堂。一年后毕业，学业大进。梁开钱见儿子成绩

优异，乃筹措学资，令其考入距村十五华里的知新学校。

知新学校创办于一八九八年，是新昌县东乡著名的高等小学校，所聘教师多是闻名乡里、有真才实学之士。柏台自一九一五年考入该校后，更加勤奋好学，能“兢兢于学问，经困难而不生畏惧心，遇蹉跌而不生厌倦心，人一己十，人十己百，勉强而行”^①。因此，成绩总在前三名之列。学校里有几位信仰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具有爱国思想的教师，常以古今名人名言和民族英雄事迹启迪学生。梁柏台受其影响，渐渐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埋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种子。

那时，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勾结列强，图谋复辟帝制；日本帝国主义为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加紧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浙江处在袁世凯爪牙的独裁统治下，苛政若虎，捐税如毛，人民的生活痛苦万状。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梁柏台心怀忧愤，深以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为念。他睹物思情，每每由眼前小事推而论之国家大事。有一天，他看见三年级同学在踢足球，双方在球门前激烈地争夺，即联想到“吾国之与日人对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门也。吾国之土地，犹皮球存立于操场也，两队相争，犹吾国人与日人相攻击也”，因而发出“吾辈青年，可不击球，以强筋骨、活血脉、振精神，以与日人相搏战”的感慨。又有一次上体操课时，他见泥水匠在建造学校大门围墙，即联想到“国家之国防不可坏”，若“国防不建，则外人自由出入，一无禁止，至外兵至时，将何以抵御之？至此而始悔防御之无从，不亦晚哉。”他希望政府“筑炮台，练海军，购兵舰，早建国防，勿至临渴而掘井

^①梁柏台：《论智育》（高小作文），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也。”收茧的商人，以各色旗帜作为标记，招引顾客，这本是不为人注意的小事。而他却由此而联想到：“国家存立于世界，必有一国之旗”，“国家荣则旗荣，国家辱则旗亦辱。国家之荣辱全在乎旗”^①。面对反动政府丧权辱国，外国帝国主义“欲寝中国之皮，而食中国之肉”，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他渴望中国睡狮“一吼而即起”^②。疾呼：“今夫中国犹一巨船也。各国之协以谋我，犹船之遇险也；我四万万同胞，犹船中之旅客船员也。”如若“果能协力同心，镇定以谋救济，无怨无咎，不扰不乱，则船虽遇险犹不至于沉耳。”然而，“乃吾国民，犹蠢蠢欲动，自相践踏，何为耶？”^③

在当时落后封建的中国农村，广大妇女的处境尤其悲惨。她们深受旧道德、旧礼教的束缚，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过着异常痛苦的生活。梁柏台对这种陋习深恶痛绝，提倡妇女解放，呼吁“解缠足”、“兴女学”。他在作文《论女学不兴之弊》^④的开头写道：“当今之世，日东侵，法南凌，英西窥，俄北眈之际也。而我国人竟馁而不振，其何故哉？曰：女学不兴之弊耳。”进而指出：“女子亦一分子也，我四万万同胞，女子居其半，女子不振，弱其半矣。一旦外侮至，惟赖男子之力尚能御乎？”疾呼“女学之须兴也久矣”，“愿我二万万女子毋守从前之陋习”。

梁柏台还主张“天下为公”，指出历代变革“所惜者家天

①以上摘引自《梁柏台日记》，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梁柏台：《睡狮论》（高小作文），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梁柏台：《铁达尼邮船遇险将沉旅客船员皆镇定不乱论》（高小作文），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④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下而不能公天下”^①。他立誓效马援之“男儿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和班超之“立功异域”，做一个“以身付诸国，竭力以担国事，以保国家，不以私而忘公”的“许国大丈夫”^②。

为了实践自己的誓言，他从小注重身体锻炼，擅长足球，曾作《击球说》^③一文，极称击球能“强国强种”，指出“况今之世，国基始奠，欧风美雨咄咄逼人，借击球之游戏振尚武之精神，强国民之体魄，壮民国之国魂，防外人之侵略，法至美矣”。他还说，若“吾辈青年，果好击球，共能尚武，协力同心，共谋救济，无论区区三岛之国不之畏，即英、俄、德、法诸邦，亦何畏之有？”升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更酷爱体育，是该校体育运动的佼佼者、校足球队主力，是出席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全浙运动会的十四名选手之一，与另一名选手参加八百米赛跑，分别夺得第一、二名。

(二)

一九一七年冬，梁柏台毕业于知新学校。时大姐梁小芬已能参加劳动，家境渐有好转。父亲乃送他去本县西山学校补习半年，一九一八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

当时，浙一师校长经亨颐顺应世界新潮流，采取“与时俱进”的方针，革除因循守旧的教制，“国文改授国语”，“试行学科制”，实行“学生自治”等，深受学生欢迎。特别是有

①梁柏台：《革命说》（高小作文），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梁柏台：《丈夫誓许国说》（高小作文）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几位“新派”教员，即被称为浙一师“四大金刚”的陈（陈望道）、夏（夏丐尊）、刘（刘大白）、李（李次九），在浙一师树起了文化革命的大旗，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更使青年学生为之向往。

梁柏台进入浙一师，立即接受新思潮，思想一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自称“主张的是新思想，所看的是《新青年》”^①。还说：“吾国今日之世，所可仗者恃吾青年”，“青年肩造就吾国将来之责任”^②。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梁柏台从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找到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即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爱国学生运动。他与浙一师进步同学一起，站在运动的前列，是学校社会服务团讲演部的重要骨干，“每逢假日出外演讲”，陈述国耻历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疾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身可死而青岛不可失，头可断而山东权利不可亡”，期以“唤醒国魂”，“励其心志，鼓其热血”^③。他和同学们组织起学生军，每天操兵式早操二小时，“预备为战士的后盾”，“俱愿效死战场”^④。

此时，杭州掀起了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运动。梁柏台参加了劝用国货会，走街串巷，宣传“国货之益，舶来品之害”，捣毁日本人招牌，将查获的所有日本货，集中到新市场、城站

①1919年9月12日梁柏台给相标、岳仁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18年11月梁柏台给袁月乔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1919年5月9日梁柏台给母校老师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④1919年5月28日梁柏台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两处烧毁，以为“国民之先导”^①。他有一个同学已弃学经商，他去信告诫：“毋贪目前之利而遗国家无穷之害。凡关于外货禁止批发，免得财源外漏。尤祈劝道国民而知用中国货之利，用外国货之弊^②”。

六月三日，杭州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全市举行“三罢”，有五万人在省公众运动场集会。会上梁柏台和宣中华、汪寿华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工人到处搜查日货，并将其堆集在公众运动场当场焚毁^③。

正在举行的浙江省议会常会，不讨论反帝爱国运动，却否决了“创办浙江大学堂案”，而提出了所谓“增加议员薪给案”，引起了进步人士的极大不满，发生了殴打议员事件。梁柏台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他痛骂议会是“豚犬之议会”，议员是“豚犬之议员”，“专以营私”，“瘠公肥己”，“于民脂民膏之竭尽则不顾”。他对家乡新昌县也有一议员参与鼓噪“加薪”尤为气愤，几次“欲寄书以谨告恨”，或“当面相责”，还写信给母校老师，斥责这位议员“不啻人民之蠹贼”，要求今后“乌用此议员”^④。

梁柏台频频寄书父母、师长和亲朋、学友，陈述时势之危急，亡国之惨苦，救国之责任，自言“五四”运动以来，“天天愁国家之将亡，东奔西走，尽良心去做救亡运动”，“国家

①1919年5月17日梁柏台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19年5月13日梁柏台给袁月乔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杭州党史资料》总第2期第4页。

④1919年5月23日梁柏台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既得这样的现象，那怕弃生命去救国，也不敢稍为退让”^①。他接连给母校老师写信，批评“新邑（新昌）的学生常终日伏案，书声咿唔，以为尽自己的责任。则爱国的思想已不及他人了”。他指出：“今日教育宜注重时事，使学生发起爱国心”，“书籍上之学问固不可缓，时事上之学问更不可缓”，建议“设一阅报室，使学生随时阅览”，“既知时事，又可增广知识”^②。他大声疾呼：“愿我亲爱的同学想一个救国的方法，使我们的中国不至于亡的地位，则不亏国家平日养士的厚恩。”^③希望家乡教育界“能够联络一致”，作浙一师学生的“后盾”^④。在他的推动下，新昌县教育界成立了“实进团”，有“团员三十多人，多健全分子，大家抱着永久热烈的态度，为改造社会的起点”^⑤。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九一九年暑假以后，杭州的知识界形成了一支以浙一师为中心、目标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队伍；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刊物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钱塘江畔；浙一师的革命学生还成立了书报贩卖部。梁柏台是书报贩卖部的重要成员。他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和十二月给小学时的老师袁修昌先生的两封信^⑥中，详细地介绍了

①1920年1月2日梁柏台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19年5月17日梁柏台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1919年5月28日梁柏台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④1920年1月8日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⑤1919年11月20日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⑥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这一组织的情况。信上说：学生们都知道五四运动的力量是从新思想来的；凡有关新思想的杂志已竭力征求了几十种之多，每逢假日到公众场所出售，以供给社会上的人看，使得普及；每一种要推销一百几十份之多。他还说，浙一师能有今天的轰轰烈烈的局面，书报贩卖部有很大的功劳，它传播了新思想，推动了新文化的开展。

梁柏台自己则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杂志，每天“要看六七种”之多，“还觉得不够”^①。这些新杂志给他开阔了视野，促使他积极的探索和追求。他抱着“鼓吹新思想，以改造社会、革新人生观为唯一的目的”的信念^②，积极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并批评社会上出现的那些对新文化的种种非议。他有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来信中对提倡白话文有诸多的曲解。他在接信的第二天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说理透彻的长信给以回答。信中说：白话是“将来国语统一的根基，为教育普及的功臣，那有不提倡的道理呢？”又说，“处现在的时候，教育普及断不可以稍缓，欲教育的普及，不得不速谋国音的统一”，注音字母“实在是平民教育最好的利器。他还在回乡度假时，办注音字母普及会，作宣传新文化的“化装演讲”^③。但是，这时的梁柏台，从思想倾向来说，还处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他主张改造社会要从“家庭革命”入手，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并宣称自己“已经废姓”^④，“婚姻主义已经打

①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给岳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19年11月20日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1919年12月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④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破”^①。“是抱独身主义的”。他说：“我所说的独身，不是‘离群索居’的话头。我的独身主义，是共同的独身主义，社会为一个大家庭。”^②一九一九年底，父母希望他早日成家，积极给他操办婚事。他却为此斥责父亲“旧章是率”^③，“决计同家庭宣战”，“断不肯稍作栖息”^④。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浙江反动军阀当局，以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等“罪名”，查封了《浙江新潮》。接着又“严令法办”倡导改革旧教育、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浙一师校长经亨颐。

一九二〇年二月九日，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趁寒假学生回家之际，下令免去经氏浙一师校长职，并宣布改组浙一师。梁柏台闻讯迅即赶回学校，参加“挽经护校”运动。

三月，反动当局进而企图用武力强行解散浙一师。梁柏台与同学们抱定“坚持不夺之志”，“留经（亨颐）目的不达一致牺牲”的决心，与前来镇压的荷枪实弹的军警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挫败了反动当局的阴谋，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师风潮”。梁柏台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新的锻炼，其思想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原先曾积极追求过的通过家庭革命来变革社会制度的幻想遭到彻底的破灭。他

①1919年10月17日梁柏台给父母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19年11月20日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1919年12月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④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给岳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对个人前途和中国的命运有了新的追求，开始比较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跨入了新的革命征途。

(三)

早在一九一九年夏，梁柏台就在当时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热潮的吸引下，一心想赴法当华工，但两次都或因“失误时机”，或因经费无着而未能如愿^①。

一九一九年底，他又曾想到“北京工学互助团里去，别谋新生活”^②，也因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组织成立不久即宣告解散而没有成行。

正当梁柏台为“别谋新生活”而感到苦闷彷徨的时候，一九二〇年九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掩护团的革命活动和输送革命青年赴苏学习，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由俞秀松担任学社秘书，主持学社行政事务。梁柏台原准备去北京工读互助团，与俞秀松早有联系。学社成立后，遂经俞秀松等介绍进该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赴苏作准备。在这里，他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年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①1919年7月20日梁柏台给水焕族叔的信和1919年10月7日梁柏台的信，均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19年12月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二一年初，梁柏台回家禀明父母，准备赴苏。父亲执意不允，並以为其与陈莲芝完婚相挽。但梁柏台不为新婚稍移其志。婚后七天，他即别妻离亲，毅然束装登程。离乡之前，他已抱定“以身许国”的决心，将家事悉托于大姐梁小芬。行前谓亲人：“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梁柏台自沪启程赴苏。行前当掉了全部行李，仅得银元九元，乃向在上海做工的同村人吕云根借。吕系一般工人，经济十分拮据，但感于梁柏台不畏艰难立志救国的精神，慷慨相助，将仅有的八元银元借与柏台。梁柏台就凭这十七元银元的川资，踏上了赴苏的旅程。

与梁柏台同行的有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许之桢、胡公冕、谢文锦等十余人。他们先乘海船抵海参崴。时海参崴尚在白党手中，复取道中东路赴哈尔滨，经松花江转阿木尔，然后抵黑河，一路几经曲折，于九月到达伊尔库茨克。在这里，得第三国际远东局魏经斯基通知，因全苏大饥荒，任何人不得去莫斯科。梁柏台和许之桢等由远东局派往党校受训。曾因不惯异国严寒气候，冻坏身子，去海参崴治疗休养，并编辑中文报纸。

一九二二年八月，梁柏台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年底，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肖劲光等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

一九二四年，梁柏台等圆满地完成了东方大学的学习任务。一些同志回国参加斗争，他被分配到海参崴工作，先后担任沿海省职工苏维埃华工指导员、远东五省职工苏维埃委员及主席团成员、崴埠CP支部书记等职，并在党校兼课。一九二

七年夏，经党组织批准，他在这里和周月林^①结婚。

一九二七年底，梁柏台调伯力远东党部工作，担任远东华工指导员，负责远东的华工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后来，调伯力省法院当审判员，致力于红色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还在远东教务部编译局做过编译工作，翻译了《联共党纲和党章》、《列宁主义入门》和有关职工会的一些小册子。

海参崴和伯力，地处中苏边境，在中国革命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途经海参崴、伯力派往苏联学习的人员不断增多。凡过往人员的膳宿、交通和安全，梁柏台均亲自过问和精心安排。我党许多领导人，如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肖劲光和肖三等，途经海参崴和伯力时，莫不与梁柏台亲切会晤，交往甚密。

梁柏台长期在远东工作，创造了“远东的工作基础”^②，以至在第三国际要调他回莫斯科工作和他几次要求回国时，那里的党部担心他一走“工作将全部停顿”而“极力的反对”^③。就这样，他在异国度过了十个春秋。他眷恋故国，思念亲人，却不能还乡省亲。甚至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父亲去世时也不

①周月林，1925年由张琴秋介绍入党，曾参加“五卅”运动，在上海市总工会做保密工作。1926年由党派往苏联党校学习，后到伯力任华工俱乐部主任。1931年回国赴中央苏区工作。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和国家医院院长等职。1935年2月与瞿秋白等自瑞金经闽西转移香港，上海途中被俘，解放后因此蒙受冤狱二十五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②1929年1月6日梁柏台给肖子璋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1926年2月27日梁柏台给袁庆云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能回家，只好强忍住“十二分痛苦”，告慰母亲：“国家事大，家庭事小”。自己的“职务太重大，不是随随便便一抛弃就可以走的”，“家中事务，只好请母亲费心”^①。

对于梁柏台的久居苏联，乡人亲友“实在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的不少亲朋学友，有的当了老板发了财，有的做了官有了地位。因此，许多人认为他“没有出息”，“既不会发财，又不会做官”^②。柏台父亲去世后，族中无赖以其家妇女可欺，常相威胁，强借巧取，无所不为。家中生活十分艰难。曾屡次去信，诉说种种苦状，或以谁发财、谁做官相告以动其心，催其早日返家。梁柏台却寄语母亲、大姐说：“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些玩意儿。”“若要富贵，何必要久居异邦。”并教育家人“不要看某某（梁柏台表弟、同学，时在国民党军队供职）现在如何得时”，要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自信“我对于这些，看得非常清楚”^③。

一九三一年春，梁柏台为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所吸引，决心返回祖国。他专程去莫斯科，向第三国际东方部请求回国。适国内正在筹备召开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权，要起草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规，正在物色搞过政府工作，特别是做过司法实际工作的人才。梁柏台恰巧符合这些条件，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一九三一年五月，根据党的指示，梁柏台将两个孩子留在

①1926年1月16日梁柏台给母亲的信，抄件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30年1月梁柏台给袁修昌先生的信，抄件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③1929年12月12日梁柏台给大姐梁小芬的信，抄件存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苏联，和周月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他从莫斯科先到赤塔党的秘密联络站，由他们安排过境。梁柏台化装成煤矿工人，由向导陪同到了中苏边境，趁黑夜走了九十里路，于次日拂晓进入中国境内，坐火车过哈尔滨到大连，转乘海轮抵达上海。一路上，他们巧妙地应付了国民党特务的多次检查、盘问、盯梢。在上海小住一个时期，接上了关系之后，根据党的安排，由秘密交通陪同，前往苏区。他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我党地下秘密交通线，七月间，到达了闽西苏区。因道路不通暂在闽西工作。

(四)

一九三一年九月，闽西和赣南的道路打通，刘伯坚代表中央通知梁柏台，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快要开了，要他速去瑞金。梁柏台马上赶到瑞金叶坪，见到了早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就结识的任弼时和开辟这块红色区域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大会文件——宪法和婚姻法等的起草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十一月十三日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邓发、张鼎丞、曾山、袁德生、刘建中等党政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团各推举一名代表组成，讨论宪法起草问题。梁柏台以宪法草案撰稿人选入宪法起草委员会^①。十六、十七两日

^①原载《一苏大会日志》，转引自瑞金革命纪念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史料》（内部资料）。

上午，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大会主席团办公处，对梁柏台总结各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集中集体智慧，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十八日大会代表听取了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宪法大纲》以第一部由中国人民自己制定、确保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大法的崭新面貌，载入了我国人民宪政运动史，

另外，他还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法令。

《宪法大纲》的制定，为制订一切法律、法令、决议、条例提供了立法原则的依据。随后，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展了大量的立法活动。梁柏台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开始，就一直从事司法工作，是中央政府司法部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梁柏台为司法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任的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一直没有到职，梁柏台成了司法部的实际领导人。不久，又委任他为临时最高法庭委员（主席何叔衡）。后来，正式任命他为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任司法人民委员，并担任临时检察长。他为创制苏维埃法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面对当时肃反工作中的问题，梁柏台十分注重司法程序的建立。他一到司法人民委员部，便很快制订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颁布^①。《暂行程序》指出：

^① 《红色中华》第3期，1931年12月28日。

“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根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份，不分首要与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如不释放附和的工农分子），这些错误在苏区好些地方、好些时候都发现了”。《暂行程序》共有九条，对司法机关的设置、案件侦查、预审和判决之职权以及审讯方法都作出了规定，并明令在审讯中“一定要分别阶级成份，分别首要与附和”，“坚决废除肉刑，而采取搜集、确定证据及各种有效方法”。

接着，梁柏台和何叔衡等一起，开展了创立苏维埃司法机关的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央政府发出通令，要求各地政府成立司法临时机关——裁判部^①。二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十九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七次常会作出了组织临时最高法庭的决定^②。六月九日，中央政府颁发了由梁柏台组织制订的《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③。六月二十日，梁柏台主持召开闽赣两省及瑞金直属县裁判部长联席会议，县一级裁判部至此完全建立。各地裁判部开始按照《条例》规定的司法程序来组织法庭、审判案件，使审判工作上了轨道^④。

在二月十九日，人民委员会第七次常会上，梁柏台提议创办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行感化政策，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

① 《红色中华》第39期，1932年11月7日。

② 《红色中华》第11期，1932年2月24日。

③ 《红色中华》第34期，1932年9月20日。

④ 《红色中华》第26、39期，1932年7月7日、1932年11月7日。

并决定由他起草劳动感化院组织法。同年八月十日，司法部发出第二号命令，正式颁发了《劳动感化院章程》^①。该章程明确规定，创立劳动感化院的目的是看守、教育及感化违犯苏维埃法令的一切犯人，使这些人在监禁期满之后，不再违犯苏维埃的法令。感化院设置工场，让犯人在劳动中得到改造。劳动感化院生产了许多产品，如油墨一项，可供全苏区之用。劳动感化院的生产收入除支付本身的费用外，尚有多余，成为国家的一项收入^②。

为了统一司法公文，克服以往的混乱状况，以利案件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在一九三二年内，梁柏台先后制订和颁发了案卷、判决书、审判记录、传票等十种表册形式，建立起了公文案卷的“相当次序”^③。

一九三三年三月，梁柏台又一次召集了各级裁判部长会议。三月二十八日，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会，检查了裁判部长会议的经过，对起草刑法，健全司法行政系统，保障审判工作上的正确与迅速，裁判工作的群众化，增设检查员、指导员与法警，加强劳动感化院、看守所的管理以及行政实施的办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④。

会后，梁柏台一面着手起草刑法等法规，一面进行健全司法行政系统等工作。这年四月十二日，司法部发出第九号命令，决定在城市、区一级裁判部组织劳动法庭，专门解决资本家、工头、老板破坏劳动法及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等案件，以

① 《红色中华》第34期，1932年9月20日。

②③ 《红色中华》第39期，1932年11月7日。

④ 《红色中华》第58期，1933年3月6日。

保障工人享受劳动法所规定的一切利益^①。紧接着，司法部于四月十六日发出第十号命令，对没收犯人的财产和物件的手续作了严格的规定。六月十日，梁柏台签发了司法部关于下发《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小册子的第十四号命令^②，揭示了各级裁判机关的错误和缺点，并作出了相应的具体指示。七月三十日，梁柏台又拟订并签发了《司法部五个月工作计划（1933年8—12月）》^③，并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现，建立和健全了司法部之司法委员会、刑事处、民事处、总务处、劳动感化处等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各级裁判部；他还亲自担任教员，采用实习工作的办法和开办司法工作训练班的形式，培养了一批司法干部充实到各级司法机构里去，平时经常给下级机关以“活的指导”，使工作有了新的改进。在这一年里，他还组织制订了《革命法庭条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纲》和《看守所章程》，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前三者以司法部名义颁发，后两者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实施^④。

“司法机关过去在苏区是没有的，是中央政府成立后的创举。在司法上，每种工作都是新的创造和新的建设。”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苏维埃政府在司法领域制订了十几个法规，建立起了苏维埃共和国独特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确立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民主的诉讼原则和审判制度。这中间凝结了梁柏台的心血和汗水。由于战争原因和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有

① 《红色中华》第71期，1933年4月20日。

②③转抄自江西省档案馆。

④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些规定未能完全实施，影响了司法工作的正常开展。但是，梁柏台“从不搞王明路线那一套，都是在毛主席、张闻天领导下，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搞好本职工作”。“他负责司法部，也不是随便抓人、打击人”^①，而是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按法定程序办案，重调查，重证据，努力做到量刑准确，避免失误。他和何叔衡等在创制苏维埃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方面的工作，以及它在维护革命秩序、巩固苏维埃政权中的作用，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高度评价苏维埃政府在司法工作方面的成就，指出苏维埃法庭一方面“在苏维埃领土之内起了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就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明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绝大的改革”。毛泽东还说：“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采取感化主义，即是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与劳动纪律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的本质”，废除了“司法范围内一切野蛮封建的遗迹”，“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改革，同样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一九三三年春，全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竞赛。梁柏台代表中央政府到瑞金指导春耕生产。他每到一处，插秧薅草挑粪样样都干，群众说他不象个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倒象个农民。他听了高兴地说：“我也是种田人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梁柏台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瑞金等八县区的查田运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是梁柏台在中央苏区三年半时间中，

^①《吴亮平同志回忆梁柏台》，载《新昌党史资料》第32期。

任务最繁重，工作最艰难的半年。其荦荦大者就有：

一、主持内务部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人民委员会任命梁柏台为内务部副部长^①、代理内务部长职。他在主持司法部工作的同时，又兼管内务部的工作。内务部工作头绪繁多，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工作更为繁重。为了适应开展革命战争的形势，他以代内务部长的名义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签发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五号命令^②，限定各级政府“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完成区一级的内务部的建立”，并“切实地将各地内务部的工作建立和健全起来”。为全面开展内务部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随着扩大红军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如潮水一般地涌到红军里面来。红军家属占了苏区人口的半数以上，因而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成了“广大的群众工作”。梁柏台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把它作为内务部“最中心的工作”，衡量内务部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他根据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制订了《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等；普遍建立起县、区、乡、村四级“优红委员会”，组织优红耕田队、杂务队、检查队以及看水班、看牛班、砍柴班、挑水班、慰问班等；还创办优红谷仓、优红商店、优红合作社、优红公卖所、优红熬盐厂、优红柴厂，实行合作社百分之五的优红红利和红属买货九五或九三折的优惠待遇^③。梁柏台曾亲自总结兴国、长汀等地的经验，在

①《红色中华》第95期，1933年7月17日。

②原件存瑞金革命纪念馆。

③梁柏台：《优红工作的检阅和内务部的工作》，载《红星》第57期，1934年3月5日。

《红色中华》上介绍^①。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内务部发出《关于修理河道及沿河两岸的道路问题》的第四号训令^②也得到了很好实施。各地内务部和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修理河道委员会，浚通河道，修复河岸，整理纤道，改善了水运条件，确保了运输畅通，在支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又签发了《托儿所组织条例》^③，许多地方试办起托儿所，为使妇女有更多的精力参加生产和苏维埃的工作，让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为改善劳动妇女和儿童的生活，作出了新的尝试。

二、参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起草。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临时中央政府作出了于广州暴动六周年纪念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为此，专门设立了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指定梁柏台、赵宝成、谢觉哉为委员，进行各项准备工作^④。八月十六日，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议事日程，并指定王稼祥、刘伯承、洛甫、潘汉年、毛泽东、胡海、吴亮平、沙可夫、刘少奇、陈云、何克全、梁柏台、邓发、高自立、林伯渠等十五人组织起草委员会，以梁柏台为主任。又决定编辑《苏维埃中国》一书，在全苏大会前出版，指定吴亮平、梁柏台、沙可夫、谢然之、潘汉年五人组织

① 《红色中华》第203期，1934年6月16日；第204期，1934年6月19日。

② 原件存瑞金革命纪念馆。

③ 《红色中华》第155期，1934年2月27日。

④ 《红色中华》第89期，1933年6月20日。

编辑委员会，以吴亮平为主任^①。随后，梁柏台投入了紧张的大会文件起草工作。经他直接负责修改的，就有《宪法大纲》、《婚姻法》和《组织法》等重要法规。

三、指导选举运动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等。七月十五日，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作出了重新修改《选举法》和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决定。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梁柏台负责对《选举法》作了修改，并于八月九日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了推动和指导选举运动，九月六日至九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八个县的县区两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出席的选举运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今年的选举》的报告，梁柏台作了《选举法》和《全苏大会的准备》的报告。后来，内务部又开办了两期选举运动训练班。梁柏台先后发表了《市苏乡苏向选民的工作报告》和《关于选举法上几个疑问的解释》等文章，还对宣传动员、选民登记、选民和候选名单的公布等作出了详细而具体的指示。这些，都有效地指导了选举运动，使这一次选举“比较上一年实行得更加普遍了”，“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未有的。”^②

与选举运动进行的同时，八月一日，红军烈士纪念塔、红

①《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

②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转引自《江西社会科学》增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

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等纪念建筑物，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上破土动工。同日，又在瑞金沙洲坝破土动工新建大礼堂，为“二苏”大会准备会场。梁柏台担任工程总指导者，亲执罗盘，和工程设计者钱壮飞等选定了方位，领导了这些工程的建设。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新建大礼堂举行。梁柏台作为瑞金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长和法令委员会主任^①。这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通过了修正的宪法和各项重要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梁柏台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二月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梁柏台作了《关于组织法的重要原则》的报告，并被选为司法人民委员^②。

梁柏台除担任以上所述的各种职务以外，还曾担任过《红色中华》代理主笔^③、苏维埃大学委员会委员（校长毛泽东）^④、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⑤等职。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政、邮电、交通、卫生、教育、宣传和财政诸方面，任务至为繁重

① 《红色中华·〈二苏大会特刊〉》，第2期，1934年1月24日，第3期，1934年1月26日。

② 《红色中华》第146期，1934年2月6日。

③ 《红色中华》第19期，1932年4月28日。

④ 《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

⑤ 《红色中华》第109期，1933年9月15日。

复杂。他以“竭力以担国事”的抱负，夜以继日地从事着建设红色政权的艰苦卓绝的工作。

他工作耐心细致，认真负责，注重调查研究，强调联系实际。每到一地，他总是通过多种形式的调查，在详细了解当地情况之后，再根据中央的精神，形成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对人总是笑嘻嘻的，很少发脾气。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没有领导架子，人随和，好亲近。平时在家庭中，他对妻子也十分尊重和照顾。李六如曾称赞他是“模范丈夫”，他妻子也时常夸他是个“贤夫”。平时，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穿的是布衣，着的是草鞋，一天两顿，战士吃什么他吃什么，一点也不把心思放在吃喝上。他常常工作到深夜，饿了喝点水用以充饥。他身子渐渐地消瘦了，精力却依然十分充沛。

梁柏台以他出色的工作和良好的品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亮平在回忆梁柏台事迹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梁柏台这个同志很好，很实在，对革命很忠诚，很能照顾人。毛主席、张闻天都称赞他工作能力强，对同志关系好^⑦。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工农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梁柏台列在随野战军出动的名单中。但是，在出动前的几天，情况起了变化，中央决定项英、陈毅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并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

^⑦1983年11月访问吴亮平记录。

作。结果，项英提名要梁柏台留下。梁柏台坚决地服从党的决定，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梁柏台为中央分局成员，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主任陈毅）。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反抗敌人进占苏区，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地统治下去，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

根据中央的指示，梁柏台组织二万民工，架设桥梁，运输物资，支援野战军出动。十月十二日，他在江西西江梅坑和战友们互道珍重，送别出发长征的同志们。

主力红军一离开中央苏区，敌人就闯进来，迅速占领了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继续堡垒封锁政策，将中央苏区截为无数的小块，企图将我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和机关围困在狭小地区内，然后分区“清剿”，达到其彻底消灭苏区的目的。

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打破敌人的“清剿”，保存革命力量，梁柏台和陈毅一起以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先后颁布布告和命令（如著名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第一号布告和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等），号召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

此时，项英忙于军事部署，陈毅腿伤严重急需抓紧治疗，在工作多、人手少的情况下，梁柏台担负了整个政府工作，如坚壁清野、粮食贮存、伤员安置、部队给养等等。他还将大批文件资料加以清理，从中挑出最重要的一部分，分装几箱，派人秘密送往深山埋藏，把其余的全部焚毁，不使落入敌手。

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几个月以后，由于项英对当时的情况和斗争的前途缺乏正确的估计，在敌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没有及时转变斗争方式，继续同敌人死打硬拚，致使苏区和部队进一步遭到损失，局势更为恶化。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等机关以及部队，被敌人围困在赣南南部狭小的区域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二月中旬，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进行分路突围。但是，行动的意图很快被敌人发觉。敌人采取严密的封锁和堵截，先期突围人员除少数冲出重围外，大部分被打垮了。剩下的一部分机关人员决定跳出于南，最后突围转向粤赣边区。梁柏台率中央政府办事处部分人员随同赣南省委机关一路行动。

三月三日午后，最后突围的人员在陈毅动员之后开始出发。梁柏台他们这一路所经之地，驻有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部队，兵力数倍于我，装备精良，且筑有碉堡，封锁严密。梁柏台等虽经奋勇拚杀，终因非战斗人员多，力量众寡悬殊，被敌人密集的火网切断，无法集中，只好将队伍再次分散。三月四日，粤敌和“铲共团”四处出动，分头堵截已被打散的我突围部队。战斗随处发生。梁柏台在激战中左臂负重伤，行动困难，躲在茅草丛中，打算天黑下来再走。不幸被敌人警犬发觉，引来“铲共团”，落入了敌手^①。

梁柏台先被押在驻信丰(原登贤县)小汾的余汉谋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后被解往第一军军部驻地大庾(今大余县)，关押在大庾监狱。在敌人法庭上，他置生死于度外，掩护了自己

^①魏晋：《梁柏台烈士访问材料》（1954年），存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

的同志。不久，即被敌人杀害，时年三十六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征集、珍藏的梁柏台学生时代的日记、作文、信稿和参加革命后寄往家里的部分遗札。
2. 梁柏台：《给袁庆云的信》（1926年2月27日），《给肖子璋的信》（1929年1月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中共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梁柏台烈士史料专辑》第1至8辑，载《新昌党史资料》第1、8、22、24、25、28、29、32期。
4. 中共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梁柏台烈士史实概述》。
5. 《沃洲英烈谱》，载《新昌党史资料》第21期。
6. 新昌县委党史编写组：《梁柏台烈士生平事迹》，载《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1期。
7. 肖劲光：《回忆参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
8. 许之桢：《关于渔阳里六号的活动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9. 胡公冕：《我的经历》，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3期。
10. 华林：《渔阳里六号和赴俄学习的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关于一九二八年以前浙江党的活动情况——摘自华林自述》，载《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2期。
11. 徐大妹：《回忆海参崴党校的学习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12. 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梁柏台烈士简介》等。
13. 访问肖劲光、吴亮平、王贤选、罗志才、黄长娇、邱世桂、徐大妹和烈士亲属周月林、梁志洪、丁宗华等的谈话记录，以及瑞金叶坪、松山下和烈士故乡群众的座谈记录。

蔡会文

谭运湘 刘普庆

蔡会文是年轻的红军将领，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苏区和三年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斗争中，战功卓著。一九三六年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一)

蔡会文，号赤潮，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湖南省攸县凉江山田一户富裕之家。父亲蔡开先，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有自耕田四十亩，还有成片的油茶林，每年可榨油数千斤。母亲贤惠厚道，一家十口，家务由她一人操持，对穷人乐于接济，对长工从不刻薄。蔡会文兄妹七人，哥哥蔡忠、名南阶，性格温和，谦让沉着；弟弟郁文，胆小怕事，沉默寡言；而会文却倔强好动，富有冒险精神，常常拿着父亲的猎枪到屋后山上练习瞄准。一次，他躲在屋角里拌火药，“哧”地着火，脸上烧伤了一大块^①。八岁时，入附近宰冲的蔡貽清老先生家读《三字经》，但不感兴趣，喜欢听长工讲故事，尤其爱

^①见烈士胞妹蔡年秀、元英，侄儿蔡德祥，原蔡家长工张冬瓜及山田农民文登初、刘金焕、陈国良等的回忆。

听农民怎样同豪强斗争的故事^①。十岁时，父亲从东乡请来一位清末秀才陈济贤，专门教他们兄弟读经。陈先生虽教的诗云子曰，但也渗进了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民主思想，这使蔡会文的长进很大，学会怎样看待社会的一些不平现象。有一年，当地有个叫张家恂的土豪做三十大寿。他看不顺眼，写了一副对联悄悄贴在张家的门口：“家家为你，吃了烂肠肿肚；询询（与恂谐音）责问，听着哑口无言。”气得张家恂哭笑不得。又有一次，山田农民凑钱出粮在栖真观打醮（山田人叫唱“保章”），求神降福，要请陈济贤先生做副对联。陈济贤要蔡会文先做一副，蔡会文写道：“山上有山，山山为寨，寨寨除民害；田中有田，田田收租，租租含人泪。”还有一次，陈济贤出了个题目“我的家乡”，叫蔡会文兄弟作文。蔡会文写道：“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农夫做牛马，土豪似神仙。同生一块地，穷富两个天。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②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在少年时期就有了初步的民主进步思想。

一九二一年，蔡会文进入盘田小学；一九二三年入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长郡中学。入长郡中学不久，他积极参加学运活动，并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他组织同学成立了南星读书社和攸邑旅省同学会^③，主办《攸县同学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这年暑假，他偕刘振国等同学回到攸县，在横山、了江桥、大桥一带，宣

①见凉江84岁老人刘回生的回忆。

②易任远、易湘藩、刘灵等的回忆。

③攸邑旅省同学会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组织，会员有刘谭豪、谭阳隆、黄弼教、刘振国、吴仲华等。他们在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攸县革命运动的领导骨干，并先后为革命牺牲。

传发动群众。后又回到家乡山田，在栖真观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土豪劣绅欺压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起来清算血泪帐，实行二五减租。为了带头均贫富，他召集百余贫苦农民到自己家里担谷，动员母亲拿出钱来，向每个担谷的农民箩里扔一块银元。之后，他又带领农民群众到大土豪张家恂、陈扬芬家里吃大户，迫使他们开仓济贫。假满返校后，蔡会文被长郡中学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党员。

(二)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湖南省委为培养军事骨干，建立武装，适应高涨的革命形势，成立了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总队。蔡会文应选到总队训练，和刘亚球一起被编在第二（或第三）大队第三中队，任第二班班长兼党小组长。经过严格的训练，他的政治、军事素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升为排长。五月“马日事变”时，干训总队首先遭到袭击。他率领同志们抵抗到最后才撤离长沙城^①。撤出长沙后，蔡会文与胞兄蔡忠（中共党员）化装回到攸县。此时，父亲久卧病榻，生命垂危，母亲要求他兄弟俩“收心”，别再“乱闯”了。蔡会文对母亲说：“救国救民的革命路，我们走定了。我俩不需要继承父母的家业，只要得到父母的支持。”

团防局长、大土豪陈扬芬，闻知蔡家兄弟回来了，深夜带着团丁破门而入，对着蔡母大骂：“你家出了这样的‘乱臣贼子’，不治掉，我们将后患无穷。”遂指使团丁搜查。这时，

^①刘亚球回忆蔡会文。

蔡会文兄弟已破窗出走，当晚来到王背冲李贞元（中共党员）家，嘱李串连党员，坚持秘密活动，待他到外地找党组织联系工作^①。

七月下旬，蔡会文辗转来到武汉，党组织派他去卢德铭领导的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任第一营第一连党代表^②。八月上旬，他随部队挺进湖南浏阳，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警卫团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秋收起义失败后，他随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军。在攻克莲花，占领古城，围攻宁冈战斗中，蔡会文总是率领战士，勇猛冲杀，立下了战功^③。

一九二八年三月，蔡会文深入江西永新秋溪乡作调查研究，先找受苦最深的贫苦农民蔡球、李和林、张桂仁等，讲解共产党的政策，宣传革命道理。经过教育，蔡球等人串连三十多个苦大仇深的穷苦农民，成立了贫农协会。接着，又发展他们中的十三人入党，建立了秋溪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成立了暴动队和赤卫队。在党支部领导下，秋溪乡人民在为红军侦察敌情，送子弟参加红军，将打土豪得来的钱粮支援红军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久，还成立了中共秋溪特别区委^④。

一九二八年八月，蔡会文被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教导队任党代表，肩负培训基层军事骨干的任务。他同正副大队长梁军、周子昆一起，向学员们讲军事斗争形势，讲官兵平等，讲红军纪律，讲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还教唱《国际歌》，坚定大家斗志，鼓舞革命信心。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

①参见1929年9月7日攸县政府对李贞元等人的判决书。

②浏阳县文家市纪念馆所藏资料。

③陈仕渠的谈话记录。

④蔡球谈蔡会文在秋溪乡建党的情况。

每人每天只有四个铜板作盐油和菜金，粮食要靠自己到鄱县等地打土豪筹办，然后脱下裤子扎了裤腿当袋子背上山，有时还要上山挖冬笋来充饥。蔡会文也常到茅坪背谷子，每天用石块磨两斤谷做饭。冬天没有被子，他跟学员一样盖的是稻草。一次，朱德到教导队检查工作，看见大家晚上冻得睡不成觉，就说：有办法，起早一点，跑步爬山，身上不就热了吗？此后，蔡会文便带领学员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翻山越岭跑上两三个小时，既暖和了身体，又训练了部队。特别是他每天早晨与猎犬赛跑的苦练精神，更受到学员的称赞。为了使学员们成为不仅是军事骨干，而且是能写会说的武装宣传员，他又耐心教学员们学文化。没有黑板，就拿茨坪祠堂门口的两块大石头当黑板；没有粉笔，就用木炭棒代替；没有课本，就教习当时的革命口号和标语^①。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达瑞金中央苏区，蔡会文任支队政委^②。一九三〇年三月，他随毛泽东到会昌城开展工人运动。月初，他来到筠门岭镇，在牛栏背（山名）主持了党员宣誓和支部成立大会。接着，又帮助成立筠门岭赤卫队，打击了国民党筠门岭镇区分部委员朱功贻的进攻，活捉了朱功贻，缴了民团的枪枝，并成立了中共筠门岭镇区委会^③。

（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蔡会文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

①宋裕和谈红军教导队，永新苏区老人的回忆。

②郭化若谈蔡会文。

③会昌纪念馆：《筠门岭地下党支部的建立》，未刊稿。

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四军由江西重新开回闽西，在汀州进行休整，前委决定将红四军一、三纵队扩编为新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①，并以江西地方武装二、四团为基础，扩编组成红三军，由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蔡会文任政委^②。当时，蔡会文年仅二十二岁。他针对红三军组成成分复杂，以及战士中普遍存在着地方观念、农民意识、旧军队习气等情况，在汀州休整期间，用古田会议精神教育部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向指战员宣讲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比分析红军与白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分析斗争形势，指出奋斗目标和革命前途，并特别强调党支部、党小组和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使部队民主作风得到发扬，官兵关系大为改善，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得到克服。

在汀州期间，蔡会文会见了胞兄蔡忠（红十二军三十四团政委，后牺牲于陕北战场）。此时正是他兄弟俩自武汉参加革命武装三周年。久别重逢，他以“赤潮”署名题字留念：“三周年纪念的我俩，具备了牺牲奋斗的决心。”借以表达对革命忠贞不二的赤诚^③。

八月，黄公略、蔡会文率领红三军挺进湖南浏阳县之文家市。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击毙敌旅长戴斗垣，并歼其部属五千余人。不久，回师江西，进入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开辟新的战场，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

①扩编后的红四军由林彪任军长，罗荣桓任政委；十二军由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

②郭化若谈蔡会文。

③题照现存攸县党史办。

剿”，争取了主动。年底，红三军和红四军等在龙冈附近山中，全歼敌第十八师九千余人，活捉了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之后，红三军分驻藤田、潭头、东固一带休整，从事地方工作。当时正值青黄不接，加上敌人封锁，粮食供应困难。蔡会文带领干部战士上山挖竹笋，下水拣田螺、捉泥鳅，想方设法解决生活困难，减轻地方负担。

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三军在兄弟部队协同下，也取得了很大战绩，先后消灭了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王金钰之四十七师和韩德勤之五十二师。毛泽东曾以“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赞誉黄公略、蔡会文领导下的红三军。

蔡会文在红三军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也执行过“左”的肃反方针，曾将军部参谋曹里怀当“AB团”分子关押审讯。后来，他听了朱德的指示，终于承认了错误，没有加害同志^①。

(四)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蔡会文从江西省军区（当时任政治部主任）调到湘赣省军区任总指挥兼政委，兼红八军政委^②。

蔡会文和红八军军长肖克一同到达湘赣苏区之后，即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为目标，立即投入紧张纷繁的战备工作。十一月七日，在湘赣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蔡会文代表省委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传达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

^①郭化若谈蔡会文（1982年10月）。

^②参见张国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编成情况》。

指示，发布了“关于紧急动员，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政治动员，并对扩大红军、统一各级指挥关系、加强内部肃反、实行赤色戒严等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①。

十一月中旬，敌人完成了对湘赣苏区“围剿”的兵力部署。蔡会文与肖克决定首先率红八军向从安福进攻苏区之敌五十二师发动还击，并命令各独立师、团及其他地方武装进入苏区西、南边沿地带牵制敌人，配合作战^②。十一月十六日，红八军开始在安福金田向敌人一五六旅发起攻击，随后又在官田攻打一五四旅及与之协防的靖卫团。经过近半个月的频繁战斗，给了从东北方向逼进永新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并恢复了一部分苏区。但官田之役自己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伤亡一百五十余人。蔡会文等旋即修正了湘赣红军的行动方针，决定积聚主力，采用内线作战，在有充分胜利把握的前提下，乘敌向苏区进犯时，选择其一点予以击破的原则，不打有坚固设防的据点工事，不打无充分胜利把握的冒险战争与盲动战争，并指令各地方武装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以战胜敌人^③。

但是，受王明“左”倾错误控制的中革军委，却规定只有二千多名战斗人员、且无攻坚武器和攻坚经验的红八军，向敌人布有十二个团兵力，在萍乡、宜春、分宜、彬江和阜田、丁田、油田等重要城镇构筑有坚固工事的袁河流域出击，要求打通与湘鄂赣苏区的联系，同湘鄂赣之红十六军呼应，以配合中央红军迅速完成向北发展之任务。蔡会文等从实际出发，没有轻

①参见《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2年12月19日）和《通令》第四、七号（1932年11月6日）。

②③参见《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报告第一号》（1932年12月20日）。

率地接受中革军委的这一决定，而把“培养八军，使八军具备能消灭两个团敌人的力量”，作为湘赣省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①。

十二月十五日，蔡会文与肖克率领红八军由永新高桥头出发，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我们群众基础较好的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发展。二十一日，他在《红三军团八军关于部队及湘赣苏区情况报告》中，向中革军委据实申述了红八军这一行动的理由和意旨：“八军如要达到配合主力红军向北行动的任务，必须：A、攻破敌人之一据点，并消灭或击溃敌人之援兵；B、迅速渡过袁水流域，与十六军取得密切联系。但第一项我们觉得八军目前数量不足，战斗力不强，要突破已搞好工事的敌人据点……很少可能。”“第二项，我们取得渡过袁水流域是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困难。但渡过以后，敌人一定会固守袁水各据点，一面集中几团兵力分路向我们追击。这时，白匪通讯容易，我们联络困难，敌情难明，不好放手打仗。”

“我们认为向遂万泰行动，正是与主力红军的行动相呼应。截断赣江交通，威胁吉、遂、万、泰之敌，使吉、赣之敌不敢大胆向中区前进。”^②

红八军进入遂万泰边区之后，一面进行休整训练，一面开展地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不仅帮助建立了遂万泰中心县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力量，而且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打击和牵制了吉安至赣州一线的敌人，支援了中央红军在抚河地区的战斗，还恢复了遂川以北、永新以南的大片苏区^③。红八军的

① 《红三军团八军关于部队及湘赣苏区情况的报告》（1932年12月21日）。

②③ 蔡会文、肖克1933年4月13日给军委的报告。

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三三年春，继于田墟一举击溃敌二十八师四个营之后，四月七日，又对该地守敌八十三旅及一六六团发起佯攻，调动了驻守遂川城内之敌增援，于运动中全歼援敌一六五团第一营和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营。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只用了三十分钟即结束战斗，毙俘敌营长以下四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四门、重机枪二挺、长短枪一百三十多支，扭转了湘赣红军在战斗中的被动局面^①。

一九三三年夏天，敌人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攻势，在湘赣苏区周围和腹地进驻了九个师近四十个团的主力部队。在此紧要关头，蔡会文和肖克立即从赣南挥师北上，返回永新，部署新的大战，并将吉安及永新独立团编成警卫师，分别到宁冈、酃县和遂川、崇义活动，钳制湘敌王东原部和粤敌余汉谋部；命令萍乡独立团和醴陵游击队编成新独立一师出击东朝、黄土街、老关之线，牵制湘东之敌；将北路独立团及各县独立营编成新独立三师，在泗水墟、三湖、河埠一带游击，相机打击二十七师、二十三师等向北路进犯之敌；又抽调各县地方武装组成挺进游击队，积极向敌后活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主力^②。蔡会文和肖克则亲率红八军打击深入苏区腹地的敌人，在运动中逐次剪灭其爪牙。

占据宁冈、莲花等地的湘敌王东原部和陈光中部，其粮秣、弹药等一切军需用品，都必须依赖茶陵至莲花间的唯一通道来运送。蔡会文和肖克等决定，截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迫使敌守城部队出援，以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五月初，他们将

①蔡会文、肖克1933年4月13日给军委的报告。

②蔡会文：《湘赣地方武装之编制及行动部署》（1933年4月30日）。

红八军和独立第十二师调至这条运输线的棠市、九渡冲一线，捕捉战机。湘敌为保证军需供应，果然不断派兵来维护交通运输线。我红八军和独立十二师，在蔡会文、肖克指挥下，自五月六日到五月底，在九渡冲、棠市一带连战皆捷，先后击溃敌六十三师三个团，全歼其两个整营，打垮十五师一个旅，消灭十九师一个团，俘敌近千，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重机枪三十余挺，二华特电台一部，并截获八千多套军装等大量辎重，取得了以少数兵力、劣等武器战胜优势兵力、装备齐全的敌人的空前胜利，得到了中央的嘉奖^①。

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发起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西路“剿总”、国民党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将总部移驻莲花，统率彭位仁、陶广、李觉、陈光中、王东原等五师之众，向湘赣苏区进攻。

为了打破敌人的新的进攻，蔡会文等五月间在指挥九渡冲大捷的同时，就开始了下一战役的准备工作。五次反“围剿”开始后，苏区军民在蔡会文、肖克等领导下，广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袭敌、扰敌，破坏敌人交通，断绝敌人后路，终于迫使占领苏区腹地局部的敌人，除了派出小部队进入苏区中心骚扰之外，其余只好缩在碉堡工事里与我相抗。

一九三三年秋后，中革军委命令湘赣红军坚决执行进攻路线，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消灭进攻湘赣苏区的湖南敌人，夺回莲花、宁冈、茶陵、攸县，恢复上犹、崇义苏区，打通中央和湘鄂赣根据地的联系，以利向北发展，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从

^①肖克：《报告（二）》（1933年6月9日）。

七月底开始，红六军团^①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挺进到莲花、宁冈、茶陵，十月进兵醴陵^②。这一系列战争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因“强攻工事及兵力分散，未能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一点，结果，终日未解决战斗，回到新城（即永新县城）”^③，造成梅花、七溪岭失守，秋溪和莲花战斗不能获胜，以致永新城被陷落^④。此时，蔡会文积极设法挽回局面，争取永新和万（安）、泰（和）地区的重新赤化^⑤。

蔡会文对湘赣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初来湘赣时，红八军的前方战斗人员仅有二千一百人（一说一千八百）。在他和肖克等的共同努力下，红八军迅速壮大到四千余人，还新组建了独立师、团等地方武装。在军队建设中，他特别注意部队的教育和训练，教育干部“不要天天忙于东奔西跑，尽可能每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休整训练，反对不要训练或借口没有时间不能训练”等错误倾向^⑥。他自己经常利用战斗间隙亲自抓全军副连长以上及各师班长以上干部的训练。选拔有经验的忠实勇敢的同志分别到湘赣红四区分校和中央红校学习^⑦。还开办了工人特别训练班，注意培养工农干部。任弼时后来回忆说：蔡会文对湘赣红军的建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特

①红六军团由湘赣之红八军改编的十七师及湘鄂赣之红十六军改编的十六师组成，成立于1933年6月。

②参见《红二方面军战史》（1963年1月）。

③参见《湘赣军区检查战斗失利原因系犯右倾的报告》（1933年9月23日）。

④见《蔡会文的申明书》（1934年2月）。

⑤见《湘赣军区任（弼时）蔡决定主力之行动及独立营任务的请示报告》（1933年12月27日）。

⑥见《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报告第一号》（1932年12月20日）。

⑦蔡会文、肖克1933年4月13日给军委的报告。

别是在部队的教育和正规化建设方面^①。

蔡会文由中央主力红军调到湘赣之初，对地方党的领导不能够尊重，经过省委批评，他很快就纠正过来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之风。只要工作或战斗达不到预期效果，都会被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一九三三年冬，梅花、七溪岭失守，莲花、秋溪战斗未能获胜，指挥战斗的是龙云、李芬，但蔡会文却认为这是由于“在部队中没有广泛的开展反对（以）我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所以龙、李又重复表现这样的错误”^②。自己首先承担了责任。一次，湘赣军区短枪队深入湖南白区筹款，把蔡会文的母亲也抓了，并关押在永新。他听了汇报之后，表扬短枪队的同志干得好，还说：“我母亲是地主，不要以为他儿子在共产党里当了大官，就不要抓了。”早在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一方面军分赴攸县、萍乡筹款，开展地方工作时，蔡会文就同在十二军工作的胞兄蔡忠商定，叫他随十二军进入攸县时，再次动员母亲把财产分给农民，叫弟弟郁文入伍参加革命。可家里人不听劝告。因此，他在永新见到母亲就说：“你不把财产全部分给贫苦农民，我就不认你这个母亲了！”事后，有些同志叫蔡会文的妻子出面说情。蔡会文得知后，又告诫妻子：“公事公办，你决不能利用我的权力去徇私情。”^③蔡会文无私无畏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不怕“左”倾错误的高压打击，挺身保护了一批好同志和党的优秀干部。他在参与批判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

①《任弼时同志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1944年10月26日）。

②《蔡会文的申明书》（1934年2月）。

③傅云飞、刘广生的回忆。

的所谓“右倾”问题时表现“动摇”^①；还同王震、肖克等一道保护过被错打成“反革命”的张启龙^②。蔡会文从党的利益出发，关心爱护革命同志，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当时在湘赣工作的冯达飞是黄埔一期生，后毕业于苏联炮校，又会开飞机，并富于研究性，但他不适应部队的战斗生活。蔡会文向上级建议，调冯达飞去中央红军大学任教官，帮助领导合理使用人才^③。

蔡会文身居要职却没有官架子。他年轻，有能力，富于才华，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尤其艰苦朴素。据当年苏区的一些老同志回忆，他有时冬天也只穿一条短裤，扎上绑腿，朝气蓬勃地跟士兵一起练武，一同劳动，吃饭时他也端着碗跟士兵混在一起吃，老百姓都说他“爱兵如子”^④。

蔡会文在湘赣工作时，通过实践逐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之后，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坚持跟王明的冒险主义作斗争，并实际地扭转了湘赣苏区的战局，而且善于讲究斗争策略和艺术。例如，他在写给中革军委的历次报告中，反复强调执行“积聚主力，乘敌人分进未达到合击之前，选择一点，有充分胜利把握地击破敌之一路”，“动作应迅速，进退无定，变化无常”；“不打硬仗”，不打“冒险战争与盲动战争”，要采用游击战、运动战之战略战术。但是他又在这些提法当中往往冠之以“坚决进攻”、“当然不是诱敌深入”、争取中心

①参见《蔡会文的申明书》（1934年2月）。

②见《回忆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张启龙1982年9月在浏阳的谈话记录）。

③蔡会文《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报告第一号》（1932年12月20日）。

④袁家瑞、胡坚谈蔡会文（1982年4月）。

城市的任务“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地动摇”等等言词，以敷衍“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从而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得到有效的实施和执行，胜利地领导了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正是由于他在执行中央“坚决进攻”路线时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机械地拿三次战争（即毛泽东领导的一至三次胜利地反“围剿”战争）的战略经验，运用到四次战争中来，实行与中革军委坚决进攻战略恰恰相反”的行动方针^①，加上个别战斗的失误，导致了执行“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他的打击和迫害。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蔡会文辞去了红十七师政委职务，调回省军区机关工作。在省委会议上，批判了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刘士杰等去参加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向中央报告了关于蔡会文的情况，于是中央又撤销了蔡会文湘赣军区总指挥的职务^②。肖克在回忆中说：蔡会文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是有一些缺点的，挫伤了一些干部的积极性。但是，他在湘赣工作一年多，成绩是主要的，指挥打仗，建设军队都有很大功劳。把他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当作一条错误路线来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后来撤销他军区总指挥的职务，更是做得过分了^③。

（五）

一九三四年春，蔡会文参加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四月，筠门岭战斗失利，中革军

^①《蔡会文的申明书》（1934年2月）。

^{②③}肖克谈蔡会文（1981年9月5日）。

委重新任命蔡会文担任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一说任政委）^①，担负保卫中央根据地南大门的重任。主力红军准备长征的前夕，中央又于九月委派蔡会文任赣南省军区司令员，与项英、陈毅、方维夏、贺昌、阮啸仙等坚持在中央根据地斗争^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被迫实行长征，以项英、陈毅为首组成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领导红二十四师和三、七、十一等独立团，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由于项英继续坚持大兵团作战的错误方针，使我兵力锐减，被压到于都与赣县之间的仁风山区。后来，中央多次来电敦促中央分局及所属部队“应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进行游击战争”，才决定分五路突围。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蔡会文、陈丕显、阮啸仙、刘伯坚等率领赣南省军区部队一千八百多人，开始从仁风山的黎板桥突围，蔡会文和陈丕显亲率先头部队为省委机关干部和后继部队开路^③。突围途中，蔡会文写了《七绝》一首，生动地流露出他对中央根据地的依恋深情，表达了他冲破艰难险阻，为革命开辟新的战场的坚定信心：

连天烽火炮声隆，
惜别赤都情意浓；
突破重围千万叠，
挥戈直指油山中^④。

①刘道生的回忆，刘建华谈蔡会文在红军长征以后的情况（1978年11月和1981年7月）。

②③陈丕显谈蔡会文（1981年8月）。

④诗稿存陈丕显处。

部队进到马岭，突然遭到敌人从两山之间发起的猛烈攻击，部队被拦腰截断，赣南省委和省军区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全被打散。蔡会文等组织我军连续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省委书记阮啸仙不幸牺牲，军区参谋长刘伯坚因重伤被俘（后被杀害于大余）。为了打破敌人的堵截，陈丕显不断鼓励战士奋勇拚杀，蔡会文端起一挺轻机枪冲在最前头为部队开路。战士们在司令员的鼓舞下猛冲猛杀，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闯过马岭，进入牛岭。

牛岭系战略要道，敌人在这里筑有坚固的堡垒，死守不放，我军无法通过。蔡会文立即挑选一批精壮战士，组成突击组和爆破组，由他亲自带领冲入敌阵，迅速抢占了一个制高点，用猛烈的扫射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爆破组接近敌堡，突破了敌人的碉堡防线。接着，蔡会文带领部队越过牛岭，继续向南挺进^①。

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奋战，部队伤亡惨重，冲过牛岭后，一千八百多人的部队，仅剩下八十余人了。同志们苦笑说：我们的司令员成了个连长了。但是蔡会文仍然坚毅地带领大家奋勇向前。他亲自率领警卫班开路，凭一个指南针，借助风雨辨别方向，看一山，走一山，来到桃江，沿途被打散和负伤的战士也陆续赶上了队伍，总计又有三百多人。在桃江，蔡会文让大家稍事休息，一面派人去找当地党组织。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又饥又乏，一听休息，身子一挨地便呼呼入睡了。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一觉醒来，发现蔡会文在为大家担任警卫，激动地说：“司令员，你也该休息了。”蔡会文却兴奋地说：“阿丕同志，现在好了，我们找到大龙区委了。”说罢，顺手把刚填好

^①陈丕显谈蔡会文（1981年8月3日）。

的一首《好事近》递给陈丕显，词曰：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①

大龙区委为部队补充了给养，战士们又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征途。行至离信丰河十多里的地方，前面有粤军挡道，被甩掉的追兵也从后面尾随赶上。蔡会文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以猛虎扑羊之势，一鼓作气击溃了粤军，到达了信丰河边。信丰河水深浪急，难以涉渡。此时，追兵和被击溃的粤军残部汇合后又向我压来，蔡会文立即命令部队抢占了一个山头。这座山前面是一道缓坡，后面却是悬崖。战士们刚到山顶，敌人就在缓坡上展开了。指战员们异口同声喊道：“不走了，和敌人拚了！”大家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搬不动了，就拚刺刀，有的同志刺得太猛，刺刀拔不出，干脆用枪托击。不少重伤员提出把他们留下掩护，要求司令员带队突围；许多共产党员坚决“请求党给我们最后一次任务！”……

①词稿存陈丕显处。

蔡会文始终跟大家一起战斗在前沿阵地，终于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为了摆脱困境，他叫大家解下绑带连接起来当绳子，准备把指战员吊下悬崖脱险。可绳子扎牢之后，同志们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先下。急得几个团、营干部无法，就一拥而上，把蔡会文一把捆住，说：“为了党的工作，为了部队的生存，你司令员一定得先下去”。不容分说，大家硬把他吊下悬崖，然后战士们才一个个吊下去。待敌人追至悬崖，我军已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从王母渡渡过了信丰河。这时，我军好一点的武器只剩下一支轻机关枪了①。

从仁凤山突围到渡过信丰河，历时近一个月。蔡会文带领部队打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终于打开了通向油山的胜利进军道路。蔡会文在戎马倥偬中哼就的《浪淘沙·突围行军记事》，生动地再现了我英雄红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豪迈气概：

料峭春寒浴，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惊敌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如虹。

①谢友才谈蔡会文（1981年7月17日）。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①

四月初，蔡会文、陈丕显率领部队来到油山，与先期到达的项英、陈毅和贺昌等同志会师②。

每当回忆这段战火纷飞的戎马生涯，陈丕显就对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蔡会文充满了敬意和怀念之情。他说：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达油山这一段时间，我几乎与蔡会文寸步不离。我常说：没有蔡会文的正确指挥，就没有我们这支红军部队。因为当时领导突围的阮啸仙、刘伯坚先后牺牲，剩下蔡会文和我。我当时年轻，又没有作战的经验，部队往哪儿冲，怎么打，都是蔡司令员亲自指挥。他不仅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他端着一挺机关枪，勇敢地冲在最前头，我对他的印象是极其好的。他年轻英俊，能文能武，很会打仗，作风过硬。他那时年纪不过三十左右，然而他对革命之坚定，操算之稳重，指挥之得当，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那老练持重的态度，以身作则的作风，实在叫人佩服。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却非常之谦虚谨慎，态度极其和蔼，毫无咄咄逼人之态，打起仗来，尤其以身作则，不怕牺牲，吃苦耐劳，爱护士兵，实为一个优秀指挥员③。

(六)

根据南方游击总指挥部长岭干部会议的决定，蔡会文带领

①陈毅：《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1957年7月讲话录音）。

②③陈丕显谈蔡会文（1981年8月3日）。

一支三百人的红军武装，到上犹、崇义、桂东、汝城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蔡会文和他率领的部队来到了湖南桂东县的东边山，与方维夏、周礼、陈山领导的游击队汇合，成立了中共湘粤赣边特委和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蔡会文任特委委员、游击支队长兼政委，罗荣任参谋长。特委决定以赤水仙为游击支队总部，以桂东的东边山、西边山为活动中心，深入持久地开展游击战争^①。

西边山，山大林密，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地处湖南境内，主要敌人只有湘军，比较容易对付。东边山是湖南、广东和江西的界山，一拉旗帜，震动三省，因此招来的敌人也多。为了扩大革命影响，牵制更多的敌人，保卫设在北山的南方游击总部机关，支援北山、油山的游击战争，蔡会文亲自率领两个大队进入东边山，为革命勇敢地承担起更大的风险^②。

蔡会文来到东边山之后，立即带领战士深入到各个山村，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和欺骗伎俩，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他们参加与支援游击战争。

东边山群峰绵亘，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加上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群众一听说“兵”来了，不分红白，就躲进深山。蔡会文带领指战员经常深入山庄空院，为老乡打扫屋场，挑水，割草垫圈。到老百姓家里买点吃的，总是按斤两加价付款，老百姓不在家里的则写个字条，留下现金。当地群众终于明白了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来了，高兴地互相传递红军到过自己家里的消息，

^{①②}《关于湘粤赣游击支队成立前后的情况》（未刊稿），存桂东县革命活动陈列馆。

都主动地跟游击队亲近起来^①。

东边山的群众，长期受豪绅地主和反动势力的盘剥勒索，生活穷困不堪。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蔡会文经常带领游击队下山打土豪。当时，虽然部队生活很艰苦，突围出来，战士们除了枪枝以外真是一无所有。但是，打土豪得到的衣物，都首先分给了群众，使当地老百姓非常感动。在打土豪的斗争中，蔡会文特别注意执行党的阶级政策，每逢抓了人，都要请当地群众辨认是不是土豪。有的老乡怕土豪认出了自己以后遭报复，不敢去认。蔡会文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让他穿上，叫他站在暗处去认^②。

群众发动起来了，青壮年争着参加红军游击队，老年人和妇女自动为游击队购运物资，担任秘密交通员，有的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保障红军游击队的安全。方冈有个叫方传启的老人，被敌人抓住带路搜山。老人把敌人领到一座桥上，突然返身拖住一个敌人跳进河里，跟敌人同归于尽^③。

蔡会文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说，群众越是拥护我们，我们越要关心爱护群众，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注意群众纪律。上庄有个李春源，经常为游击队送物资和情报，跟游击队亲如家人。因为他很瘦，有些同志叫他“鸦片烟鬼”。蔡会文不许这样称呼老乡。每次李春源一来，蔡会文总是亲热地一边叫“老李”，一边把饭菜送到他手里，问长问短，还留他跟自己睡一张床。有一次，有个战士弄坏了李春源的一盒“如意油”（即清凉油），被蔡会文知道了，要那个战士赔偿了两个

①赖昌茂、杨汉林、谢友才、余庆腾的回忆。

②参见谢友才的谈话记录和桂东县知情老人的回忆材料。

③郴州地委《党史通讯》1983年第1期。

铜毫子。老李不肯要，不声不响地走了。事后蔡会文打发警卫员从晓水坳追到谷耙坳，赶了十二三里路，硬把两个铜毫子交给了李春源^①。

由于蔡会文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以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包括湖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赣南的遂川、上犹、崇义、大余和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边界，游击支队也很快壮大到一千人。尽管敌人纠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对游击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疯狂“围剿”，但湘粤赣边游击支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仍然非常活跃地战斗在三省边界上。

（七）

湘粤赣边游击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红军游击支队的不断壮大和活跃，引起了湖南、广东和江西三省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迅速集结三个主力师，又纠合我根据地周围十数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以数十倍于游击队的优势兵力，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进行“会剿”，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等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并强迫移民并村，控制集市贸易，进行经济封锁。敌人利用叛徒李宗保（原红四团团团长）等恶棍做向导，到处搜山纵火，洗村劫寨，把崇义的冬瓜棚、赤水，上犹的十八垌，桂东的上下庄、晓水、芳村等数十个山村化为焦土。上庄贫农妇女李风娟来不及逃避，一家大小全被杀绝，连不满一岁的婴儿也不放过。反动派血洗过的地方，一片荒凉凄

^①桂东县李春源的回忆材料。

惨的景象，有的稻田里后来竟长出碗口粗的松树。

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会剿”，蔡会文想了许多办法。敌人大规模进攻，游击队就化整为零，编成十几人至三四十人的小分队，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分散到各个山头隐蔽起来，不和敌人硬拚，实行“保存实力，等待时机”的方针。兵力分散，目标小，但是也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了保证兄弟部队的安全，蔡会文常常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次，他和周礼、罗荣带领四十多个战士，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朱冠山赤水仙庵子下面的山腰里，上面赤水仙庵子里驻了敌人一个营，粤敌彭霖生的师部驻扎在下面的上堡墟，左面的上犹营前墟还有敌人一个团驻守。蔡会文领导的小部队离前后左右的敌人大部队都不过三十里之遥，他们今天在这个小山头，明天到那个小山头，使敌人摸不着，碰不上，又离不开。在战役上，“赚钱就干，赔本不来”，一遇战机，迅速集合，歼灭敌人。有一次，何健部三个连来搜山，蔡会文带领一支小部队正在一个陡坡上，很远就看见敌人一个连在搜索前进。他果断地对周礼说：“送上砧的肉，先吃掉它一个连再说。”待敌人进入射击区，蔡会文指挥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一个猛虎下山，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人。听到枪声，隐蔽在其他山头的兄弟部队也迅速合围过来，将何健的三个连一并全歼^①。

敌人分散进击的阴谋被粉碎之后，又组织起所谓“跟脚队”、“望火队”、“砍山队”，绞尽脑汁企图找到游击队这支“飞兵”。蔡会文又教育指战员涉水过溪莫踩露出水面的石

^①周礼谈湘粤赣游击队及湘南特委的变迁（1980年11月10日和1982年7月3日）。

头，用于柴生火、趁浓雾做饭，不让敌人发现部队的一点痕迹。他还让战士们化装成民工，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把带队砍山的地主恶霸、保长干掉。敌人的阴谋再次破产，气得到处放火，把山上的民房烧个精光，连厕所也不留。群众却对战士们说：“让他们烧吧，烧了旧的，以后我们盖新的。”战士们非常激动：“老倭，这话说得对哇！我们队伍里米匠、石匠、泥水匠有的是，等到革命胜利了，俺们还要盖高楼大厦呢！”①

敌人切断了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粮食。即使群众偷偷地送来一点粮食，也没法煮。蔡会文跟同志们一样，没有粮食就吃野草，没有东西煮饭，就拣些稍大一点的破水缸片或者喝水的搪瓷缸子来烧，有时甚至饿着肚子与敌人周旋②。

一九三五年秋后，东边山的斗争形势日趋困难，油山、北山等根据地的处境也更加艰难。蔡会文派出一个大队跟项英、陈毅联系，支援总部的斗争。他还派出一个小分队深入湘赣根据地，支援谭余保领导的游击斗争③。

由于战争越来越残酷，生活越来越艰苦，游击队里叛逃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原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之后，给部队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为了安定部队的情绪，坚定大家的信心，蔡会文经常深入到各个游击分队的驻地，找干部战士谈心，召开会议，帮助大家认识革命形势。他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要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要有坚定的信念。他还说：我是一个出身地主家庭

①谢友才谈蔡会文及其游击战争。

②余庆腾谈蔡会文在湘粤赣边的活动。

③参见《一九三七年项英同志的讲话》。

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升官发财，不呆在家里搞家业、享清福，而甘愿吃这个革命的苦？根本原因，就是我抱定了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革命红旗扛起来，扛到底。他向大家讲述革命一定会胜利时说：我们的部队虽然小，我们可以占山为“王”，开展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不断扩大根据地。过去贺胡子（即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毛委员上井冈山时人也不多，却搞红了小半个江西；我们有大家在，为什么不能搞红整个湘粤赣边？我们不要让暂时强大的敌人吓住了，其实敌人并不可怕，敌人象一头很凶又很笨的野牛，在深山密林里瞎闯，我们有时敲它一下脑壳，有时揍它一下屁股，有时给它拦腰一棍子，有时牵着它的鼻子满山转，它发怒了，朝我们猛冲，我们又闪到它的身后……这样，牛魔王碰上了孙悟空，即使它再肥大，再凶猛，也要被拖瘦、拖垮、拖死^①。蔡会文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和胜利信心。为了不连累老乡，战士们在山上搭棚子安身；没有粮食，就吃草根树皮。冬天，几个战士紧挨在一起，靠自身的体温，再加一把树叶御寒，坚定地朝着胜利的目标前进^②。

一九三五年冬天，敌人更加紧了对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广东军阀陈济棠不仅搬出他的精锐第一军，而且增派了铁甲兵教导团，湖南方面也补充了胡凤璋旅和何宗汉保安团，并指令衡阳卫戍司令欧鉴京前往桂东“督剿”；叛徒龚楚也戴着“剿共游击司令”的头衔，进山充当帮凶。隆冬腊月，

①②赖昌茂谈蔡会文（1982年5月）。

寒风彻骨，被困在丛林里的游击战士缺衣少食，忍受着极度的痛苦，与饥寒作着顽强的斗争。形势虽然十分险恶，蔡会文仍镇定自若，指挥小分队在显垌、上堡、晓水坳、刘家排、鹰打圈等处，给了敌人以无数次的打击。胡凤璋折了老本，就在桂东一带强迫每个农户出一二个壮丁，搞了些“灶头勇”当炮灰，蔡会文提出“不打灶头勇，专打胡凤璋”、“穷人不打穷人”等口号，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灶头勇”一遇到红军游击队就自动放下武器，有的还向游击队透露了敌人的消息^①。

一九三六年初春，在一次与余汉谋部的遭遇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全部被打散，蔡会文身边仅有十多名战士，跟周礼也失掉了联系，只得向朱冠山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最后，他带领九名战士来到一幢破房子里稍事休息。由于连续转战，又值春荒时节，他们已有好些日子没有见过一粒米星子，个个又饥又累。蔡会文叫管理员下山买粮。不料这个管理员一下山就被俘叛变，然后带着化了装的广东铁甲兵教导团来搜山。这时，蔡会文正跟战士们在破房子里煮野菜，哨兵发现一大群敌人围了上来，刚鸣枪报警，就被敌人击倒。蔡会文闻声跃起，举枪还击，掩护战士突围，他自己带两名警卫员断后。战士们才突围到麻婆垌的一座山脚下，一名警卫员中弹牺牲，蔡会文也多处负伤。身边的战士们要背他撤离，他说：“你们赶快走，我已经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赶快冲出去！”他伏在地下仍坚持举枪还击，让剩下的战士安全脱险。这时，他背部又中一弹，昏倒在血泊中，被敌人俘获。敌人得知他就是蔡

^①赖昌茂谈蔡会文。

会文司令，立即备了竹椅要把他抬回去请功。蔡会文苏醒之后，破口大骂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从椅子里跳出来，不准敌人把他抬走。敌人恼羞成怒，竟残忍地用刀割断了他的脖子。顿时，鲜血和草汁从他的咽喉里一齐喷出，蔡会文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①。

蔡会文将军把他自己短暂的一生和全部才华，献给了伟大的党，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是装着满肚子草根、树叶为革命而战死的^②。

蔡会文将军永垂不朽！

①余庆腾谈蔡会文在湘粤赣边的活动和穆青：《二十年不屈的斗争》，载1949年10月15日《新湖南报》。

②周里1980年11月10日及1982年7月3日的谈话记录。

郑 义 斋

刘 炳 强

(一)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一九〇一年^①七月十八日（农历六月初三）生于河南省许昌县城关一个贫民家庭。父亲邓魁，母亲陈氏，兄弟二人。

邓少文幼时，家境贫寒，度日维艰。父亲挑着货郎担，做小生意养家糊口。母亲是一位既勤劳又能干的家庭妇女，料理家务之外，还经常纺线织布，织出的布除家人穿用，有时拿到市场上换点零用钱，以解燃眉之急。

邓少文八岁时到一家私塾读书，因家庭困难，中途几次停学，时断时续地读了四年。他禀性聪颖，刻苦好学；读过的书多能背诵，老师很喜欢他。

苦难的生活使邓少文较早地看到了人生的艰辛。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从小就热爱劳动，经常帮助大人做些家务活。在私塾读书期间，他放学回到家里，不是担水，就是砍柴。凡是力所能及的活他都干。

^①郑义斋出生年份，有1901年和1905年两种说法，按其夫人杨文局提供的情况，应是190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编》则谓生于1905年。本文采用前一种说法。

一九一三年邓少文十二岁时，许昌遭了大水灾，物价上涨，民生凋敝。此时，邓家的日子更加困窘。少文的父亲无奈，只好让他辍学，求人送到许昌一家商号当学徒。这家商号的老板“变脸王”和他的大老婆十分刻薄狠毒，不仅让邓少文每天东奔西跑购买货物，而且还要给他们倒尿盆、叠被、洗衣、扫地，稍不留心，即遭打骂。邓少文整日劳碌，累死累活，得到的却是欺压和凌辱。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一天早晨，在端尿盆时故意把尿倒洒在房内，以示愤恨。老板娘看见了，凶神恶煞地破口大骂。邓少文怒不可遏，将尿水直向老板娘身上泼去。“变脸王”恶狠狠地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仍不肯罢休，又把他的父亲抓去毒打一顿，然后送县衙扣押起来。少文母亲到处找人求情，并变卖家产交了赎金，父亲才被放回来。生性刚强的邓魁，遭此横祸，满腹冤屈无处申，一气之下，卧病不起，不到半年便含恨死去。父亲病故以后，一家几口人生计无着，年仅十二、三岁的少文被迫做苦工，艰难地维持着家庭生活。

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少文胸中萌发着反抗的种子。

后来，邓少文到许昌一家印刷厂当工人。一九二三年二月初，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邓少文积极发动和组织印刷厂工人举行了两次大罢工斗争，以示响应。“二七”惨案发生后，邓少文被资本家开除出厂。

不久，邓少文托人介绍，到京汉铁路当客车检票员。从此，他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接触，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转入低潮。邓少文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工作。他利用自

已在客车上当检票员之便，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协助运送枪枝弹药。由于他对党忠诚，革命坚决，办事认真、机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①。

邓少文入党不久，被调往上海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各地，传送党的指示、文件及经费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〇年春，党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任命邓少文为经理。该钱庄既是为党筹集经费的银行，又是秘密交通站。邓少文的公开身份是经理，对内仍然做党的交通工作。从此，他改名为郑义斋。

郑义斋在钱庄整整工作了两年。在此期间，他不计艰危，在各地党组织的配合和掩护下，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平、大连、青岛等地，为党筹集经费，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火物资。一次，党组织派他给关押在上海法租界看守所的同志送款。他装作一个小商贩，到法租界后故意违犯卫生规则，被巡警抓起来送进看守所拘留一夜，于是他便利用这一机会把款子交给了被关押的同志。另一次，党组织派他到青岛调查有关情况。不料这时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无法取得联系，经济来源断绝。然而他没有气馁，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把身边带的一些衣物变卖掉，艰苦工作数月之久，想方设法进行调查研究，终于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一春，他还奉命赴鄂豫皖苏区护送过党的干部。

^①郑义斋夫人杨文局回忆，义斋生前告诉她是1927年入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编》说于1928年入党。本文采用前一种说法。

(二)

一九三二年春，郑义斋由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任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他和财委会的同志共同努力，在开展银行业务、建立财经制度、发展对外贸易、促进苏区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以及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军主力越平汉铁路向川陕边区转移。郑义斋随部队西征，接着便投入紧张而繁重的创建和发展苏区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陕南越过大巴山，迅速占领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二月上旬，在川陕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郑义斋被选为中共川陕省省委委员。接着，他担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川陕省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亦称总后勤部）部长，并兼兵工厂、造币厂厂长。

红四方面军是从鄂豫皖苏区仓促西撤的，途中曾不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行程二千多里来到川北，随即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因而吃饭、穿衣、用钱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后来，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和红军的迅猛扩大，后勤工作的任务更为繁重。那时，郑义斋领导下的总经理部所属单位众多，分别掌管着全军的粮秣、被服、军火、财经等项工作，但实际负责的只有他一个部长，没有政委、副部长，工作千头万

绪，担子很重。然而，郑义斋毫无怨言，总是知难而上，勇挑重担，为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应，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吃粮是红军入川后首先遇到的一个十分紧迫而突出的问题。红军到通、南、巴之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这里的劳动人民终年吃糠咽菜度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了“两个月内集中三万担粮食，最近完成五千担到一万担”^①的任务；随后省委又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集中粮食和物资来适应战争的需要”^②，说明筹集用粮问题的严重困难和紧迫性。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郑义斋带领干部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总结这方面的好经验，建议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省工农民主政府采纳实行：一是打土豪，破仓取粮；二是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发动军民开荒种田，毁烟（鸦片）种粮，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在苏区号召群众捐助粮食，并派人到白区购粮；四是实行计划供粮，坚持勤俭节约；部队用粮，按实际需要和筹粮情况，定量配给；大米主要保障前方作战部队，后方多吃杂粮。

经过郑义斋的努力工作，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部队吃饭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九三五年春，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渡嘉陵江西征时，不仅部队用粮比较充足，还将一部分粮食分给了烈军属和群众。

食盐供应是另一大难题。通、南、巴不产食盐，外地运来

①《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斗争纲领》，见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1978年10月）第9页。

②《中共川陕省委一九三四年红五月工作计划》，见《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1978年10月）第37页。

的盐，量少价高，以往当地群众很少吃盐，红军入川后，必须解决食盐供应问题。川陕省委和省第二次党代会先后作出了“准备食盐”、“集中大批食盐”^①的决定。为此，郑义斋带领经理部的同志下去调查、访问，探凿盐井，仅在通江县东南就打了几十口井。经过探查、试凿，终于挖出了三口盐井。接着，他又发动大家产硝熬盐，从其它方面寻找扩大食盐来源的途径。他曾动员通江县商人陈万福联络了几个做过贩盐生意的小商，由白区运来食盐。这对缓和红军吃盐的紧张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方面军取得了仪（陇）南（部）战役的胜利，解放了素称“川北盐乡”的南部县，占领了大批盐井。消息传来，郑义斋立即带人赶赴南部县，每到一地，就把当地盐井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召集起来，组织和动员他们掏挖盐井，检修设备，使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的盐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八百多口盐井产盐。同时，还大量组织食盐收购，基本上解决了军民的吃盐问题，有力地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解决红军穿衣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军川北时，正值隆冬，经过长途转战，战士们身上穿的夹衣已破烂不堪，急需赶制军衣。郑义斋率领经理部的同志帮助各师首先办起战地被服厂，拆洗缝补破旧军衣；通、南、巴解放后，利用缴获来的一些布匹、棉花，为战士们制作了新棉衣，分批发给部队，同时把旧军衣收集起来加工。后来，还在通江县的苦草坝办起了小规模的被服厂和纺织厂。一九三三年十月宣

^① 《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斗争纲领》。

(汉)达(县)战役中,红军缴获了军阀刘存厚在达县经营多年的工厂设备,仅被服厂的机器就有几十台(部),棉衣两万余套,棉布二十万匹。总经理部决定,在原来的基础上建立男女两个被服厂(女厂后编为妇女工兵营),工人共一千五百人左右,使生产规模得到扩大。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胜利,四方面军迅速壮大,红军由入川时的一万多人发展到八万多人。为了使新扩编的部队尽快穿上整齐的军装,郑义斋和军需科的同志经常深入到被服厂和纺织厂,发动干部和职工献计献策,苦干巧干,解决了许多生产中的难题,制作出了大量衣服、鞋、袜、帽,一批批运往前方,保障了部队发展的需要。在红军渡嘉陵江之前,广大指战员基本上都能适时穿上军服。

郑义斋领导的总经理部还担负着解决部队武器弹药的重要任务。四方面军入川后,开始只有一个二十多人的修械厂,既没有机器设备,也缺乏熟练的技术力量。郑义斋带领总经理部的同志,到各部队挑选了约百人的工匠,很快在通江县苦草坝办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组织大家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修理枪械,生产火药,后来逐渐摸索做手榴弹。红军解放达县后,郑义斋当即组织人力把缴获敌人兵工厂的设备、器材、原料等全部运到通江,并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壮大苏区军事工业的工人队伍和技术力量。总经理部还对原有的兵工厂重新进行整组,建起了机械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等。“扩大后的兵工厂,拥有工人一千四百余人,各种机床一百三十八台,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修理,起了重要作用”^①。这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第244页。

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郑义斋还重视通过统战关系，解决红军物资供应的困难。一九三三年六月，在白区中共党组织的大力推动和配合下，四方面军同驻陕南的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郑义斋曾积极支持党组织秘密开辟由陕南汉中通往川北的红色交通线，并在通江碑坝设立接转物资专门机构，将大量从白区采购、收集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药品和医疗器械等急需的军用物资，及时、安全地运往前线。

(三)

作为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财委会主席的郑义斋，在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中，进行了大量而艰苦的工作。

郑义斋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十分重视，强调经济计划，经济建设必须“适应目前革命战争胜利条件”，“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他批评某些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只注重没收经济，没有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错误倾向，要求各级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认真抓好这一工作^①。

郑义斋虽工作非常繁忙，但仍经常在晚上挤时间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中寻找武器，用以分析、研究和解决经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多次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针对财经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或建设性的意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在《对于经济物质(资)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清理问题》一文中，列举了财经工作中的保守

^① 《我对财政经济工作之意见》，载1933年7月7日《干部必读》。

思想和分散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提出了十条办法，其中包括“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本身的工作”，“上下级的关系要密切”，“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经常要有对经济、财物的“精确统计”，“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发展对白区的贸易；“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见”；“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等^①。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苏区财经工作的基本经验，对于健全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由于郑义斋熟悉财经工作，善于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当时被大家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在发展苏区财政金融事业方面，郑义斋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和财委会的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银行向工、农、商和小手工业者提供贷款的办法，认为苏区内的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均可向银行贷款，既有半年或一年的长期贷款，也有半月或数月的短期贷款，对于小手工业者的少量、短期贷款，只取低利或不计利息。这种办法实行后，对于扶持工农业生产，活跃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川陕苏区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有布钞、纸币、铜板和银元四种，开始，一些群众对苏维埃布钞有怀疑，担心不如旧币顶用。根据川陕省委关于“扩大银行的威信”的要求，郑义斋很重视银行的宣传工作和立信于民。在他的安排下，工农银行兑换处曾经在通江县城开展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宣传活动。通过宣传，使广大群众懂得工农银行的性质、任务及使用苏维埃布钞的意义，消除了对布钞的顾虑，纷纷拿银元、首饰等来兑换。工农银行使用兑换来

^①见1933年7月23日《干部必读》第30期。

的铜、铁、锡、铝等金属，一方面增加财经积累，另一方面为兵工厂提供原料。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经济工作中的一条重要原则。郑义斋认真贯彻这一原则，十分注意爱惜物力、财力，坚决反对浪费社会物质财富的行为。在张国焘实行的“左”倾政策下，红军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钞票，没收地主豪绅的贵重物品、高级家具、珍奇古玩等，均付之一炬，造成了财力、物力的严重损失。郑义斋对毁坏财物的错误做法非常气愤，并尽力加以制止。红军占领达县后，在一次干部会上，他严肃地指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东西又回到主人的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应当珍惜它们，因为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只有我们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利。”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郑义斋和总经理部的同志常常随前方部队行动，每走到一个地方，除进行爱护物质财富的宣传、教育外，并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迅速组织人力，对全部战利品及时进行清点、归类、装运、入库，设法运往后方，以扩大苏区的物资储备，供应红军作战和经济建设之需。

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这是郑义斋突出的特点。在个人生活问题上，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遇事公私分明，从不以权谋私，占公家便宜。他是省财委会主席、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掌管着财政大权和全军物资，但他和杨文局结婚时没有花公家一个铜板，没有用公家一点东西。一九三四年春，他患疟疾，时冷时热，发起高烧来汗流浹背，满身衣服湿淋淋的。警卫员见他的衣服换不过来，就到军需科领来一套衬衣衬裤。郑义斋发现后，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当即让警卫

员把领的衣服退回去，并责成他向军需科作了检查。

（四）

川陕苏区时期，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极力推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在肃反中，张国焘大搞扩大化，以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打击、迫害与他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千方百计地加强其军阀主义统治。郑义斋和许多干部一样，当时还未能从本质上认识张国焘，但他对张国焘的一些错误已开始有所觉察，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斗争，保护了一些革命干部。

在肃反扩大化中，一些有文化、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同志，往往成为怀疑、打击的重点对象，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测。郑义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冒风险，想办法，尽力减少因肃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他提出后勤部门业务、技术性强，没有文化的人干不了；从事财经工作，搞军工生产，同白区进行贸易，要有一定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外行不能顶替等等，竭力保护那些身处逆境的同志。对于所谓有“问题”的同志，他建议不把他们抓走，边留用边“改造”。用这种方法，使一些好同志和有用之才幸免于难。林月琴、李泛山等就是在郑义斋的保护下，得以继续为党工作的。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一九二七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加入共青团，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中，林月琴就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送进

“劳政队”，四方面军西征时，她又被遣散。但林月琴并没有因为遭受挫折而动摇对党的信念。她和几位女同志紧紧跟着西征的部队，长途跋涉，备尝艰辛，辗转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当了几个月的“编外红军”。郑义斋深入了解到林月琴革命意志坚定，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就任命她为妇女工兵营营长。在郑义斋等的支持和帮助下，林月琴激情满怀地努力工作，使妇女工兵营成为一个团结向上、生气勃勃的战斗集体，在后勤战线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李泛山是知识分子，一九三〇年入党，曾在白区为党工作，参加领导过南部县升钟寺农民起义，一九三三年十月来到红四方面军。不久，张国焘硬说他在白区工作期间“右倾”，责令他进行反省，临时到总经理部打杂，听候处理。李泛山诚实可靠，作风正派，又有较高的文化程度，郑义斋认为对这样的人才不应该歧视、压制，就安排他在总经理部当科员。当张国焘追问此事时，郑义斋机敏地说：“李泛山检讨不错，能接受改造。”这样，李泛山才免遭不幸。后来，有人诬陷李泛山同一个国民党起义军官有联系，张国焘准备把他抓起来。郑义斋得悉后，便让李泛山到外地去设立物资收购站，待危险过去了，才让他回到总经理部工作，以后任总务科长、制造处长。当李泛山回忆这段往事时，以感激不尽的心情说：“那时候，不是郑部长想法保护，我这把骨头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五)

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西征。郑义斋率领总供给部及所属工厂，随部队行动。

红军渡过嘉陵江后，郑义斋根据前方、后方不断转移的情况，很快组成了三个兵站，跟随部队就地筹集粮食和物资。红军在宿营地若有两三天休息时间，各工厂立即就地取材，进行生产，赶制被服用品，修理枪械，制造弹药等，争分夺秒地为部队提供军需物资。

五月初，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渡过天险大渡河，向天全、芦山挺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师。得到这一消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郑义斋号召并组织总供给部所属全体同志积极行动起来，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还准备了许多衣服鞋袜送给兄弟部队，表现了人民军队之间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团结友爱精神。

在长征途中，郑义斋时刻关心着战士们的安全，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行军路上，他很少骑马，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或者帮助同志们驮东西。遇到难走的地方，他就赶到前面带路。过草地时，他一手牵着马，一手拄着棍，走在部队前边探路，发现哪一段沼泽地不能走，就用红布条作个标记，告诉大家不要通过。过了危险地带，他又和警卫员站在路旁，看着部队都走过来了，才继续跟随部队前进。每到一宿营地，他都要亲自对水源、野菜等情况作调查，防止大家感染、中毒，待安排妥善后才去休息。

一九三五年九月，郑义斋调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翌年六月又调回总供给部继续任部长。

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后，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渡河西进。郑义斋领导的总供给部及所属单位亦随部队渡河。十一月十日，渡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

不久，西路军孤军深入于各方面条件极为不利的甘肃“河西走廊”，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苦战，仍然屡遭挫败。在红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日子里，郑义斋和总供给部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努力解决红军的给养和物资供应问题。每到一地，他们不顾劳累，深入当地群众中调查情况，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同时尽一切可能收购粮食、布匹和铜铁物资，组织随军工厂制作衣服鞋袜，制造弹药，及时送往前线。后来，红军伤亡越来越大，局势日益紧张，后勤人员也要投入战斗，携带的机器设备大都损失、扔掉，只剩下一副铸手榴弹的模子和旋口机。尽管如此，郑义斋仍然组织大家设法搞好后勤供应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进入抚彝（今临泽县）的西路军遭敌围攻。“驻守在临泽城的主要是总部后勤部门，这是我们全军的生命线。这里有驮着全军经费的辎重部队，有全军唯一能制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一个小小兵工厂，有医院，有供给部门……城内除了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经历过一些战斗外，其他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和几百个女同志及勤杂人员”^①。而包围县城的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却有五个团的兵力。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守住临泽城，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负责这次守城的是郑义斋。他命令富有战斗经验的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担任守城前线指挥，并用坚定的语气对秦基伟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们要时刻想着全军，全军不能没有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战胜敌人！”^②随之，总部直属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员全部组织起来，编成班、排、连，男同志担负守城任务，

①②秦基伟：《苦战临泽》，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434页。

女同志负责做饭、救护伤员并拣石头当武器。在激烈的战斗中，郑义斋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敌人攻城时，他冒着密集的炮火登上城头，组织、鼓动战士们用枪、矛、砖、石阻击敌人，把敌人打垮了，他又下来督促修械工人赶制手榴弹，还亲自帮助拉风箱。这样，经过五昼夜的激战，在主力红军的策应下，城内红军才突破重围，转移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一带。

从抚彝突围出来，郑义斋已经十分疲惫，身体消瘦了许多，眼窝陷得很深，但他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便不顾疲劳困顿，又立即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开会，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振作精神，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还多次检查、督促修械厂的生产。看到工人们日夜苦战，非常劳累，不仅给予鼓励，而且让炊事员给工人们做点面条，烧些茶水，送到现场为他们添把劲。

二月下旬，集中于倪家营子的西路军又被敌人围攻，红军与敌血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不得不突围转移，退入祁连山麓。三月十四日，西路军总部鉴于局势严重恶化，遂在康龙寺以南之石窝附近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以后的行动方针。

郑义斋接到开会的通知，估计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遂在行前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必要的安排。他把总供给部原来分散保存的金子、银元集中起来，准备交总指挥部，以备急需。接着又对秘书廖静民、处长李品仙一一交待了工作，鼓励大家坚定顽强地战斗下去。

这时，石窝一带全被皑皑白雪覆盖着，寒气刺骨。行前的那天晚上，郑义斋和一部分后勤人员露宿在森林里，大家冻得

不住地打颤。警卫员小曾拾来干柴点起一堆火，用仅有的一个小铁壶熬了点小米稀粥，给郑义斋盛了一小茶缸。郑义斋把周围的同志看了看说：“大家都有了吗？都喝点暖和暖和身子。”夜深了，同志们由于过度疲劳，互相依偎着坐在地上渐渐睡着了。可是，郑义斋和杨文局却思绪万千，怎么也合不上眼。文局第二次怀孕已经八个月了（第一个男孩长征后不久送给了一位老乡），想到义斋这次离去将会成为诀别，她禁不住掉下了眼泪。郑义斋劝慰她说：“文局啊，共产党员应该坚强些，挺起来！”又嘱咐说：“我如果牺牲了，你不管生下的是男是女，都不能丢掉，一定要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让他（她）继承革命事业。”

十四日清晨，义斋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包好的金子和银元，奔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刚走不远，就被尾追的敌人包围起来。郑义斋双手提着枪，沉着应战，指挥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追击的敌人。但援敌不断增多，包围圈越来越小。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金子和银元突围，叮嘱小张千方百计送到指挥部，他自己留下来坚守阵地，同战士们一起奋力掩护。小张终于冲了出去，将经费安全送到总指挥部，但担任掩护的同志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郑义斋也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三十六岁。

郑义斋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对苏区的经济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红四方面军后勤工作的出色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全国解放后，为了缅怀和表彰郑义斋等西路军英勇牺牲的

同志们，党和人民政府在甘肃高台烈士陵园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朱德在题词中写道：“伟大的革命先驱的事业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徐向前的题词是：“振堂、海松、后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光荣。”这些题词都深切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郑义斋等烈士的敬仰之情，也是对烈士们的永久纪念。

附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凡未注明出处者，见以下诸种：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编》。
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杨文局：《红色的理财专家——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载1982年4月2日《人民日报》。
5. 访杨文局谈话记录及其有关文稿。
6. 张琴秋、苏井观写给郑义斋亲属的信件。
7.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

贺炳炎

方城

贺炳炎是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红二方面军和一二〇师、西北野战军的著名战将，屡建奇功。建国后，授上将军衔，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他负伤十一次，劳瘁过甚，一九六〇年七月病逝。

（一）

贺炳炎，幼名明言，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农历壬子年腊月三十）诞生在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黑冲子口一户雇农家里。

父亲贺学文，原籍宜都九道河。因生计所迫，很小就给人帮工，种过地，当过屠夫，挖过煤。到壮年，还是孑身一人。后来，他到了江家湾，才给一位寡妇做了顶门女婿。妻子姓晏，乳名兰儿，结婚不久就迁到松滋刘家场黑冲子口，一年后，生下了贺炳炎。

贺炳炎九岁时，母亲病死。他从小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一天，他和小伙伴们掏了地主周武寿的几只鸽子。周武寿赶到贺家门口，大吵大闹，硬是逼着贺家赔了钱才算数。这件事气坏了贺炳炎。以后，只要有钱人的孩子欺侮他，他便拚死相

斗；遇到穷苦人家子弟受人欺侮，他总要挥拳相助，打抱不平^①。

一九二六年秋，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从湘西进入松滋。在北伐军的支持下，松滋县党部及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公开成立^②。贺学文参加了刘家场地区的农民协会。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松滋的革命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一九二八年秋，贺龙等在湘西创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游击到松滋，打土豪，惩团防，救济贫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穷人起来革命，对贺炳炎影响很大。从此，他便产生了参加部队反抗土豪劣绅的念头^③。因此，当一九二九年春贺龙率工农革命军再次游击松滋时，贺炳炎毅然参加了红军。

这时，十六岁的贺炳炎正在刘家场镇向元丰铁匠铺当学徒。他先跟父亲说要去当兵，父亲没有答应。其实，父亲是自己想参军。他暗地把炳炎托附给铁匠铺另一个学徒蓝良鉴，瞒着儿子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蓝良鉴往贺炳炎床上一摸，人不见了，急忙跑上街找，知道的人告诉他：“小铁匠跟着队伍走了，揸个背架子，长布衫子的下摆都撕了一大截！”^④父亲在队伍里听说炳炎也跑来了，找到他要他回家，他死活不肯走。父子俩便这样一道当了红军。

①③参见贺炳炎：《思想历史自传》（1942年12月14日—1943年3月20日），存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档案科。

②参见《松滋县志·记事》（民国本），存松滋县档案馆。

④蓝良鉴老人的回忆。

(二)

贺炳炎参军后，先是喂马。喂了几天，大家见他年纪小，个子矮，不想要他。贺炳炎嚎啕大哭，说什么也不肯走。正闹得不可开交，贺龙从这里经过，见他哭得伤心，就说：“好好好，把他拨到宣传部去提浆糊桶子吧。”^①以后，贺炳炎又给二营营长陈昌厚当勤务员。不久，调到总指挥部手枪队当战士，很快提升为班长。

一九二九年九月，贺炳炎经王尚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②。后来，他给贺龙当特务员。不到一个月，又调到总指挥部便衣队当班长。

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战争的锻炼，贺炳炎认识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共产党员应起模范作用；懂得了为什么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打倒帝国主义等许多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赤手空拳从敌人手中缴获枪枝，也曾单枪匹马深入敌群捉来俘虏。那是在大小洪山地区，部队刚从洪湖拖出来，非常疲惫，可是敌人追击越来越紧。想停下来反攻吧，却摸不清敌人的情况。贺龙给了贺炳炎一个捉俘虏的任务，限他一天办到。第二天，贺炳炎果然押着个比他高出一头的俘虏回来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在松滋杨林市地区，红二军团遭敌十八个团的重兵围攻，虽经激烈战斗，终因敌我悬殊，难以取胜。总指挥部下令突围，向刘家场转移。贺炳炎等

①沙汀：《记贺龙》，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②参见贺炳炎：《自传》（1953年8月27日），存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档案科。

护卫邓中夏、贺龙等军团首长突围，但被强敌尾追，情况万分危急。贺炳炎急中生智，一刀砍破马驮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哗哗坠地，撒满路面。敌人见钱眼花，顿时你抢我夺，挤成一团。贺炳炎等趁这个机会，护卫军团首长突出了重围。

一九三二年春，贺炳炎从便衣队调到湘鄂西军校学习，先当班长，后任区队长。六月初，川军乘我红三军主力开赴襄北之机，分三路进犯洪湖苏区。敌以第二十一军两个团的兵力进攻陈砣子口，直接威胁我湘鄂西军委分会的安全。当时，这里只有省军委警卫团和少数地方武装。军校学员奉命参战，但是枪枝很少。贺炳炎把自己的枪让给别人，拿起一把菜刀冲入敌群，左砍右杀，又夺来一支枪，和战友们一起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件事轰动了全校，因而受到校部表扬^①。军校结业后，贺炳炎调任骑兵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不久，又调军部手枪大队，先后任区队长、大队长。

六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对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何成濬、徐源泉率左路军十万余众进攻洪湖苏区。苏区军民全力投入反“围剿”斗争。为牵动敌人并取得粮食，红三军七、八两师于八月十三日向沙市、草市进攻。八师首先袭入草市，主力进入镇内，以一部向西警戒，与荆州守敌对峙。军部直接指挥七师进攻沙市，却因敌人工事坚固，负隅顽抗，我军急攻不克。午后，敌援兵赶到。隐蔽在草市镇内的敌人乘势出击，将我八师包围，情势万分危急。贺炳炎闻讯，焦急万分，因为这时沙市战斗正紧，七师不能抽兵策应。于是他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军部报告，一面主

^①参见贺炳炎：《自传》（1953年8月27日）及贺炳炎墓碑文。

动率手枪大队驰援草市。经半天激战，从正面冲入敌人包围圈，打开一条通路，将八师接出敌围。贺炳炎因此受到军部嘉奖，手枪大队也荣获“模范大队”称号。之后，贺炳炎又调任骑兵大队大队长。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节节失利。八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主力转移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转移前夕，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命令贺炳炎和少共湘鄂西省委书记宋盘铭，带三个县的游击队到襄北打游击，继续拉队伍，精干的编成独立团，其余的编成游击队，等敌人“围剿”结束，再相机回洪湖；同时，负责将洪湖地区的三四千名干部、群众，护送到襄北安置。贺炳炎被任命为襄北独立团团长，宋盘铭任政委。

接受任务的当夜，贺炳炎就和宋盘铭带领三个县的游击队共二百余人，离开新沟嘴，经过两天一夜急行军，到达马良与各路群众队伍会合。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迅速渡过襄河，随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向襄北大洪山地区进发。沿途干部、群众纷纷自动加入这支队伍，人数越来越多。为避免和敌人主力接触，队伍走小路，宿松林，多次突破敌军的拦截。到达大洪山地区，正式编成襄北独立团，人枪达千余。

独立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主动打击敌人，有时袭击敌人的小据点，有时伏击敌人的行军队伍。这时，围攻洪湖苏区的敌人，也纷纷渡襄河向北，追赶红三军。贺炳炎和宋盘铭决定袭击这些敌人，拖住他们的后腿，以减轻主力部队的压力。仅客店坡一仗，独立团就全歼敌八十五师辎重营，毙伤敌七百余人，缴获大量子弹、粮食、衣服、西药和骡马。经过多次战斗，不仅牵制了敌人，独立团本身的装备也得到改善，战斗力

大大提高。

在大部分敌人跟踪我主力西去以后，贺炳炎和宋盘铭率独立团回到洪湖苏区。由于敌人的连续“清剿”，苏区党组织和红色政权被破坏，没有撤走的共产党员被杀害，无数村庄被烧成废墟，粮食、牲畜被敌掠走；独立团没有立足之地，四处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新沟嘴到浩子口，从浩子口到沙岗，独立团来往转战，一日数仗，吃饭睡觉都没有时间，部队拖得精疲力尽，只得重新退出洪湖，再渡襄河北上。

回到襄北后，独立团在东起应城、京山、天门，西至荆门、当阳的广大地区，打击敌人，建立地方武装。贺龙等军首长对单独在襄北活动的贺炳炎和他率领的独立团极为关切，红三军出发西征时，即派侦察队东返寻找。十月，侦察队找到独立团，传达了军首长的命令：留一部及地方游击队坚持襄北斗争，大部迅速西进，赶上主力。贺炳炎即率独立团主力一千七百余离开襄北，边走边打，历时一个多月，行军一千多里，在鄂豫边与红三军主力会合。

(三)

和主力会合以后，贺炳炎调任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担任全军后卫。十一月初，红三军从随县以北翻越桐柏山，进入豫西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连续作战，于十二月底到达湘鄂边。

红三军到达湘鄂边不久，贺学文在鹤峰牺牲。贺炳炎亲手掩埋了父亲的尸体。

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二十二团在湖南桑植泥糊塔与敌新三十四师周燮卿旅激战中，贺炳炎负伤，转往军部休养，任军

部特务班班长。伤愈后，又调任红九师二十五团团长。

这已经是贺炳炎第八次负伤了。因为他打仗非常勇敢，枪一响就往前冲，所以经常受伤。他的老战友谭友林回忆道：“打起仗来，他总是冲在最前，退在最后，因此，负伤次数也最多，差不多每年总有一两次。但是，他满不在乎，裹着绷带照样打冲锋。贺炳炎负了伤，好得也快。人们说他的血好，他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不塌塌的，没有什么了不起。’”^①他的老上级贺龙，后来在谈到他时，曾说：“是不是好干部，你要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去看他。好的，一定坚决，一定不悲观动摇。贺炳炎这个家伙就越打越硬，尽管环境极端困难，他也拿得出劲来！”^②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革命虎将，不久却被诬为“改组派”，被捆了起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政策，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继在洪湖苏区两次抓捕“改组派”后，又在湘鄂边进行第三、第四次“肃反”。一九三三年五月，贺炳炎已调任红七师十九团团长。当他率部转战到鹤峰的时候，他被捕了。

“罪证”是某个被逼供承认的“改组派”分子，“供认”和他一起下馆子吃过饭。前一天早晨，贺炳炎就预感到自己将被逮捕。他带着几个特务员爬上宿营地旁边的山头，呆了一整天，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曾想，“谁若来捕我，打死他几个就是，然后再跑掉。”“但是又想到，若跑掉了，只有当土匪，或者回家，这都是没有出路的。天快黑了，才考虑好，想到自

①谭友林：《大无畏——忆贺龙军长》，载《星火燎原》1981年第5期。

②沙汀：《记贺龙》。

己是在红军中跟贺龙长大的，还是坚决（留）下来，跟贺龙干好了。不捕便好，若真的捕了去，就请死好了。”^①

贺炳炎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但他毫不屈服。他曾当众质问夏曦：“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②贺炳炎虽然身材瘦小，却膂力过人。平常摔跤，很少有人能胜过他。看守怕他逃脱，行军时用几根绳子分别捆住他的臂膀，套住他的脖子，前面一个人牵，后面一个人拉。后来还给他上反铐，戴重镣，把沉重的米袋、大捆的草鞋压在他肩上。但他仍不服管束。就这样捆了二十九天，被贺龙发现了。贺龙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要捆贺炳炎？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打起敌人来会那样不要命吗？！他十四五岁跑来投红军，是我把他拣回来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成人的，别人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清楚！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③这样，夏曦才同意把贺炳炎放了出来。

贺炳炎虽被释放，却不被信任。但他仍衔冤受命，忍辱负重，为的是用行动表白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最初，他被派到新兵大队当大队长。新兵大队又叫特科大队，是一支刚被收编的“神兵”（迷信帮会的兵丁），士兵们带着浓厚的封建意识，都相信念佛之后会刀枪不入。他们作战相当勇敢，而且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出身。贺炳炎因势利导，耐心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这个大队很快成为一支勇于战斗的部队。在贺炳炎领导下，新兵大队打了很多胜仗，扩充了一千多人，后来都分编到各部队。新兵大队分编以

①贺炳炎：《思想历史自传》（1942年12月—1943年3月）。

②樊哲祥的回忆。

③谭友林：《大无畏——忆贺龙军长》。

后，贺炳炎又奉命到黑洞镇扩展游击队，很快发展成一个大队，贺炳炎任大队长。因为这个大队英勇善战，能打硬仗，人们都称它“铁壳大队”。后来这个大队改编成湘鄂川黔独立团，不久编入红三军主力。

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三军到达黔东。六月十九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派出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各地苏维埃政权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黔东苏区初步形成。黔东苏区的开辟，结束了红三军长期的游击状态和流动生活，成为退出湘鄂西根据地以来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在开辟黔东苏区的斗争中，贺炳炎奉命率干部大队一个班到沿河县，以上坝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这个班的成员大都是“肃反”中被诬指为“改组派”，这些刚刚恢复自由、恢复干部称号的好同志，工作情绪很高。沿河县位于乌江两岸，地处偏僻贫瘠的大山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压榨下，这里的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贺炳炎和同志们一道，一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一方面将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分给穷人，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同时，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消灭国民党的地方保卫团，打开恶霸地主的山寨，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了，部队迅速发展，正式组建成沿河县独立团，由贺炳炎任团长，熊仲清任团政委。

黔东苏区创建后，贵州军阀王家烈先后调集李成岗旅三个团、廖怀中师一部及其他部队，加上地方团防武装，连续对苏区发起围攻。八月中旬到九月初，沿河独立团曾在红九师的配

合下，两度击退进入淇滩的黔军，歼敌两个营。第二次打淇滩时，贺炳炎与三名战士带一支步枪，一次就俘虏了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九月，湘敌周燮卿旅、川敌达凤岗旅又分别从东西两侧逼进，妄图配合黔敌将我军彻底消灭。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我军采取外线作战和“避实就虚”的战术，把敌人引出苏区，于九月底在木黄地区歼灭大量敌人，缴获大批物资。贺炳炎率沿河独立团参加木黄战斗后，与红九师一道，乘胜向沿河守敌杨畅时部发起进攻。我军出敌不意进袭沿河县城，敌仓惶败逃。我追至黑水地区将敌围歼，缴枪三百余支。与此同时，我军另一部在苏家铺亦击溃湘军一个团。川军慑于我军威势，一直死守防地，按兵不动。至此，川湘黔三省军阀联合进攻黔东苏区的计划归于失败。以后，沿河、黔东、川黔边、印江、德江等五个独立团和黔东纵队被整编成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熊仲清任师政委。

十月，从湘赣边区突围长征的红六军团到达黔东。贺炳炎奉命率黔东独立师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兼程疾进，接应红六军团，首先与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所率前卫部队会合。二十四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主力于木黄、石梁一带会师。

此后，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称号，部队进行整编，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黔东独立师编成二军团六师十八团和另一个独立团，贺炳炎调任十八团团长。

这时，中央红军已从江西突围，向西转移，正与敌军苦战于湘粤桂边境。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决定进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

就在湘西永顺十万坪战役前夕，贺炳炎突然被调到总指挥部任管理科长兼作战参谋。这次职务变动，实际上仍然是“左”

倾错误的影响。贺炳炎虽蒙受委屈，工作仍兢兢业业。这时正处于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六路“围剿”的紧张阶段，贺炳炎除负责将打土豪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和转运全军的伤病员外，打仗时哪里情况紧急，就到哪里担任临时指挥。人们戏称他是“补缺官”。在大庸高粱坪战斗中，敌人打到总指挥部。他主动带领警卫员、炊事员、管理员、饲养员、运输员一起上阵，打垮了敌人，而他自己腰部却负了重伤。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六军团计划在后坪设伏，歼敌李觉纵队于澧水河畔。但是，敌人先我占领了制高点。红军为夺回高地，竟日反攻均未得手。这时，敌人反扑，贺炳炎奉命上阵。他一个人冲上山头，占领了有利地点，随后迅速收集了两挺机枪和一大堆手榴弹，向敌人猛烈开火——远的用机枪射击，近的用手榴弹轰炸，自己受了伤也不退缩，终于阻止了敌人，使主力得以重新整顿，组织反攻。这一仗我军虽最后被迫撤出，但仍获得歼敌近千名的战果。

六月，二、六军团以一部分兵力围困宣恩县城，集中主力于忠堡地区围攻来援之敌第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部。敌困兽犹斗，疯狂反扑，战斗十分激烈。经三天三夜苦战，我十八团伤亡很大，团长高利国负伤，全团营以上干部只剩第一营营长曾庆云和总支书记余秋里。就在这时，贺炳炎被调回十八团接任团长。他直奔火线，首先向余秋里传达提升他为团政治委员的口头命令，随即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整顿部队。十八团负责南面警戒，并阻击来凤方面援敌。次日，来凤援敌到达。贺炳炎指挥部队预先埋伏于两侧山岭，待敌进入山沟，两边一齐开火，将敌一个营全部歼灭。这时，我军另一部正从西北面猛攻。敌人听到南面响枪，以为援兵已到，纷纷向

南突围。我军乘势突入敌阵，将敌分割包围，展开肉搏。这次战斗，我生俘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全歼敌四十一师师部、一二一旅及特务营，敌其余六个团也遭我重创。

忠堡战斗结束后，红六师奉命围取龙山县城。贺炳炎率十八团据城北，经一个多星期，将外围扫清，进逼城下。后来，因敌人调来新的部队，准备向我进攻，我军乃撤离龙山，连夜赶到沙道沟。在这里得悉新从江西调来鄂西的敌八十五师谢彬部正由北向南朝板栗园开进。总指挥部决定迎上去消灭这股敌人。八月二日夜，红二军团隐蔽到达板栗园附近，并选定战场于板栗园东侧的利福田谷地。这块谷地南侧陡峭难攀，北侧茂林覆盖，红四师、红六师隐蔽在北侧丛林，十八团、十二团埋伏在两端隘口，作为堵塞两头的“瓶塞子”。贺龙总指挥命令：“以十八团的枪响为号，一齐出动！”①

贺炳炎率十八团两千余人进入阵地，迅速筑起一道简单的工事。他把打仗最猛的三营放在正面，一、二营放在两侧，团指挥所和警卫连设在三营后面。上午十一时许，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贺炳炎一声令下，霎时号声、枪声响成一片。敌人先是一阵慌乱，随即镇定下来，拚命抵抗。战斗非常激烈。由于工事简单，地形不利，加上敌人火力太猛，十八团伤亡很大，两个营长牺牲，连排干部伤亡更多。其他部队伤亡也很大，建制也被打乱。这时，总指挥部命令贺炳炎代理前沿指挥。贺炳炎立即令十八团向敌群冲击，其他各团占领四面阵地，防敌突围②。

经过一阵激烈的拚杀，敌人大部就歼，但敌师长谢彬仍带

①②贺炳炎：《板栗园阻击》，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二。

着警卫营凭据一个土围子拚命抵抗。贺炳炎正要带着部队向土围子猛冲，三营长曾庆云一把将他拖住，大声喊道：“这个围子你不能去！”^①话音未落，他自己已带着三营冲了上去。贺炳炎立即组织重机枪掩护。三营迅速冲到围墙跟前，一举拿下土围子，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次战斗，我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全部及一个特务营大部，缴获甚巨，仅弹药就有六百多箱，银元达六万多元。

板栗园战斗，是我军在敌人纵深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典型战例。战后五天，即八月八日，二、六军团又在龙山芭蕉坨击溃敌陶广部十个团。至此，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乘虚进入石(门)、临(澧)、津(市)、澧(县)、松(滋)地区，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域。就在我根据地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这时，中央红军已长征到川西北。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保存力量，遂于十一月下旬突围，进行战略转移。

突围前夕，部队进行整编，新编红五师、红十六师分属二、六军团建制。红五师由鄂川边、龙桑、龙山三个独立团组成，由贺炳炎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

^①贺炳炎：《板栗园阻击》。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首先挺进湘中，随后突然改变方向，向贵州疾进。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我军在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突然与敌陶广纵队的两个师遭遇。瓦屋塘是我军入黔必经之地，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将敌击溃，打开通道。二军团四师首先投入战斗，十二团从正面主攻，十团从右翼佯攻。六军团绕道金屋塘，拟从后面攻击，不料在这里被敌另一个师截住。敌人炮火十分猛烈，我正面部队进展困难。这时，贺龙总指挥与任弼时政委商量决定，调五师从左翼加入战斗。贺炳炎接到命令，立即率部赶赴前沿，迅速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全线冲锋^①。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右手提一支花机关冲锋枪，与战士一道，边跑边喊：“冲啊，把敌人压下去！”正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他的身旁。“快卧倒！”警卫员喊着把他推了一把，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把炮弹踢开，炮弹爆炸了，刚刚卧倒的贺炳炎被炸断了右臂^②。由于五师投入战斗，六军团又很快上来，阻我之敌被迅速击溃。

贺炳炎被抬到总指挥部卫生部，卫生部长贺彪一看，伤口骨粉肉泥，血流不止，右臂只剩一点皮连着，若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可是部队马上要撤，怎么办？贺彪立即派人报告贺龙、关向应。贺、关闻讯即至，在听完贺彪的汇报以后，决定推迟转移，马上手术。这时，手术锯已分散各处，来不及寻找。贺彪只得用修械所的钢锯给贺炳炎截骨，然后用钢锉将截面锉平。因为麻醉药少，贺彪把一块毛巾塞在贺炳炎口

①参见杨云阶遗作：《我跟贺龙闹革命》，载《征途》第1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参见纪希晨：《贺龙在长征中》，载《怀念贺龙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里，让他咬着忍痛。手术完毕时，那块毛巾已经被贺炳炎咬得稀烂了。手术刚一结束，部队即开始转移。一到宿营地，贺龙就来看望贺炳炎。贺炳炎眼里含着泪水，对贺龙说：“贺老总，我……我还能打仗吗？”“为什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照样可以骑马，可以打枪，可以打仗嘛！”贺龙用手抚摸着贺炳炎的头，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亲切地安慰他，并向他要了两块他手术时锯下的碎骨，用红绸包好，装进衣服的口袋。后来，贺龙曾多次打开这个红绸包，告诉人们：“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啊！”

由于没有镇痛的药物，贺炳炎伤口的剧烈疼痛实在无法忍受。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只好用吗啡止痛，有时一天要用十几次。一天，贺龙担心地对医生说：“用这么多吗啡，日后人还有用啊？”躺在隔壁的贺炳炎听到后，一把抓过吗啡药瓶，“砰”的一声摔得粉碎。自此，拒不再用。伤口疼痛起来，他紧咬牙关强忍。实在受不了了，便含块布巾咬住。就这样，他还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以后，飞跨鸭池河，转战乌蒙山，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月底，翻过云南西北的玉龙雪山，分两路北上。七月初，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这里，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奉命编为红二方面军。贺炳炎调任红六师师长。

在二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贺炳炎听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揭露张国焘另立党中央、分裂红军罪行的报告。一散会，他就奉令将张国焘发来的反党小册子全部退回指挥部。后来，张国焘又分派三名政治干部到二军团四、五、六师，准备接替这几个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贺炳炎早有警觉，命令那个到

六师的干部：只准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散布反中央、反毛主席的言论。

部队从甘孜出发，继续北上，进入雪山草地。行军序列是：四方面军在前，二方面军在后，贺炳炎率领的红六师担任全军后卫。雪山草地恶劣的气候，艰险的道路，已给红军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再加上粮食奇缺，几乎使红军陷于绝境。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六师，肩负着比其他部队更重的担子。他们不但要对敌作战，保证全军行进安全，还要收容二、四方面军掉队的同志。贺炳炎经常到走在最后面的十六团和这个团的后卫连，帮助解决粮食问题，与团、连干部研究收容工作，叮嘱他们要特别照顾好四方面军掉队的同志，不让一个战友再掉队。一次，贺炳炎在去十六团的路上，突然遇到暴风雪，连人带马摔下了山，他晕了过去。醒来后，他摸到一个村子里，第一件事就是派人上山找十六团的同志。这时，贺炳炎右臂截肢后还未痊愈，但他的马常常让给其他伤病员骑。有时一次遇到几个伤病员不能行走，他就用左手将伤员扶上马，送一个到前面后，又转回来驮另一个。爬山时，他让重伤员骑在马上，叫轻伤员扶着马身，拉着马尾，自己牵着缰绳，一趟一趟往上转。因为很少骑马行军，贺炳炎的鞋子跟战士们一样，烂得很快。于是，他学着一只手打草鞋，另一只手的活，完全用嘴代替。后来，他的门牙上，竟因打草鞋咬绳索磨出一个深深的槽痕。

部队进入雪山草地前，只筹到很少的粮食，途中又得不到补给，只有靠野菜充饥。而且，大部队走过后，后卫部队连野菜也很难找到了。就在快到阿坝的那天上午，后卫连走到一座小山前，怎么也爬不上去了。他们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

食，最近两天，连野菜、草根也没吃上，这天早上行军前，每人只喝了几碗开水。大家正坐下来休息时，面黄饥瘦、精疲力竭的贺炳炎带着骑兵班赶来。连长张先云说：“师长，你们先走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跟上来。”贺炳炎说：“我知道，你们的肚子已休息五、六天了，昨天晚上连野菜也没吃上，是吧！”说着，解下干粮袋，把里面仅有的一点炒面倒出来。看到师长的行动，骑兵班的同志们也倒出了自己剩下的干粮。贺炳炎叫宣传科长郑玉宝把干粮集中起来，分给后卫连。可后卫连的同志谁也不肯要。因为他们知道，出发前，师长和他们分的粮食一样多，这点炒面是他省下来的。直到贺炳炎生气地说：“这是命令，不吃不行！”大家才流着热泪，慢慢地拿出碗来。随后，贺炳炎又和骑兵班的同志一起，用自己的马把后卫连送上了山顶^①。

过了噶曲河，日子更加艰难，不仅各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一点能吃的东西，就是沿途附近能吃的野菜、草根也找不到了，指战员只得找些不知名的野草吃。为了避免中毒，贺炳炎一到宿营地，就和师政委廖汉生一起，漫山遍野找野草，找到后自己先尝，证明没有毒，再向全师推广。他们还组织各级干部动手找野菜，动口尝百草，摸索鉴别毒草的方法。这些野草又苦又涩，有的同志吃不下去，贺炳炎就送到他们嘴边，恳挚地劝说：“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吃野菜，活着去见毛主席，到党中央报到。同志，你有两只手，更要活下去呀！”^②被劝的同志

①钱治安：《我永远难忘的贺炳炎同志》，载武汉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的《回忆录选刊》第10期。

②姜平：《艰苦革命精神永留人间》，载1963年7月2日《人民日报》。

总是流着热泪，把野菜吞了下去。

就在走出草地的前两天，六师的战士们突然发现前面有座喇嘛庙。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提啦，因为那里面有粮食啊！大家走到庙前，只见贺炳炎和关向应站在门口。贺炳炎那没有臂膀的右肩头斜挂着马缰，左手不停地挥动着，一遍又一遍地对大家说，前边有野菜，这喇嘛庙里的粮食要留给后面掉队的同志，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会师后，贺炳炎率部活动于陕甘边一带，参加了山城堡战斗。

(五)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红二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红六师改编为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贺炳炎任团长，廖汉生任团政委。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贺炳炎因左臂还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被送到西安广仁医院治疗。伤愈后，他由西安经潼关、洛阳到郑州，又经石家庄转车到五寨，找到了七一六团。

这时，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地向前线运送弹药。为了切断敌人这条重要运输线，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令贺炳炎、廖汉生率七一六团到雁门关一带发动群众，寻机打击敌人。雁门关地区的群众为逃避日寇，几乎跑光了。七一六团到达这里以后，立即组织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同时，派出部队帮助群众秋收。不到两天，逃到各地的群众陆续回来，和部队相处得水乳交融。十月十六日，群众送来

情报：大同敌人集结了三百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南开忻口的模样。贺炳炎等决定伏击这股敌人，并将战场选在黑石头沟。十八日凌晨，部队进入阵地隐蔽。上午十时左右，敌汽车队临近伏击圈。就在这时，突然得到情报：南面阳明堡又开来敌人汽车一百多辆！贺炳炎、廖汉生果断决定：一起吃掉！待南路敌车队进入狭窄的黑石头沟时，贺炳炎一声喊“打！”霎时，两边山上步枪和轻重机枪一齐吼叫，八路军战士似神兵天降，扑向山沟。这时，从大同向南运行的敌人也到了，战斗愈加激烈。经过三小时的白刃格斗，毙伤敌五百余名，毁敌汽车数十辆，随后占领雁门关^①。这次战斗切断了敌人的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战役的正面防御。贺炳炎因此受到国民政府传令嘉奖。

忻口战役结束后，贺炳炎率部回五寨休整。不久，他被选送到瓦窑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三个月后，返回晋西北。这时，一二〇师已开赴冀中。他带着七、八十名干部和一个骑兵排，在冀中武强县找到了师部。

一二〇师到达冀中的时候，敌人正对冀中区发动第三次围攻。为粉碎敌人“围攻”，帮助冀中区三纵队坚持游击战争与扩大本身力量，一二〇师抽调七一六团三个连和师干部大队一部共三百零四人，组成一二〇师游击第三支队，以贺炳炎为支队长，余秋里为政治委员，常德善为副支队长，开赴大清河北岸霸县、固安、新城一带，配合冀中第五军分区部队行动。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三支队在余秋里等率领下，北渡大清河，到达新城县板家窝，与五分区部队取得联络。这时，敌人

^①参见贺炳炎：《雁门关伏击》，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五。

开始了第四次围攻。二月四日，三支队于板家窝与进攻之敌激战获胜。不久，贺炳炎到职，与支队同志一起，在板家窝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并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说服了两支自发武装，分别改编为新、固、霸和新城县游击大队，统归三支队建制。三月初，冀中独立二支队长柴恩波叛乱。贺炳炎闻讯后，一面派人向分区报告，一面派人寻找被柴恩波扣押后冲出来的干部下落，同时率部连夜南渡大清河，直逼史各庄，和兄弟部队一道，迅速平息了叛乱。三月十八日，敌人开始第五次围攻。二十六日，三支队在葛各庄歼敌六十余，配合了师主力的反围攻行动。接着，与冀中三纵队第六支队共同行动，于四月二日在堽上村歼敌八十余。五月底，奉命转至蠡县以东潞龙河两岸地区，与六支队合编为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贺炳炎任司令员，余秋里任政治委员，常德善、江东升任副司令员。

整编后，由常德善率两个连返回大清河北组建一二〇师第六支队，贺炳炎、余秋里率支队主力活动于潞龙河、滹沱河之间地区，坚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击出扰之敌，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帮助蠡县、肃宁等地的党和政府发动组织群众，发展民兵武装，并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扩充了一千五百多名新兵，全支队达到二千五百八十八人。在这期间，三支队先后进行了莲子口、魏庄、东固贤、赵段庄、师素村、北高晃、马家营等七次战斗，歼敌四百余名。三支队在冀中打出了威风，老百姓纷纷赞扬：“那支三个人戴两双手套的部队①会打胜仗！”贺龙也给予贺炳炎、余秋里和他们率领的三支队

①余秋里在红军长征的战斗中失去了左臂，他经常与贺炳炎合戴一双手套。因为三位首长只戴两双手套，所以群众这样亲切地称呼三支队。

很高的评价。他说：“贺炳炎、余秋里两个人都只有一支胳膊，刚来冀中时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了。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来了，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①

八月，一二〇师主力奉命开赴晋察冀边区整训。为了不过分减少冀中的兵力，师部将独立第二、三、四、五、六支队留在冀中，由贺炳炎统一指挥，在冀中军区领导下，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并进行扩兵工作。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在反顽斗争中，贺炳炎统率上述五个支队，以连续不断的战斗行动，从冀中打到冀南，再打到冀鲁豫，配合友军消灭了石友三、张荫梧的汉奸部队。而后返回冀中，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了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四月，贺炳炎奉命率部返回晋察冀边区休整。四月底，三支队到陈庄地区后，六支队归还建制，全支队已有三个团、四千余人了。三支队在晋察冀稍事休整，即返晋西北。随后，贺炳炎又率三支队参加晋西北夏季反“扫荡”和“百团大战”。战斗结束，三支队缩编为三五八旅第八团，贺炳炎升任三五八旅副旅长兼晋绥三军分区副司令员。

一九四一年春，贺炳炎带职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二年五月，军事学院并入中央党校，他又转入党校学习。贺炳炎少时未曾上学，又在战斗中失去了右臂，学习中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知难而进，毫不气馁。他顽强地用左手练习写字，象刚刚发蒙的小学生一样，把白纸蒙在别人写的字上，一笔一笔地描，经常练得满头大汗。上课无法记笔记，他

^①吕正操：《贺龙同志在冀中》，载《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就用心反复默记。由于他刻苦努力，思想、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到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报刊杂志了。这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贺炳炎自己省吃俭用，却经常把津贴费送给更困难的同志。在大生产运动中，同志们不让他下田干活，他就给同志们烧水送饭，不肯闲着。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贺炳炎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来，贺炳炎曾说：“这次学习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大，对我来说是空前的。在军事上总结了过去十来年的感性知识，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所提高，由过去的很少知识进而在游击战、运动战的几个主要原则上有所体会。更主要的是在党的政策路线上结合党的发展历史进行反复的、民主的讨论研究，……对党内斗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弄清了过去李立三、王明等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性质以及错误的原因，也真正认识了毛主席之所以正确伟大。……从而也解除了由于夏曦的错误肃反路线给我背起的包袱……。”^①

一九四四年秋，党中央决定：由三五九旅抽一部分主力部队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远征华南，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南方抗日根据地；同时，由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随队南下，到鄂豫皖工作。从三五八旅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第五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分任大队长和政治委员。十一月九日，南下支队离别延安，开始南征。随后两渡黄河，三跨铁路封锁线，涉过寒流彻骨的四道大河，经过敌顽结合的漫长地带，历时七十八天，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到达鄂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到这

^①贺炳炎：《自传》（1953年8月27日）。

里以后，贺炳炎和他率领的五大队留下就地工作，其余继续南下，向广东挺进。开始，贺炳炎任襄南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他们和五师的战友一道，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依靠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敌、伪、顽四方面包围之中，扩大了武装，扩大了根据地。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建立了江汉军区，贺炳炎任军区司令员。

(六)

一九四六年六月，贺炳炎奉命由江汉返回晋绥。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贺炳炎被任命为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十一月，又调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

解放战争初期，阎锡山的部队都龟缩在同蒲路沿线的几座县城里。为了大量消灭敌人，巩固解放区，我军不得不实行攻坚。但是，当时我军特别是新组建的晋北野战军，不仅缺乏攻坚经验，而且没有攻坚的重武器。贺炳炎等组织干部战士研究试验，很快制成了爆炸杆、爆破筒等爆破武器，创造了迫击炮抛射炸药、坑道爆破等爆破方法，在短期内连克朔县、宁武、崞县、原平数城。这些攻坚武器和方法在以后的西北战场攻坚作战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七年五月，在晋中汾孝战役全歼敌艾子斋部后，贺炳炎转到西北战场；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不久改任。从此，他便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和廖汉生等其他纵队首长一道，率领一纵队驰骋西北战场，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斗。

贺炳炎到达西北的时候，正值西北野战军继青化砭、羊马河两战两捷之后，胜利地进行攻克蟠龙的战役。蟠龙战役结束不久，贺炳炎就率领一纵队挥师陇东，首克蒋台，歼敌宁（夏）马（马鸿逵）军一部，继而与兄弟部队一起，收复曲子、环县，又乘胜北上，收复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及盐池地区。八月上旬，一纵队参加第一次进攻榆林战斗；接着，配合野战军其他主力，一举歼灭敌整编三十六师于米脂沙家店，使西北战场开始内线反攻。九月中旬进至关庄、岔口，重创敌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十月初，协同三纵队攻克清涧，全歼守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旅部及七十二团。旋即北上，二次进攻榆林，予敌邓宝珊部及来援之宁马军以沉重打击。

一九四八年二月，在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结束以后，西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南下陕中，转入外线作战，以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二月下旬，以野战军全部主力五个纵队，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当时宜川之敌，兵力薄弱，仅一个旅（欠一个团）把守，又较孤立。我决心首先围攻宜川，诱洛川、黄陵、宜君之敌刘戡集团来援，继集中主力，围歼援敌于瓦子街地区，后实施攻城，全歼宜川守敌。具体部署是：三、六纵队各一部攻宜川，一部在宜川城西阻击；集中一、二、四纵队于瓦子街地区，围歼援敌。一纵由西北向东南侧击敌左后，断敌归路；四纵由北向南攻敌左翼；二纵由禹门口西渡黄河，由南向北攻敌右翼。

二十四日，三、六纵队包围宜川。胡宗南急令刘戡率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及整编二十七、九十师驰援。援敌二十六日自洛川、黄陵地区出发，二十八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二十八

日下午，贺炳炎奉命率一纵由英旺、观亭地区进至莲花台、张显及其以北地区。二十九日拂晓，攻击开始。二时，贺炳炎指挥一纵队各部冒着大雪，沿公路向瓦子街攻击前进。六时，前卫团独立第一旅第三团全歼瓦子街敌搜索排，切断敌人退路，占领瓦子街。正组织攻击，突见敌九十师主力向南山蜂拥集结。这时，二纵队因距离较远，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南面高地。贺炳炎深知，如不迅速堵塞这一缺口，敌人势必由此脱逃，我整个战役计划就会落空。于是，他决定以全部预备队顶二纵队的任务。当时，虽然有同志以兵力不足和超过战斗分界而持不同意见，贺炳炎仍纵观全局，当机立断，坚令独一旅在北，三五八旅在南，同时由西向东全力攻击前进，令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团攻占瓦子街东南高地并向东进攻，堵住缺口，断敌南逃去路。部署尚未完成，敌人即以全部兵力向南突围。为控制东南山，敌人先后投入两个团与我反复争夺。我七一四团与敌奋战竟日，接连打退敌人三十余次反冲锋，毙伤敌近千人，夺占了敌阵地。全军著名的“硬骨头六连”和战斗英雄刘四虎，就是这次战斗中涌现出来的。当天下午，二纵队赶到，投入战斗。三月一日，我发起总攻，敌全部就歼，中将军长刘戡和九十师师长严明自戕身亡。二日，攻宜川城，到三日上午八时，全歼守敌，战役胜利结束。是役歼敌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两万九千余人，其中一纵队即歼敌一万一千余人。

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次大捷，它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影响了中原的形势，为我军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月七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起草《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

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并指出，这次战役胜利有许多原因，第一条就是“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①，对包括贺炳炎在内的“前线领导同志”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彭德怀等野司首长也曾通令嘉奖贺炳炎及一纵队全体指战员，表扬他们在战役中所表现的主动精神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宜瓦战役结束后，贺炳炎等率一纵队乘胜攻击，一举解放黄陵、宜君。在其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又先后参加西府、陇东、澄（城）郃（阳）、荔北及西北冬季战役，屡建奇功。一九四九年春，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四月，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贺炳炎等率一军于陕中战役解放三原、岐山等城，继于川口河、老君顶全歼敌五十七军。

七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开始全面进攻，发起扶（风）郿（眉县）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贺炳炎等率一军歼敌二十四师及六十一师大部于盩厔（周至）、郿（眉）县地区，并堵击由渭河泾水南逃之敌，共歼敌一万一千余人。扶郿战役我军全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迫胡宗南退守秦岭，两马（马步芳、马鸿逵）西窜平凉、六盘山地区。第一野战军为追歼逃敌，于二十日将主力分三路发起陇东追击战役。一军二十五日攻占陇县，二十八日于固关镇歼敌青（海）马（马步芳）骑兵第十四旅，随即越过关山，经马鹿镇、张家川，于八月四日解放秦安后，奉命就地作进军青海的战役准备。十一日从秦安出发，连克陇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7页。

西、渭源，西渡洮河、黄河，九月五日进占西宁，青海全境解放。这次西进，一军经甘南入青海，一路皆回民聚居之地。贺炳炎等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释放俘虏，公买公卖，尊重回民习俗，部队宁露宿街头，也不进清真寺，因而得到回汉人民的衷心拥戴。

一军进驻西宁以后，即奉命成立青海省军区，由贺炳炎兼任司令员，廖汉生兼任省委书记及军区政委。为了“彻底摧毁青海反动统治，建设人民的新青海”，贺炳炎等紧紧抓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三个环节，开展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他们从军队抽调两千余名干部、党员参加各级政权的创建工作，以“军政兼施，分别对待”的方针，大力清剿蒋马残敌，从而迅速争取、团结了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进步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很快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荡平了匪患，安定了秩序。一个人民的新青海巍然屹立在祖国的西北高原。

贺炳炎不仅善于用兵，而且长于治军。在紧张的战斗中，他和他的战友们总是抓紧每个战斗间隙，开展政治整军，通过诉苦、三查和每战之后的评查活动，不断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同时坚持一面作战，一面练兵，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保证了部队高度的思想统一和旺盛的战斗士气。

(七)

贺炳炎南征北战二十余年，先后十一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十六处伤痕。当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的时候，他已积劳成疾，染上了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支气管哮喘、痛

风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难于支持工作了。从一九五〇年三月起，组织曾先后把他送到兰州、北京治疗，但收效甚微。一九五二年九月，贺炳炎调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这年年底，他病情加重，严重哮喘并引起心力衰竭。鉴于他患有多种疾病，西南军区党委于一九五三年春作出决定，要他以休养为主。但是，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积极主动抓工作，找群众谈话。党委曾多次劝阻，也控制不住。党委还再三劝他到外地休养，专心治疗，他却始终不肯。他经常对人说：“现在是条件太好了。要是打仗，保险病也没有了。过去我害疟疾高烧四十度，洗个冷水澡就好了。现在这些病有什么了不起！”

一九五五年三月，贺炳炎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九月，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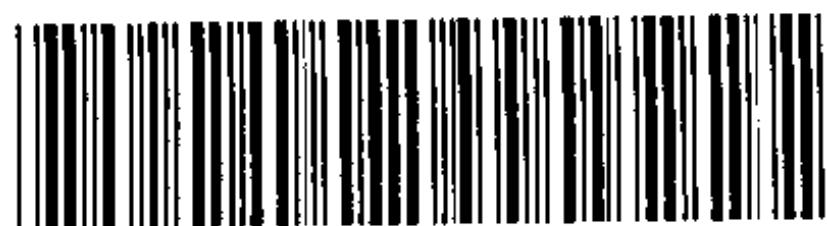
从一九五四年起，贺炳炎除主持军区的工作以外，还兼任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对省体委的工作，他不但管方针，管原则，而且管具体事。有时召开体育工作会议，他从会议的要求、开法到代表的食宿，都要亲自安排，从大会到小会，他都一一参加。一九五七年，贺炳炎率领四川省体育代表团出席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出发前，他亲自作动员报告，参加准备会；比赛时，他亲临现场指挥，还经常和运动员交谈，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在这次全运会上，四川代表团获得良好成绩，男子篮球队夺得了冠军。

建国以后，贺炳炎还是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军区党委书记，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虽然地位

变高了，生活条件变好了，但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丝毫没有改变。他经常到军人服务社同理发工、清洁工聊天，同花工、牛奶场的工人叙家常。军区机关洗澡堂、理发室、花工组、牛奶场、木工组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叫得上名字，知道他们家里的情况。贺炳炎还自己喂猪，自己种菜，经常用那仅有的左手拿着刷子给猪洗澡。等猪长到二百来斤，他就用一根小棍把它们赶到警卫连，说：“给你们，拉去宰了吃！”南瓜刚结实的时候，他就用左手在上面刻一些字。等南瓜长大成熟，人们看到那些字也长大了，有“艰苦奋斗”，有“献给毛主席”。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病体，拨了一笔款子给他盖宿舍，他却用来盖了军官宿舍，自己一直住在一所简陋的旧房子里。组织上只得退一步给他的房子安装暖气，他又把暖气片送给了医院。一九五八年，贺炳炎又患毛细支气管炎和小叶肺炎，病情再次加重。这年冬天，后勤部趁他去北京开会，把暖气安上了，他回来后狠狠地把后勤部批评了一顿。

贺炳炎病情稍有好转，又坚持工作，并积极要求参加全国全军性的重要会议。他在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后，本来可以到海南岛去参观，但他惦记着成都军区的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要乘飞机回成都。这天由于天气关系，广州到成都的飞机停飞。他便改变航线，绕道飞行，硬是当天赶了回来。一九六〇年四月，贺炳炎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时，由于身体不好，中途病倒，在京治疗月余，虽有好转，但未痊愈。返回成都后，不料于六月二十六日在原高血压及动脉粥样硬化症的基础上，突发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经多方抢救无效，于七月一日二十一时四十分逝世，终年四十七岁。

贺炳炎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忠贞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久经考验的优秀指挥员。正如贺龙在悼念他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贺炳炎同志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生，他把一生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贺炳炎同志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能密切联系群众，热情诚恳地对待同志。对敌人深恶痛绝，爱护同志胜过爱护自己，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是他的高贵品质，凡是和他共过事的人对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① 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垂史册！

作者附记

一、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贺炳炎档案资料。
2. 贺炳炎：《襄北风雪》、《板栗园阻击》、《雪山草地红旗飘》、1960年7月5日《四川日报》、《雁门关伏击》。
3. 贺龙：《悼贺炳炎同志》（1960年7月6日《四川日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贺炳炎墓碑文》。
5. 余秋里、廖汉生、黄新廷、谭友林、郑绍文、贺彪、樊哲祥、李文清、谷志标、杜时新、朱绍田、顿星云、黄新义、吴子杰、李建良、郑依保、潘显才、吴桂山、刘忠、刘佩荣、钱治安、李畔等和贺炳炎夫人姜平及其他亲属回忆贺炳炎的文章、谈话记录。
6. 沙汀、纪希晨记述贺龙生平事迹的有关著作和文章。
7. 红二方面军、一二〇师、一军战史资料。

二、本文撰写在中共松滋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在资料搜集及其他有关工作中，先后在松滋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的谭道圣、陈定茂、张念伯、柴怀山、郑昌衡、苏以幸、贺光新等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①贺龙：《悼贺炳炎同志》（未刊稿），存成都军区档案库。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二卷

作者=

页数= 3 8 2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